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黑手党秘史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言

这里记下的，只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可是，它们残酷。

因为，它们首先真实。

1978年，9月28日夜。

教皇保罗一世无声无息地死去，没有任何人知道原因。

五年后，英国作家戴维·亚洛普经过长达三年的周密调查，证明保罗一世死于黑手党人之手。

1983年5月24日。

苏伊士运河上，一条亚历山大 a 号船被截获，在上面搜出私藏的武器（一把左轮手枪，一支复射冲锋枪和一挺比利时造的机关枪）和 233 公斤泰国产的纯海洛因。

警方经过一系列详细、周密的调查，证明是黑手党罗萨里奥·里科波诺家族一手进行的贩毒活动。

1982年9月31日21时左右。

巴勒莫警察行动中心接到报告，又一起惨案在卡里尼路发生。

警务人员火速赶到现场，眼前的一切惨不忍睹：一辆 A112 型小轿车停在人行道上，车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车上有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这就是巴勒莫的省督卡尔洛·阿贝尔托·达拉基·那萨和他年轻的妻子玛努拉·塞堤·卡拉洛。

达拉·基那萨，1982年4月30日任巴勒莫省督，在对黑手党分子的恐怖活动中毫不退却地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一位著名的西西里作家在写到黑手党杀害公职官员时总结出这样一条理论：黑手党攻击和杀害的对象是那些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打击黑手党而又孤立无援的单枪匹马的作战者。

谋杀、绑架、贩毒、走私、赌博、淫业……

意大利震惊了，美国震惊了，整个世界震惊了。

1988年10月，中国，一向惜时如金的中央电视台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竟十次报道了黑手党在欧美的动向。富有权威性的《法制日报》还将美、意警方对黑手党的一次联合行动评入“1988年世界十大新闻”。

人们无法再以平静的心情坐视黑手党的灭绝人性的罪恶活动了。整个世界开始把它们目光转向黑手党制造的一次又一次耸人听闻的惨案。

黑手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犯罪团体，它已经向整个世界伸出了罪恶的黑手，人们必须从和平、安稳的美梦中警醒了。

黑手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残酷的现实开始使人们沉思。

内 容 简 介

黑手党是一场世纪的瘟疫，它们的一桩桩罪行令人发指。它们的罪恶之手无处不伸，它们的组织蔓延到全世界，不断发展壮大。这一罪恶的毒瘤似乎成为绝症。然而，它们的罪行终于激起全世界的反击。黑手党这只九足兽能否最终被消灭，人们正拭目以待。

黑手党秘史

第一章“瘟疫”家族——黑手党是一场世纪瘟疫

也许，正是这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使黑手党分子在生活中具备了一种获得成功的推动力：黑手党分子们总是能够很好地适应任何社会环境，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不具有思想意识价值这个事实，有助于他去适应他周围那些人的无穷的生活变化。几十年后，当西西里的黑手党一下跨入美国灯红酒绿的大世界后，他们不仅没有惊慌失措，而且如鱼得水似的蓬蓬勃勃发展了起来。这或许正是他们自身这种强烈的个人意志的最充分实现。对于他们而言，只需要自己的存在，其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无论黑手党分子的个人主义怎样发展，对他们而言，家族首先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黑手党家族，它的强大首先源于牢不可破的血统关系。

使一个人成为黑手党分子的关键是血统。黑手党分子生来就是黑手党分子，因为他的血统是他家族的血统。最早出现的一批黑手党，在他们之后，首先以血统壮大着自己的组织。不是黑手党分子的儿子、侄子或堂兄弟的人就不是黑手党分子，如同仍然在皇家家族流行的那样，黑手党分子总是在他们的家族之间联姻。

黑手党家族的魅力就在于黑手党本身，只有“家族”可以不顺从个人的节奏和命运。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期徒刑和多年监禁的威胁从来都没有阻止住未被关押的黑手党分子的继续前进。

家族是一个农民世界中的父权制类型的组织，它的首要的规则便是“服从”。黑手党的家族也严格遵从了这一点。在它的世界里，一位“父亲”同样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物。他不仅决定家族的全体成员应该做什么，如何分配财产，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他还必须向子女传授谋生的手段以及生存的诀窍，让他们在最险恶的环境里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权势，即使付出血的代价亦在所不惜。

在黑手党家族的许多礼仪中，对黑手党分子的男子气概做了严肃的要求。

“你必须会沉默，必须遵守秘密禁规，没有武器就不能生存。”这就是一个黑手党分子的信条。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威严的强权性的信条灌输使黑手党分子们具有了一种蔑视危险和死亡的勇气。

强大，这是任何人都崇拜的一种男性威严，黑手党利用它并使它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这种以血统关系结合在一起的黑手党家族牢不可破，即使是岁月和地理的距离也绝不能使他们的联系松弛。一个“青年人”，即使在许多年失去同其他黑手党分子的联系后，也会被重新招来执行命令（因此也能被重新招来进行黑手党的一项罪恶活动），正是这种家族的血统使西西里的黑手党分子和美国的黑手党分子之间永不衰竭地紧密联系。在某些时刻，美国黑手党头子的选举直接取决于西西里“娘家”的虔诚态度。而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发生的许多起名人被谋杀的案件都是由特意来到意大利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干的。这种密切的联系为人们追查、打击黑手党集团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在二十世纪初，从大批黑手党分子移居美国时起，美国黑手党分子始终力求执行一种同留在西西里的黑手党家族联姻的政策。事实上，只要看一下

美国黑手党分子的家系图，就会发现，在每一代中，都注入了西西里黑手党分子的血液。

在一个家族不断巩固的地位中，总育一个人会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黑手党家族的“家长”。后来，人们逐渐冠他以一个名称——“教父”。这是一个虔诚的洋溢着宗教气息的名号，相当于汉语中的“圣人”，“受人尊敬的人”。以后，人们又逐渐用“唐”代替了它。当一个人的姓氏前面被加上“唐”这个字，他就已经成为黑手党家族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一个残暴的、罪行累累的集团的大人物竟然享受着一种神圣的美好的称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任何罪大恶极的人都总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装饰。

“教父”在他的家族里受到绝对的尊重。在许多场合他并不轻易露面，总是通过中间人约会、会晤的方式，既与外界隔离，又受到尊敬。他总是与整个犯罪活动保持着很大的距离，一旦危险临近，便会有其他的黑手党分子上前替他挡住射来的“子弹”。

人们无可例外地在自己的想象里塑造着“教父”的形象，甚至离开他罪恶的面目，赋予一种高大、威严、富于男子气概的形象，并

在此之上加上了一些引人窥探的神秘感。几十年后，当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把一部名为《教父》的影片推上荧幕时，人们尽管惊恐于这个教父的凶残、毒辣，另一面却也发出了羡慕的叹声。

当然，一个家族即使再强大，力量也终究是有限的。而黑手党分子贪得无厌的利欲之心是难以忍受这种拘束的，于是一种家族的联盟出现了。这种黑手党集团的产主，对于西西里来说，意味着强权垄断的出现。黑手党分子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巩固、保卫自己的地位。

地位的巩固与力量的加强必然要依靠一定的政治势力。于是黑手党人开始努力形成一个派系，他们设法与社会上、经济界的显赫人物包括男爵、财主、教士们拉上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合法的执政者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后面我们将要提到的一个黑手党头目真科·鲁索就曾借助这种手段发展自己的势力。

“他总是和教士们打交道，教士们也去找他，他去银行也总是由教士们领着，因为银行经理也是个教士，银行一向是教士的。由于总跟这些人在一起，警察对他也尊敬起来，见面时都要打招呼致意。到5月底竞选运动时，部长扎卡尼尼和议员兰扎都同他共进晚餐，而且吃完后还是挽臂而出。”

这是一段真实的记载，它出自一位农民之口，残酷地向我们揭示了黑手党分子与上层人物狼狈勾结的事实。

在1881年，菲塔利亚的一个“受尊敬的人”达米亚诺·马扎雷塞受到当地警察的监视。于是，他向巴勒莫省督写了不少信，同时也找了菲塔利亚的亲王帮忙。

在他1882年1月4日写给省督的信中说：“……请允许我提醒您，我马扎雷塞曾为公共安全效过力。1876年9月的七天暴动中，我曾与巴勒莫派来的部队的军官合作，在那场流血事件中作过贡献。那些军官能证明我马扎雷塞的为人。

“事过六年之后，我又向本地的战友菜卜卡莱·弗里迪告发了本地潜藏

的土匪特雷迪奇，使公安人员在跟踪调查之后终于能将他捕获归案……

“此外，我在四年前还曾化名斯克帕奇，向宪兵队长揭发了强盗拉布萨，使该队长很快发现并消灭了这个坏人。”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记录里再保持平静，而西西里也不可避免地要走进一场又一场可怕的恶梦。

走出黑手党集团黑暗、罪恶的腑脏，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事实：

西西里人终于学会了沉默，因为他们不得不沉默。他们很清楚，在西西里岛上已经生长出一只强壮有力的黑手，随时准备伸出，扼住那些敢于开口说话的人。

人们称这种沉默为“乌默它”。“乌默它”逐渐成为西西里人不约而同遵守的一项原则。一旦有人胆敢违反它，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即使黑手党集团成员也不会幸免。当然，这种原则是针对官方而言的。黑手党人使西西里人完全学会了自己处理一切不幸事件而绝不向官方告发。

“不同任何司法部门合作，违者必死！”

这是黑手党集团用无数次血腥场面向人们宣告的“真理”。没有人再敢同警方有一点联系，即使是小孩也学会了如何保持沉默。

鲜血是会让人恐惧的，而死亡则会使人感到极端的恐怖。

1897年的一天。

西西里空前的一场两大家族的争斗发生了。斯托帕格里埃家族和弗拉图齐家族为了争夺对附近水源的控制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搏杀。几百条生命在转瞬之间成了游荡的亡魂。

所有参与格斗的黑手党分子都被自己身临其境的血肉横飞的场面震惊了，他们感到了一种近似毁灭性的崩溃。

然而，一切并没有结束。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弗拉图齐家族的达米科——他是指挥那些本家族黑手党分子参予争斗的头目——经过几日的避免仇杀回到了家里。

他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使他几欲昏厥的场面。他的父母、弟弟、姐妹及妻子、孩子共十三口人全部倒在血泊里，而且身首异处。女尸的下半身都裸露着。

仇恨使达米科几乎疯狂。他在毫无理智的情况下冲向了警察局。警察局记录了达米科提供的关于黑手党的一切情况。

黎明时分，达米科开始逐渐清醒，一种令他浑身颤抖不已的恐惧袭来。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他目光呆滞、喃喃自语着，继而又冲向牢房的窗口，疯狂地号叫着。

整整两天，达米科水米不进，他瑟缩在牢房的一角，仿佛等着随时而来的死神。

“黑手党会杀死我的，无论是你们还是意大利王国的全体警察都救不了我。”达米科神情木然地对前来看望的警长说道。

十几天后达米科死了。他满身弹洞，嘴里还塞着一个软木塞，胸口上放着一张圣母像。这是斯托帕格里埃家族与弗拉图齐家族的标志。两个敌对的家族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联合的谋杀行动，因为达米科违背了“乌默它”原则。

所有布防在监牢周围的警察都对这一事件流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黑手党集团是永远不会放过一个告密者的。

这种对于背叛者的惩罚令人胆战心惊。人们仅存的一点点不满的情绪也

被彻底地打在了恐惧的深谷里。

黑手党家族，即使它们之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在一点上是永远一致的，那就是——向当局告密是对整个黑手党犯下的极大罪恶，必须绝对惩罚。

“只有到地狱里他才能保持沉默，只把他杀死而别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死，那就等于他还活着。”黑手党集团用明明白白的死亡告诉人们什么是不能做的，而且是绝对不容许做的。

一个黑手党人的生涯就是他执行暴力，掠夺、凶杀的生涯。

西西里有多少这样的黑手党人，它又将面对多少刀光血影的恐怖场面呀！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准确的答案。人们只能在静悄悄的麻木里打发着时日。

然而，鲜血恣流的场面并没有因为西西里人的俯首帖耳宣告结束。在这些场面中犹为惊心动魄的则是黑手党家族之间的世代必究的复仇之战。

“死者的血会窃窃私语”，这是黑手党家族发出的复仇的呼声。

由于每个黑手党家族所遵循的规则的潜在的暴力，黑手党家族之间很容易失去平静。一种无礼的言行、一个错误、在一块划定的领土上的威信的争夺、一笔未偿还的债务、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成员对另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成员的一次十足的敲诈，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导致一起杀人事件，而对方将会进行报复，从而引起延续多年的一系列残杀。

可怕的是，那些具体进行复仇的个人，总是自觉地为整个家族的荣誉而雪耻。并且他知道，万一他倒下去，另一个同血统的人定会为他报仇。

一代又一代，绵延不息的复仇被传接下来，而那经久不息的仇恨之火则愈积愈旺。仇杀的序幕仿佛永远都没有拉上的一天，即使这舞台扩大到整个意大利、美国乃至其它的国家。

“你必须学会忍耐，因为你肩负着复仇的使命。”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教诲。

在黑手党家族中，女人在其死去的亲人带来的创伤中得到恢复之后，便开始训练和组织其子女进行报复。

生命的失去将不再回复，可是黑手党人们并没有因为死亡的威胁而收回他们洗刷耻辱的誓言。

鲜血依旧在无止境地流。

十九世纪末，阿尔卡莫市。

十几个黑手党集团的头目在一个隐密的地方聚会，他们要对这个地区毒品的贩卖情况作出详细的规定。

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教父”站了起来。在这些人中，他具有更强大的力量。这是一个古老家族的代表。

然而，这位“教父”的意见在一个年轻的黑手党头目那里受到了一点轻视。

“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聚会结束后，“教父”冷冷地对那个年轻的黑手党头目说道。一丝尖利的仇恨从他的眼里闪过。年轻的黑手党头目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知道，一个“教父”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简单的手势都必须得到遵从。而自己所流露出的轻微的不满是对他尊严的蔑视。

这个一向气焰嚣张的黑手党头目感到了恐惧，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再停留在阿尔卡莫。现在只剩下一条路——逃亡。

他逃到了美国，在美国这块高扬“自由”的领土上，这个黑手党头目感

到新的生活又来临了。他开始消除一切戒备之心。

五年后的一天，这个意气风发的黑手党人从一家华丽的餐馆走了出来，他已经志得意满，金钱、权势、美女纷纷向他涌来。几年前逃亡的噩梦结束了。

“啪”，一声枪响，大街上的人们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一具庞大的尸身已经横在了马路上。这个从西西里逃亡到美国的黑手党人在几秒钟之前是绝对不会想到，几年以来那个曾经被他轻视过的黑手党家族的“教父”是从来都没有忘记他的。

几个刚才还被簇拥在怀的美女尖叫着。

一场历经五年的跨国界的追杀终于结束了。

“谁夺你面包，就夺谁性命！”黑手党人这样说。睚眦必报的丑恶面目流露无遗。

“我死了有人埋，我活着就杀你。”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顾虑的。

在黑手党人看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是能以自己的方式让人尊重，能够保卫自己的财产，维护个人与家庭的尊严，能够调解各类问题而决不靠别人和国家当局的人。

而这种自己的方式，毫无疑问就是他们赖以发展、壮大的抢劫、仇杀、绑架、贩卖等种种暴力行为。“道德”二字在黑手党人的眼里从来没有占据过一席之地。

这是恶梦不断的夜，而这夜仿佛永远不肯离去。

西西里，从产生黑手党人之日起，就与安宁拉开了长长的距离。在血肉横飞的暴力场面中已经听不到西西里人低微的埋怨、诅咒声，恐惧已经使他们把最后一点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收了起来。

黑手党，这只“黑手”依旧在时刻不停地搜索着，从农民的土地上，从杂货铺的柜台上，甚至从乞丐破烂的口袋里，搜取着最后一枚钱币。没有人能够逃脱。

沉默，沉默。

在血雨腥风的黑暗里，除去黑手党人贪婪得意的狂笑声，仿佛就只有了沉默。“只有死人才会真正沉默。”西西里难道竟然死去了吗？

在西西里，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说话”与“吃饭”两位去问萨洛莫内国王谁能把握住嘴巴。国王说“吃饭”可以控制人的嘴巴，而“说话”则往往招灾惹祸，所以人们总是说得愈少愈好。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寓言故事，然而在十九世纪中期后的西西里，黑手党人真正使西西里人懂得了它的意义。

“谁看了不讲，谁就是好人。”

“真正的男人决不泄露任何事情，哪怕是在匕首面前。”

“南瓜南瓜，谁敢说话，死去地下。”

“谁不只顾自己的事（即谁多管闲事），就是打着灯笼找祸事。”黑手党人使这些古老的谚语得到了最好的实现。

在切发卢，一个青年因为杀人而被捕，他的母亲与神父一起到被害者坟上去。神父让死者坦白讲出凶手的名字。死者虽知这青年不是凶手，却答道：“神父。我不能回答您，这个年轻人受不正当的指控被捕。谁杀的我，上帝知道。请别问我，因为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西西里的沉默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古老传说的年

代。

黑手党人已完全使他们的名字在西西里岛上“深入人心”了。人们无法使自己脱离这种由黑手党人制造的布满罪恶、鲜血淋漓的真实生活。残酷的阴影笼罩在西西里的上空。

然而，任何一种罪恶的历史，在它的绝对性里总会出现那么一点小小的“差错”。

现在，回到 1860 年的西西里。

1860 年，对于整个意大利的历史来说，这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1860 年，加里波第领导自己的队伍在西西里登陆。

加里波第，这位意大利的英雄正在为整个国家的命运而战斗。他的到达西西里，无疑为这个沉寂的岛屿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在许多村庄，一些年轻人纷纷加入加里波第的义勇军队伍。而这个时候，逐渐出现的黑手党分子们已小有势力。他们拥有自己的武器和马匹，这对于加里波第的队伍而言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些人由于其手腕和本性已经成为村庄的首领，他们熟悉别人所不知道的道路和路线。正是这些人，在加里波第到来之际，有一部分加入了加里波第的游击体系。毫无疑问，他们完全适应南美洲那种将军就是行家的游击战。

拥有一定武装实力的黑手党分子的加入，使加里波第的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充。

另外，黑手党分子们还以他们特有的暴力手段为加里波第的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位当时许多头面人物的直接见证人和亲密的朋友、温和自由派历史学家、王国参议员拉法埃莱·德切萨雷在他的书中写道：1859 年年底，巴勒莫的意大利式的自由派曾委派黑手党杀害马尼斯卡尔科，他是波旁王朝有头脑的警察头子，因而也是那些贵族正在各委员会酝酿的未来革命的首要障碍。

与此同时，黑手党的一些小头目也加入了加里波第的队伍，如米切利和巴迪亚。

总之，在加里波第的光辉业绩中，黑手党人也画上了小小的一笔。尽管他们在以往的所有的历史中都以罪恶的面目出现，但在加里波第的起义中，他们确实充当了一定的有意义的角色。

然而，黑手党依然是黑手党，它的罪恶的本质绝不能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业绩而抹煞。在西西里的土地上，它已经完全发展壮大了起来，拥有自己一定的组织管理原则。这个愈来愈强大的罪恶的集团把它恐怖的、残暴的手伸向西西里的任何一方，声威赫赫而不容侵犯。法律、道德、宗教都被抛在无人理睬的角落。在西西里岛上，黑手党集团就是“国王”，是“法庭”，是一切行业的管理者，一切财物的分配者。

一棵强壮的大树吸食着西西里人民的血液生机勃勃地发达了起来。

漫漫长夜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西西里的大地上，黑手党在放声大笑。

西西里的大地上，贫穷的西西里人在恐怖、惊惧、不安、没有温饱保障的不幸里苟且偷生。

谁能够为这一切画上一个句号呢？

西西里人在沉默的绝望里等待着。

一定不会有人想到，揭开黑手党不幸篇章的竟然是骄横、狂妄、热衷权

势掠夺的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

第二章 血雨腥风西西里——黑手党的起源

“我以自己的人格宣誓忠于我们的团体，就像我们的团体忠于我一洋。这张图画正在化为灰烬，我的血滴正在流失，永不复返。我也同样保证把自己的鲜血献给‘团体’。灰烬不再能转化为纸，我也永远不能脱离我们的‘团体’。”

一个神圣、庄严的宣誓仪式正在西西里岛上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举行。

参加仪式的每一个人脸上都流露出一种鲜明的凝重、肃穆的表情。仿佛他们即将加入的是“上帝的使者”的行列，从此要进行的将是“崇高、伟大的事业”。

年轻的宣誓者神情庄严地望着前方，他举起的手上鲜红的血迹还在不断渗出，然而这一切对于他仿佛视若无睹。在他的前面，一支点燃的蜡烛在光线灰暗的屋子里闪着耀眼的光亮。那张画着一个头骨和两根交叉骨头的纸在蜡烛跳动的火焰里渐渐化为灰烬。

仪式顺利地结束了。

坐在椅子上的首领满意地出了一口气，他满面的严肃逐渐退去，换上一种带了点坚决的平和。

“又是一份新的、年轻的力量。”他在心里想到。这是他成为这个团体的一个首领后主持的第一百多个仪式了。每逢这种时候，他心里总会流过一种紧张的激动，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多好呀！”这位首领在心里满怀幸福地感叹道。

这是发生在19世纪初的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小小插曲，没有人会把它同几十年后那只凶残、罪恶的“黑手”联系起来。

西西里，这是一块美丽的土地，也是一块充满不幸的土地。

西西里岛整个看来就像一个充气不足的大气球系在意大利这只“大靴子”的顶端。这个位置使西西里本身就带了那么点脱离整体的独立性。

自古以来，西西里的居民构成就极其复杂，完全不同于意大利的其他组成部分。在这个岛屿上，居住着各式各样的地中海的土著居民，这些人和最早迁移来的意大利人——“锡克洛人”同时并存着。他们生性好斗，给西西里最初的发展注入了强悍的血液。

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希腊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一次又一次争先恐后地入侵西西里这块地中海的岛屿，从中谋取各种利益。但他们并不长期占有，只是如匆匆过客一般，在进行一场恣意掠夺的烧杀抢劫后，便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这个时候，登上西面里并向西西里注入生生不息血液的是阿拉伯人。

翻开历史，阿拉伯人展示给我们的首先是他们那凶猛好斗的个性。这些人仿佛携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杀气，好勇斗胜，充满着一种强烈的凶杀之息。他们不仅能够与荒漠峻岭的修酷、危险抗衡，还能漂洋过海，与大风大浪做对，总之这是一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强大的队伍。

公元827年，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又一次把贪婪的手向世界伸出，它派出了强大的远征军，从突尼斯出发，开始了气魄宏大的征服“工程”。这支队伍势力壮大，它拥有六百多艘大型战舰，四万多名士兵。浩浩荡荡的东征军使所过之处无不胆颤心惊。三年后，这支阿拉伯远征军到达了西西里东海岸的马扎拉，骁勇善战的阿拉伯人以海盗般的神速登上了陡峭的海岸。仅仅一夜工夫，那些驻守在西面里岛上的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如丧家大

般被打得落花流水。

阿拉伯人以马扎拉作为滩头堡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西西里岛。不到一个月，西西里就完全被这帮凶蛮、膘悍的阿拉伯人控制了。在此后长达 250 年的统治中；阿拉伯人把西西里变成了一个伊斯兰联邦，西西里首府巴勒莫也成了穆斯林文化的辉煌中心。虽然后来基督教在西西里逐渐居于上风，但岛上的基督教徒骨子里依旧是穆斯林文化的继承人。这些人依然保持着骠悍勇猛、杀人不眨眼的作风。这种几百年来强悍个性的渗透，使西西里的命运注定要与暴力产生密切的联系。

距今约九百多年前，西西里终于结束了阿拉伯人一统天下的历史，然而灾难并没有由于阿拉伯人的一去不复返而告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铁蹄又毫不迟疑地踏上了西西里的土地。同样凶残的盎格鲁-拉克逊人借口阿拉伯人是异教徒，挥舞屠刀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批的阿拉伯人丧失了生命，还有一部分被抓被流放。撒克逊人对阿拉伯人使用了极其残忍的刑法，他们制造了一种叫做卡塞塔刑具。那是一种盛有滚烫开水的铁盒子，然后把男人的生殖器塞进去。撒克逊人的灭绝人性的残酷镇压激起了阿拉伯人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那些幸免于难的阿拉伯人在逃进山林和偏远的野外之后，开始逐渐联络，这些流亡者开始把复仇的火种带到西西里的每一个角落。

西西里，这块丰饶美丽的土地，仿佛在它进入人类历史之后就永远都要不可避免地同强力、凶杀、流血结伴而行。

当一块土地在几百年的血腥、掠夺中挣扎，在燃烧不息的复仇之火里存在，那么这块土地必然会培植出一种崇尚强力的天性。

这也许正是黑手党凶残天性的最久远的源头。

拿破仑的大军长驱直入，意大利又一次失去了自己。法国统治者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走进了意大利的历史。

十九世纪中期，波旁家族的专制主义者住在那不勒斯城，他们把西西里王国交给了一个总督去管理。西西里的贵族们得不到任何信任，因为他们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效仿了英国的立宪政体，并且在 1884 年——宪法革命的年代里宣布推翻波旁王朝的国王斐迪南二世。

1849 年，国王恢复了专制政权，并于 1852 年访问西西里，但他执意不肯到巴勒莫去。这无疑使整个西西里的上层人士们开始产生一种不满。

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西西里的贵族们从来都不是“宫廷贵族”，同样也不是“武装贵族”，因为波旁家族把保护他们自身安全的任务——从雅各宾派当政以后曾多次受到威胁——交给了由瑞士人组成的雇佣军。这种严重的不信任，使西西里人尤其是西西里的贵族们开始采取更积极的方法来保证和维护自己的各种权益。一种极端的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的品格出现了。

与此同时，西西里的大多数贵族王子、公爵、伯爵、侯爵和有权在国王面前不脱礼帽和出卖贵族头衔的西班牙的最高贵族，一直在依靠自己拥有的封地生活。现在，他们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手段来管理自己的封地，从而巩固已有的地位。

在那个时期，一个中等的封地就会超过一千公顷。这是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地，对于这些封建领主们而言，他们是不可能、也无法直接去管理的。另一方面，这种不能称为劳动的“劳动”会使他们失去特权和利用自己社会地位的权力。西西里的贵族是从来都轻视那些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的。

其实，从 1700 年开始，由于货币的不断贬值和充分利用土地的愿望，就

导致了許多封建領主把他們的大莊園分為“小農場”的現象的出現。這些小農場都是擁有幾十公頃土地的居民區。

這種分成小農場的封地根據稅收制度予以出租：不管一年的收成好還是壞，每年必須交納一筆固定的資金，有時候也可以交納實物。當然租金比土地的实际收成要低。這樣，轉租土地的人直接耕種土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逐漸成了小農場的“中心”。

但是，這種方法並不能使土地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從而給封建領主帶來更好的收益。於是，他們開始允許這些租種土地的人可以把土地轉租給其他人，這樣封地就全部得到了利用。在這個過程中，轉租土地的人很快就掌握了根據商品價格情況用實物交稅或用現金交稅的方法。於是，轉租土地的人在封建領主們的眼裡有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在對土地利益的最大限度的榨取中，暴力開始出現了。

轉租土地者們開始成為西西里農村的新興社會集團的代表。由於對土地的有效利用，他們當中有很少一部分人賺了錢，以至於可以買下整個農莊或封建領主讓出的一部分土地。他們當中出現了“男爵”，那是他們用土地從陷入經濟困境的封建主那裡買來的頭銜。

轉租土地者擁有了大量現金、種子、衣機和牲畜。神父、律師、醫生從他們的行列裡一批批產生出來。他們開始和貴族們一起爭先恐後地掠奪和侵占國家的土地和公民的使用權。

在這場殘酷的掠奪戰中，轉租土地者意識到他們必須為自己建立起一支武裝。這是一種完全的私人暴力。因為他們需要有人監督勞動的行列，需要有人用武力收租，還需要人來保護土地。

在西西里的廣大農村，轉租土地者開始成為唯一擁有馬和武器的人。於是，在西西里古老農業的團體中開始留下了轉租土地者的痕跡：他們可以隨便殺人，結婚或離婚，給予或奪去工作。

1856年夏天的一個傍晚。

西面里一個已經很有勢力的大土地轉租者在他豪華的客廳裡大發雷霆。

“哼，你們真是沒用，我雇你們是為了收取租金，不是要你們顯示上帝的好心腸。孤兒寡母又能怎麼樣，沒有錢不是還有房子嗎？”

幾間簡陋的茅草屋對於一個富人來說也許微不足道，可是對於窮人而言，它們是生命得以繼續的重要支柱之一。

可憐的寡婦和她幼小的兒子被迫流落在街頭，他們失去了最後一點自己的財產。

西西里的轉租土地者們開始逐漸成為一個無惡不作的團體。他們的暴力行動不再僅僅停留在對於租金的榨取上，同時把罪惡的手伸向了其它行業。

然而，在西西里已經初具規模和影響的這個團體在意大利政府的眼裡是絲毫沒有地位的。政府對西西里的駭人聽聞的压榨依舊在繼續，而意大利的天主教會也仍然可以隨意剝奪西西里島上任何一個異教徒的產業。西西里這個多災多難的島嶼仿佛永無寧日，報復和仇殺的種子在西西里人、尤其是那些已經小有勢力的轉租土地者們的心里萌發着。

1862年，巴勒莫市上演了一部朱塞佩·里佐托的喜劇片子《神父住地的黑手黨》，這是“黑手黨”一詞的最早出現。

“黑手黨”在英文中拼作“Mafia”（馬菲亞），在阿拉伯語中是“避難地”的意思。以轉租土地者為主導的復仇、凶殺、掠奪的團體取用了這個名

字。从此，黑手党集团真正出现在了西西里土地上。

“黑手”，很容易引起人们这样的想象：一群染黑了手的恶魔或一伙戴黑手套的歹徒，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洗劫商店、炸毁飞机、击沉轮船……总之，他们所过之处，总是留下阴森恐怖的黑手印迹。

的确，黑手党集团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成了凶杀、掠夺、绑架、勒索的代名词，甚至意味着死亡。

1865年4月，巴勒莫行政长官菲利波·瓜尔特里奥侯爵在一份呈给内务部长的官方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黑手党这个词。黑手党集团第一次引起了官方人士的关注。

1875年5月29日，巴勒莫行政区长官索拉尼骑士在写给内务部长的信中称：“黑手党（……这个占据整个社会实体并以恐吓和庇护两种对立的方式企图取代公共权力的庞大的组织……）比政府和法律有着更大的力量。

人们再也无法忽略黑手党集团的存在了。

1866年，巴勒莫市。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被绑架，他是巴勒莫市一个富有的政府官员的独子。赎金被按时送到约定的地点，被秘密通知的警察也跟踪到了这里。

一切都加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在发展。

孩子被安全地送回了家中，警察抓住了前来取赎金的人。这是一个倔强而年轻的黑手党分子。

在警察厅里，一个以行事果决、狠辣著称的年轻警长对黑手党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当然，没有任何结果。

第二天，政府官员在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他意外地保住了生命。当他回到家时，他的十三岁的儿子在母亲悲痛欲绝的哭声里闭上了眼睛，在他瘦弱的胸脯上，有一个冒着血的窟窿。这个残忍的场面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了莫名的恐惧。

最为不幸的是那位年轻的警长。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布满了子弹穿击的血洞，他躺在血泊里，当人们发现时，早已僵硬了。

没有人在目睹了这样的场面后还敢于去亲身一试。

贵族们开始默不作声地付钱，他们不敢告发，也不能告发。在他们呈给皇家宪兵并要求国家为之逮捕敲诈勒索的黑手党分子的公文中“自卑地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穷人们也默不作声地付钱。他们非常清楚，在武装的强暴者面前，他们绝对得不到保护。因为，为了一个被关进监狱的黑手党分子，竟有一百个黑手党分子准备起来洗刷他们所遭受的耻辱。

黑手党集团在公众面前大摇大摆地发展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使人们再也不敢对安宁、和顺的生活抱一点希望。

在偶然的的情况下，黑手党集团的复仇也会指向罪恶的一方。

1878年，西西里岛上一位农家妇女遭到强暴，是极无人性的摧残。然而，法庭没有对这件事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施暴者是一个诺曼底贵族。

人们纷纷表示不满，却又只能看着犯法者逍遥法外。

几天后，罗马派出的巡回法庭到达巴勒莫，急迫的人们在失望之后又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然而，罗马的巡回法庭拒绝受理这一案件。公正在西西里仿佛没有一点立足的地方。

人们彻底灰心了，然而，就在法庭拒绝受理的几个小时后，那个诺曼底

贵族暴尸街头。在他的旁边放着一支长枪——是黑手党的武器“鲁巴拉”，一种装有打狼用的特大砂弹的猎枪。

黑手党集团充当了一次正义的维护者。而在实际上他们向一切外来者宣告，西西里是属于他们的，不容许任何人在这里任意行动。

实际上，这些心狠手毒的黑手党人们组成的集团逐渐成了比官方政府更大的第二政府。一切不能实现的伸冤叫屈，只要你愿意付出金钱的代价，黑手党分子们就会为你做出合理的解决。

1875年后，黑手党分子们开始进行他们一系列不择手段的“原始积累”，为自己能够取得越来越多的钱财和越来越大的权力做着积极的准备，尽管西西里人民对黑手党分子的暴力行为深恶痛绝，但对于黑手党分子而言，在公众的仇恨中成长和巩固是无关紧要的。

黑手党的力量开始变得日益公开和明显。硫磺矿和盐场这些曾经被贵族们拥有的财产，黑手党分子们开始把它们租下来或买下来。无论如何，最终几乎都由他们来经营。

麦子、葡萄、橄榄等农产品在食用前都要加工成面粉、葡萄酒、橄榄油。在像19世纪末的西西里农村这样落后和陈旧的地方，“进行这种加工工作的作坊直接设在农村的原料生产地：用牲口牵动的磨粉机、榨油机、脚踏葡萄压汁机被并入小作坊，这就是西西里的小农场。这些农场就是黑手党的势力；马、骡、驴和大大小小的车辆——特别是用于农业和运输业的时候，都掌握在黑手党分子手中，因为这样做他们有利于传递黑手党头子发出的命令。

但是，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橄榄油、葡萄酒、蔬菜和水果、盐和硫磺都必须出卖，这样一来，随着为了发展而“必须”经过黑手党分子之手的贸易的起伏，黑手党分子慢慢地从农村来到了城市。走进城市，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的一页的开始，在以后的短短时间内，黑手党分子在巴勒莫以及其它城市也拥有了某种东西。1875年，他们已经在那里创立了起初主要是面向磨坊工人和牧人的商业联合体。

黑手党人们以他们敏锐的嗅觉开始走出西西里农村的封闭圈子，向城市发起进攻。

当然，贪婪的黑手党人并不会就此放松对西西里农村的控制。

农村的黑手党分子们逐渐成了西西里农村的唯一银行家。其方法很简单。转租土地的黑手党分子把种子“借给”承租农民，承租人归还时要支付适当的“利息”，本息全是实物，但利息高达20—30%。转租土地的黑手党分子是唯一有现金的人，必要时他可以把钱借给办理婚事、丧事、治病或移居的人们，像一个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高尚的人，黑手党分子们竟带了点“高大”的味道。人们称之为“大叔”。这位“大叔”接待顾客时无须办理银行手续。“大叔”凭直觉就能了解顾客，并且知道，在蒂齐奥的欠款可以延期归还而无需写任何字据。因为，如果最后欠款没有偿还，那么“大叔”就会毫不犹豫的收起慈善家的面孔，拿走欠债农民的驴子或房子，甚至成为其灵魂的主人。在“大叔”的身后随时都有人走出向那欠债者射出致命的一枪。“高利贷”和“死亡”一起出现并保留在黑手党分子的字典里。

毋庸置疑，在19世纪末，黑手党分子通过这些“正大光明”的途径日益成为巴勒莫、特拉巴尼和阿格里琴托农村中的经济支柱，在这些地方，一切按照黑手党分子的愿望发展着，没有任何使他们感到不快的事发生。

西西里的黑手党们在对城市文明的渗透中，并没有忘记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

从 1875 年到 1915 年，西西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黑手党分子们也不失时机地和统治阶级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并且使这种联系更加直接、密切和公开化。他们几乎产生了一种“同事”一样的亲密感。

在西西里举行的公民选举中，居于上层的男爵们开始利用他们的黑手党“主顾”在选举中作弊。

共济会会员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在 1918 年后曾担任总理。正是他使用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举行公共宴会的方式来调节他的竞选活动的节奏，而这些活动几乎全部都在充斥着黑手党分子的蒙雷亚莱和帕尔帝尼科地区举行。在这些宴会上，常常是那些黑手党分子的“大叔”和“老兄”坐在显赫的位置上当着“尊敬的议员”们的面大吃大喝。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都得到了自己需要的。

这种选举中的作弊司空见惯。选民证往往只发给那些被认为是可靠的选民。密集的枪声和许多葡萄园、橄榄园和柑桔园被炸，参加投票的是些无生气的和糊里糊涂的人，他们是热爱自己的选举权并多次去投票的选民。预制的票箱被焚烧和捣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那些总是并且仅仅是有把握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当选。

阿尔卡莫的一位男爵劫持了特地去那里主持选举活动的新官员乘坐的车；一些人在选民的住宅周围游逛并翻阅将去投票的人的名单。

……

各种各样的记载无不触目惊心，强烈的威胁、暴力气息使人们只好乖乖地呆在家里。

黑手党集团给西西里带来的仿佛只有无穷无尽的黑暗，而不幸的西西里在它默默无言的忍耐里培植着一个越来越强大的“黑手党王国”。

当我们在看过了黑手党一系列扩张势力中的罪恶行动之后，我们必须走出简单的仇恨，来透析一下这个集团表层下的本质。

“人世是敌对的，危险的，尤其是艰难的。”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子说。

年幼无知的孩子并没有想到，自己从出生之日起就享受的舒适的生活是自己的父亲依靠沾满血腥的暴力生涯掠夺而得的。

“你必须努力争取你应该得到的一切，而且要不择手段。”

孩子并没有真正领悟父亲的意思，只是从父亲威严、强悍的目光里看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将来也要拥有像父亲一样的威慑力。

这是黑手党家族对自己的子女所做的最重要的启蒙教育。

毫无疑问，这种教育培养出了一种对于暴力的崇拜。因为在孩子的眼里，首先盲目信任一切胜利者，崇拜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这一切是罪恶的。

同时，这种毫无附加条件的鼓励，使逐渐成长的黑手党人们的子女天生有了一种不顾一切达到目的的决心。在他们的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一种道德束缚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被从骨子里培植了起来。

第三章魔鬼将军莫里——血洗黑手党

当人们沉浸在自由、民主的良好氛围里，诅咒法西斯的强权、专制的时候，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经过历代浴血奋战而获得的民主制度成了黑手党集团得以生根、发芽乃至不断壮大的肥沃土壤，而与此相反，却正是法西斯的残酷、强权使黑手党集团一度气焰冲天的浩大声势被打入了苟延残喘的黑暗地狱。

在这里，一切都将从墨索里尼登上西西里开始。

墨索里尼西西里被辱

1924年5月。

巴勒莫机场。

墨索里尼走出打开的飞机舱门，早已准备好的笑容忽然冻结。

置于墨索里尼眼前的是一个非常空旷、冷清的机场。巴勒莫，这个西西里的首府城市用它惯有的对外来者的漠然和轻视迎接了这位不可一世的新任意大利政府总理。

“这种场面真正是令人耳目一新。”墨索里尼嘴角泛起一丝冷冷的笑，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嘲讽。是对自己的，还是对西西里的？

墨索里尼，1919年走进意大利的历史，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注意到这个小人物。他曾经为逃兵役而流落瑞士街头，过着乞丐一样的流浪生活；他曾经为反对政府出兵昔兰尼亚（今利比亚）鼓动示威游行，被拘捕五个月；他曾经为证明“上帝根本不存在”而慷慨陈辞，毫无顾忌地打断一位神甫的讲读；也是他曾经以手枪威胁自己的父母，迫使他们同意自己娶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做妻子。在1919年举行的意大利全国范围的竞选活动中，他又派自己的党徒肆意砸毁竞选会场。然而，正是这个品质低下、有着歇斯底里发作狂、看上去却文质彬彬、像个书店老板的人在四年后登上了意大利政治舞台，驾驭了整个意大利，结束了派系繁杂、斗争激烈的乱纷纷的争斗场面。

美丽的鲜花、热烈的掌声和无数狂热的崇拜者已经成为墨索里尼所到之处上演的同一幕戏，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为他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西西里人却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盛大的欢呼场面。墨索里尼久已飘飞的心实实在在地沉了一下，他很清楚地记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23年秋天，墨索里尼首次访问巴勒莫。

在市政府的大厅里，墨索里尼喋喋不休，做了长达六个小时的讲话。当时的墨索里尼打扮得极其时髦：身穿漂亮的早礼服，脚佩精致的鞋罩，手里还提着文明棍。所有的组合使人感到眼前好像站着—个赛马场上出身高贵的交际家。然而，当墨索里尼洋洋自得地结束了自认为非常出色的讲话后，却发现自己的那个高筒圆顶硬礼帽不见了。

所有在场的人哄然而笑，这个小小的插曲使久已忍耐的黑手党们开心倍至。

墨索里尼气急败坏。

对黑手党的敌视的种子第一次强烈地埋在了墨索里尼那颗因被侮辱而愤怒的心里。

在过去的几年里，当法西斯挥舞着大旗、所向披靡地强占城市、控制经济、掌握政治的时候，西西里对法西斯队伍的输送人员却等于零，而西西里几乎一半是掌握在黑手党集团手里的。

“嗯，黑手党。”墨索里尼出众的记忆力是绝不会忘记这一切的。

市长皮尔纳·德伊格雷奇·库恰出现在高高的市政厅的大门前。库恰。长着一张极为平庸的脸。他所有的特色都集中在那个充分表现矮、胖特点的身材上。”基亚纳洛图”，人们在背地里这样称呼他，意思是“小木桶”。也正是这个“小木桶”，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影响着整个巴勒莫市的命运——他是黑手党一个极其重要的头目。

库恰市长带着镇定、悠闲的笑容在大厅前停了一下，看了看已经到来的墨索里尼，然后迈动了他那又粗又壮的腿。库恰自始至终都是不紧不慢，仿佛他见到的只是巴勒莫任何一个小小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府官员而非风云一世的意大利首脑人物墨索里尼。

650级，墨索里尼终于看着那个笨拙的、桶状的“东西”一级一级而下，移到了自己面前。

意大利政府总理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了起来。他的整个身体绷紧，像一支稍一失控就会万箭齐发的弓箭装备，眼里是几乎按捺不住的几欲疯狂的怒气。

可是，库恰市长并没有给墨索里尼一个倾泄怒气的机会。看了看墨索里尼身后不远处装备整齐的警察——这是墨索里尼带来的一千名受过良好训练的警察，库恰带着明显的质问的口气转向了墨索里尼：

“尊敬的阁下，为什么要调动这么多的警察，这笔开支简直是浪费！”像一个长者对一个不谙世事的无知小孩的责备。

墨索里尼脸上怒潮更甚。

“如果西西里人想做什么，那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库恰市长并没有意思停下来或者改变一下自己强硬的口气。他接着说道：“然而，在我库恰的保护下，你不会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得意、狂妄从库恰市长那张胖乎乎的、其貌不扬的面孔上一层层涌来，像一张醒目的讽刺广告。

墨索里尼从巴勒莫机场就开始贮存的怒气终于膨胀到不可抑制。

他怒不可遏地咆哮起来：“不许你用这种口气与我说话，我是意大利元首，意大利元首！”狂怒的潮流使墨索里尼的呼吸沉重而滞顿，他愤怒地喘息着。

“可是阁下，这儿是西西里。”库恰市长淡淡地说道。墨索里尼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并没有使他的目光中增添一丝的恐惧与担忧。好像一个画家观赏自己的杰作一样，库恰带着满足的神情看着这位意大利元首的“表演”。

库恰市长一定忘了，一个聪明人是应该时常记着给自己留条后路的。

墨索里尼带着渐渐平缓的神情看着库恰市长。

“当然，阁下，我们是民主社会，我们都拥有自由的事业，您想做什么都可以。作为这里的主人，我愿意满足您对西西里的一切好奇心。”看着墨索里尼逐渐消下去的怒气，库恰用一种温和的、近乎理解的同情口吻说道。

“谢谢你，市长先生，我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张。请你下午召集一次市民大会，我要发表演讲。”墨索里尼用出奇平静的声音向库恰市长说道。

作为一个在短短的几年内叱咤意大利政坛的人物，在还没有彻底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自己的实力之前，墨索里尼这个一向狂傲、嚣张的军事家、政治家知道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且如何适时地收起自己目空一切的意大利首脑的作风。

1924年5月10日，下午2时。

墨索里尼向库恰市长要求的市民大会按时举行。巴勒莫美丽的马里纳广场上人山人海，十万多人聚集在这里，等待着墨索里尼将要开始的演讲。

墨索里尼面带微笑，镇定自若地走上了主席台。在他笑意盎然的面孔下，掩藏的依旧是因库恰市长的侮辱而掀起的怒潮。

“这是决不容许的，”墨索里尼在心里默默冷笑着并对自己斩钉截铁地

说道，“看吧，用不了几分钟，你们这些西西里的可怜的蠢货们，包括那些狂妄的黑手党党徒们就会俯伏在我的脚下，做我心甘情愿的臣民。”

墨索里尼抱着坚定的信心和不可摧毁的自信，要用自己的演讲征服巴勒莫，征服西西里，征服那些无法无天的黑手党们。

不可否认，墨索里尼的确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激越慷慨的言辞，撼动人心的语调，坚决有力的手势，使他的演讲具有一种征服人心的力量，也曾经为他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命运的转机，招来一批又一批狂热的追随者。

1901年，在他还是一个未诸世事的中学生的时候，就用他出色的感人至深的长篇演讲为纪念意大利天才的作曲家威尔第的大会带来了狂热而沉痛的高潮。第二天，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的名字——本尼托·墨索里尼第一次被登在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

1912年，在社会党召开的全国大会上，墨索里尼以一个勇敢的英雄的身份站了出来，他激昂、尖锐、滔滔不绝的发言指向给国王维托里奥·艾曼努埃莱三世和王后发出慰问电的社会党领导人比索拉蒂：“在罢工中，工人被军警打伤，你向他们发慰问电了吗？在工伤事故中，工人残废了，你向他们发慰问电了吗……”墨索里尼像一个工人阶级的维护神。在他的义愤填膺的演讲中，人们的情绪被完全煽动起来，社会党领导人比索拉蒂被开除出党。

也是他的演讲曾经使弗利市成千上万的人们走上街头，反对意大利政府对利比亚赤裸裸的殖民侵略。

墨索里尼的演讲为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辉煌的记录，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美好的人生的篇章。

现在，对着眼前这盛大的集会，他又要拿出自己的得意武器了。

“尊敬的西西里市民们……”

“滚回你的罗马去吧！”

“这里不需要你，蠢货！”

……

人群忽然骚动起来，墨索里尼刚刚开始演讲被完全淹没了。谩骂声、嘲笑声、怒吼声像潮水一般以不可阻挡之势扑向了墨索里尼。各种肮脏的腐烂的水果，发着腐臭味的蔬菜，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块向主席台上纷涌飞来。

夹在人群中的黑手党党徒开始挑衅了。

站在墨索里尼身边的侍卫长祖利诺忍无可忍，他伸手拔出了腰间的手枪。墨索里尼极快地制止了他，他用更高的声音讲了起来。

“是的，尊敬的西西里市民们，毫无疑问你们是正确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有谁愿意浪费几个小时在这里听我絮絮叨叨地讲话呢？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请你们谅解，请你们谅解。”

西西里曾经倒下过高贵的国王，显赫的贵族，还有许许多多上层的官员们。因为他们公开地在黑手党分子面前表现了他们的不可侮辱的尊严与他们与生俱来的高贵的愤怒。

墨索里尼终于保留着自己活着的、完整的身躯走出了西西里，他聪明而适时地收起了自己的不满。

墨索里尼诚恳的致歉使夹在人群中的黑手党党徒们遗憾地收回了已拔出的手枪和早已准备好的长长的鲁巴拉。

一天后，墨索里尼结束了原定三周的西西里巡游计划，返回罗马。这一切，对于墨索里尼而言，无疑是一场恶梦。

市政府的大厅里，库恰市长得意地放声大笑着。

“ 看吧，这就是我们的元首，杂耍团的领班。 ” 库恰对身后的人说道。

库恰市长一定想不到，正是这个他所谓的“ 杂耍团的领班 ” 主宰了未来十几年的黑手党的命运，使西西里的黑手党集团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1924 年 5 月 10 日晚，一个身着将军制服的人走进了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他就是后来被称为“ 黑手党将军 ” 的莫里。

魔鬼将军莫里

萨雷·普里莫·莫里，前内阁部长。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干瘦、矮小，头发已经全秃了。总之，这个形象和人们头脑中对将军的记忆是毫无共同点的。他五十多岁，但看上去显得更衰老一些。在莫里全身的所有器官中，只有那双眼睛会使人产生一种因威严而来的畏惧的震颤。那是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含着决绝坚韧和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沉。尤其其他那紧闭的牙关使人迅速联想起与狼撕咬、拼搏的猎狗的坚忍。

莫里功绩显赫，曾经在佛罗伦萨担任过长达十年的行政长官。当时的佛罗伦萨正与它悠久的历史名城的美名背道而驰：盗贼横行、社会混乱，人们在担忧、惊恐中度过每一天。没有人会想象到，就在佛罗伦萨，曾经有人把一位总督的裤子偷去挂在大剧场的帷幕上。在那些日子里，悠久文化所延续的一切美德都已经完全沦丧在一片乌烟瘴气之中。莫里在这个时候走马上任了。

几个月后，佛罗伦萨一改旧貌。街道整洁，秩序井然，治安良好。平和宁静的“中世纪”的美好气息，又重新洋溢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只是在这宁静的气息之外，偶尔会流露出那么一点惊心的恐惧。在这次治理的过程中，莫里以绝不迟疑的雷厉风行的果决把一千二百多名盗贼的魂灵打入了永劫不复的地狱。佛罗伦萨在那个时期成了全意大利犯罪率最低的一座城市。

佛罗伦萨又回复昔日芬芳流转、秀丽怡人的美丽容貌，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归功于莫里将军。

莫里将军站在办公桌前，是一张堆满材料的办公桌。莫里沉思着，一双阴郁的眼睛由于思考而显得更加严厉，更加深不可测。

“也许应该行动了。”他自语道，眼里闪过一道凌厉的光。

早在几个月前，当莫里被召进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一向意气昂扬的墨索里尼正气急败坏地发泄着怒气。他双拳紧握，大喊大叫。

“我命令你指挥全西西里的军队、警察和行政部门。为了肃清黑手党，你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不要管什么社会民主，不要管什么合理统治，你想怎样干就怎么干好了，因为这样做符合国家利益。”

这就是墨索里尼下达的命令。

莫里将军以他军人的严正与利落接受了这一任务。接下来的几个月，莫里便完全投入了对黑手党的研究。

现在，眼前这张大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都是关于黑手党的。

黑手党，烧杀抢劫，以毫无怜悯心的暴力手段实现自己的一切目的：规定税收数目，控制商业货物，垄断各种生产原料，并且控制西西里的水源供应；以一种完全畸形的道德观念充分显示自身存在的“伟大意义”，有强烈的复仇观念，其集团内部也存在争权夺势的各种斗争。但是，他们又并不是一帮流窜四野的、毫无组织的匪徒，他们有一定的秩序，按一定的章程行事，并有为荣誉而战的誓死信念。

莫里仔细地看。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谋杀使他触目惊心。

1893年2月1日，在一节从特尔米尼·伊梅雷塞到特拉比亚的车厢里，几个“匿名者”（材料是这样写的）杀死了西西里银行的董事埃马努埃莱·诺塔巴尔托洛侯爵，在被杀害者家属的坚持下，对这次谋杀提出了许多次惊人的诉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众议院终于在1809年批准对被指控的作为这

次谋杀的后台支柱的拉法埃莱·帕利佐洛众议员进行了起诉。大量的诉讼材料表明，这起谋杀案是黑手党实施的。拉法埃莱·帕利佐洛在1901年被波洛尼亚的重罪法庭判为犯有杀人罪。然而，一切都并没有真正结束。1905年，佛罗伦萨的重罪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赦免了拉法埃莱·帕利佐洛。这桩罪恶赦免背后的真实原因是：拉法埃洛·帕利佐洛是一个始终与黑手党分子保持着极其友好的密切关系的能干的“戴黄手套的人”。

一个完美的结局在人们的心照不宣中宣告成功。

1900年，黑手党分子绑架了著名的盎格鲁—西西里家族的年轻美貌的比安卡·惠特克小姐。他们的目的自然是金钱，三天后，比安卡·惠特克小姐的亲人们以250个金币的代价将她赎回。但是凶杀由此也开始了：绑架者们由于分配赎金的不公而发生争执，他们的头领菲菲·马基亚雷拉杀死了四个想多要赎金的同伙，但是两天后，他也遭到四个死者的亲人的杀害。20世纪的血腥绑架从此拉开了序幕。

其实，早在1878年，法国共和政府就已经采取公共措施来对付那些危害去西西里旅行的法国人的谋杀活动。但是，这对于黑手党分子们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依旧进行着自己的绑架、暗杀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谋取大量的钱财。

各种谋杀在猖狂地进行着。

1909年，纽约警察中尉乔·彼得罗西诺来到巴勒莫，他是专程赶来搜集美国黑手党与西西里黑手党联系情况的，以掌握更多材料，有效地打击黑手党。然而，他登上西西里仅仅五个小时就被人杀害在巴勒莫法院门前。

一桩又一桩罪恶的杀害在黑手党的策划下毫无顾忌地进行着。

调查证明，从1906年到1910年，就意大利全国而言，平均每十万居民中就会发生9.93起杀人案。而在巴勒莫的平均数是39.53起，在卡尔塔尼塞塔是39.23起，在阿格里琴托是34.04起。在特拉巴尼是26.73起，而这些地方都是由黑手党一手控制的。

令人震惊的数据，以强有力的真实宣告着黑手党集团的强大和不可侵犯。

早在1875年，邦凡蒂尼众议员在根据议会对西西里所做的许多著名的调查里就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黑手党是一个天生的残忍的和极尽所能谋取私利的组织。它把所有那些喜欢不是靠工作而是依靠暴力、欺骗和命令来维护生存和舒适生活的人纠合在一起，以危害国家、法律和所有合法的机构。

看着这一项项触目惊心的调查报告，莫里清晰地感到了自己肩头的重负，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个强大、凶残而又狡猾的对手，但是，莫里是绝不会退却的。

两天前，墨索里尼又一次召见他。

“坐在罗马就能消灭黑手党吗？难道你的骨头被西西里的绑匪吓软了吗？”他刚走进办公室，墨索里尼就怒气冲冲地喊道。对于莫里的一再推延行期，墨索里尼已经极为恼火了。

“我的元首，我这就去西西里看一看谁的骨头更软。”莫里用非常平静的声音回答了墨索里尼的咆哮。

“不管等多久，西西里总不会被地中海的波涛卷走。”在走出房门之际，莫里带着自信的微笑同他的元首开了个玩笑。

莫里合上最后一本卷宗。

“好吧，黑手党。”一丝残酷的笑容从莫里的嘴边滑过。

《欧洲人报》曾经这样评价莫里将军：虽然他天性好静，与世无争，但他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他的这种性格像一条狗，正好与西西里的凶暴相斗。

1925年，9月21日。

莫里以新任巴勒莫省督的身份踏上了西西里的土地。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到来，包括那些一向对陌生人的出现极其敏感、消息灵通的黑手党人们。他们还没有完全从几个月前嘲笑墨索里尼的得意的回忆里清醒过来。

莫里将军以秘密巡游的方式对西西里岛做了十几天详尽的考察，对于西西里的地势、西西里城市和小镇的分布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

1925年，10月3日。

莫里来到了巴勒莫城，在他身后是四支装备精良的别动队。这四支别动队由4000名全意大利最优秀的防暴职业杀手组成。他们果敢、勇猛且充满着一种旺盛的势不可挡的杀气。

莫里并不敢丝毫掉以轻心。他清楚地知道，对凶残、老练、秩序井然且有良好武器装备的黑手党集团而言，4000名出色的别动队员并不足以构成很大的威胁。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最迅疾的手段，砸碎黑手党人的根深蒂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感”、“荣誉感”，这对于黑手党集团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如果首先让他们的首领俯首认罪的话……”莫里在心里想到。

莫里下达了第一项命令：逮捕库恰。

库恰市长腆着满意的肚子，心情畅快地走进了市政府大厅。大厅很静，没有人过来迎接。库恰并不打算让人通报，他知道穿过大厅就会见到那位新上任的莫里省督。

“等一等，最最尊敬的库恰市长，您是来自首的吗？”坐在沙发上等候已久的韦勒迪警长对着径直走过的库恰喊道。

“自首？”库恰仿佛听到一件极其可笑的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他笑了，用宽容的眼光看了看来到面前的韦勒迪警长。

“亲爱的朋友，这可不是西西里人接待朋友的方式。”库恰用颇为幽默的声调说。

“朋友？”韦勒迪警长忽然怒气勃发。“谁和你这黑手党的猪猡称朋友？蠢货！如果不是碍于命令在身，我早就毫不客气地赏你一粒子弹了。现在，你最好弄明白，你走进的是莫里省督的驻地。西西里岛上，你呼风唤雨的时代就要成为过去的记忆了……”

库恰市长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发生在眼前的事情。韦勒迪警长一挥手，几个早已准备好的警察一拥而上。

莫里将军兴奋地听着手下的报告，“干得好！”他简单地称赞道，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开始进行了。

“库恰市长被捕了？”

“库恰市长被捕了！”

像一枚重型炸弹投放在西西里岛上，短短的几分钟，库恰被捕的消息传遍了西西里岛。所有的西西里人都震惊了。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呀，西西里岛上至高无上的黑手党市长被捕了。黑手党人们惊恐了。

当库恰被戴上手铐时，惊恐在他的心里只是一闪而过。“我要求见莫里

省督！这是非法的！”

没有人理睬他的抗议。

“好吧，用不了多久，你们会亲自为我打开的。”库恰冷冷地嘲笑道。

几分钟后，韦勒迪警长走出大厅，对正在等候的库恰的司机说：“你立刻离开这里，库恰已经被捕。”

库恰始终没有见到莫里将军，直至第二天的市民大会。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巴勒莫，来看这场不可置信的审判。

库恰被押上了台，他依旧保持着满脸的微笑。看着那些纷涌的人群和人群中夹杂的许许多多熟悉的黑手党党徒们的面孔，库恰趾高气扬地叫道：“朋友们，没什么，法律经常有用错地方的时候。我们得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是应当的。”

莫里将军没有让库恰宽容的表演继续下去，他用威严的、不可抗拒的声音宣布道：

“库恰侮辱元首，蔑视法律，对抗政府，将被永久放逐到圣索里岛。”

哄闹的人群忽然寂静下来，一种危险的气息迅速地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莫里不动声色地向早已严阵准备的别动队员做了个手势。几千颗子弹挟着尖厉的呼啸划破长空。

刚刚骚动的人群又复于平静。

“现在，请你们交出私藏的武器！”莫里将军对台下的黑手党党徒喊道。

所有的人都散去了，偌大的广场上只有三支自动交出的长枪摆放在那里，是三支老式的而且已经很陈旧的毛瑟枪。

当大批黑手党党徒肩扛着他们的鲁帕拉神态自若地离开广场时，莫里没有下令强制他们交出武器，莫里知道这不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他已经取得了计划中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莫里走到库恰面前：“市长先生，有地中海的波涛伴随您宁静的晚年，您应该很满意了吧！”

库恰市长的眼里是惊恐、仇恨和那么一点点无可奈何的恳求。

几个月前的库恰市长一走想不到，当他以君临天下的国王姿态对待自己的元首时，他就已经为自己今天的命运写下了一个悲剧性的开端，同时也给强大的黑手党集团埋下了一枚毁灭性的炸弹。

第二天，罗马报刊纷纷以醒目的大字打出这样的标题《库恰市长当众丑态百出，莫里将军就任首战告捷》。

同一时刻，墨索里尼在国会大叫：“莫里将在三个月内使西西里变成意大利的花园。”

跟随莫里将军同赴西西里的一位《罗马每日新闻》的记者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当初我应莫里将军之邀前往西西里，原以为几个月后也只不过能发回一些诸如警察被除、黑手党连占上风的坏消息，没想到两天不到就爆出了黑手党党魁哀求宽恕的头版头条特大新闻，而且图文并茂。

库恰市长的被流放对于黑手党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致命的打击，凡十年来，他们高高在上、引以自豪的尊严感第一次被莫里将军的铁掌毫不留情地打翻在地。“荣誉至上，不可侵犯”的美梦破碎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莫里将军以雷厉风行的果决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行动。他知道，任何一次喘息的机会都可能使黑手党集团积蓄更大的敌对力量。

莫里将军完全抛开了法律程序，他开始使用墨索里尼赋予他的一切“特殊手段”，不止一次地使用纯军事化的策略，以更强大的残酷对付黑手党人的凶残。

当他包围一个地方并下令捉住那里的所有黑手党分子时，便对所有住宅进行突然袭击。在莫里的字典里已经没有了心慈手软这样的词，而这一切都是黑手党教给他的。

许多黑手党议员在继库恰市长之后被判以重刑或流放地中海的孤岛。成百上千的下层黑手党党徒被投入监狱，至少也在某个宪兵兵营或某个警察分局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光。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开始了。

莫里充满恐怖意味的镇压手段使黑手党集团不寒而栗。许多黑手党分子在逍遥法外或潜逃一年后，又主动向这位瘦小的、很不起眼的行政长官投案自首了。

火焰冲天的黑手党集团终于像一个被捅破的庞大的气球，慢慢地瘪了下去。

1926年10月，在美丽的马里纳广场上，莫里将军对全体市民发表了就任巴勒莫省督一周年的纪念演说：

差不多两年前，愚蠢骄傲的库恰曾在这里侮辱过我们敬爱的元首。今天，我在这里代表所有蒙昧无知的西西里人向尊敬的元首和伟大的罗马政府忏悔，库恰则在地中海的一个孤岛上上了此残生。希望他死后，灵魂还能进入天堂。这场对黑手党的战争并不只是一场警察运动，必须唤起全体西西里人们的觉悟和行动。

莫里的行动以强大的优势宣告着辉煌的胜利。然而，莫里同样清楚地知道，几十年来，黑手党集团的势力早已根深蒂固地种植在西西里的土壤里，像一棵根脉发达伸展的粗壮有力的大树，已经有足够的强壮抵御外界的狂风暴雨。任何一点沾沾自喜和漫不经心都会使已经获得的成功和将要取得的胜利化为泡影。莫里将军知道，此后的战斗将会越来越残酷。

1926年12月中旬的一个深夜。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黑夜寂静的帷幕被划破了。莫里将军队床上一跃而起，像一只敏捷的伺机出动的猛兽。一阵紧张、激奋涌来，莫里以军人的直觉和猎人的警醒清晰地感到又有一次意义重大的战斗即将开始。

电话是两名军事别动队司令打来的。他们报告说：西西里最后一个黑手党匪帮集团，在军队的围剿中，已经被迫退到了西西里中部的一个重镇——甘集。

甘集？

莫里锐利的目光在地图上搜寻着。

“立刻带一千名士兵，携大炮，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甘集。”莫里以刻不容缓的口气下达了命令。

“限令西西里所有的黑手党党徒在六小时内走出藏身之地。”六小时，这是从西西里最边远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甘集所需的时间。

莫里以他将军的决断与智慧又开始指挥一场新的战斗。

差十分钟整六个小时，莫里赶到了甘集。

远远近近的居民都被通知，聚集在一个十分开阔的场地上。没有喧闹，没有谈笑。一种沉重的压迫人的气息笼罩在甘集的上空。仿佛连那些襁褓中

的婴儿也感觉到了一种恐怖而收回了自己的呱呱啼哭。

莫里气定神闲地走下车。他全身武装，像过去许多年里走上残酷、危险的战场。

“上帝的孩子们，几分钟后就会有精彩的演出了。”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从莫里翘着的黑胡子上抖落出来。

人们都在静静地等待。

莫里环顾四周，一种强烈的坚忍从他的眼里流露出来。

“我不要巷战，让黑手党的脏血玷污我的士兵的手足是可耻的，我要让他们全部变成炮灰。”莫里低沉、坚决的声音像闷雷一样滚动在甘集阴霾的上空，也把沉甸甸的惊惧种在人们心里。依旧是死一样的寂静，那些被召集来看黑手党失败场面的人们并没有因为他们将要目睹到的一切而流露出一点欣慰。

六个小时刚到。五匹高头大马各载着一位气度不凡的黑手党党魁出现了。在他们身后，是500名腰插手枪、肩扛鲁帕拉的黑手党党徒。所有的黑手党党徒都用一种木然的却又带着强烈的誓死的眼光望着前方。

空气骤然紧张，像初秋的水突然遇到冬天的严寒。

五位黑手党头目各管各地骑马前行着。他们像一个个互不相干的国王，彼此互不理睬。只是他们的面孔上显出几乎相同的神情，那是满布的鲜明的淡漠和一点黑手党由来已久的倨傲。他们的神情把令人震颤的现实忽然拉得很远。没有了冷酷，没有了蔑视。偌大的挤满人群的场地仿佛忽然间就只剩下他们带来的一片更沉重的苍白的寂静。

所有的一切突然从画面中消失，甘集土地上这块挤满人的阔大的场地上，好像只留下五位意态淡漠的黑手党党魁和杀气浓重的莫里将军对峙而立。

好像所有的人都突然停止了呼吸。

莫里将军冷冷地看着。

走在最前面的是唐·夏洛，他来自西西里西部的皮萨基诺镇。泛着铁灰色的脸和他铁灰色的坐骑映衬，呈现出一种不容侵犯的威严。只有那或疏或密分布在脸孔上的紫色的斑点让人感到一点点威严之外的柔和。

唐·夏洛冷冷地看着相隔五十步远的莫里将军，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内容。

四十多年前，当唐·夏洛还是一个在众人眼里顽皮、无知的孩子时，他就早已经在自己的心里精心理藏、培植着仇恨的种子。他咬着牙，默默地等待了15年。26岁那年的夏天，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唐·夏洛已经长成一个身强体壮的青年，也完全掌握了杀父仇人的一切生活习惯。在一个下午，当他的杀父仇人一个人走过街道，从一棵大树下经过时，唐·夏洛从树上跳了下来。那个一向狂妄、嚣张、目空一切的黑手党头目被一下从马上掀翻下来。唐·夏洛发泄了一切仇恨。在镇中心，他用自己充满仇恨的手割下了仇人的鼻子、嘴、耳朵和生殖器。然后，唐·夏洛双手拎着这个已经失去形状的血淋淋的尸体，策马来到了死者家门前。

对这个毫无怜悯的血腥的场面，几十年后当地的人们依旧记忆犹新。从那以后，镇上的人们开始对唐·夏洛敬而远之。而唐·夏洛则由于这一事件逐渐成为皮萨基诺镇上首屈一指的人物。他代替了被自己杀死的黑手党头目的地位。唐·夏洛开始成为“受人尊敬的人”，这无疑是依靠他那令人心惊

的残酷得来的。

在唐。夏洛后面的依次是皮亚尼镇的唐·厄扎苔，卡尔塔尼塞镇的唐·底托，维拉穆拉镇的唐·马库奇以及帕蒂尼科镇的唐·昆塔那。

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曾经有过杀人、劫掠的记录，而这对于他们自己而言，是荣誉、是骄傲，是强大力量的证明。

没有一个人说话。

莫里将军轻轻地挥一下手，几十名警官立刻走了过去。看上去，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隔开黑手党头目们以保证他们的莫里将军的安全。

“把他们拉下来，跪在我的脚下向上帝祈求平安。”莫里忽然一声令下，几十名警官以粹然而起的迅疾扑向五名黑手党头目。

快速，勇猛，任何其它的意识都没有来得及从人们脑海里闪过。

五名黑手党头目在眨眼之间被扯下了他们的坐骑。

所有围观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以一种极为迅速的默契一起低下头来。没有人敢表现出一下点的得意、高兴来正视这些被踩于脚下的罪该万死的黑手党头目们的狼狈。他们心里很清楚，也许在某一个地方正有一双仇视的眼睛在捕捉任何一点幸灾乐祸的表情，而黑手党们的誓不罢休的复仇是没有人不害怕的。

500名装备整齐的黑手党党徒一时愣在那里，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以上帝的名义就地处决他们。”莫里将军没有给人们任何思索的余地。

只是转眼的工夫，一切都结束了，只剩下几十声枪声响过后在空气里慢慢扩散开的火药的气味使人们明白一场血腥的战斗、搏杀已经闭幕了。

500名黑手党党徒在莫里将军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所有的信心、勇敢在主子们脑浆飞溅的时刻一同被打碎了。

莫里将军下令将所有黑手党党徒戴上手铐带往一百华里外的波旁镇监牢去，而且必须是徒步而行。

莫里知道打垮黑手党、使其气焰完全熄灭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打击是什么。

“我决不能让他们再套上什么勇敢、富于牺牲精神之类的光环。我要战胜他们，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要让西西里人亲身感到他们其实不堪一击。”后来，莫里将军这样对询问的人说道。

不可否认，莫里将军是极其正确的。

当几百名黑手党党徒在人们的或震惊、或兴奋、或淡漠的目光中结束100华里路程到达波旁镇监狱后，他们已经完全垂头丧气了。在他们心目中，那以生命誓死维护的不可侵犯的尊严的堡垒已经彻底崩塌了。

“甘集之战”的辉煌成果为莫里将军镇压黑手党集团又抹上了一层异彩，也使黑手党又向最后的末路踏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然而，真正标志着盘踞于西西里岛一百多年的黑手党社会的土崩瓦解的却是名扬四海的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的落网。

唐·维托的落网

在关于审判黑手党的犯罪的众多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一个叫帕萨拉克瓦的黑手党头目对法官说：“法官先生，当您老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您一想起我们今天的会晤，您就会懂得，帕萨拉克瓦非常认真地遵守了大自然的规律，并且正直而自觉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这无疑是一段非常滑稽的黑手党头目的自白，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这又是发自肺腑的真切的自我认识。

如果从帕萨拉克瓦所持的道德观念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即将被我们记载的而在莫里看来是罪不可赦的唐·维托的确应该算是一个“高尚的人”了。

“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是黑手党空前未有的领袖。”有人这样评价说。

就实际情况而言，这种评价毫不夸张。唐·维托从19世纪末就开始统治黑手党，这种权势一直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莫里将军的到来。

唐·维托交友广泛，从最上层的达官显贵、政府要员到下层的普通百姓，他的朋友广布西西里、意大利乃至意大利之外的许多国家。这种影响使唐·维托的势力像一张向四面八方张开的大网，随时都有来自各方的信息。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唐·维托以其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组织大批黑手党党徒乘虚而入，迁人美国，开始在美国这个新世界开辟自己的王国。唐·维托本人虽然在几年后就返回了西西里，但是他一手培植的这批新势力却在美国这片正开发的土地上蓬勃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支强大的影响整个欧洲社会的犯罪集团。可以说，唐·维托是使黑手党加入美国乃至整个欧洲犯罪界的最早、最著名的组织者。

唐·维托的确称得上是“名扬四海的唐·维托”了。

在关于唐·维托的一段记载中这样写着：识字极少，身高，体瘦，衣着讲究而典雅。长长的白髯使他俨若道貌岸然的圣人、上个世纪新英格兰的传教士或尊敬的法官。态度温文尔雅，举止谦恭而庄重，生性慷慨。

这个记载使唐·维托的形象显得高贵而美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真实的。

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生于巴勒莫市附近一个叫萨奎诺的小镇，他的父亲是百分之百的农民，并且目不识丁。他们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过着艰辛的日子。

如果说造物主在创造的开始就对某一些人抱着特别的宠爱，那么，毫无疑问，唐·维托就是其中的一个。

唐·维托很早就崭露头角。这倒并不是凭借什么暴力，而完全是由于他先天的条件而得的。在唐·维托身上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气概，这气概使他显得庄重、高大，像一个完美的圣人，使人们在见到他的第一次就产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依附感、信赖感，各种人都不由自主地服从他。在西西里人怀着恐惧与敬畏的心理服从黑手人，在黑手党人持着古老、传统的古代的道德观念固守在西西里大大小小的村庄的时候，唐·维托走了出来。他使黑手党田园诗般的古风适应了二十世纪现代化城市的复杂生活，把西西里黑手党集团的势力一步步扩大，更深入地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文明中。

当人们几乎把暗杀、绑架、掠夺等等惨无人道的恐怖行为做为黑手党集

团的代名词时，在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唐·维托所有被人们崇敬、赞颂的美德却是用一种完全和平的方式获得的。

在黑手党集团一次又一次争权夺利的帮派斗争中，唐·维托的出现可以使充满火药味的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下来，并且能够用最公平的方法做出令人心服口服的裁决；在许多为家族荣誉而战的血腥浓烈的复仇活动中，唐·维托总是适时来到，以平心静气的却是不容置疑的坚决化解人们几年、几十年积累的仇恨之火；也是他曾经走进最普通的村民的庭院里，以慈善的长者的身份为他们平息家庭里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纠纷。在这种种的场合里，唐·维托完全是一个倍受尊敬的公正的法官，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个和平秩序的兢兢业业的维护者，而大名鼎鼎的、令人震颤的黑手党头目的名号则被静静地置于一边。

唐·维托在他的影响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内竭尽全力地维持着一种友好相处的和平秩序。在他的管理下，乞丐们也被编入了一定的组织，从此不再受当地小流氓们的欺负和敲诈。这在人类历史上大约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乞丐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个月按百分比向黑手党保护者交纳一定的收入。

如果说唐·维托在他的一生中也曾出现过小小的失误，那么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两次。

1923年，在墨索里尼第一次到达巴勒莫做长达六小时的讲话的会议上，唐·维托也是参加者之一。当时，唐·维托以极大的耐性忍受完了那么讨厌的政府总理的喋喋不休的讲话并且严厉制止了其他黑手党头目要拂袖而去的举动。但是，在看到墨索尼里丢失了他的高筒圆顶礼帽时，唐·维托也和其他人一样情不自禁发出了开心的笑声。虽然他知道，只要自己一个小小的手势，用不了几分钟，墨索尼尼那顶滑稽的高筒圆顶礼帽就会被送回。但唐·维托并不想为这个自己厌恶的总理效劳，他在心里很赞成对人人讨厌的元首来的这个小小的恶作剧。

可是，唐·维托一定想不到，他的大名和他举手一挥的能耐墨索尼尼是已经深有了了解的。而他毫无同情的淡漠表示已经在元首的心里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第二个小故事同样充满了喜剧色彩。

声名显赫的兰扎亲王携同他最宠爱的英国女朋友来西西里欣赏怡人的风光。他们周游西西里各地，正心情舒畅地享受着西西里的美丽风景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兰扎亲王的女友的一件极其名贵的大衣被盗了。这位女士大为生气，满腔不满向亲王倾泻而出。兰扎亲王抵御不了这个女人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责备，同时也为一个亲王竟然被盗而大失面子的愤怒所淹没。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唐·维托，他认为只要唐·维托尽力，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兰扎亲王找到了唐·维托。两个小时后，当天丢失的所有的名贵大衣都被送到了兰扎亲王的面前，但是并没有找到那件他们需要的。唐·维托最后的答复是：大衣一定是被岛上外来的某个流浪汉顺手牵羊地拿走了。

一个男人在自己宠爱的女人面前丢失面子是很尴尬的事情，尤其是一位亲王。兰扎亲王带着满腔懊丧与怒气离开了西西里，他并没有真正相信唐·维托的答复。这种深信不疑的想法也同样为唐·维托带来了不幸。

这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并没有给唐·维托带来任何不安。

唐·维托始终过着舒适而受人尊敬的日子，一直到莫里踏上西西里的土

地。

1925年9月，当莫里踏上西西里的土地，唐·维托和所有的黑手党党徒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面临的极度的危险。他依旧安静、悠闲地做着自认为应当做的一切。可是莫里的一系列雷霆万钧式的毫不留情的行动使唐·维托惊惧了，他开始感到一种潜在的巨大的威胁在向自己逐渐逼近。库恰的被流放、成千名黑手党党徒的被关押使唐·维托知道自己必须退避了。但是，唐·维托忘了，他的对手是莫里，有“魔鬼将军”之称的莫里。

唐·维托在一切秘密进行的情况下，来到了东西西里的卡塔亚港。他打算从这里转遭到希腊，进行名为旅游观光的避难。

一艘豪华游轮早已等候在卡塔尼亚港港口，唐·维托走进游轮，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多日以来压在心头的重负终于卸去了。

“好吧，再见了西西里！”唐·维托用低级的带着点无可奈何的口气说道。

可是，一切好像才刚刚开始。

“等一等，尊敬的唐·维托先生！”几个早已恭候多时的人走了过来。

唐·维托静静地看着他们，他知道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现在不是旅游的好季节，还是请您回到家乡去欣赏那些迷人的花草吧！”一个带着嘲弄的声音说道。

唐·维托镇静地看着一切发生。他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早在几个月前，莫里就派出了最得力的手下密切监视了唐·维托的一切行动。而他的手下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们以最大的忍耐、细致掌握了唐·维托的所有行动。当唐·维托刚刚有取道东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港的打算时，他们就立刻向莫里报告了这一情况。莫里很高兴，他知道唐·维托的落网对于自己打击黑手党集团将意味着什么。

“也许我犯了许多许多的罪行，可是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你们唯一能够证明的就是我没有罪。”这是唐·维托在一次又一次的审问中做出的唯一的回答。

唐·维托并没有感到害怕，他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而他依旧还是过去的唐·维托。他并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可以使莫里将军对自己进行判决。

在唐·维托的一生里，只有过一次血腥的行动，而那次的罪行早已由于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了。

那是1909年2月，唐·维托正坐在巴勒莫一位市议员的家里晚餐，手下有人来报告：纽约警察署意大利人小分队队长彼德罗西诺来到了西西里。彼德罗西诺肩负的任务是调查西西里的黑手党，了解它们与美国黑手党集团之间的联系，掌握它们的罪恶的行动，以便更好、更有力地肃清这一恐怖集团。

唐·维托默然地听着手下人的报告，然后走了出去。在漂亮的马里纳广场大街上的法院门前，唐·维托镇静地举起他那把大口径手枪，在所有人的目光中，彼德罗西诺倒在了血泊中。这个时候距离彼德罗西诺踏上巴勒莫的领地的时间只有五个小时。他所进行的一切调查到此停止了，而唐·维托则回去继续进行他未完的晚餐。

在唐·维托的意识里，从来没有为这次持枪杀人的行为感到过一丝不安。在他看来，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必须的，是为了维护整个黑手党集团的荣誉而进行的战斗，是光荣的引以自豪的举动。

法院没有任何证据对唐·维托进行判决，因为他有不在场的最好证人。那位巴勒莫的地方议员严正而诚实地向法庭声明：彼德罗西诺被杀时，唐·维托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家，那一刻他们正在共同欣赏一幅感人心魄的圣母的画像。

唐·维托带着他丝毫未损的高雅风度走出了法院大门。而他的形象也因这一大庭广众下毫不畏惧的枪杀行为显得更加无畏，更加高大。

然而，在莫里将军的管制下，一切被黑手党分子颂扬倍至的民主都取消了。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唐·维托依旧被毫不客气地投进了监狱。

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地看着这一幕的发展。

唐·维托依然心平气和地呆在监狱里，他相信自己的忠心耿耿的手下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营救自己的，而眼前的处境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而已。

监狱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唐·维托解决自己的难题。在这座关押着形形色色罪犯的监狱里，唐·维托依旧醒目出众，他卓然独立的领袖风范使最坏的人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几分敬仰。唐·维托替犯人们解决因各种争执而引起的打架斗殴，同时利用自己在外边的势力帮助那些穷困的犯人家属，为他们送去钱财、衣物度过最困难的日子。另一方面，唐·维托也依旧利用自己往日的影响间接地平息那些复仇行动。像往昔所有倍受尊敬的日子一样，唐·维托继续着他的安排一切、领导一切的圣人、君玉的风范。整个监狱里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良好秩序，人们一收往日桀骜不驯的心，相安无事地过着牢狱生活。

唐·维托仿佛永远都是“受人尊敬”的唐·维托，无论他在哪里。

莫里并不感激唐·维托给监狱里带来的良好的秩序。当他听到手下关于唐·维托种种深入人心的事情的报告时，莫里将军大为愤怒。

“好吧，把他单独关起来，不准与任何人接触，看他的至尊无上的‘国王’风度还怎么表现。”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唐·维托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除了监狱的看守外，他见不到任何一个人。一种可怕的寂寞吞噬着这位黑手党头目的心。莫里将军始终没有出现，他仿佛早已忘了在监狱里还关着一个“名扬四海”的唐·维托。

唐·维托一次又一次要见莫里的强烈要求被置之不理。没有一个人再来听他说话，听他谈自己的想法，请他帮助解决困难。一位领袖式的人物在失去一切听众、追随者之后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唐·维托一天天消瘦下去，而期待中的黑手党党徒们的营救也越来越渺茫了。

失去了一切，唐·维托感到的只有愈来愈多的可怕的寂静和他一天天紧缩的心。

唐·维托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被关进监狱的日子里，他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党徒们已经遭到了怎样的毁灭性的打击。已经没有人能够在莫里的铁腕下一逞往日威风了，而少数一些黑手党分子们早已失去一切信心和胆量来搭救他们的首领了。在他们闻风外逃的日子里，自顾尚且不及。

强烈的孤独感把唐·维托抛进了彻底绝望的深渊。他的至亲好友们也不再给他写信，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和唐·维托断绝一切联系。唐·维托仅存的一点安慰也终于失去了。

“没有人再需要你了，没有人再需要你了！”只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对他喊着，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唐·维托彻底崩溃了。

半年后，唐·维托在监狱牢房里抑郁而死。这个曾经闻名海外的黑手党集团的大人物终于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此后的许多日子里，西西里岛上依旧流传着关于他的许许多多神奇的、受人尊敬的事迹。我们可以说，唐·维托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手党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掩去他所特有的“圣人”的独特风采。

在唐·维托死后的第二天，莫里将军来到了监狱。

莫里掀起了盖在唐·维托尸体上的白布，仔细地看了看。

“的确是一张令人尊敬的不同凡响的面孔。”莫里感叹道。

死后的唐·维托呈现出旧有的儒雅，尽管消瘦了许多，但他平静而忧郁的面孔上依然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可企及的庄严。

“哼，真是可惜！”莫里不知是惋惜还是嘲弄。

在牢房的一面墙上，唐·维托留下了这样的字迹：监狱、疾病和贫困见真心。字迹显得笨拙而生疏。

莫里冷冷地笑道：“真是至理名言！可惜已经有多少人重复过了。一样的蠢货。”

死后的唐·维托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收到的那些表示要划清界线的信都是亲属们在莫里的威逼下写的。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警醒的是，无论唐·维托这个真实的人看上去有多么美好，他所做的许多平息凶杀的举动有多高尚，我们依旧不能忽视，而且必须了解，也正是由于他一手控制了许多工业部门的原料供给，使西西里无数人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由于他规定各行业的祖税而给许多人造成了命运的不幸。唐·维托的危害在无形中已经为西西里带来了更坏的命运。尽管有很多事件只是间接发生的。

现在，唐·维托死了。

唐·维托的死宣告了黑手党集团的最终的崩溃。

莫里将军终于完成了他的神圣的使命，美丽的西西里岛上绑架、暗杀、抢劫越来越少，然而，那些因为黑手党集团掌握的工厂、船行等被摧毁而失去工作的人却越来越多。西西里岛贫穷的人们并没有因为黑手党集团的被摧毁而获得更稳定、更平和的生活，尤其是那些落后的农村依旧在从1700年以来就经历的不幸境遇中苟延残喘。

历史发展的许多规律都惊人地相似。

任何一种强大的力量，无论它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只要能够绵延不息地将自己的势力一步步渗透到一个省区、一个国家，那么在它的背后必然有以政治、经济为砥柱的强有力的支持与援助。

莫里将军坚决、有力的行动的确给黑手党集团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以刻不容缓的迅猛、冷酷摧毁了黑手党集团精心营造的一个又一个壁垒，毫不留情地流放市长、逮捕市议员，严厉打击黑手党集团管理下的工厂、船行。

莫里将军可以依靠武力建立起一个秩序良好的西西里。然而，莫里却没有力量去影响国家实施的各种政治、经济政策，给西西里人民带来真正和平、美好的生活。他对于黑手党的一切行动只能在此画上句号。因为不幸的是，他的国家依旧如同任何一个当权者执政时期一样，在政治、经济方面严重依

赖着一群“戴黄手套的人”。

戴黄手套的人

“戴黄手套的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人物？

统一后的西西里，存在着一种严重而典型的对于地产的竞争。其中，获得了当时可以自由买卖的封建财产的是自由职业者、资本家、财产所有者，还有转租土地者中间的佼佼者。这些人促成了弗洛里奥家族和鲁巴谛诺家族的贸易—金融—工业集团的诞生，他们购买了自由国家从天主教会那里没收的大约 20 万公顷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在 1806 年到 1809 年期间转让给个人的，而且其中有 93% 的份额付给已经有了土地的人。这些人在 19 世纪末把不在他们手中的 20 万到 60 万公顷的土地带给了贵族，他们通过 1893 年的一个有利于取得市镇土地的人，因而也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合法方法，终止了由封建主发起的抢夺城市权益收入和市镇土地的种种行为，仅仅在 1870 年至 1874 年期间就使西西里银行提供了 300 万里拉的贷款，而在左派执政后，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有权势的阶级。

黑手党正是同这样一个阶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紧密不仅仅在于由于经济、政治的需要而建立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往往有直接的血统关系。因为，不止“一个黑手党是他们的子女、神父、医生和律师，这样就使他们完全进入了他们的有影响人物的行列”。而另一方面，黑手党集团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是从来就迫切需要这样一个保护人的，犹如大象需要长鼻子一样。黑手党分子们需要“一个平民保护人”——一个熟悉税务和公证事务的人；一个善于策划刑事诉讼，能够在警察、法官那里说情的人。这样，这些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黑手党的保护人，即所谓的“戴黄手套的人”。

一位资产阶级男爵是非黑手党人士，黑手党分子委托他与市民阶层、与国家发生联系。于是，不止一个资产阶级男爵向黑手党分子提供情报并指导他们的报复和犯罪活动。在 1910 年议会对西西里进行的无数次总是被缩小的调查中，大量事实总在证明“领导阶级的某个野心家是一个十足的黑手党头目”。而莫里将军直截了当地称这些人为“戴黄手套的黑手党”。

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居于统治地位阶级的“戴黄手套的人”对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是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对于他们是不可能用某一种强力来根除的。

事实上，也正是这些西西里的统治阶级的“利己主义”认真地扶植了黑手党集团的发展。这种“利己主义”首先以给黑手党分子“免罪”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如果黑手党分子自上而下地被关进牢房，不仅会严重破坏转租土地的制度，同时也会影响到保护人们有利可图的职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戴黄手套的人”一方面给黑手党分子们的各种犯罪行为加上厚厚的保护膜，另一方面也依靠黑手党分子的支持扩大着自己的权势。正如弗朗凯索和索尼诺曾经指出的，“贵族和男爵假如想利用暴徒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们也必须允许这些人谋取自己的特殊的和独立的利益。”这两者是紧密不可分离的。因此，黑手党分子们也就常常从应受的惩罚中逃脱出来。

在莫里将军全力以赴镇压西西里黑手党集团的同时，墨索里尼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黑手党和“戴黄手套的人”的联系。在墨索里尼的授意下，黑手党被看作仅仅是犯罪分子而不是别的，而“戴黄手套的人”在法西斯党中是会得到一定的政治机遇的。

虽然从一定程度而言，墨索里尼限制了“戴黄手套的人”借助黑手党集

团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与可能性，但也相对地表现出了墨索里尼对这些“戴黄手套的人”的需要。

另外，墨索里尼并没有真正严令彻底取缔黑手党。那么，“戴黄手套的人”与黑手党人之间彼此扶持、互相壮大的局面也就必然不会真正消失。

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只有莫里将军以最理智的认识、分析，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剪除着“戴黄手套的人”的影响。

莫里将军很清楚地知道，要想真正彻底地捣毁黑手党集团，首先必须置“戴黄手套的人”于死地。在莫里看来，这些所谓的“戴黄手套的人”其实质就是“戴黄手套的黑手党”。

1926年，在莫里踏上西西里岛后不久，他就开始了自己严密的调查。莫里故意在不作任何刑事诉讼的情况下，向墨索里尼指出，迪乔治将军的弟弟是一个“戴黄手套的黑手党”。莫里的暗示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响。迪乔治将军曾经是墨索里尼第一届政府国防部长，当时正在巴勒莫统帅第三军。

墨索里尼的沉默对于莫里将军来说意味着不祥。然而，莫里将军并不是一个容易退却的人，他骨子里那种天生的军人的坚毅、倔强使他继续着自己的调查。

接下来的日子，莫里将军又向墨索里尼递上了一份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是关于阿尔弗雷多·库科议员的。

阿尔弗雷多·库科是墨索里尼在初建法西斯党时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法西斯分子之一，他也是当时巴勒莫市法西斯分子的头子。然而，莫里所获得的一切材料都表明，这个法西斯头子与西西里的黑手党集团之间保持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

在莫里登上西西里岛并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时，他就感到有一股强大的“暗流”在向自己不断逼近，而这股“暗流”正是以阿尔弗雷多·库科议员为中心形成的。它直接指向了战斗中的莫里。事实似乎是：阿尔弗雷多·库科受到了许多来自美国的（一些想避开莫里的黑手党分子以非法手段逃亡到那里）要莫里立即滚出西西里并且停止一切对黑手党“迫害”的压力和要求。

阿尔弗雷多·库科为了黑手党集团，更多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用尽一切手段向莫里将军制造各种压力。实际上，他确实充当了一个具有保护性的“戴黄手套的人”。

另一件调查是由宪兵队提出的指责：因为阿尔弗雷多·库科曾经不止一次利用自己当时作为眼科医生的职权使许多人免服兵役，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黑手党分子。

但是，事实并没有打动墨索里尼。尽管他的心里真实地痛恨着可恶的黑手党分子们，但他更关心自己拥有的一切权势，他离不开那些重要的“戴黄手套的人”。这种态度势必使黑手党的存在继续下去。

的确，墨索里尼这种带着一定宽容的打击态度，使许多重要的黑手党分子由于在“戴黄手套的人”的保护下一次又一次因“证据不足而免于起诉”对于真科·鲁索的审判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事例之一。

真科·鲁索，法西斯主义时期一个非常年轻的黑手党分子。当时，警方把他永久地定为一个“具有定型的反叛和专横特性”的人。1928年4月27日，巴勒莫上诉法院的起诉庭对真科·鲁索的五起谋杀案免于起诉；1929年

12月21日，同一法庭对他的四起谋杀案免于起诉；1930年1月18日，还是那个法庭对他的两起谋杀案和三起企图谋杀案免于起诉；1931年10月，卡尔塔尼塞塔重罪法庭对于他被指控参加一个犯罪集团的案件免于起诉；1932年11月23日，卡尔塔尼塞塔重罪法庭对于他的三起谋杀案免于起诉。这些免罪都是由于证据不足而作出的。而实际原因是，真科·鲁索在黑手党集团中逐渐成为一个拥有一定权势的重要头目，在他的背后是一些他需要同时也需要他的“戴黄手套的人”。

法律在这里好像已经失去了一切存在的意义。

莫里对于黑手党集团的打击只能到此为止了。

1928年，莫里将军被墨索里尼任命为王国参议员。然而，与此同时，墨索里尼把行政长官的任职年龄降到了55岁。1929年6月，在莫里和阿尔弗雷多·库科的争吵达到顶峰的时候，墨索里尼让55岁的莫里退役了。而阿尔弗雷多·库科则立即恢复了一切名誉，并荣升为法西斯党的全国副书记。莫里将军一直留在参议院。他死后，他的政策也立刻宣告结束，对黑手党的直接压力也随之减弱了。

墨索里尼命令下的镇压黑手党行动到此结束了。虽然，就其真实情况而言，这种打击并没有真正根除黑手党集团，但却在极大程度上有效地阻止了黑手党罪恶势力的进一步扩大。黑手党集团在莫里将军的镇压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终于在若干年内不能无法无天地实施罪恶活动了。

然而，一切并不能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只要在意大利继续存在无数身居上位的“戴黄手套的人”，就必然有黑手党重新振兴的一天。

第四章枪声再起——中兴黑手党

回到莫里将军统治西西里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在整个意大利，无论有多少“戴黄手套的黑手党”依旧安稳、如意、舒适地享受着生活，西西里岛，这块孕育黑手党的土地，毕竟从血雨腥风的恐怖中向和平、安定迈进了一步。

在法西斯统治意大利的若干年内，西西里的黑手党集团由于受到莫里将军的严厉打击而完全失去了其强大茂盛的生命力。

17年的沉寂，使西西里黑手党集团的绑架，凶杀、抢劫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逐渐淡去的过去。

然而，一棵根脉发达、饱受风雨的大树是不可能在一次意外的挫折中彻底毁灭的。西西里，这块丰饶、美丽的土地早已渗透了黑手党罪恶的血液，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就会即刻流动，恢复往日的生气，向四面八方延续。

这里，有一个人是必须要写到的，因为正是他在长久的等待中使黑手党凝固的血液又一次在西西里畅流无阻。

这个人就是唐·卡洛杰罗·维齐尼。

“有一个人自认为是社会的恩人，是西西里的伟大的爱国者，是优秀的天主教徒。”

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笔录。显然，这个自认为是社会的恩人、是西西里的伟大的爱国者、是优秀的天主教徒的人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卡洛杰罗·维齐尼。

1877年，卡洛杰罗·维齐尼出生在维拉巴。这是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南面四十英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唐·卡洛杰罗·维齐尼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过着勤劳而贫苦的生活，毫无怨言。他们是忠实的天主教徒，几十年如一日，虔诚地在心里敬奉着上帝。

唐·维齐尼在出生后被取名为“维齐尼索菲”，他的父母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够成为一名教士。

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名字的小维齐尼在父母的期望里安安静静地成长。他长得很瘦弱，看上去文静而懂事。每年复活节时，他总是在学校组织的宗教剧中扮演基督。所有见到小维齐尼的大人都说：“这孩子长大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事与愿违。正是这个常常扮演基督的孩子开始表现出一些极为恶劣的品质。他开始干一些令所有人厌恶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偷偷杀死村里人家的鸡、狗，在村外小路上，他拦住年龄小的孩子们敲诈勒索。在渐渐长大的几年里，走私、贩卖成了他生活的主题。人们再也无法把他和从前那个可爱的小维齐尼联系起来。在他的天性里，仿佛带着一些与生俱来的十分卑劣的品质，总是对一切具有破坏性的、报复性的甚至是充满危险性的事情感兴趣。维齐尼开始成为众人讨厌的对象。

他18岁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维齐尼诱奸了村里的一位姑娘，在事发后，又拒绝娶那位姑娘为妻。对一个小小的村庄而言，这无疑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不可饶恕的行为。女方的父亲愤怒至极，发誓一定要杀死维齐尼以挽回家庭的尊严。

维齐尼逃进了山里。在山里，他四处游荡，和许多行为不端的人开始来往，维齐尼恶劣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他结识了一些黑手党分子，从此成为黑手党里一个小有权势的人物。

五年后，维齐尼回到了村里，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名声败坏的人人诅咒的坏小子。他在一切事上都表现出一种守信用、讲义气且豪爽大方的受人欢迎的品性。

维齐尼回到村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上大量的钱财亲自去向那位不幸的姑娘赔罪。在意外获得的大量钱财面前，女方的父母动摇了，看着维齐尼身后几个腰插手枪气势慑人的黑手党党徒，他们终于妥协了，过去的一切仇恨的誓言都化为乌有。

维齐尼因为这一事情被人们另眼看待。人们忘记了他的那些恶劣的品行。

“豪爽大方、勇于承担责任”，人们这样评价道，从前的种种偷鸡摸狗的劣迹在人们的记忆里逐渐淡去。维齐尼开始被称为“值得尊敬的人”。

唐·卡洛杰罗·维齐尼以他特有的机警、狡猾、冷酷开始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已经为自己创造了良好的声誉，剩下的就是依靠这声誉来铺垫一条辉煌之路了。

唐·维齐尼开始施展一切手段，他积极努力要把自己的权力渗透在任何一个他所能涉及的范围内。

唐·维齐尼的专制地位在他所接触的任何场所都表现了出来，即使在自己的家庭里也毫不例外。对于自己妻子的收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唐·维齐尼的世界里绝不会允许一个人有丝毫的不满表示。

唐·维齐尼的妻子是一个出身罗马贵族的大家闺秀。她容貌姣好，举止端庄，在年轻的时候是无数贵族子弟们追逐的目标。然而，不幸的是唐·维齐尼出现在这个圈子内，那些在前一天还向她表示热烈情意的追求者们忽然如一股股轻烟，转眼间没了踪迹。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然而又无可奈何。这位昔日被像众星捧月一样簇拥的贵族小姐只好满怀怨愤地选择了其后几年内唯一的不懈的追求者——唐·维齐尼。但是她心中的积怨即使在婚后也没有消除，她自始至终都有着一种强烈的被明匪劫掠的感觉，尤其当她面对自己的相貌平平、看上去毫无男子汉气概的丈夫时，那种厌恶之情愈发强烈。

唐·维齐尼心里很清楚自己妻子的态度，对于妻子的那种冷淡、漠然的表情他已经忍无可忍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默默地思索着，要找出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的办法彻底征服自己妻子的心，使这位高贵的女士从此以百依百顺的仰慕之情来对待自己。

1919年，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在经过几个月精心的策划之后，向意大利国王发出了诚恳倍至的邀请。

国王接受了所谓臣民的善意的邀请。在到达西西里的第一个星期日，国王按原定计划来到巴勒莫教堂望弥撒。主持这次仪式的是大主教诺托。唐·维齐尼的家族可以说与教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的一位叔父是个主教，有两个弟弟都是传教士，其中的一个还是享有“阁下”尊称的高级教士。现在，为国王主持弥撒仪式的这位诺托大主教，则是唐·维齐尼的堂兄，他是卡尔麦马圣马利亚修道院可敬的创始人。年轻的时候，庸·维齐尼和这位堂兄常常一起喝酒、打猎，他们感情深厚。毫无疑问，在唐·维齐尼的这次行动中，诺托主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王走进教堂，步履从容、高雅，身后是一些仪表凝重的侍从，西西里的高官、显贵们以敬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尊敬的陛下。

国王微笑示意，人流一下向国王簇拥过来。唐·维齐尼早已安排好的夹

杂在人群中的三百名黑手党党徒恰到好处地行动了。他们很自然地 toward 国王靠近。没有几分钟，在国王周围形成了一个由黑手党组成的圈子，它隔开了其他人与国王的接触。

诺托主教快步走向国王，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

“尊敬的陛下，请求您为这个婴儿施洗礼。”诺托恭敬地说着，一边把怀里的婴儿递给了国王。

意大利国王愕然了，他很清楚当天的活动中并没有安排这一洗礼仪式，况且这个婴儿的身世他也一无所知。可是拥挤的人群和众人期待的目光没有给国王一点迟疑的余地，他被迫接过了婴儿。由国王主持洗礼，这将意味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将成为伟大的意大利国王的教子。

唐·维齐尼，这个出身农民家庭毫无贵族血统的人的儿子——这个幸运的婴儿，竟然成了意大利国王的教子，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方夜谭。在意大利以往的历史上，能够有幸成为国王教子的都是那些居于高位的公爵、将军、陆军大元帅等执政铁腕人物们的儿子，一个平民阶层人家的儿子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遇的。教子们在长大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人羡慕的皇家骑士，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无以伦比的荣誉。尽管国王的教子已有一百多个了，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殊荣，而且建立在高贵的出身上。

唐·维齐尼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知道对于整个西西里来说他的确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对于意大利国王而言自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正是他使自己的儿子在别人看来没有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成为国王的教子，不会再有一个人敢轻视他唐·维齐尼了，包括那位冷漠的妻子。

唐·维齐尼的妻子在看到意大利国王接过自己的儿子并举行洗礼时，早已热泪盈眶。这个骄傲的妇人激动地走近国王，伏在国王的脚下表达自己无法言表的感激。这一刻，她已经完全满足了，她的儿子竟然成了尊贵的国王的教子，“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这个妇人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感叹着。她对自己的丈夫从此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仰慕之情。

“还有哪一个丈夫能有这样的能耐呢？”这个曾经对自己的丈夫不屑一顾的妇人终于被收服了。

唐·维齐尼的这一行动达到了最好的效果。他不仅巩固了自己在家庭中受人尊敬的绝对权威性的地位，同时也使其他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他的通天的能量。

40岁那年，卡洛杰罗·维齐尼的名字前开始被人们加上“唐”这个称号。当“唐”这个称号被人们心照不宣地赋予某人时，他在黑手党集团中的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

这个时候，唐·卡洛杰罗·维齐尼过早地显出衰老的迹象。他已经失去了十几年前纵马劫掠的强健，敏捷，看上去有些力不从心。唐·维齐尼显得很瘦小，由于多年患风湿病而稍微有点驼背，穿的依然是很多年来那种富裕农民们穿的平绒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很朴素的布质帽子。

很多年来，唐·维齐尼一直生活在农村，他仿佛把自己的根永远扎在了古老的乡村土地上，并与之产生了一种不可割舍的感情。每天早晨，天刚刚亮他就开始在田野上散步。每逢这个时候，那些有求于他的人就早早地等候在他必经的小路上。在田野的土埂上，唐·维齐尼耐心地倾听人们的各种情况，对他们的难题做出分析并指明解决的方法。他还常常不厌其烦地为争吵的双方调解，直到矛盾完全化解。这些情景使唐·维齐尼整个罩上了一层善

良、善解人意的好人的光圈。

“聪颖过人，处理事务通情达理，令人心服口服，是个天才的外交家。”人们一致这样评价唐·维齐尼。

很少会有人认为唐·维齐尼是一个凶残、狡猾、老谋深算的人。因为他看上去永远都是一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样子，仿佛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一丝恶意。然而，一旦当人们能够鼓起勇气以正视的目光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在唐·维齐尼的那双眼睛里掩藏的令人胆颤的严酷，那是比十二月的严寒还要疹人的冷酷。他的一双灰褐色的眼睛阴森、冷漠，偶尔投向某人，那种一闪而过的锋利好像能把人的五脏六腑刺穿。

在唐·维齐尼的周围，人们永远不会看到诸如绑架、凶杀、掠夺等等血肉横飞的场面，而在距离人们几十里、几百里外出现的那些人们难以想象的残酷的血迹横流的场面却正是由唐·维齐尼一手策划的。

在唐·维齐尼扩大地产的过程中，他曾经以暗地里“购买”实际是强占的方式使许多人被迫离开了他们耕耘了几十年的土地。而在一个窄小的农家小院里，唐·维齐尼这种强盗式的“购买”遭到了严正的拒绝。

“敢拒绝唐·维齐尼的要求！”这是唐·维齐尼在听到报告时表示的唯一意见。

几天后，那个拒绝了唐·维齐尼要求的农家在一场“意外”的火灾里消失。而他们的土地也理所当然地收在了唐·维齐尼的名下。

任何敢于和唐·维齐尼作对的人最后都将遭到惨不忍睹的报复。即使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孤儿。上帝在人类心里种植的怜悯之情仿佛从来都没有在唐·维齐尼的身上表现出来过。

“这就是与唐·维齐尼做对的结果。”在已经倒在血泊里的人们身边，常常会留下这样一张字条。

唐·维齐尼的罪恶之手无处不伸。

1919年秋天，西西里著名的共产党员吉罗拉莫·利考西准备召开一次集会。他以满腔的热情站起来，准备号召人们同黑暗的政府做斗争，同西西里残暴的黑手党集团做斗争。

“请你取消这次集会！”唐·维齐尼派人向吉罗拉莫·利考西告诫道。

吉罗拉莫·利考西没有屈服，尽管他很清楚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共产党人由于对唐·维齐尼的警告表示蔑视而倒在了血泊中。

集会于当天下午按时召开，维拉巴广场上冷冷清清，原定参加集会的几千人只有五六十个人按时到达。吉罗拉莫·利考西知道唐·维齐尼已经开始了行动。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吉罗拉莫走上台，镇定、勇敢地开始向面前寥寥无几的人演讲。

仅仅几分钟，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了，烟雾立刻弥漫开来，有几个人倒在了血泊中。台上的吉罗拉莫·利考西也遭到了不幸的暗算。

在最后的意识里，吉罗拉莫·利考西隐隐约约看到在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人瘦弱的人，他的目光与对方那双灰褐色眼睛里的嘲弄、阴冷对峙着。

唐·维齐尼天衣无缝的结束了这场谋杀。对于那些在他的罪恶的手中失去的生命，他是永远不会感到惋惜的。而西西里的法庭对他而言也只不过是一个随时进出的毫无意义的场所。唐·维齐尼早已不再恐惧了，因为在西西里岛上已没有人敢站出来为证明他的罪行提供证据。

“和唐·维齐尼做对”——这是一个人们已不敢涉及的话题。

唐·维齐尼的势力在他毫不心慈手软的铲除异己的行动中不断巩固、壮大，像一棵吸足了天地间精华的树木，生机勃勃地向外伸展着。他的曾经坐过 16 次牢的不光荣的历史在他盛大的光芒里被粉饰了。

正在这个时候，莫里将军出现了。

莫里将军的出现使唐·维齐尼的心底掠过一丝不祥。然而，久已形成的“没有准敢再侵犯我”的想法使他忽略了自己的预感。

“库恰市长被流放了。”当唐·维齐尼听到手下的这个报告时，他同所有西西里人一样震惊了。唐·维齐尼像一只身陷猎人们围击圈的狼一样，感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他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会同样避免下了莫里的铁爪。

唐·维齐尼积极地派出大量的手下，在很多场合他也自己出面与一些上层人物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送出大量的钱财，做出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许诺，唐·维齐尼用财势为自己编织了一张保护网。

1926 年，莫里将军以猎狗般敏锐的嗅觉察觉了唐·维齐尼的罪恶面目。

唐·维齐尼被关进了监狱，接着又被莫里将军打入了流放分子的行列。

一切正如唐·维齐尼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那些接受了唐·维齐尼大量财物、又从唐·维齐尼的承诺中获得地产权益的保护人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是一支强有力的保护队伍，他们在适当的时候绝不会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即使干涉法律也在所不惜。

在被流放了 24 小时之后，唐·维齐尼由于证据不足而被赦免了。他又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

唐·维齐尼的聪明、狡猾、机警给他准备了最好的退路，同时也使他很清楚地认识了当前的形势。维齐尼知道，在莫里毫不仁慈的武装镇压的枪口下，不可能有反抗的机会，他必须寻找另外一条道路。暂时的隐退——这是唐·维齐尼做出的最后的选择。他知道，也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东山再起，而整个黑手党集团也将重新成为西西里岛真正的主人。

唐·维齐尼走进了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的大门。他心平气和，仿佛对转眼间失去的一切权势毫不留恋，而对于自己眼前的处境也毫无怨言。

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这正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修道院，他的创始人是诺托大主教，即帮助唐·维齐尼使其独生子成为国王教子的唐·维齐尼的堂兄。

可想而知，唐·维齐尼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避难所。他的修道士生活完全是避开一切被镇压风险的自得其乐的生活。在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唐·维齐尼和他的堂兄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一起回忆过去，谈论将来，品着酒、下着棋，这两个队小一起长大的有着相同偷鸡摸狗历史的兄弟在融洽的气氛中过着逍遥的日子。在闲暇之余，他们甚至结伴而行去瑞士领略美丽的风光。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中有一个是在枪口下逃生的恶贯满盈的黑手党头目。

唐·维齐尼和他的堂兄在平静生活的背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积极地计划着，积蓄着更强大的反扑力量。唐·维齐尼绝不相信庞大的黑手党集团会从此了无声息。

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完全成了名副其实的庇护所，它像莫里的血雨腥风之外的一片风和日丽的小天地。遗憾的是，在这个看上去宁静、平和的小天地里埋藏的却是罪恶的复仇的种子。

一切成功达到顶峰时，必然走向末路。

当莫里将军沉重地打击西西里黑手党集团同时又把鹰隼般的眼睛射向那些“戴黄手套的人”时，莫里将军开始被墨索里尼逐渐减弱权力。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墨索里尼在自己政权的巩固中是无法离开那些“戴黄手套的人”的。

毫无疑问，莫里将军的失势对于等待中的唐·维齐尼来说无疑是黑暗中的曙光。

唐·维齐尼像一只蛰伏已久的毒蜂，又开始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每个地方。

1928年，意大利政府重新调查各省、市的人口。

对于唐·维齐尼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又施展出自己的手段，伪造了一份阿尔卡莫的户口资料，使阿尔卡莫的市民人口在一夜之间由31765人变成了整整63051人。阿尔卡莫终于成为省辖市，而唐·维齐尼则由于这件事成为整个阿尔卡莫市的大恩人。人们又开始悄悄注意到唐·维齐尼的存在。

此后不久，一个不知名的皮匠被带去坐牢，他的罪状是伪造阿尔卡莫市的户口资料。没有人会看不出这件事的荒唐性，但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在多次诉讼中，唐·维齐尼依旧安然无恙地过着他的修道士生活，没有谁敢去触动这位已经被尊称为“大叔”的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先生。

唐·维齐尼在不动声色中等待着时机的成熟；像一只早已确定好袭击目标的猛虎，在静伏中准备着最迅猛的扑击。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蔓延开来，烧毁了一座又一座美丽的城市，也烧毁了千百万人心中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望。但这熊熊而起的战火却迅速燃起了唐·维齐尼心中的复兴之火。

机会终于来了。唐·维齐尼相信自己坚忍的等待终究会得到一个完满的答案。

墨索里尼忙得不可开交，要去联合希特勒，要去争夺更多的领地。1941年，墨索里尼派兵25万远征苏联，这年底投入战争的总兵力已达到100万人，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紧张、混乱的状态，各种各样令人心焦的问题涌向墨索里尼。这个时候，墨索里尼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再去注意西西里的黑手党了，强占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已成为当务之急。

唐·维齐尼开始有足够的时间和信心来恢复自己的势力、重建西西里岛的黑手党集团了。没有人会再进行任何无谓的干涉，战争造成的极度的秩序的混乱和生活的贫困已经使人们完全麻木了。他们再没有任何精力去关心能勉强延续生命外的任何事了。

复兴计划开始了。

第一个行动是收罗残兵败将。唐·维齐尼向四面八方发出了消息，那些在莫里将军的枪口下幸运逃生的黑手党党徒们一个个陆续归来，聚集在唐·维齐尼的周围。与此同时，那些被流放在地中海孤岛上的黑手党死硬分子们也收到了唐·维齐尼招收的信。对于他们来说，唐·维齐尼的信号确实是伸向他们所处的危谷的一条救命绳索。

第一个行动取得了出乎意料成果。唐·维齐尼的周围又形成了一股坚强的势力。这些在危难中被召回的黑手党分子们由于感激而对唐·维齐尼忠心耿耿。一个坚实的地基又逐渐形成了。

一定不会有人想到，唐·维齐尼的第二个行动竟然是焚香祷告。他虔诚

倍至地祈求着上帝，当然这绝不是为了意大利的命运，为了西西里人民的生活。他祈祷的目的是希望英美盟军早日在西西里登陆。在唐·维齐尼看来，旧政府的颠覆会有助于自己重建、扩大黑手党集团，同时，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势在新政府中获得更大的影响。

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展开了老练、机警的地下活动。他的那种出色的领导、组织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人们无法推算出这个看上去平庸的人的脑袋里装了多少出人意料的智慧。他的行动的目标就是帮助英美盟军，给他们的登陆提供更多的条件。

在唐·维齐尼的安排下，黑手党分子们像一只撒开的网，秘密而有秩序地活动起来。在他们的帮助下，许多不幸坠机后幸存的英美盟军的飞行员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唐·维齐尼使他们享受着极好的生活待遇，为盟军的登陆做着积极的准备。

这些行动使唐·维齐尼与英美盟军之间开始架起一座友好的桥梁。

从1943年起，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的“特务”们，一次又一次从作为同盟军地中海地区总部的阿尔及尔到西西里“向亲属致意”。这种友好的致意包含的意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唐·维齐尼获得新成功的可能性。

当一切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1943年7月，唐·维齐尼亲自派人与英美盟军取得了极为秘密的联络。这一次，他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因为唐·维齐尼获得了极为可靠的关于德军炮兵阵地的报告。他派出了极为得手的手下带领英美盟军的一支小分队向德军炮兵阵地进发了。他们穿过山道，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悄悄包围了德军炮兵阵地的后沿。

在连续而起的震天动地的轰响之后，一个强大的炮兵阵地只剩下一片灰烬。墨索里尼做梦也没有想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失掉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军事基地。如果墨索里尼想到这其中与黑手党分子有关，他一定懊悔当年对莫里将军的冷淡了。

这个炮兵阵地的解决直接消除了英美盟军登上西西里的一大障碍。战争以更快的速度向好的方向发展着。

正当墨索里尼为他遭受的损失歇斯底里的时候，唐·维齐尼又开始了新的行动。

在距离英美登陆的前两天，唐·维齐尼亲自带领一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黑手党突击队潜入了巴勒莫城。这一次，唐·维齐尼使出了黑手党集团的拿手好戏——绑架。

在巴勒莫城一个法西斯军队的指挥部里，一位德国将军正在给他的部下们分析当时的战局。

“西西里登陆，这是不可能的。”这位自信、骄傲的德国将军说道。他转过身，走向悬挂的地图。

“我们将在这里……”将军一边在地图上比划着，一边说道。可是，身后的部下们没有一点反应。这位将军不满地转向了他的部下们。

只是转眼工夫，他的不满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惊愕。他的部下们正在几支威力极大的武器的威胁下交出他们的手枪，没有人敢反抗。

站在旁边带着愉快的微笑看着这一切的是唐·维齐尼。他十分满意地望着德国将军。

“真遗憾，尊敬的将军，你得暂且放下这里的一切，去亲自迎接盟军登

陆。”

德国将军带着一脸的迷惘被唐·维齐尼带了出去。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的指挥部里，堂堂的将军竟然被几个黑手党分子绑架了。

几天后，德国将军被送到了英美盟军的地盘，他是被做为一份见面礼送去的。自然，礼物的主人是唐·维齐尼。

1943年7月10日，英美盟军在西西里胜利登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无疑是一决定性的一举，同样，对于西西里的黑手党们而言，这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又一次开创出一番新天地，那是十几年前辉煌的再一次展现，荣誉的再一次高扬。

唐·维齐尼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接下来的日子将是他一展复兴宏图的时代。

“品格高尚，不负众望”，这是美国驻西西里的司令官阿方索·拉蓬托上校在致华盛顿的电文中对唐·维齐尼的特别称赞。

的确，那些登上西西里的英美盟军们又有谁不知道唐·维齐尼的大名呢？他不仅在盟军登陆前就向他们提供了大量消息、大量物质援助，在盟军踏上西西里之后，他依旧继续着这种友好的往来。

“热忱、爽快、出手大方，豁达大度”，这是许多盟军军官对他的一致评价。

唐·维齐尼确实是一个聪明的人。在英美盟军刚刚登上西西里、一切正处于混乱之际，物资严重缺乏。在这种时候，唐·维齐尼为盟军送去了一车又一车的粮食，一车又一车的生活用品。他俨然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为和平事业尽心尽力的高尚的“公仆”。唐·维齐尼的形象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唐·维齐尼还以私人身份向大量的盟军军官赠送礼物。从最上层的司令官阿方索·拉蓬托上校到下层的一个小小的军官，都无一例外地收到过唐·维齐尼各种各样的礼物。有名贵精巧的工艺品，价值连城的珠宝古画，还有一坛又一坛芳香醇美的陈年老酒。

唐·维齐尼在上上下下的盟军军官中得到众口一词的称赞。他如鱼得水，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越来越美好。

黑手党集团借助唐·维齐尼的声望和他的有效的组织、管理，一日日壮大起来。

当然，唐·维齐尼绝不会让他付出的一切毫无收益。

在与盟军一步步越来越深入的交往中，唐·维齐尼一面加紧营救那些至今由于罪行严重、证据充足仍在监狱中打发时日的黑手党党徒，另一方面则向盟军大力推荐那些走出牢笼的大大小小的黑手党头目。仅仅一个月，西西里西部各小镇的镇长都已由原来关在牢房里的罪恶深重的黑手党分子们担任，甚至法院、市政府的守门人也被换成了黑手党分子。

西西里的人们在等待新的民主制度的热切期望中，又眼睁睁地看着几近毁灭的黑手党势力重新复燃。

对于整个西西里而言，这无疑是一上帝开的所有玩笑中最残酷的一个玩笑。人们为之振奋、为之祝福的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竟然成了恶行昭彰的黑手党集团的温床，而他们所诅咒、所不齿的万恶不赦的法西斯却是黑手党集团的克星。

无论怎样，唐·维齐尼终于从十几年的浮沉里又登上了他振臂一挥、响应万千的旧日威风赫赫的岸头。

唐·维齐尼很清楚，要想维持一个黑手党集团并使之越来越庞大，那么就必须控制一定的经济脉络。另一方面，就他个人而言，在财势中享受已久的他是绝不希望有经济拮据的一天的。金钱的意义对于唐·维齐尼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唐·维齐尼清醒的意识使他步步为营，采取着一系列掠夺式的财富积聚手段。

在盟军登陆期间，他把一车车粮食无偿地送给盟军，由此换得的是盟军对他坚不可摧的信任。唐·维齐尼在进行了一定的付出之后，获得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特别通行证，对于在混乱中的西西里自由来往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一车又一车的粮食被唐·维齐尼以各种理由送到了西西里财物交易的黑市上。他以高出五十倍的价格把粮食卖了出去。没有人能计算出在那个时期唐·维齐尼获得了多少纯利润的收入。一笔又一笔大数目的钱使唐·维齐尼的口袋涨鼓起来。唐·维齐尼待人的态度更大方、更热情了，而他眼里那抹阴挚的光芒也更盛了。与此相应的是西西里的下层人民由于粮食价格的飞涨而生活越来越艰难。

然而，唐·维齐尼贪婪的心并没有因此满足，他那双罪恶的手也并不打算收回。

粮食的供应被彻底垄断了，紧接着唐·维齐尼把目光转向了其他行业。他开始以强力向所有的肉店、咖啡店、水果市场征税，而征税的数目则完全由他自己决定。即使是西西里岛上一向比较自由的流动乐队也没有逃出唐·维齐尼欲望燃烧的眼睛。

在唐·维齐尼自己看来，他已经用最大的宽容、耐心、善意对待西西里人民了，那么，任何一种对他、对整个黑手党集团的不满都是不可原谅的，甚至包括那些蕴藏于心的丝毫不敢流露的不平。

西西里岛上的自流井也逐渐被唐·维齐尼控制了。水对于人类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唐·维齐尼很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开始向岛上的居民出售井水，不幸的西西里人只要想继续维持生命，就必须为此付出金钱的代价，他们仿佛永远都走不出黑手党的阴影。

接着，唐·维齐尼又派人很客气地“买”下了几十座西西里建筑漂亮、环境优美的贵族庄园。所有的交易看上去都公平合理，没有谁会想到在这场强“买”的交易中，曾经有人被做为威胁的工具承受了恐惧的滋味。

金钱、土地、权势都有了，人们掩埋起仇恨的敬畏的“崇敬”也有了。总之，一切都有了。

唐·维齐尼成了西西里岛上的首屈一指的大富豪，也成了西西里岛上众人仰慕倍至的黑手党集团的头目。

西西里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的状况。“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这就是西西里经过几十年战争后的真实写照。

不久之后，唐·维齐尼被任命为维拉尔巴市长。又是一个黑手党市长！

意大利历史学家巴尔齐尼评述道：“在盟军占领下，唐·维齐尼恢复了法西斯政权下丧失掉的全部权利。”

当人们的美好愿望成为一种罪恶的孕育地时，对于整个人类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悲剧。

唐·维齐尼气势盛大如日中天。西西里所有正常的制度、程序都被抛在

了远远的角落。黑手党的一日日壮大又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到血腥、掠夺、仇杀的西西里。

美好和平的生活像一场梦，还没有来得及显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就已经失去了。

有人说：“在唐·维齐尼生命的最后十二个年头里，西西里人把意大利政府忘得一干二净。”也许西西里人能做的、必须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从强大到几近消亡到再次强盛，黑手党集团的势力更牢固、更深入地渗透到了西西里的每一寸土地上。在法西斯主义彻底退出西西里官方舞台后，黑手党分子们又重新以他们惯有的风貌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现在已经够了。法西斯主义用其特殊的治安法败坏了西西里的名誉。我们被看成是一伙罪犯。今天，西西里应该重新被看成是美国人在地中海的一颗明珠。”唐·卡洛杰罗·维齐尼骄傲地断言道。看上去，仿佛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并且用他高明的手段把美国人带上了西西里的土地，使西西里成为美国人在地中海的夺目明珠。尊敬的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先生似乎忘记了他自己曾与法西斯党有过密切的关系。那位西西里岛上法西斯的头目阿尔弗雷多·库科就曾与他过往甚密。

从前的一切又将照样谱写了。

黑手党分子们又开始重操旧业。“霸占土地，瓜分地域，非法交易粮食，盗窃牲畜，抢劫和敲诈勒索”，这仿佛永远都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而在经历了一场浩劫之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好像在痛下决心要让西西里双倍偿还他们失去的一切。

同一时刻，黑手党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势的斗争也开始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火并拉开了序幕。

在恰库利，维拉巴特和克罗切韦尔德集团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决斗。他们使用了最优良的武器装备，彼此毫不留情地射出仇恨的子弹，一个又一个强健的身躯在转眼之间永远倒在了血泊之中。这场血腥的争斗使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关于地盘的划分问题，在黑手党集团内部依旧是一个敏感容易引起火并的问题。

在进行关于地盘的、经济财产的角逐中，黑手党分子同样不失时机地登上了西面里的政治舞台。他们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加入到权力的竞争行列中。黑手党分子和那些“戴黄手套的人”又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开始重新瓜分整个西西里的政治、经济控制权。

战火平息后的西西里，不仅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迅速发展，反而由于黑手党集团势力的复苏而陷入了更大的残酷中。

1945年1月，权倾一方的唐·维齐尼同美国驻巴勒莫领事内斯特进行了一场单独谈话。唐·维齐尼先生明显流露出对于君主政体命运的缺乏信心。看上去，他严然是意大利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救护神。而这虚伪面孔后的真实原因是：这个君主政体没有向黑手党集团做出任何承诺换取一种帮助。

与此同时，黑手党集团的许多人物并不满足西西里的有限的范围。他们开始把势力向西西里之外甚至整个意大利之外发展。许多黑手党分子同外国情报机关发生了公开的联系。

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巴勒莫的警官告诉美国领事内斯特，黑手党分子在意大利陆军将军贝拉尔迪的明确要求下，曾帮助他捕获了埃维斯分子——这是一支直接由分离主义者投入战争的部队。

另外有资料表明，意大利籍的黑手党分子曾受美国情报机构的委托，在古巴进行了一些反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活动。后来，也正是这些黑手党和美国情报机构卷入了杀害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十分复杂的事件。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说几十年前黑手党集团势力曾经如冲天火焰，映照一方。那么，现在它已经像一张密集、柔韧的蜘蛛网向所能伸延的任何一方广张罗网了。

就西西里的真实记载而言，在许多场合中，没有任何人（不论是分离主义者，还是共济会会员；不论是天民党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意大利警察）起用一个曾经动员过黑手党分子的“戴黄手套的人”；而所有与当时的西西里政府合作的集团却直接、明确地转向了那些名副其实的黑手党分子。这是第一次含蓄承认了黑手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而不是一种受约束和受限制的无足轻重的事物。显而易见，对于黑手党集团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转折。它终于可以公开地以一个团体的面目从事一切活动，尽管在以往的日子里，它已经毫无顾忌地从事了各个领域的犯罪活动，但那毕竟是没有名目的个体组合的活动。

1948年4月，当德加斯佩里的政府允许进行小范围内的土地改革时，西西里尽管按照要求并不适宜这种改革，但是在黑手党集团的影响下，也开始推行这种旨在进行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土地改革法令。黑手党分子们亲自出场了，以唐·维齐尼为首的一帮举足轻重的黑手党人物依照他们的愿望规划了随之而来的极少量的土地分配，同时处理了相应的公共开支。这完全是明目张胆的对土地的掠夺。

这场虚假的黑手党分子一手策划的土地改革运动又为黑手党在农村势力的进一步巩固书写了“美好”的一页。

黑手党集团并没有就此住手。

几个月后，西西里的有关机构和人士制走了一项计划，即把离巴勒莫不远的格里福内山附近的大量水源用来灌溉耕地。

关于这项计划的讨论会议如期举行。绝大多数西西里人对这一计划持赞同态度，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它是有益的。会议顺利进行，就在人们抱着乐观的态度准备做出最后的决定时，有人站起来反对了。

“这个计划毫无意义，应该取消。”说话的是一个黑手党头目。

紧接着又有几个人表示反对，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黑手党集团内有地位的人。

人们默然了，他们很清楚只要黑手党分子干预一件事情，即使它是正确的也终将毫无结果。

长期以来，黑手党分子们一手控制着农业所必需的地下水。一切水资源都由黑手党分子们来分配，由他们给那些需要水的人规定价格。现在被讨论的这项计划对于黑手党集团来说毫无收益。于是，黑手党分子们提出：要么按照他们说的使用与已经开始的工程完全相反的方法来安排格里福内山附近的水源，要么宁愿在水中放入鳗鱼也不让它为公众们使用。

计划被废弃了。已经开始的工程也中途停止。而站起来表示反对黑手党意见的工程主任在第二天由于意外车祸而毁容。没有人再表示反对，正如黑手党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水被引向了格里亚。

黑手党终于黑手遮天，把西西里投入到太阳照耀下的无止境的黑暗里。

1954年7月，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去世。

葬礼空前盛大，其隆重程度超过了意大利任何一位亲王。

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个黑手党集团炙手可热的人物，在 1943 年英美盟军登上西西里岛直到 1954 年去世的期间，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尊敬。有这样一段记录：

这个黑手党分子凡进入一个地方，挂起帽子就出去：盟军当局、自由党人、天民党人、村镇银行、矿山、土匪、分离主义分子，据说还有备有可卡因的伯爵夫人的沙龙集会，众人看着他以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走进来……不用敲门，服务员就会把门打开。人们正在房间里做些什么事情，“矮小的，有点发胖的卡洛”走了进去，由于在场的人给他办了事，他向大家致意，然后回家。一切举动从容、随便得就像一位将军检阅他刚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

现在，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终于静静地躺在了棺材里。然而，即使在这一时刻，他所享受的一切依然是最好的。

鲜花洒满了通往墓地的几十英里的大道，成千上万的农民穿着丧服走在队列中。在队列里还有来自西西里的政治家，来自巴勒莫的官方人士。

成行的牧师和僧侣，满怀神圣和虔诚唱着赞美诗，在西西里最出色的乐队的伴奏下缓缓而行。香炉摇晃，漆黑的大马牵挽着柩车。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是同样凝重、肃穆的表情。一种庄严、圣洁的气氛笼罩在这个阴险、狡猾、罪恶累累的黑手党分子的葬礼仪式上。

巴勒莫市的市长发表了悼词：他是穷人的朋友，从来没有忽视过求助的人。他没有丝毫自私自利之心。

维拉尔巴的天民党支部获悉唐·维奇尼去世的消息后，在天民党的旗子上加上了哀悼的标志。

在教堂门前的一张布告上写着：唐·卡洛杰罗·维奇尼先生在迫害中是伟大的，在不幸中更加伟大。他总是带着微笑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对待生活中的挫折。而今天……从所有的朋友那里，也从所有的敌人那里，他得到了最好的证书——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从美国传来了“同哀伤的家属团结在一起，同他的亲属把他视为君主的大家庭团结在一起”的反响。

教堂正门顶上立着表示悼念的铭文，这样写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讲信用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西西里的舞台上上演的滑稽、可悲的一幕。

唐·卡洛杰罗·维奇尼一生罪恶累累，掠夺他人的财产，强占别人的土地。曾经 16 次由于罪行严重被打入监狱。然而，正是这些铸成了唐·卡洛杰罗·维奇尼最后的辉煌。

几年后，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的出生地维拉巴村由于维奇尼的关系逐渐繁荣，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一切都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无论对于唐·卡洛杰罗·维奇尼个人还是对于整个黑手党集团而言，这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骄傲。然而，对于沉重的西西里来说，这是多么的不幸！

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结束了他的一切；可是在他一手策划下从奄奄一息中振兴起来的黑手党集团并没有因此失去强大的声势，这棵老树在雷电袭击之后，又以更年轻的生气、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壮大、发展着。

“在西西里，国家已不复存在。”有人说。

在 60 年代，人们开始把黑手党分子是亿万富翁说成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上层黑手党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1971 年 6 月 22 日，巴勒莫宪兵团团长向反黑手党委员会透露道：“在 60 年代中，黑手党的杀人犯也进入了黑手党历史的一个特别光辉的一页，因为他们与获得了并掌握了建筑业的支配权的政权取得一致，所以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并获得了虽说是伪装的，但却是第一流的经济地位。”

谁的目光里能再没有一点黑手党集团的阴影呢？

在多灾多难的西西里的历史上，黑手党的沉浮预示着一种强大的恶势力的不断增长，人们无法走出的黑夜在黑手党浩大的声势里一日日拉长。

走私军火、贩卖烟草、炼制毒品……不择手段地消除异己。这早已不再是一个世纪前那个封闭在西西里古老农村的骑着大马、扛着老式“鲁帕拉”长枪的“散兵游勇”们了。

从西西里到整个意大利，到整个欧洲，现在，西西里的黑手党集团们已经不再满足他们拥有的一切了。他们又把贪婪、阴险的目光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搜索。

新的一页又要揭开了。

第五章“黑手”越洋——美洲黑手党

在上个世纪，当移民浪潮接连不断地从欧洲涌向美国的时候，西西里人，其中包括黑手党人，也来到这块乐土。

匪徒们飘洋过海的迁徙从 19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了，其原因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在移民匪徒中间，有一些是吉星高照鸿运当头的绅士，他们打算到大洋彼岸去大发横财，捞到比在自己家乡更多的油水；另一些人是为了逃避报复；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摆脱贫困（在匪徒中间，罪恶的收入当然从来也不会平均分配）；有的则是当初由黑手党的首领派去美国侦察的探子，因为西西里黑手党迫于时代的不断变迁也不得不去适应 19 世纪的韵律，不能不跟上到处出现的资本主义的时代步伐。

1900 年，西西里岛的传奇人物——唐·维托·卡肖·费罗也来到美国探奇寻幽。他在这个“新世界”快活了几年，一日思乡情动，便飘然而归。唐·维托个子很高，仪表堂堂，威严庄重，并且享有极高的威信，任何人见到他都不会想到他是一个半文盲的怙恶不俊的罪犯。最豪华的旅馆彬彬有礼地接待他，达官贵人尊敬他。他慷慨地挥霍钱财，并且装成一个无暇去点钞票、也没时间去考虑钞票来源的人。总之，唐·维托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

然而，这位了不起的高人这一来一去，潇洒纵情，自在任性，却犹如播种者一样，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留下了 BLACKHAND——也就是“黑手”组织。十年不到，“黑手”在美国已经无人不晓。

所以，专门研究黑手党的专家潘塔莱奥内于 1962 年写道：“五十多年前在美国建立，至今仍蓬勃发展的罪犯工业的黑手党人，就是来自唐·维托·卡肖·费罗那一派的。”

唐·维托是美国黑手党的鼻祖的说法，便成定论。

如果说西西里黑手党是在 13 世纪作为一个反抗外来压迫的抵抗组织而突然兴起，那么，说一句公道话，刚刚建立的美国黑手党却也不见得全是孬种，他们偶尔也会顺便动一动侧隐之心，干那么一两件“侠义之举”。

弗兰基·耶尔的一桩义举

1919年8月4日那天，闷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正午，气温达到了华氏95度——就在这时，两个衣冠楚楚、穿着棕榈滩套装、戴着巴拿马草帽、相貌凶恶的人，溜达着离开热闹的弗拉特巴什大街，来到布鲁克林商业区的奥林匹斯山餐馆。

“你们好，我的好朋友们。”老板尼克·科罗瓦斯用带着浓重的希腊口音的声音欢迎着这两个人，他认识这两位顾客。弗兰基·耶尔是那个下流社会中升得最快的匪首之一；他那肌肉发达的矮胖的同伴和重要助手“小奥吉·皮萨诺”安东尼·卡法诺也同样有名。

“来，让我给你们一张靠近后面大电扇的桌子，在那儿你们就凉快了。”科罗瓦斯主动提出。这个说话柔和、很有风度的餐馆主人自从1918年那个阴沉的冬夜之后就把耶尔看作了英雄。当时，一个最多有10岁的男孩正在餐馆外的一个临时报摊上兜售晚报。那天晚上，在那一擦擦报纸本该售光的钟点，它们仍然堆得很高，那是该呆在室内的天气，大街上空无人迹。

尼克·科罗瓦斯眼看着耶尔向那个男孩子走过去，用一张干净的50元钞票把他报摊上的报全买下来，并粗暴地命令他：“回家去见你妈妈。”

科罗瓦斯从来也没有忘记那件事。对于一个来美国之前只知道贫穷，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洗盘子，而后做厨师，直到好不容易攒够了钱开自己的餐馆的贫穷的斯巴达村庄的移民来说，这个下流社会的恶棍对于那个报童的举止无疑是一种真正慷慨的榜样。

他把客人们安置好，让他们点了菜，而后走进厨房去确保饭菜做得使弗兰基和皮萨诺满意。耶尔对皮萨诺评论说，尼克不像他通常那样热情。

当尼克把食物端出来，为客人摆好时，耶尔问他，什么事正使他不安。尼克只是耸耸肩说一切正常。耶尔并不相信他的话。

“尼克，你心里有事，我的好朋友。是什么事？有人使你烦恼？你和这儿的帮工有麻烦？”

尼克摇摇头，“不，根本不是那样的事，它是一件私事……”

他的声音渐渐变小，没有了，于是耶尔感到，一个极大的问题正在折磨着尼克。

“我们到后房去吧，在那儿我们就可以谈谈了。”耶尔提议。他站起身，一只手伸进裤兜，掏出一擦现金来。他抽出一张十元钞票，打发皮萨诺到附近一家酒店去取一瓶威士忌来。

皮萨诺因来以后，三个人退到了后房。斟了酒，弗兰基和皮萨诺又询问尼克的困境。

尼克的话说得相当犹豫，他很努力地说：“是因为……我的女儿……奥林匹亚……你认识她，弗兰基……两个月以前为了她的生日你给了她20元……”

耶尔认识那个姑娘，她长着一张天使般的面孔，鬈曲的茶褐色长发垂在后背上，她今年8岁。

尼克解释说：在过去几周里，奥林匹亚异常的忧郁，经常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哭泣，并且拒绝吃饭。

“这根本就不像我的女儿。”尼克说。“最后我们把她带到医生那儿，但他找不到她有什么毛病，他认为她正在经历一个阶段，但我妻子和我知道肯定有什么事不对头。”

最近，那个小姑娘总是在深夜醒来，在恶梦中尖叫。“我看不了我的孩子哭，”尼克表示。“那使我沮丧。而且更糟的是，她甚至不肯谈是什么正在使她不安，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耶尔想出了一个直接的解决办法。

“你知道我打算为你做什么吗？我要让玛丽·德斯帕诺这个周末把奥林匹亚带到科尼艾兰去。也许她在那儿骑几趟马，吃一些冰淇淋后，会向玛丽坦白，告诉她有什么事正在烦扰她。”

玛丽·德斯帕诺是一个像圣徒一样的45岁的寡妇，孩子们很喜爱她，他们中许多人把她当作知心人。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的事和最重要的问题告诉她，那些是他们不敢去和自己的母亲讨论的。

玛丽果然不负那尔之托，她把事情办得很周到。在那个星期天，玛丽把奥林匹亚带到了布鲁克林海岸那个著名的夏日游乐场。在那儿，她们在骑了一圈马，吃了些热狗、棉花糖之后，那个小姑娘终于松了口气。

玛丽·德斯帕诺找到了耶尔，把一直使尼克的女儿十分愁苦、总做恶梦的原因告诉了他。弗兰基·耶尔喊出了一连串脏话，把手重重地拍在墙上，使镜框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灰泥中留下了一条裂缝。

玛丽走后，耶尔往餐馆打电话，请尼克让他妻子为下一个星期日准备正餐。

“我想和你与玛丽亚一起吃饭，而且一定把你兄弟乔治也请来，那是非常重要的。但孩子们将不和我们一起吃饭，玛丽将带奥林匹亚和你的两个儿子去科尼艾兰再玩一次。”

尼克的宴请设在克林顿大街的一座褐色砂石大楼里，离餐馆不过八个街区远。尼克在门口迎接了弗兰基·耶尔，把他引进了起居室，尼克的妻子玛丽亚和兄弟乔治已经坐在了那里。

稍稍谈了一会儿之后，科罗瓦所太太道了对不起，起身去准备正餐。二十分钟以后，她把烤牛腿和各种花色配菜端到了桌上，并召唤耶尔、她的丈夫，还有小叔子，进了餐室。

吃饭的时候，谈话挺简单，没有拘束。玛丽亚把盘子收干净后，端上了传统的土耳其咖啡、希腊人的餐后精美食物、巴拉圭餐末点心，还有小杯的加香料的白兰地。

直到这时，科罗瓦斯一家人还不明白耶尔安排这场聚会有何目的。耶尔喝下了他的最后一口白兰地，向主人转过身去。

“尼克，”耶尔愁眉苦脸地开口。“我有关于奥林匹亚的很坏的消息。她做恶梦的原因是因为……”

耶尔的话音渐小，几乎没有了。但只是片刻，他的目光燃烧起来，烈焰熊熊，而这怒火是烧向尼克的弟弟，小奥林匹亚的叔叔乔治。

“这个混蛋，”耶尔一个手指指着吃惊的乔治·科罗瓦斯，紧咬着牙说，“这个畜生，一直在干你的女儿，那就是她一直做恶梦、一直沮丧不安的原因。”

尼克极为震惊，转过身，无法相信地怒视着弟弟。他的面孔突然变成了一张黑色的面具。

乔治笔直地坐在桌旁他的椅子上，呆若木鸡，面色惨白。

尼克还没能说出一个词，耶尔就继续讲述了玛丽·德斯帕诺从奥林匹亚那里得知的事情。

“这件事持续了两个月了——从你的弟弟的船为了修理驶入干船坞、他来看你的时候起。奥林匹亚告诉了玛丽，乔治怎么用给她巧克力的许诺哄她到地窖去。他对她做了邪恶的事情，而后，警告奥林匹亚，如果她把他正在对她干的事告诉任何人，他就杀了她。”

尼克又转过身，再次难以置信地怒视着自己的弟弟。乔治跳起来往门口跑。耶尔叫道：“坐下来，你这个令人作呕的堕落的混蛋。”乔治顿时噤若寒蝉，乖乖地走回他的座位，肮脏的液体沿着颤抖的双腿沥沥拉拉流下来，弄湿了裤子、鞋子和地板。他等待着弗兰基·耶尔的下一道命令，浑身冒冷汗。

当耶尔解开短上衣，从臀部的枪套中取出一支0.45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时，乔治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呈现出死灰色。

耶尔竖起扳机，把枪管对准乔治的脑袋。“在有人正讲话的时候你不该这么没礼貌。”他咆哮着说。

乔治靠着椅背，顺从地听着弗兰基·耶尔讲述有关奥林匹亚的痛苦经历。

耶尔讲了奥林匹亚被她叔叔凌辱的最卑劣的细节，讲了他威胁她，如果她把他干的事告诉任何人就杀死她，还有恐惧怎样驱使她躲入一个惧怕与混乱的躯壳中。尼克夫妻完全垮了。耶尔讲完，向尼克转过身去，把手枪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超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尼克，”耶尔用一种缓慢而又有节奏的语调说，“我极想杀死你这个下流的混蛋弟弟。但我不自私，我不想剥夺你的那一荣誉。”

尼克不相信地凝视着耶尔。

“……你想要……我……杀死……我的弟弟？”他结结巴巴地说。

耶尔盯着尼克，眼睛眯成了缝。

“我知道你是一个文雅、举止温和的人，我的朋友，但我这么麻烦地去努力发现正在使奥林匹亚不安的事，并不是为了使你弟弟逃脱他该受的惩罚——从应该给予他的那一惩罚的唯一的人那里，而那个人就是你！”

尼克的手慢慢地向桌上的那支枪伸去。乔治·科罗瓦斯始终蜷缩在椅子上，目光追随着哥哥的动作。

尼克握住那支枪的时候，乔治突然用希腊语哀怨地叫道：“我的哥哥……不要！”但没有被人注意到。

尼克·科罗瓦斯现在像弗兰基·耶尔命令他的那样，一心复仇。他把那支0.45口径的手枪瞄准了乔治那正在出汗的太阳穴。乔治又哀求，“请求你，尼克……我忍不住。我是个不健全的人尼克尖叫道：“有你这样一个弟弟，我很耻辱。如果爸爸活着，他会亲手杀死你。但他死了，我要做那件事……”

餐室陷入一种可怕的寂静中，只有那个被判处死刑的人那沉重的呼吸声打破了这寂静——而后又是尼克向他弟弟的头射去的迅速的两下枪击声。

两个一模一样的洞撕开了乔治的太阳穴，鲜血从中喷涌而出。

看到小叔子坍倒在桌上，脑袋落在巴拉圭餐末点心中，玛丽亚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枪响的回声平息下来后，耶尔迅速地行动起来。

“好，尼克，抓住他的脚，帮我把尸体放在厨房的地板上，”他吩咐道，“我不想让血溅到这儿。”

耶尔把乔治柔软的上身夹在腋窝下，把死人从椅子上拽出来，尼克则从地板上抬起了他弟弟的双脚。他们把乔治的尸体抬到厨房，放在亚麻地毯上。

过后，玛丽亚擦去了从头部的那两个伤口中滴到地毯上的血迹。

那天晚上大约九点钟的时候，黑暗降临。耶尔和尼克把用毯子裹着的尸体抬到大街上，塞在尼克的轿车行李箱内，驱车奔向新泽西渡口。

他们的目的地已经由这个黑手党的霸主规划好了，去一个被杂草覆盖着的违法倾倒垃圾的地方。他们在尸体上洒下生石灰，只需几天，血肉和骨头就会完全分解。

他们一言不发地开车回家，在一周内没有联系——直到尼克给耶尔打了电话。

“我非常好的朋友，”他说。“我想告诉你我的小女儿的情况有了多大的改善。她又像以前那样说笑了。而且她又吃东西了，最重要的是，她不做恶梦了……”

耶尔静静地听着。尼克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又说话了：

“弗兰基，我想谢谢你。我知道，你做的事是因为你爱孩子们——而且你不愿意看到他们以任何方式受到伤害。你是个非常好的人，为此，称你为我的朋友我很自豪。”

耶尔为那些感情向尼克道谢，而后自己说了几句话：

“尼克，我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是诚心诚意的，你真是那个意思。正是由于你我是这么好的朋友，我想给你点儿劝告：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是在不得不那样做时才杀人。他们死了——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

“而你的弟弟，哼，乔治——去死吧——他自作自受，活该！”

弗兰基·耶尔的这件善事被尼克夫妇记了一辈子，又被奥林匹亚记了一生，他们都认为耶尔是个非常好的人。

事实可不见得如此。事情往往是这样：好人偶尔干一件坏事，便是罪大恶极；而坏人偶尔干一两件好事，便“功德无量”。

事实上，“功德无量”的弗兰基·耶尔杀人抢劫，恶债累累，实在称不上是好人，更不用说是个“非常好的人”了。而且，大家也看得出，就算他所做的这桩义举，也是违法的，是在犯罪。

初期的美国黑手党迅速积聚了力量，从而引起当局的恐慌。恫吓和敲诈勒索是“黑手”专门从事的一种刑事犯罪活动。

美国警方在同“黑手”的斗争中，迅速把自己的视线转向西西里岛，因为美国的西西里匪徒同自己家乡的同胞和同事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美国警察局职员约瑟夫·彼得罗西诺奉命出差到了西西里，他曾试图搜集移居美国的意大利犯罪分子的情报，但他来到巴勒莫五小时就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凶手没有找到。恰巧正是美国黑手党的鼻祖、西西里岛的传奇人物唐·维托被指控为杀死彼得罗西诺的凶手，但唐·维托逃避了追究，因为他有不在现场的可靠证据。一个地方议会的议员（！）声明说，彼得罗西诺被杀时，唐·维托一直未离开过他的家。

彼得罗西诺到底死于谁手？唐·维托无疑嫌疑最大，而从他的脱罪逍遥来看，至少可以知道，“黑手”从何时起就已形成了“跨国巨网”，以及它的阴影附在什么人物身上才变得可怕起来。

据说，唐·维托先生一生反对使用暴力，在他辉煌灿烂的生命历程里，他只杀死过一个人——只有一个？！

而彼得罗西诺何幸，竟做了唐·维托的这个唯一？！

意大利黑手党在西西里岛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时，美国黑手党正在蒸蒸日上，一日千里，干出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业。

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汇集在一起，并于1920年至1933年所谓“禁酒法令”时期形成统一的全美组织。从事投机活动的匪徒巧妙地利用了禁止公开出售烈性饮料的机会，神话般地大发横财。在这场争夺利润、争夺销售市场的残酷斗争中，来自西西里第一批移民匪徒的势力占了上风，打开了向权力攀登的道路。那些在残暴的20年代早期的勇敢的幸存者中，有许多人在30年代作为黑手党霸主而出现，并在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保持了他们的势力。

时至今日，黑手的阴影越来越大，在美洲大地上恣意游荡，并在纽约形成了甘贝诺、波拿诺、吉诺维斯、路其斯、科伦坡等五大“家族”，他们能够永远赶上“新潮”，他们积累的财富比一百多层的帝国大厦还高。当欧美的亿万富翁在后台出尽风头的时候，他们却乐于谦虚地坐在幕后默默操纵。他们打家劫舍，杀人如麻，却永远不认为自己是罪犯，自称为“光荣的社团”，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叫做“科札诺斯特拉”。这是意大利语，意思是“我们的事业”。

他们藐视法律，瞧不起政客，无心过问政治，但只要愿意。他们能在60年代帮助约翰·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并在选举战的最后关头用成捆的美元作台阶使肯尼迪登上白宫宝座。他们常使用暴力，本世纪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谋杀案——1963年肯尼迪总统头上中的那颗子弹，竟也是拜美国黑手党所赐。肯尼迪之死：成也黑手党，败也黑手党国际政坛，风云变幻，留下了许许多多让人永远弄不清的疑团。但最让人感到不可恩议的还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被刺身亡：一个拥有全世界六分之一财富的国家，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多警察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侦讯手段无与伦比的国家，它的总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得满脸开花，最后却不了了之。虽然公布了一个长达几十万字、共26本的调查报告，里面却没有一个结论能够说服美国人。

然而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1988年美国社会“爆”出了一层层惊人内幕：肯尼迪总统生前与黑手党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而射中他的那两颗子弹也是来自黑手党。

约翰·肯尼迪44岁当上总统，创造了美国总统中的年轻之最，并且是第一位入主白宫的天主教徒。他于1960年11月8日当选，1961年1月20日就职，执政千日，于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

年轻的民主党参议员为什么能够在竞选总统的激烈政治角逐中取胜？他上台后是否参与了暗杀卡斯特罗的阴谋？为什么出任不到三年就遭暗杀？直到总统身亡25年后的1988年，他的情妇朱迪丝·坎贝尔·埃克斯娜才第一次向美国公众揭露了肯尼迪与黑手党的关系，提供了解答这些问题的最新线索。

肯尼迪号称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然而人们很早以前就了解到他还是个好色之徒。此人热衷于女人的程度仅次于政治。埃克斯娜就是肯尼迪众多情人中的一个，但她并非普普通通的情人，她的出现影响了整个美国历史。

埃克斯娜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幼时因车祸受伤而不能去学校读书，就请了家庭教师。她姿容出众，堪称国色天香，16岁步入好莱坞并结识了演员威廉·坎贝尔，两年后与他结婚，七年后离婚，那是1958年。

一年后，埃克斯娜偶然结识了演员弗兰克·西纳特拉，几天后，西纳特拉邀请埃克斯娜去夏威夷旅游，这时两人的关系已发展到床上。一天晚上，两人正在寻欢作乐时，另一个女人却开门进来，到了他们床前，原来这女人是应西纳特拉之约来做群体性游戏的。埃克斯娜非常难过，感到受了侮辱。尽管西纳特拉支走了那女人，但他们的关系还是完结了。为赔罪，西纳特拉请埃克斯娜到拉斯维加斯去观看他的演出，在那里，西纳特拉将埃克斯娜介绍给约翰·肯尼迪。

那一天是1960年2月7日。肯尼迪当时正在弟弟特德的陪伴下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每当回忆起那个夜晚，埃克斯娜总是兴奋得像个小姑娘：“和杰克谈话时，他一个劲儿对你说话，他对每件事、每个人都十分好奇，他喜欢闲谈。那一天夜里他怎么也不让我离开他的身边。”在谈话中肯尼迪因要发表演说离开了一个小时，肯尼迪的弟弟特德就想对埃克斯娜非礼，遭到了她的拒绝。

第二天，肯尼迪在西纳特拉的住处邀请埃克斯娜吃午饭，宴席持续了三个小时。席间，他们从家庭生活到天主教义无话不谈。埃克斯娜还告诉了肯尼迪他弟弟昨天晚上向她求爱的事。肯尼迪淡然一笑，说：“这个小坏蛋，你得原谅他的年轻妄为。”

以后的一个月里，肯尼迪几乎天天给埃克斯娜打电话。“他问我一天过得怎么样，我看见谁了，做了些什么；而我则问他关于竞选的事情。他显得急于见到我，我得意得几乎飘飘然了，世界看上去多么美好！”埃克斯娜回忆着那难忘的往事。

他们约定3月7日在纽约相见，而转天就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

那个夜晚他们是在谈情说爱中度过的，“杰克显得无比钟情，他很注重我的感情，对我既体贴又温存。不过后来，由于他体力欠佳，而且把白宫内养成的傲慢习性带到床上，因而他似乎总是在接受服务。”说起他们的床第之欢，埃克斯娜感慨万千。

“令我惊奇的是，他在竞选总统的第一轮决战前夜竟是那样轻松，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整个夜晚甚至没有提到过新罕布什尔。次日清晨，他送给我一束玫瑰花，打开一看，其中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想着你……J。”

一星期后，西纳特拉邀请埃克斯娜并把她介绍给其朋友萨姆·詹卡纳，埃克斯娜说：“我当时不知萨姆是芝加哥教父，但我确信他绝非等闲人物。”

这样，埃克斯娜既认识了詹卡纳又与肯尼迪有肉体关系，这使她很快成了肯尼迪与黑手党之间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

1960年4月6日，肯尼迪第一次提出要埃克斯娜作他与黑手党联络的信使。那是在乔治敦肯尼迪的府邸里，当时肯尼迪的妻子杰基外出未归。埃克斯娜是头一回到肯尼迪住所，她说，在肯尼迪与他妻子作爱的床上和他幽会的滋味真难受，可是，“我对杰克极感兴趣，我需要和他在一起，这种欲望战胜了我的良心。”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只有肯尼迪、埃克斯娜和一个叫比尔的说客在场。“他们两人整整一个晚上都在讨论西弗吉尼亚州初选的策略，杰克是天主教徒，他的竞争对手是耶稣教徒，而那个州的95%的选民是耶稣教徒，因而杰克感到非常头痛。杰克和比尔商讨带多少钱去西弗吉尼亚和谁在那个州有影响力。忽然，杰克转向我：‘你能悄悄为我与萨姆安排一次会面吗？’”

埃克斯娜反问：“为什么？我可以问吗？”

肯尼迪严肃地说：“我想我在竞选中需要他的帮助，这次会见越早越好。”

对于能帮助肯尼迪，埃克斯娜十分兴奋，第二天一早她就打电话给詹卡纳，告诉他她本人要去芝加哥与他谈话。“我在4月8日早晨八点半来到芝加哥俱乐部与萨姆进行谈话。我告诉他，杰克想见他，因为杰克在竞选中需要他的帮助。我们商定四天后在迈阿密海滩枫丹白露见面。我打电话通知杰克，然后根据他的要求飞往迈阿密。”经过埃克斯娜的斡旋，肯尼迪与詹卡纳如期见面，他们的会谈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现在看来，在总统竞选中，黑手党帮了肯尼迪大忙。

1960年1月肯尼迪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有两大不利因素，即资历不够深和信奉天主教，后者尤其致命。在美国，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人数之比是二比一。在南部某些州，基督教徒则占绝对优势。在美国的政治棋盘上，天主教徒历来只是听人摆布的小卒子。民主党人充其量只不过希望有个天主教徒做副总统候选人，从而既可得到天主教选民的支持，又不失去反天主教选民的选票；而天主教徒做总统候选人肯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在肯尼迪之前，已有天主教徒竞选总统惨败的例子：1928年，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就因其天主教徒的身份而引起大多数选民的反感，终于败北。肯尼迪深知自己的处境，1960年3月总统预选开始，经过激烈的角逐之后，肯尼迪和信奉基督教的休伯特·汉弗莱击败了其他几位民主党总统候选的提名人，居于领先地位。肯尼迪此时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基督教徒占95%的西弗吉尼亚州。在那里，他要想战胜汉弗莱显然不易，可是在5月10日，一个奇迹使所有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不由得对肯尼迪刮目相看：肯尼迪以三比二的优势，在反天主教的西弗吉尼亚州击败了汉弗莱。这一胜利迫使汉弗莱灰溜溜地退出了竞选。这是总统竞选中第一次关键性的胜利，使肯尼迪有可能与共和党候选人一决雌雄。

是黑手党的金钱使肯尼迪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生死攸关的五月大捷。

谈到肯尼迪与詹卡纳4月12日在枫丹白露见面时，埃克斯娜说：“我不在场，但事后杰克来到我的房间。我问他会见进行得如何，他显得很满意并感谢我所做的安排。我们又谈了一个多小时竞选的事，然后杰克告诉我，如果他在7月份得不到提名的话，他就和妻子离婚。他没有说他离婚是为了我还是其他女人，或是杰基要离开他去找新的男人。他只简单他说他们的婚姻不幸福，离婚是双方的协定。”

肯尼迪离开时交给埃克斯娜一个信封，并让她在他走后再打开。埃克斯娜发现信封里装着两张一千美元的钞票。埃克斯娜说：“杰克想让我用这钱买件新的貂皮大衣或什么特别的东西。”她收下了这笔钱。

虽然埃克斯娜不知道肯尼迪与黑手党达成了什么协议，但后来联邦调查局发现，黑手党为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竞选捐了巨款，其中大部分用于酬谢为竞选效力的主要官员。

事实是，詹卡纳曾派大西洋城经营俱乐部事务的保罗·丹马向西弗吉尼亚控制竞选机器的行政、司法官员游说。他许诺，如果能为肯尼迪拉选票，事后可得酬金5万美元。

同年7月，肯尼迪由民主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开始为11月的总统大选作准备。他的对手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尼克松曾在出访苏联期间与气焰嚣张的赫鲁晓夫进行过轰动世界的“厨房辩论”，也曾因受到来访的英国政治耆宿的丘吉尔的赞扬而身价百倍。相

比之下，肯尼迪不仅年龄上给人以未可信赖之感，而且在政治上也可以说是涉世不深。为了变不利为有利，肯尼迪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在7月到11月这四个月里，埃克斯娜又为肯尼迪和芝加哥黑手党头子詹卡纳安排了几次会面。大选时，肯尼迪在尼克松影响较大的伊利诺斯州获得多数票，以微弱的优势战胜尼克松，成为第三十六任美国总统。

埃克斯娜透露：“杰克当选后，萨姆一直说，要不是他为肯尼迪在伊利诺斯州库克县作出努力的话，肯尼迪这辈子就当不成总统。”

帮助一个美国人、一个天主教徒当选为基督教国家的总统，黑手党真是法力无边，令人咋舌不已。

在肯尼迪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他无暇顾及埃克斯娜，这期间邻国古巴出现的共产党政权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但一时肯尼迪对中央情报局策划已久的猪湾行动计划还有些犹豫不决。当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大部分是黑手党分子）组成的古巴旅在猪湾登陆惨败后，上台仅仅四个半月的肯尼迪十分难堪。可他不知道，更危险的是得罪了黑手党，肯尼迪不懂黑手党的规矩：知恩必报，从而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并最终为此送命。

4月28日，即猪湾惨败后的第十一天，肯尼迪电召埃克斯娜，让她飞往拉斯维加斯，从罗塞利那里取出一封信然后飞往芝加哥交给詹卡纳。到达那里后，她安排了一次总统与黑手党头目之间的会晤。

“那是在傍晚举行的一次简短会议。萨姆最先到达，然后是杰克。他一进门就搂住我说：‘对不起，我今天晚上不能呆在你这里。’他还要在民主党的一次宴会上讲话。尔后他走过去与萨姆握手，萨姆打招呼后没有称他为总统，而是直称杰克。我问他们是否希望我离开，杰克说：‘不，我希望你别走。’为使他们谈话方便，我走进浴室等待他们谈话结束。”

第二天，应肯尼迪的要求，埃克斯娜飞往佛罗里达。她从罗塞利和詹卡纳处取出另外一封信，五天后飞回华盛顿。然后她立即打电话通知肯尼迪，并把信带给了他。

见面时，肯尼迪半开玩笑地问埃克斯娜在佛罗里达是否过得愉快，他话中有话地说：“你在那里花了很长时间嘛？”

埃克斯娜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向肯尼迪撒娇：“亲爱的，我是为你才去那儿的。”

她的杰克说：“萨姆怎么样？我可不愿你和他太亲近了，别让他把你勾引去。”

堂堂的美国总统竟与黑手党头目争风吃醋了。

第二天，埃克斯娜又来白宫吃午饭。饭后肯尼迪陪伴她来到卧室。“我看到两张床，杰克又引我穿过一凹室来到另一间卧室，那里有一张大双人床，我们在那儿幽会了一番。”肯尼迪送埃克斯娜出来时交给她一封信，让她转给詹卡纳。

那年从春到夏，埃克斯娜往往数天或数个星期马不停蹄地自己花钱乘飞机或火车奔波于全国各地。她在肯尼迪、詹卡纳和罗塞利之间传递信件。她说：“信是封起来的，但没贴胶纸，信封上无任何字迹或标记，信的重量如一本杂志，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也从未想知道。我总是随身携带这些信件，因为我知道那里面的内容对杰克太重要了。我只是想我爱杰克，他信任我，我在为他做重要的事情。”

直到1975年参议院委员会报告问世，埃克斯娜才猜到信封里的内容：“我

意识到我那时是帮杰克安排利用黑手党刺杀卡斯特罗的计划。”

黑手党对卡斯特罗这位古巴共产党强人把他们在古巴的夜总会和贩毒俱乐部扫荡得干干净净而怒火大旺，他们发誓要宰了卡斯特罗。在气势汹汹的古巴旅全军覆没后，他们决定用拿手好戏——暗杀，黑手党中直接参与向卡斯特罗投毒计划的就是詹卡纳和另一个叫约翰·罗斯利的家伙。根据埃克斯娜的回忆，詹卡纳肯定同肯尼迪总统面谈过此事，总统是什么态度那就不得而知了。

白宫当时的电话记录表明，詹卡纳不止一次地从芝加哥住地给肯尼迪打过电话，同年8月8日，詹卡纳亲口对埃克斯娜说，他刚刚见过杰克。据后者推测，这次面谈是在白宫进行的。尽管从肯尼迪图书馆收藏的白宫登记簿上查不到詹卡纳的名字，但进入白宫会见总统，还有另外两个途径：一是应召来访者无须登记就可从另一个便门进入白宫；一是来访者用化名进入白宫。

此时的黑手党，并非溜门撬锁的街头小贼，而是能登大雅之堂的江洋大盗。

以后的时间里，肯尼迪遇到种种不顺心的事，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受到了批评。心烦意乱的肯尼迪对埃克斯娜越来越专横。尽管如此，埃克斯娜仍在为肯尼迪传递那些令人疑窦难解的信件，在白宫和詹卡纳之间奔波。但有一天，她忽然发现自己成了联邦调查局的重大调查对象，她立即变得惊慌失措，向“杰克”求助。肯尼迪说：“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萨姆是在为我们做事。”这种无关痛痒的安慰消除不了埃克斯娜心中的恐惧。总统终于大发雷霆之怒：“你应当学会应付这件事，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1962年夏天，他们的关系彻底宣告完结。他们并没有发生争吵，只是彼此间再也难以相容。

就在这一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注意黑手党的活动。总统的兄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把黑手党大头目萨姆·詹卡纳作为主要调查对象（目前还无法证明罗伯特是否知道詹卡纳与约翰·肯尼迪的关系）。经常与詹卡纳来往的埃克斯娜因此也被跟踪。3月22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午餐会上告诉总统，埃克斯娜和詹卡纳有来往，而且还给总统秘书打过电话。胡佛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黑手党，他向肯尼迪暗示，如果此事泄露，可能会损害总统的形象。这番话使肯尼迪无比震惊，他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肯尼迪惶惶不安的是：此事败露，他将身败名裂，从此结束政治生涯；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年多后，他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会在枪声中毁灭。

可能是为了忘记过去，埃克斯娜与肯尼迪分手后定居贝弗利希尔斯。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消息传来，埃克斯娜登时浑身无力，瘫倒在地。

1975年，埃克斯娜与丹·埃克斯结婚，婚后第四个月，参议院委员会传讯了她。在听证会上，她一口否认肯尼迪总统知道她与黑手党的关系，她也从未在总统与黑手党之间充当过牵线人。

然而现在她承认，15年前她在参议院作证时撒了谎。“这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我吐露真情，只有死路一条。”的确，与肯尼迪有来往的几个黑手党头子都先后下了地狱：1975年6月，詹卡纳前往参议院作证时，在家门口被杀，凶手逃之夭夭。参与谋杀卡斯特罗的另一个黑手党老板罗塞利，在参

议院作证时，提到中央情报局企图暗杀卡斯特罗和詹卡纳在这一阴谋中充当的角色。几天以后，人们在迈阿密附近的海滩上找到了他老先生的尸体。由于这一事件涉及的主要人物都被暗杀了，埃克斯娜二十多年来一直守口如瓶。

现在埃克斯娜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不愿带着隐密离开人间。在恐怖中生活了这么多年后，她终于决定讲出肯尼迪总统与黑手党关系的一部分真相。

那么，曾经是全世界新闻焦点，至今也仍是热门话题的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到底如何呢？这本历史旧账中也涂满了黑手党的浓墨重彩。

1963年11月22日，在肯尼迪就任总统24个月的时候，他到了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准备为民主党在该州的国会议席竞选奔走。就在当天早晨，《达拉斯早晨新闻报》刊登一则欢迎他的新闻加了黑框，这使肯尼迪预感到是一种不祥之兆。他恨恨地对妻子杰奎琳说：“今天，我们去的是疯人区！”与此同时，在一座仓库的高楼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平静地将他的意大利卡宾枪装上子弹，然后瞄准正向夹道欢呼的群众频频招手的总统扣动了扳机。这一枪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生命点了一个重重的符号，——休止符号。

依据美国宪法，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他立即命令大法官沃伦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对这桩“千古罪行”进行调查。沃伦委员会经过十个月的紧张工作，先后讯问过二万五千名证人，同有关人员作了二万七千多人谈话，最后提交了一份60万字的调查报告，达26卷之多。但是后来发现，大山生了只小老鼠，虎头蛇尾……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宣布为凶手。过了两天，他自己又被一个达拉斯居民杰克·鲁比杀死。委员会的结论是：精神失常的奥斯瓦尔德一个人单独行动，杀死了肯尼迪总统，而精神失常的鲁比同样是单独地杀死了奥斯瓦尔德。

这简直是拙劣之极，就算是一个平民被杀，这个结论也漏洞百出，何况枪下亡魂乃是堂堂的美国总统，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面对这个荒唐的报告，不免举世哗然。沃伦委员会十个月的紧张工作竟得出这么个骗小孩的结论，怪事何其多？！

为了平息对此案的种种猜测，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新闻机构“美国之音”用37种语言向全世界播发了沃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如果这也算调查报告的话。与此同时，它还被印成小册子，由二百多个美国驻外机构向全世界散发了数十万册，一再宣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任何人同奥斯瓦尔德策划和进行对总统进行谋杀，“无法证明判断谋杀动机”。

26年过去了，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有人对沃伦委员会的所谓调查报告提出挑战，即使在当时，85%的美国人就表示不相信沃伦委员会的结论，因为疑点层出不穷。奥斯瓦尔德暗杀总统的事实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证实，相反，种种情况说明，他不过是一个替罪羔羊。总统被暗杀后，有关这个案件的数十名证人被杀死了，似乎有某种强大的力量接连把他们——除掉。而肯尼迪总统谋杀案的档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竟在层层现代技术的监控下不翼而飞。

黑手党导演的谋杀案，你是永远无法找到黑幕最后一层的那个“老板”的。

黑手党的法则是：施予人恩惠却得不到报答，那就必须以这个人的生命

和鲜血作补偿。

——1919年美国黑手党头目弗兰基·耶尔那种兴之所至偶尔力之的义举到今天似乎已成为历史陈迹，被时代洪流冲刷得干干净净，且一去不返了。

黑手党的另一条法则是：谁知道的关于他们的内幕太多，尤其是司法和政界要人，那就必须被除掉（1976年美国记者唐纳德·博尔斯便是因此丧生）。

而这两条戒律，伟大的肯尼迪总统竟都触犯了。

从30年代中期起，黑手党就把古巴变成了自己的乐园，“科札诺斯特拉”的使者夺取了那里的赌博和贩运毒品两项生意；50年代，黑手党“托拉斯”成了独揽哈瓦那所开的赌场的业主并取得了把毒品从西欧运进美国的最主要的最可靠的通道。黑手党匪徒对这个岛国如此称心如意，以至很多黑手党大头目都蜂拥于古巴并走居下来。但，美好生活到1959年突然结束了，古巴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把腐朽制度连同“科札诺斯特拉”在古巴的分店一起埋葬了。

一夜之间被剥夺了千百万美元利润来源的黑手党疯狂了，他们把大胡子卡斯特罗恨到了骨头里。

新奥尔良的黑手党头目卡洛斯·马塞罗，就是极度仇视古巴革命的一个。他曾经往在古巴，是古巴独裁统治者巴蒂斯塔的私人朋友，当卡斯特罗席卷全国的时候，马塞罗和巴蒂斯塔一同仓皇逃离哈瓦那。众所周知，巴蒂斯塔曾得到“科札诺斯特拉”慷慨的财政资助，条件是黑手党在古巴可以为所欲为。马塞罗回到美国之后，在一次黑手党“老板”会议上表示愿意出一百万美元来换取“卡斯特罗的脑袋”。

在古巴损失惨重的另一个头目就是我们熟悉的芝加哥分部“老板”萨姆·詹卡纳。他是黑手党在调整与美国政界关系方面成就卓著的一位。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上等人士。他的女婿托尼·蒂西是美国国会议员、领导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罗兰·利博蒂纳的正式助手。美国三大刊物之一《新闻周刊》后来写道：詹卡纳是匪徒中的匪徒，是包括毒品、赌博、卖淫和合法生意等部门的千百万金元帝国的君主。他也是市长、警察局长、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政治活动家的主宰。”

詹卡纳当初为肯尼迪竞选总统效劳，并非义务劳动，他期待有朝一日“杰克”当选，用替他夺回“古巴乐园”、“哈瓦那天堂”作为回报。

偏偏肯尼迪是个榆木脑袋，表现得很勉强，先是在支持“古巴旅”登陆计划上犹犹豫豫，后又对詹卡纳一再请求设法暗杀卡斯特罗表现得兴趣不大，这使詹卡纳十分恼火。

更令人气愤的是，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此时却向“科札诺斯特拉”——也就是“我们的事业”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进攻。而上面提到的卡洛斯·马塞罗和詹卡纳都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曾经受过黑手党恩惠的肯尼迪总统对他兄弟的荒唐举动竟不加干涉。

总统先生当时非常为难。明处他是手按圣经、对全体美国人宣誓效忠合众国《宪法》登上总统宝座的，此时他的弟弟顺应民心民情，要大力肃清罪恶累累的黑手党，他有什么理由干涉或制止呢？可暗地里，他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黑手党资助的缘故。知恩不报是黑手党最大的忌讳，当这位总统终于明白这条戒律时，他已骑虎难下了。

但黑手党却毫不体谅总统的难处：既然你是榆木脑袋，还要脑袋何用；

既然你感到难于做人，那就不要再做人了，下地狱去吧！1962年，卡洛斯·马塞罗把“科札诺斯特拉”的其他各路“老板”请到他新奥尔良的老窝，商讨暗杀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计划。詹卡纳就知道这个计划。1975年，已经66岁的詹卡纳悄悄地住在芝加哥城郊的私邸里，由于肯尼迪被刺案的最新线索遭到披露，他被法院传讯。因为案件非同一般，所以在詹卡纳私邸里担任警卫的不仅有他的心腹保镖，而且有联邦调查局密探。但是，这个老牌匪徒、黑手党大头目还是逃脱不了被用匪徒方式处死的命运：头上中了六枪，脑袋几乎被打飞。有人迫使这个危险的证人永远沉默了。美国报纸一针见血：“詹卡纳是一个过于危险的证人，而且杀死他比杀死一个外国领导人（指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来得简单。”在他之后，曾与詹卡纳一同请求肯尼迪总统推翻古巴政权的黑手党老板罗塞利也被杀死。后来查明，罗塞利在死前几天把参与暗杀肯尼迪总统的一些情况报告给了政府。

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射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和后来杀死奥斯瓦尔德的鲁比都与新奥尔良的黑手党大亨卡洛斯·马塞罗有密切交往。这位老板由于他们失掉了古巴而不能原谅约翰·肯尼迪，更因为他听任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将黑手党当作主要的刑事罪犯打击对象而被看作眼中钉。

无论如何，肯尼迪总统既然已被那位地府判官般的黑手党大事打了红钩，他便已在劫难逃，即便能侥幸逃过达拉斯那场凶杀灾难，以后也还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瞄准他大好头颅的黑枪……

千万不要以为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位与黑手党直接接触的总统，这其中还有大名鼎鼎的理查德·尼克松“光辉的一页”。

“水门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丑闻。由于这个案件，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但是，事情败露后，尼克松和他周围的人极力想开脱出来，甚至异想天开要保住自己在白宫的位置。于是，他们绞尽了脑汁，甚至向——“科札诺斯特拉”求助。

事情是这样的：多疑的尼克松在白宫安放了能把那里的谈话内容记录到磁带上的录音装置。在调查“水门事件”时，自然要检听这些磁带。除其他内容外，尼克松亲口说了一些非常不幸的话：“我是说，您会得到100万美元的……而且会得到现金。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这笔钱。我们会弄到钱的。这没有任何问题。”

这些话是尼克松在1973年3月同顾问约翰·丁谈话时说的。指的是，受到审判的“水门事件”的一般参加者要求付100万美元来换取自己的沉默。起初，总统关于100万美元现金的谈话找不到什么解释，后来，在他辞职后，联邦调查局于1977年在调查工会老板和黑手党匪徒霍法失踪案时偶然发现：美国总统尼克松从……“科札诺斯特拉”那里得到了100万美元。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都确认：1973年黑手党“老板”托·普罗文扎诺和他的保镖萨尔瓦多·布里古廖将50万美元交给了偷偷来到拉斯维加斯的白宫特派信使，其余50万由芝加哥“老板”艾伦·多尔夫曼交给了尼克松。

拉拢政治家并不是美国黑手党的专利，他们在西西里的老前辈们早已深谙此道。一个政治候选人需要选票，黑手党在某些地区就给他提供；他需要多少，黑手党就给多少。一个政客在选举中得到这些选票，心里是不踏实的，因为，黑手党过手蜂蜜就可能变成毒药，肯尼迪总统之死不正说明这一点吗？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还是这样干——前仆后继——为什么不呢？无论怎样政治总归是一种冒险和投机呀！当年意大利的政治巨头奥兰多不就是凭这

种方式上台，1919年在凡尔赛，和劳埃德、威尔逊、克列孟梭一起，成为名噪一时的英、美、法、意为首的西方世界“四巨头”的吗？

无论世界上什么地方，一个候选人当选以后，总得向他的选举人表示一下，意思意思，他必须做些事情来回报他们的选票。也许政治家上台时心里并不喜欢这样做，但对黑手党的承诺毕竟是一字千钧，聪明的政客总是明白对黑手党违约意味着什么，前车之鉴，肯尼迪总统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你敢不兑现诺言，那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于是，聪明的政客不得不推荐那些极不称职的人担任好工作，写信给内阁部长保护形迹可疑的人，越权批准黑手党分子出狱，阻挠批准威胁某些“朋友”利益的公共工程计划，等等。黑手党人认为，有些政客能保守秘密，对他们不妨施加恩惠，一旦他们得到权力之后，就作出报答。虽然这些权力并非来自黑手党，但它却对黑手党不时地有好处。这些政客是应当受到尊敬与保护的。

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曾无可奈何地说：“黑手党仅仅为了存在下去也需要政治上的保护，因此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不收买各级政府官员是不可能存在下去也不可能发展势力的。没有政客，大规模的犯罪活动就不可能放手地干。”

来自西方的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国会议员中至今与黑手党头目保持秘密联系的人数之多，仍令人咋舌。“立法的人同犯法的人结成神圣同盟”。立法者不时制订一些从严处理黑手党组织的法律、法令，违法者不时通过议员争取释放或包庇黑手党人物。黑手党徒为骗取政府贷款而收买联邦官员；为了逃避罪责和刑罚，黑手党头目买通政府部门。这些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请看：

1984年，美国黑手党大头目格斯·格林鲍姆因杀人如麻而被判极刑，由联邦行刑队执行枪决。参议院议员、曾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的巴里·戈德华特，竟千里迢迢地赶往纽约去参加这位恶贯满盈的黑手党头子的葬礼，悲痛之情如同失去了同胞兄弟——事后方知，他们从前确是称兄道弟。

众议院议员亨利·赫尔斯托斯基同黑手党诈骗犯彼罗夫有密切关系，议员多次通过彼罗夫在国外进行诈骗，甚至谋害外国官员。

美国黑手党喜欢在政府中找“朋友”，这是他们的“习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上面曾经提到过，黑手党有一条法则：谁知道关于他们的内幕太多，那就必须被除掉，记者唐纳德·博尔斯便是因此丧生。

这件事早就发生了，虽然只是在不久前才被宣扬出去，可是，直至今天许多问题还未弄清楚，而且将来也未必能弄清楚。

美国公众似乎也已不再抱什么希望，博尔斯的鲜血只好白流了。

博尔斯之死：烦恼只为多开口是非皆因强出头

地点：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市。

时间：1976年6月2日11时35分。

当地报纸《亚利桑那共和报》记者唐纳德·博尔斯，一位身材魁梧、血气方刚的男子汉，跑到停车场，几乎是一步就冲进（挤进）了他的达特松牌小型轿车，然后三下五除二，拧动钥匙，拉开手闸，踏动发火装置，汽车驶离了原地，接着就……“轰隆”一声飞上了天空，足有七八米高。然后周围一切都在抖动，附近的房屋玻璃一起碎裂、横飞。

博尔斯的汽车爆炸，确切地说是被炸。

当人们跑到出事地点时，发现博尔斯脸部朝下，躺在血泊之中，双腿埋在“达特松”牌轿车的碎片里。

而他，居然还活着！

“请给我妻子打电话，”记者发出嘶哑的声音。“他们……终于找……找到了我，黑手党，‘埃姆普莱兹’！去找约翰·亚当森。”

这就是博尔斯当时来得及说的话！谋杀者无论如何也估计不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查明，车下放了大量的甘油炸药。如果估计到博尔斯的伤势，他继续为自己生存进行斗争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外科医生给他做了五个多小时的手术，切除右腿，从全身取出数十块碎片，情况仍十分严重。在医生们忙着手术时，密探们已毫不费力地查明：汽车里装有炸弹，放在驾驶员座位下面。警察也报告说，汽车行驶了几米，后来才飞上天空。

在博尔斯编辑部同事的协助下，密探开始调查：最近一个时期，这位记者写了哪些文章，他的揭露性文章都威胁到谁。原来，博尔斯既不是个安份守己的人，也不是个胆小怕事的记者。他专门揭露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揭露当地商界、政界上层人物中的贪赃受贿现象。开始记者生涯以来，他多次收到匿名信，有人威胁要杀死他。1976年6月2日，他们终于这样做了。

博尔斯的同事和密探研究了他最近的文章和笔记，查明他经常揭露“埃姆普莱兹”公司的行贿活动，这个公司的领导机构设在布法罗，在亚利桑那也设有业务。博斯坚信，这家大公司是美国许多表面上合法，实际上却受“科札诺斯特拉”操纵的企业之一。博尔斯提醒人们注意的正是“埃姆普莱兹”公司在赌博业中的利害关系（“科札诺斯特拉”的得意的传统行业）。“埃姆普莱兹”把亚利桑那州的赛马和赛狗业据为己有。博尔斯把这门生意正式从布法罗来到亚利桑那州和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许多著名人物从全国各州来到该州这两种现象作了对比。他把老资格的匪徒云集亚利桑那州和该州土地投机生意兴隆完全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

1950年，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市有10万零6千人，而70年代猛增至120万，“人口爆炸”的原因在于：亚利桑那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最后的边疆”之一，它在1912年才加入美国，由于开发较晚，还有许多空地，于是，大量冒险家蜂拥而至，土地投机生意便红火起来。出售和倒卖土地的交易，竟从这里形成了美国开发新土地的典型传统。在亚利桑那州，也许比美国的任何地方对待法律的态度都更为随心所欲。一代又一代的牲口贩子和商人统治着这个地方，他们崇尚武器，子弹和匕首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开发美国西部过程中大发血腥横财的黑手党当然不肯放过这片诱人的“阳光地带”，五六十年后，像“埃姆普莱茨”这样的黑手党公司也仍然要到这里

巧取豪夺。这种明火执仗的“合法生意”弄得亚利桑那良民咬牙切齿。仗义执言的博尔斯不能袖手旁观，他要揭露这阴谋。

警察在侦察过程中查明，他遭暗杀之前几天，有个陌生人给他打来电话说，在某种条件下他可以告诉博尔斯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其密友加里·罗普茨维格卷入土地投机的程度。那个打电话的家伙抛出了必要的诱饵，因为博尔斯正不动声色地接近这两个人，所以他对陌生人的建议很感兴趣。后者在电话交谈中使博尔斯深信，他的确知道这两个以及其他有声望的政界人物的情况。

博尔斯把同这个陌生人进行电话交谈以及同他约定见面的情况告诉了自己要好的同事，而且同事们在博尔斯被暗杀后还找到了他写的字条：“约翰·亚当森，‘克拉仓顿’旅馆前厅，11时5分。”

谋杀后的第二天，博尔斯仍奇迹般地活着，而且神志清楚。他在回答警方密探关于这张纸条的询问时证实，他昨天开车本是为了去“克拉仓顿”旅店与一个自称是约翰·亚当森的人见面，亚当森答应把重要情况告诉他。博尔斯在警察播放的一盘录音里听出了亚当森的声音。

约翰·亚当森是早已被警方怀疑的大土地投机商内德·沃伦集团中的人物。警察开始搜捕亚当森。可是三天后，亚当森却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了警察局。警察试图讯问他，可亚当森的律师振振有辞：他的委托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呢。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亚当森被什么人用100美元保释——仅仅100美元！

此时，博尔斯仍在医院忍受那惨绝人寰的折磨。由于伤势扩延，大部分血管系统坏死，医生又给他切除了第二条腿，继而又切除了一只手，这位昔日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深富正义感的记者如今变成了个只剩一只胳膊的怪物。但他还活着——仍然活着，他要活下去，也许他希望看到最后一层黑幕后面的那个黑手党匪徒老板得到应得的下场吧。

可是，信念的力量终究敌不过死神，6月13日，也就是谋杀发生十天后，唐纳德·博尔斯终于离开了我们。据说，他是圆睁着一双怒目去世的，凶手和“大老板”的逍遥法外使他死不瞑目。

记者的惨死轰动了整个亚利桑那，并在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应。博尔斯咽气的当天，义愤填膺的警察局根据亚当森被控谋杀正式逮捕了他。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就此事迅速作出反应，他号召美国人起来反对“各种背景下的恐怖主义”。而亚利桑那州大名鼎鼎的美国国会议员、曾参加过总统竞选角逐也参加过其黑手党“朋友”葬礼、后来又被博尔斯因投机丑闻穷追不舍窘态渐露的巴里·戈德华特此时也打破了沉默，放了一大堆的马后炮。他夸夸其谈道：“自从唐纳德来到亚利桑那州以后，我就认识了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人。如果是谋杀一个坏蛋，而不是谋杀像他这样的人，那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这里有时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但我们总是置之不理，并说这是偶然现象。我们以前总觉得，亚利桑那是个安定之邦，但现在我们不能这样看了。”

这位政客犹如对选民发表演说一样花言巧语。但是，博尔斯的同行——美国全国各地的报刊对这些卑鄙肮脏的政客已忍无可忍，全美新闻记者立即成立了一个调查这个案件的专门小组，著名的新闻评论家，曾获普利策新闻大奖的罗伯特·格林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格林发表庄重的声明说：“博尔斯是由于他所做的事被杀害的。他做的事如下：揭露了我国一直在某种程度

上加以容忍的犯罪活动和贪赃受贿现象。”

这个声明比参议员戈德华特的空话明确得多，它一举击中某些身居高位的丑类的要害。博尔斯被谋杀后，报界回忆了在亚利桑那州发生的不少这样的谋杀事件，事件的牺牲者都是以某种方式威胁要揭露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这些犯罪活动与政界和商界的关系的人。奇怪的是这些谋杀案迄今没有一件被弄得水落石出，难道这就是参议员先生津津乐道的安定之邦亚利桑那州的现实吗？

经过了威力巨大的爆炸之后，博尔斯竟还能作证，这种完全不可理解的偶然性使罪犯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但他们毕竟见过大风大浪，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当亚当森被捕之时，那帮人又变得信心十足起来。

本来，在侦查过程中查明，亚当森是一个与犯罪商业的著名人物来往甚密的败类和刑事犯。实际上他没有工作，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钱从何来？

可是，即便警察能够证明他有大笔非法收入，要指控他犯有谋杀罪却不容易。

起初，亚当森表现得蛮横无理，他的行动方针简单明了：“你们能拿出什么证据呢？不错，我曾邀请博尔斯到克拉仓顿旅馆见面，可这能说明什么问题：难道有人趁此机会杀死他，也是我的过惜吗？”他并不知道，警察已经找到了他的情妇和一个同案犯朋友。只要不对他们进行追究，他们就同意供出亚当森——美国警察也不是吃素的。

当亚当森还在法庭上洋洋得意地嘲弄法官和检察官时，忽然他的面部表情僵住了，然后是震惊、惶恐，接着便如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不再张牙舞爪了。

此时，亚当森的情妇海尔·温斯出现在证人席上。

海尔·温斯作证说：有一次，他们在闲游，亚当森走进一家礼物商店，出来时拿着一包东西。好奇的海尔·温斯在旅馆里把它打开，发现里面有一部无线电遥控装置。在美国，不少人使用这种装置。

海尔又说：“我们回到旅馆后，亚当森问我，是否认识博尔斯这个人，我说认识。于是亚当森让我到一家酒吧间，看博尔斯是否在那里。我在酒吧间没见到他。”

海尔同时供认：“亚当森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会得到一大笔钱。在谋杀博尔斯那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发生了一件事，他不能在近期内和我见面。”

海尔的证言已使亚当森呆若木鸡，而当下一个证人莱蒂尔出场时，他几乎昏倒在被告席上。

莱蒂尔是一个有刑事犯罪劣迹的家伙，他长时间地同法官讨价还价，曾极力要求不就博尔斯案件对他作有罪判决。后来他供认：亚当森曾告诉他说，他把一枚炸弹放进了记者的汽车里。

亚当森这样直言不讳地对莱蒂尔说这番话并非偶然，因为莱蒂尔是半个炸药专家。亚当森就是在莱蒂尔的参谋下挑选炸药的，并当着他的面钻到汽车底下，以便在实际操作时能迅速而又可靠地将炸弹安放在汽车底盘上。

对这起谋杀案的审讯进行得如此成效显著，使一向能对司法机构进行认真而有效干涉的亚利桑那州的商、政大员们大惊失色，他们决定制止法官们伸张正义。

地方检察官贝格被指控为办案不当，滥用职权。指控是在亚利桑那万能

商人集团的声明中提出的。这个集团叫做“菲尼克斯四十人集团”。亚利梁那老板们的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审讯过程中，又暴露了政界和商界的强有力人物的名字，这些人物和有组织的罪犯界又有直接奉连。

贝格只好发表令人心酸的声明，由于官方当局和与此案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强大联合有意从中作梗：“我无法彻查博尔斯案件；简直无法开展工作。”随后他就离职了。一个在这个岗位上出色地服务了第二个四年的检察官，当他不小心触动一根神秘之弦时，就被弹出了舞台。

贝格的位置由他的副手哈里斯取代，他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呆到四年一任期满。但四十出头、血气方刚的哈里斯并不留恋仕途，他在追查博尔斯案件中雷厉风行，不惧怕黑手党的威胁，并且发表严正声明，在声明中已将矛头悄悄指向曾被尼克松称为“民族英雄”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他身边的人。

这位不畏强权、正直的检察官哈里斯仅仅上任两个月，就被某些了不起的人物挤出对博尔斯案件的审判。而且，哈里斯的文件放在检察官专用的文件柜中，有关博尔斯案件的全部材料都在那里，这个文件柜却立即被查封，随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亚利桑那州的司法界被深深地激怒了，州检察长贝比特通过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的节目向全美呼吁：

“有没有人企图暗中了解亚利桑那州的这件审讯事务？答案只有一个：是的，这种人是有的。我指的是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地制造这样一种环境：一切事情，只要他们认为是一门生意，就不能对之作任何批评。按他们的意见，当局的存在就是为了发展生意，甚至不能对它作任何调节，而警察局和司法机关只应同普通抢劫犯打交道而已。”

真是一针见血！

可惜，检察长的义愤并未能改变哈里斯下台的命运。在美国，新闻媒介有时具有无法想象的魔力：可以结束越南战争，可以轰尼克松下台。可有时嚷得声嘶力竭，震天动地，也无济于事。

案件被转给考特法官审理，几天后他对新闻界宣布拒绝受理此案。显然，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决定延滞并搞乱司法诉讼程序，以便最终谁也摸不着头绪，无法审理。

伯德塞尔法官被指定为新的办案人，结果他刚一接手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亚当森突然心平气和地供认他的确把炸死博尔斯的那枚炸弹放在了记者汽车的底部。但是，炸弹的遥控按钮是由一个叫詹姆斯·罗比逊的人按动的，亚当森还招认说，他自己和罗比逊都受雇于麦克斯·丹莱普，此人是当地建筑承包人，是按当地巨富肯珀·马利的旨意办事的。

警察立即逮捕了罗比逊和丹莱普，但没有触动本州首富马利，因为法院认为“证据不足”。然而在亚当森的供词中提到的却正是他和罗比逊都受雇于丹莱普，根据马利的指示，日后丹莱普还要支付现金，让亚当森与罗比逊两人杀死亚利桑那州检察总长贝比特。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亚当森可以高枕无忧了，他再也不会面临死刑的威胁，因为法官大人曾答应过，只要从实招供，即不会被判处死刑。

那股神秘莫测的强大势力又耍了一个花招，使人们觉得亚当森关于马利的供词不大可信。

建筑承包人丹莱普原来是一个谋杀案的承包人，亚当森和罗比逊皆受雇于他。但，是否真像亚当森所言，他的后台是马利呢？调查遇到重大阻力。

马利何许人也？他是亚利桑那州的钱库，是亚利桑那人的饭碗。

他已年逾古稀，是一个早在上个世纪就发了大财的畜牧家的儿子。其父于 1932 年去世后，马利做各种生意，结交天下，名扬四海。声名显赫的政客“兼”民族英雄巴里·戈德华特和此州共和党领袖罗普斯维格都已认识马利六十多个年头了。罗普斯维格这样评价马利：“我的确认为，他是本州最富有的人。他是经过艰辛的努力自己干出来的！他父亲只留给他微薄的资本，而他自己则从头做起，终于有了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

土地、畜牧业和其他生意组成了马利的金融帝国，当然，还有酒类生产。马利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在人前最高评估自己的财产为 5 千万美元，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二十分之一，他的全部财产起码有 10 亿美元之多！马利是社会上一位神秘异常的人物，他对政治从不过问，但他动一下指头也可以选上国会议员。可他更愿意操纵国会议员。因为他是本州首富，对于摸得着看得见的公益事业，总是慷慨解囊，所以，亚利桑那提到马利，人们有口皆碑。

那马利和丹莱普是何关系呢？原来，马利和丹莱普的父亲年轻时是真正的“铁哥儿们”，在丹莱普的父亲死后，这个 12 岁的未来承包人变成了孤儿，马利“几乎像教育儿子一样”教育他。人们都认为，百万富翁把他教育成一个笃信上帝的诚实的顾家人，一个精明能干的实业家。这个万事如意的不大不小的美国人的外形确乎如此，但这层皮里面却包了一颗祸人之心。谁也说不清在他身上是什么性格最先形成，是实业家的天赋还是犯罪的本能？反正他确信不疑：一个商人的发财之途必然要经过犯罪。因为他要在这条弱肉强食的道路上扫清一切障碍。

现在杀死博尔斯的凶手供出丹莱普就是指使行凶者，而幕后却是为发展繁荣的亚利桑那做出了丰功伟绩的马利，一切证据顿时都显得软弱无力了。

这里边奥妙何在？

一位不愿透露自己名字的亚利桑那律师兼政治家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所有当地的古老而富裕的家庭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就已认定，为刺激商业的发展，必须把亚利桑那的全部权力夺到自己手中。显然，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他们重复了尼克松‘水门事件’那样的事憎。为了试图掩饰罪证，此时他们不得不在某些地方违反法律。但是接着出现了黑手党，如年德·沃伦一流的人物。他们利用了像戈德华特·罗普斯维格这样的一些人。后者不但不承认自己被利用，反而因害怕被揭露，又重复了尼克松做过的事情，即把做过的事全部掩盖起来。许多人都卷入这一过程中去了。博尔斯离揭露这种情况太近，所以他的死是必定无疑的。此外，为了使人们只怀疑马利一个人，马利因此完全可能会被推出来做替罪羊。果然，这一点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不经过什么特别调查，大家就对他产生了怀疑，而经过复杂的调查后，大家对他所有的也还只能是怀疑。”

原来如此，亚利桑那州的权势显要可能选中马利作避雷针，从而使自己逃离了丑闻的牵连。但马利却什么都不在乎，他是亚利桑那资本的象征，没有任何人能把投入监狱。

至此，一切都可以预料了。轰动一时的博尔斯案件，在亚当森招供后，又走过场似地“调查”了一个多月，然后就以亚当森和罗比逊各判 70 年监禁

而告结束了。

这真是绝妙的一手！那股深不可测的势力成功地运用了丢卒保帅的战略战术，“平息”了一切司法麻烦。而且对于那位名记者受的残酷折磨来说，所丢的卒子也没有彻底毁灭：没有一个人被处死。而且有人还向他们做了切实的许诺，这个世界的强者是不会忘记他们今后的命运的。难怪亚当森这个突然的供认就像是按某个人的命令进行一样。

那么，是谁发出的命令呢？

官方宣告案子已经结束了，可正直善良的人们并不肯善罢甘休。由罗伯特·格林领导的那个记者小组决定亲自将事情弄清楚。在当局宣告结束审判后一个星期，记者小组在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报告声称：

“作为亚利桑那州法律维护者的法官和律师们，不管是自觉的还是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都对造成姑息养好的环境出了力。在这种环境中，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代表人物和最富有的家族成员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法律工作者的行为则没有受到监督。

“博尔斯是被两股势力——大商业和政界合谋杀害的，其中的大商业当然包括黑手党集团做的生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黑手党头子们涌入亚利桑那州做“生意”，以致全美国的人都知道，在亚利桑那州，三“B”至高无上。三“B”就是“Business”（生意）、“Bank”（银行）和“Bananno”（博南诺）。约·博南诺是全美国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大头目，在纽约有广大的地盘，但因为“生意”关系经常坐镇亚利桑那州，他在此州大受欢迎。一些饱学的美国社会观察家公开指称，统治亚利桑那州的有两大台柱——巴里·戈德华特和黑手党。

当戈德华特在政治前台充当“民族英雄”时，博南诺则悠悠然在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接壤的地方四处游玩。成百上千公斤的毒品正是通过这条国境线悄悄地从墨西哥运进美国的。博南诺坐在自己豪华的公馆里，就是一位在指挥塔上发号施令的将军，默默地指挥调度着毒品有条不紊的贩运。同时，博南诺像许许多多黑手党大头子们一样，过着富裕可敬的公民生活，他经常到教堂去做弥撒，有时还向教会赠送风琴。他热心一切社会名流应该关心的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他只有一次与人公开谈到自己的生意：“我做的是不动产生意。”的确，他有大量的棉花等农产品买卖，是在亚利桑那州商务当局注册登记过的，总之，博南诺将永远合法。

几十年来，不断有各地的美国人质问大黑手党博南诺怎么在亚利桑那州“合法”起来了。对此，戈德华特认员有一天突然大发议论：“全国各地都有人问我们，亚利桑那州真在黑手党的操纵下吗？我们可以这样向那些打算在这里做生意的人回答：我们正试图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强调一点：地方当局是关心发展生意的。”这不就等于说，即便受到黑手党的操纵，只要亚利桑那州能够发财致富，我们就在所不惜。一句活，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我们都有利可图。

这就是亚利桑那州中政客与黑手党达成的君子协定，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博尔斯竟吞了熊心豹胆，想揭穿这个“神圣同盟”，岂非鸡蛋碰石头？

既然政界是铁板一块，记者小组就又开始调查博尔斯倒在血泊中说出的那个公司：埃姆普莱茨。

表面上看，总部设在布法罗的这家公司与大多数现代美国公司一样，经营着各式各样的生意。公司的董事长路易·雅各布在1960年和黑手党勾搭上

了。从此雅各布开始到全美各地，与黑手党头子一起充当各种运动团体的所有主和共有主，而且经常以非法的赛马赌博组织者的身份出现。

70年代初，美联邦法院、国会以及新闻界开始议论雅各布与黑手党的关系，但此时他的金融实力已强大得出人意料，司法部门奈何他不得，结果他仍在众说纷纭中怡然自得地生活。

与此同时，埃姆普莱茨公司把亚利桑那州的赛狗业控制在自己手中，从那时起，记者博尔斯就开始走上死亡之路。他一眼就看穿了“埃姆普莱茨”公司招牌后做的是黑手党匪徒的不法生意。于是他开始调查。

在调查的过程中，与之一起工作的侦察员住院，后来失踪，收集到的全部材料消失得无影无踪，博尔斯本人也一而再地受到恐吓。但一切恐怖的阴影都没有吓退他。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博尔斯一再证明说：“埃姆普莱茨”是一家黑手党式的合法公司，从而引起一番争论，“埃姆普莱茨”发动强有力的攻击，对博尔斯大肆污蔑，双方正吵得热闹，议论却又戛然而止，如同一只鸡刚打了一半鸣就被扭断了脖子。这原因只有政治家说得清楚了。

前国会议员斯太格说：“博尔斯曾给我带来一些他在各州调查得来的材料，这些报告尚未发表，但它们使我大吃一惊：埃姆普莱茨与黑手党关系密切。”斯太格是支持博尔斯的调查的，但后来调查还是夭折了，而且记者本人也命归黄泉。我们来听听斯太格伤心的陈述吧。

斯太格：在博尔斯遇害前四个月，我同他谈了很久，劝他别花精力去揭露“埃姆普莱茨”公司。为什么？因为关心这件事的人太多了。

记者：也许是他的报纸由于“埃姆普莱茨”和法院提出反诉而劝阻他继续调查。

斯太格：该报的确同“埃姆普莱茨”达成协议。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博尔斯受到了多大压力，因为该公司也向法院控告了他。当然，《亚利桑那共和报》一直否认这一点，但那是撒谎！可耻的撒谎！编辑部同该公司达成了协议并答应停止公布揭发材料，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根据同一原因，“埃姆普莱茨”早已向法院控告了其他报刊：公司要求《阿肯色新闻报》支付2千万美元，赔偿给它在道义上造成的损失。要求《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也赔偿2千万美元。公司也向法院控告了《体育画刊》。

记者：把对方拖进昂贵的诉讼中是有钱人惯用的手法吗？

斯太格：我只能说，这是事实！因为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也在同我打官司。我已经可怕地看到，我也得出6万美元的诉讼费。接下来好像我还得拿出10万美元以上，这些还远远没完。我很有理的，我应该打赢这场官司。但我怎么拿得出这么多钱呢？的确，这一手很毒。可以说是以打官司和随之而来的巨额费用相威胁。报纸和博尔斯都成了这一手的牺牲品。

记者：我觉得，在我们亚利桑那，也许全美国的主要罪犯是我们的司法系统，他们太不负责任，是吗？

斯太格：噢，您说得正中要害。但是，司法机关本身也是牺牲品。

博尔斯由于要揭露黑手党与政治、商业的关系而被杀，萨姆·斯太格的敌人则以另一种方式教训他：作为亚利桑那州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于博尔斯被杀后的1976年冬美国参议院选举中惨遭败北。大商业和黑手党商业协同一致，给每一个敌人以惩罚。

斯太格由于政治前途的破灭而心境如何，他眼下还有什么不祥之兆，只有他自己清楚。但是，1978年，经过与“埃姆普莱茨”公司长期的斗争之后，

他不仅突然放弃斗争，而且公开表示了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意见的忏悔。炸死博尔斯的炸弹打垮了他的意志。“埃姆普莱茨”立即撤回了自己向斯太格提起的需要100万美元的诉讼，从而使这位前国会议员摆脱了进一步的诉讼费用的困扰。全美国对这一“默契”均感愕然，连老于世故的亚利桑那州也大为惊奇。“您是在开玩笑吧，萨姆？”当地一家报纸向斯太格发问，并继续写道：“从今以后，萨姆·斯太格就是亚利桑那政治舞台上一位最出色的滑稽演员……政治和赛狗就是这样产生爱情的。”这都是格林领导的记者小组发表的报告的一部分，但是，接着，这个报告的另一个标题就是：“戈德华特与黑手党有勾结”。“近三十年来，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他的兄弟罗伯特以及他们的密友亚利桑那州著名的共和党人罗普斯维格，都是亚利桑那州左右一切的人物。在这段时间内全州都存在着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而这些人却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并与黑手党的头目们友好相处。

戈德华特议员是世界上长达二十年呼声最高的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现在竟又发现与黑手党关系密切。真是令人扼腕。虽然他没有当过美国总统，只是曾被共和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那场选举中败给了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但戈德华特在美国人中，并不比任何一任总统的知名度低。

这里是美国百科全书授予戈德华特的词条：“戈德华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主张继续执行‘冷战’政策，是健康的保守主义的象征。主张恢复从前清教徒式的美国道德价值和传说……他以自己的全部个性和尊严博得了人民的尊敬。”

可是，记者小组的报告却坚持认为：“同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黑手党保持密切的相互关系，保证了戈德华特上升为全国性的的人物。”

不管戈德华特多么傲慢，他必须回答记者们的指控。因为在美国，新闻界决不只是一个摆设，它可以一呼百应，众志成城。记者们在报告中说：“他和犯罪界最大的老板之一迈耶·兰斯基的得力助手们关系密切。”的确。迈耶·兰斯基在美国黑手党中的地位是高不可比的，所以他不便去俯就国会议员戈德华特。对于一个国会议员来说，派出一个“得力助手”就足够了！这个得力助手包括戈德华特兄弟的亲密朋友、兰斯基的左右手格斯·格林鲍姆。后来，戈德华特曾亲自参加了被联邦法院判处死刑的格林鲍姆的葬礼。当时，这位洁身自好的议员突然置一切舆论的非议于不顾，只管到葬礼上表达满怀的悲愤。

终于，戈德华特发表声明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迈耶·兰斯基那个人的任何情况。”

笑话！“没有听说过任何情况。”这个名字在美国，每个小孩都知道，而他又是全国的主要政治活动家之一，可是他戈德华特却根本没有听说过兰斯基的情况。这种回答简直蛮不讲理，但政客有时是最无耻的，他们当众撒谎也不脸红。因为这样一来，向戈德华特提出的关于兰斯基的许多问题就失去了意义。美国报纸对戈德华特狡猾的伎俩大加抨击：

“迈耶·兰斯基是黑手党一位空前著名的人物，任何人都无法和他相比。也许只有历史上最著名的美国匪徒阿里·卡波内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参议员戈德华特先生怎么却没有听说过迈耶·兰斯基的任何情况呢？简直莫名其妙。”

就算对兰斯基真的一无所知，那么一直在亚利桑那横行无忌的博南诺

呢？戈德华特和他在一个州生活了几十年，总不能说“没有听说过任何情况”了吧？

于是戈德华特先生满脸真诚地作了如此回答：“我知道图松市有一个人，好像叫作博南诺或者类似的名字。他有一次购得赛狗业，后来又把它卖了。我从来没有从当局或其他任何人那里听说过，在亚利桑那州有黑手党的成员。”

参议员大耍无赖，记者们无可奈何。

记者小组在报告中说：“从50年代起，报刊经常刊登黑手党涌入亚利桑那的消息。唐纳德·博尔斯就这个问题给《亚利桑那共和报》写过不少文章。作家海伊·泰里齐出版了一本叫做《要尊重你的父亲》的书，该书畅销全美，后来作者把它改编成电视剧本。文章、书和电视都不仅详细地叙述了约·博南诺的情况，而且介绍了充斥着亚利桑那的其他黑手党徒头目的情况。除了上述材料外，还可以罗列黑手党老板扬名亚利桑那乃至全美的其他许多材料。”

难道对于这一切，戈德华特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难道自称毕生“推动美国教育”的民族英雄竟然不读书、不看报、不欣赏改变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电视？

很显然，戈德华特不这样瞪着眼睛说瞎话，他就不可能摆脱困境。

他的主要助手加里·罗普斯维格也选择了上司的策略：“我不知道关于亚利桑那州各种匪徒的‘系’的任何情况。我不认识博南诺，听说他曾住在图松。顺便问一下，他怎么啦，还活着吗？”

戈德华特和他一伙的这种做法再次说明，唐纳德·博尔斯已不能不被杀死了。因为他知道的情况太多了，而且还想把这一切都告诉自己的同胞。

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不可动摇的“神圣同盟”——与参加双方的犯罪的美元和无上的政治权力相比，司法界显得微弱而渺小。博尔斯的血只好白流了。

他临死时那双瞪得溜圆、犹在喷射怒火的双眼啊……

他的血真的白流了吗？

世人和历史会对博尔斯以及博尔斯之死作出确切的评价。

今天的“科札诺斯特拉”已经是一个罪犯辛迪加，领导这个罪犯公司的是所谓经理理事会，即由九个最大的“系”的“老板”组成的那个“委员会”。全国被分为二十六个区，每区由一个“系”掌管。但同时需要指出，一个纽约就有五个“系”。按规定，这五个“系”的“老板”都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这个罪犯辛迪加的总人数并不多，约5000人，包括各“系”的老板，他们的谋士、副手、“尉官”和“兵士”。如果考虑到这个组织人数不多这一情况，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使是“兵士”也都是些十分富裕的人，更不用说“尉官”了，至于这个辛迪加的头目和他们的亲信一般都是百万富翁。

罪犯辛迪加目前的机构与美国大商号、大银行的严密组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匪徒们尽管仍然信守西西里的许多传统，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效法了美国商人的组织经验。

但是，尽管这个罪犯组织的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如果它没有积极的帮手的话，它是无法扩展到整个庞大国家的。这种帮手为数不少，约有10万人，主要是一些暂时未被吸收进“科札诺斯特拉”的罪犯。这些罪犯都是一些贩卖麻醉品的商人、老鸨、高利贷者、赌博生意的组织者以及执行“科札诺斯

特拉”成员交给的各种任务的其他刑事罪犯。这种组织方式恰好使“科札诺斯特拉”更加牢不可破，使它的成员几乎不可捉摸。

“科札诺斯特拉”大规模地开展犯罪活动，以致它的岁收入竟高达 500 亿美元之巨！这是华盛顿联邦当局的最低估计。500 亿意味着什么？第一，按比例，这是美国国家预算的十分之一；第二，任何一个美国公司都不会得到这种收入，甚至不会得到近似收入。例如。美国最大的、收入最多的“埃克森”公司的利润一年只有 25 亿美元多一点；第三，“科札诺斯特拉”的岁收入超过美国所有汽车制造垄断组织加在一起的利润；第四，这个数目超过了纽约交易所一年内出售的所有股票的价值。

《哈佛企业评论》杂志写道，黑手党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像波士顿专案检察官托马斯·杜埃尔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也作证说，“黑手党越来越不愿经营街道小铺，而愿意从事大规模的金融业务。”《纽约时报》的“科札诺斯特拉”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海哲写道，这个罪犯辛迪加已成了“美国最强大的联合组织”。难怪有人说，黑手党乃国中之国，此言大有道理！

这国中之国更将魔爪伸向整个美洲。

古巴曾一度是他们的“哈瓦那天堂”，而一般的南美洲国家，特别是巴西，除了作为贩毒活动的便利基地外，也为黑手党匪徒们提供下一所“物以类聚”的新家。例如：世界黑手党巨擘托马索·巴塞塔就是在圣保罗度过了大部分光阴，最后，也是在此地被捕。黑手党，流毒无穷。

第六章“黑手”遮天——欧亚新“黑手”

当美国黑手党在刀光剑影中踏着累累尸骨，满手血腥，从可怜兮兮的意大利移民摇身一变，成为西装革履、风度潇洒的名流的时候，意大利本土的黑手党小字辈们也不甘落后，一路追赶着时代潮流，走到世界的前台来了。

社会发生了变化，黑手党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更新。

他们不再像老前辈唐·维托·卡肖·费罗和唐·维齐尼·卡洛杰罗那样，脚踏着乡间的泥土，守着宽阔舒适的豪华院落，对一群乡民和镇长发号施令。他们正年轻力壮、手脚麻利，不甘寂寞的心灵驱使他们来到一座座意大利最繁华的大都市闯世界，开拓崭新的局面。

这局面必须是崭新的，不同于以往，因为它属于新一代的黑手党。

只知墨守成规而不思进取，黑手党就会消亡。这是新一代黑手党分子的信条之一。

的确，社会环境变了：农业社会变成了工业化大城市；过去控制了土地和生产就可以吃喝不愁、鱼肉乡里、独霸一方了，现在则要控制消费，要控制大市场——巴勒莫的蔬菜水果和鱼类市场，还有军人市场，香烟市场、酿酒市场，还有建筑业，还有房地产市场黑手党是一群最能感受世界变化的人，凭空气中的气氛，凭风向的变动，凭阴云的湿度，凭路人的神色，凭那些政府公告中字里行间的语气，他们就明白自己应该怎样做，所以黑手党永远能开风气之先，永远是弄潮儿。

当然，他们也能缔造自己的历史，开创自己历史的先河。

他们向城市进军。

进城之后，眼界大开：原来上帝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供我们享用，我们以前怎么就不知道出来溜达溜达？要不然，早发了大财了。可是他们马上又明白了，只有强人才配享用这些财富。那好，我们放开手大胆地干吧，白手起家，何必再装腔作势假正经。过去当一个在村里德高望重的教父就志得意满，一辈子都在苦苦地熬着，打肿脸充胖子强装着一个“受尊敬的人”，真是乡巴佬！这群小子脚未出西西里，只在巴勒莫转了一圈，就得出了如此结论。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作法。

他们在巴勒莫扎下了根。50年代、60年代出现的新技术——小汽车、程控电话、电传机，新武器——塑料炸弹、微型机关枪，等等，武装了他们。他们现代化了。现在的西西里黑手党新一代纯粹是谋私利的，他们连前辈的“忍辱负重”保留着的那块遮羞布也不要了。他们不再当什么中间调解人，不再听人诉说什么，也没有人去找他们了。他们只是当某个方面的霸主，只要当大实业家、商业巨子。在人群中，他们不再是“受人尊重”的马菲亚，而是都市歹徒。

他们也毫不掩饰这一点，甚至还有意在大庭广众面前用“哒哒”、“哒哒哒”的枪声来说明这一点，当真是我行我素，疏狂恣肆。

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哥儿们是绝不会去卖力做那些苦不堪言的小本生意的，他们靠谋杀、绑架、恐吓挤进一个又一个工商行当之后，没有几天就厌倦了。“怎么才能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呢？”这些小黑手党们又在做他们千年不变的梦了。这时候，从美国来了“致富火种”、“幸运者”查尔斯·卢恰诺。

查尔斯·卢恰诺是个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西西里移民。30年代，他还

是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就以惊人的聪明首先将淫秽事业与海洛因消费结合在一起了。由于比别人先走一步，不出五年他就成了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夜路行多必遇鬼。一次偶然的失手，他与美国警察对面而坐了。由于他能向美国军队提供毒品而将“功”补过，美国警察居然把他释放出狱并允许他迁回意大利本土。卢恰诺先生衣锦还乡，立即在新一代黑手党中传播“科札诺斯特拉”在美国的模式，顿时引起了“观念更新”的浪潮。小黑手党马上开始追求令人神往的美国现代化了：走私、贩毒、发展淫秽事业。

50年代末，西西里黑手党开始大规模地走私香烟，如同吸烟被认为是成年人的标志一样，贩烟则成了城市意大利黑手党的标志。到70年代初，烟草走私经过了十几年历程，进入鼎盛时期。黑手党人将原来独立经营的大走私贩拉入帮伙，使这些人与“科札诺斯特拉”（也就是“我们的事业”）结为一体。这些人的加入，使黑手党的走私活动突飞猛进，过去一次贩运五百箱香烟就是一笔大生意了，后来一次运三万到五万箱香烟也不足为奇。实际上，黑手党只是投资管理，一切组织运输的费用均由走私贩子负担，所以走私香烟对黑手党来说除了大大增加收入没有任何坏处。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避免好几条走私船同时在海上待卸目标大，耽误时间，黑手党各“帮”安排了轮流到货的顺序，他们把整个贩烟过程组织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恐怕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管理大师见到那种情景也会自愧不如。

烟草走私使黑手党迅速出现了财力雄厚的强大集团——家族。最著名的有巴达拉门蒂、格雷科、马尔凯塞、因泽里洛、邦塔特、李吉奥、托马森·巴塞塔等人。

为了控制整个烟草走私业，现代化的黑手党废弃了过去繁琐的入伙条件，只要是走私行家、烟草专家就可以成为“受尊敬的人”。此外，各家族打破了原先严格的帮派界限。走私规模越大，需要的资本越多，他们就越得联合起来，但是永远也没有几十年前的那种最高领袖了，大家走到一起来不过是为了日后彼此能分得更多的赃物。

到70年代末，黑手党对烟草走私不感兴趣了，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更能获取暴利的贩毒生意。精明的黑手党家族首领们算了一笔账：一公斤海洛因在阿富汗卖价2000美元，在土耳其是3500美元，在希腊、黎巴嫩达到8000美元，到巴勒莫或米兰就可卖价12000美元。经过提炼加工后，在欧洲或美国市场上能以12万到15万亿美元的批发价出售……

账还没算完，教父们嘴角已流出了哈喇子！

他们又对各国的贩毒经验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总结出打入毒品市场的三要素：拥有资本、施用暴力和稳住警察。这三条，黑手党徒差不多从娘胎里生下来时就具备了，本色行当，不必再学。

恰在这时传来消息：美国警察和国际刑警组织出动飞机、军舰，一举捣毁了沿用二十年之久的国际毒品运输专用线：中东——土耳其——黎巴嫩——法国马赛——美国。

“好，那帮狗日的横财也发够了，现在该轮到咱们了！”

说干就干，几天工夫，买毒、炼毒、贩毒在西西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以前的贩毒只是买——运——买，可西西里黑手党在能发大财的事上是不吝惜功夫的，他们把贩毒过程变成了买——炼——贩，在岛上各处开设了几十个提炼加工厂。虽然他们大多大字不识，却懂得“知识就是力量”，请来了国外最好的技术员和化学家。一个加工点每周就能加工制成价值5千万美元

的吗啡。黑手党家族首领们纷纷东访东南亚，准确地说是印度支那，根据联合国的材料，印度支那的生鸦片生产占世界总量的 70%，黑手党家族与东南亚毒梟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每年从东方运到欧洲的原料达六百多吨。

1970 年夏天，召开了一系列西西里黑手党会议，议事日程的主要项目是海洛因交易的整顿工作。1970 年 7 月 4 日在巴勒莫市索勒旅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经过 12 天的讨论，决定让东南亚取代土耳其和马赛成为鸦片和海洛因的主要来源，而墨西哥则作为“安全阀”使用。两周后，在米兰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与会人员有巴塞塔、巴达拉门蒂、李吉奥和格兰多·艾伯提。

意大利黑手党的贩毒事业轰轰烈烈搞起来了，到 80 年代初，西西里成了提炼海洛因的世界主要中心并且是世界上最大市场——美国——的主要供应者。由吗啡碱中提炼海洛因以及其后对美国的销售现在是西西里黑手党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一些增产的海洛因是销售给意大利国内消费的。在过去，黑手党有一道禁止在他们本国推销麻醉品的自己强制的禁令，可是这种“荣誉社团”的原则很快解体了，并且又一次为“荣誉社团”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收益。

据新近意大利和美国警方侦察表明，欧洲毒品运输的 60% 和世界毒品走私的三分之一是由西西里和住在美国的西西里家族后代控制的。从而，以色列、古巴、伊朗、爱尔兰等地的走私贩子都被西西里人排挤出局了，从此，他们只能从黑手党吃剩下的东西中扒拉一点残羹冷饭。

巴勒莫所有的黑手党家族都卷入了贩毒生意。家庭首领决定自己的每一个成员是否参加，如何参加。一般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首领亲近的人总被派大用场，因而分得的利润也高些。而那些年纪大或能力差些的人则很少能介入，甚至干脆被排斥在外。但是，面对金钱和巨额利润，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能力无比，因此，凶杀，内讧，因分赃不均引起的倒戈，就成了现代西西里黑手党的特征。他们的绞杀殃及池鱼，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无数无辜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世界上更有不计其数的人因服用他们提供的“白面儿”而终生不得安宁，终至毁灭。

全世界都在这个“黑手”怪物面前发抖。

谋杀在继续：名人的尸体越来越多

20世纪60年代，黑手党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委员会已开始活动猖獗，掌管事务的三巨头分别是科隆家族的萨尔瓦多·雷伊纳，格舒家族的老板邦塔特和奇尼塞家族的首领巴达拉门蒂。各家族代表在委员会都有一席，被称为“地区老板”。

但事实上，委员会的大权却操纵在李吉奥的手中。

李吉奥本是一个孤儿，自小被一位意大利著名的医生收为义子。这位医生名叫纳瓦拉，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西西里黑手党的大头目。他收养李吉奥的用意绝不是出于善意，而是想豢养一只走狗，李吉奥在义父以培养走狗为目的的教育方式下不负所望，“茁壮成长”为一棵黑手党好苗子。他枪法奇准，几乎弹不虚发，为纳瓦拉杀人无数。

纳瓦拉脾气暴躁，对手下赏罚不够分明，动不动就拿“干儿子”李吉奥出气。就算是泥菩萨也会有点土性，何况李吉奥根本就不是泥菩萨，而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终于有一天，这只走狗忍受不了“义父”的辱骂，跳起来咬断了纳瓦拉的喉咙。

然后李吉奥逃亡美国。但他在美国并不安分，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不断派人回意大利来执行暗杀密令，而其指令总是被顺顺利利地完成。所以“跛子”李吉奥虽远在美国，声威却仍震动本土。

当李吉奥认为自己的势力已足够大时，便带领人马荣归故里，继而靠凶杀一步步当上了西西里黑手党的首领。他不惜血本地从事绑架和海洛因买卖。他身材矮壮，喜欢吸大雪茄烟，常戴墨镜。

由于骨结核病不断发作，他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但他是个强人，仍设法抓住权力不放，甚至身陷囹圄也大权在握。他小心翼翼地挑选支持者当他的地区老板，邦塔特和巴达拉门蒂对此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委员会小心翼翼地捍卫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决定谋杀计划，一次又一次的暗杀命令从这里发出去，再反馈回成功完成任务的报告。

被杀的第一位政府官员是巴勒莫检察长皮埃特罗·斯卡格莱昂。

斯卡格莱昂活着时多次被指控有贪污腐化行为。虽然因为与黑手党有牵连而受到调查，法院最终还是宣判他无罪。他掌管着无数黑手党犯罪档案，这些档案却被神秘地压下或丢失了。其中有一份是意大利宪兵提交的关于所有黑手党家族卷入毒品交易的报告，被压了四年竟毫无反应。直到宪兵队在审理黑手党案子时变得焦躁不安，直到许多黑手党分子都遭到起诉，他才开始行动。漫长而艰难的审讯毫无结果，因为缺乏证据，黑手党分子被宣判无罪。

斯卡格莱昂是极有权势的，他能够借此威胁那些他曾经保护过的人，但当他不想再给黑手党谋利益时，他的末日就到了——黑手党不能容一个知道自己太多秘密却又不为自己所用的人活在世上。

暗杀斯卡格莱昂事件是李吉奥一手策划并亲自执行的——这并不罕见，李吉奥经常亲手杀人，当年他在黑手党中的身份就是一个杀手，后来才爬上高位的。杀人已成了他的习惯和特长。

1971年5月5日，李吉奥重病缠身，骨结核使他痛得走不了路，但显然并非杀不了人。他早就一个人开车来到斯卡格莱昂为妻子致哀的墓地。半个小时后，斯卡格莱昂像往常一样来为妻子扫墓，当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李吉奥在车里举枪，瞄准，扣动扳机，一阵乱枪把斯卡格莱昂及其司机送上了天。

堂。

谁都说没看到什么，但当然许多人都知道事实真相。

警察和法院找不到凶手，因为没有证据。

斯卡格莱昂之死差不多是 1970 年 7 月米兰首脑会议一年后发生的，李吉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除了讨论毒品交易外，很可能还对那次凶杀的实施作出了决定。会议很可能也做出了谋杀为巴勒莫激进报纸《时报》效力的记者德·毛罗的决定。

德·毛罗的失踪至今仍令人不解，谁也不怀疑他被谋杀了，很多人说与黑手党有关。由于德·毛罗混迹于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他的死被罩上一层神秘的阴影。生前，他一直在调查意大利石油大王马太的死案，马太的飞机很可能是遭到破坏才在西西里坠毁的。当时，马太被认为威胁了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有人说黑手党是按照契约代表“政治利益”来谋杀马太的。德·毛罗的失踪和马太之死成了所谓“名人的尸体”清单上的头一项。

在后来十年里，格雷科和科隆家族的黑手党消灭了任何可能威胁其利益的人，从无足轻重的无赖到政府最高官员，他们都不放过，名人的尸体也好，一般人的尸体也好，在巴勒莫的大街小巷里天天可以见到。

1977 年，一位忠于职守的宪兵上校居塞波·罗梭从意大利北部被选派到西西里去调查黑手党。在此之前，他参加过斯卡格莱昂和德·毛罗失踪案的调查。但他也没能幸免。他到巴勒莫没多久，即被格雷科家族派出的杀手皮诺·格雷科一枪了账。

继罗梭之后，各种凶杀事件更加频繁，频繁得足以形成一种模式。在巴勒莫，这类凶杀案通常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人对黑手党的海洛因交易构成威胁，便难逃厄运。黑手党建立了许多加工厂，确立了对这一行的垄断地位。任何人知道了这些加工厂并且愚蠢地将真相传播出去，那实际上等于签发了对自己的死刑执行令。谁要想调查从意大利到美国“洗来洗去”的上百万美元的来路，也将招致杀身大祸。

司法部门能够获得的调查权十分有限。黑手党在政界的保护者们早就保证，他们的银行账目和守法公民的账目一样是严格保密的。若有权调查财源，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贩毒分子，还会揭露出那些支持他们的政客和金融家。这就是不授权的原因所在。那些勇气十足地想清查财源和加工厂所在地的人意识到，他们要对付的问题不仅限于西西里，毒品交易是国际性的，为了对付它，警方和调查的法官们常从国外获得重大帮助。

巴勒莫别动队的主力侦探鲍里斯·居利阿诺首先认识到世界各国执法机关若要打击黑手党，必须联手合作才行。他特别认识到与美国人共事的重要性，并亲自参与了与美国海关和缉毒署联合调查重大海洛因案。

居利阿诺的负责与细心使他在对付黑手党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果，掌握了不少材料。1976 年 6 月 19 日，一只廉价蓝色塑料提箱被运到巴勒莫郊外 25 公里处的庞塔·莱西机场。这是从纽约经罗马运来的。居利阿诺截获了箱子，发现 49.7 万美元的毒品交易现金全是小面额钞票，用几个馅饼店用的围裙包着。后来顺藤摸瓜，竟摸到了巴勒莫委员会首领巴达拉门蒂的侄子索伦纳身上，而索伦纳的供货人原来就是他的叔叔。

在庞塔·莱西机场查获手提箱后不久，居利阿诺遇到了政府指定前来清理西多纳财政网的安波罗索列。居利阿诺可能向安波罗索列提供了关于索伦纳通过瑞士银行转移海洛因赃款的证据。他们见面三天后，安波罗索列将汽

车停在他在米兰的公寓外，下来锁汽车。

“你是捷吉奥·安波罗索列吗？”身后一个声音问。

他转过身来说：“是的。”

三名枪手朝他胸口打了五枪。

枪声响亮，五个血窟窿，鲜血飞溅如浪花。

又一个名人做了枪下亡魂。

在巴勒莫和居利阿诺一起工作的是美国缉毒署最有经验的便衣之一——汤姆·特里波迪。他在巴勒莫工作并设法建起一个由黑手党情报员组成的网络。他把他们当特工来“使用”，见面安排在偏远的山坡上，这样可以保证不被跟踪。特里波迪高个子、身材强壮，是个标准的美国佬，可是他竟能在意大利以便衣手法成功地对付黑手党，甚至有一次他还曾与巴达拉门蒂本人碰头。可惜，巴达拉门蒂为人谨慎，不会只见一面就完全信任他，后来也没再派人和特里波迪接触。

居利阿诺一再接到恐吓电话，但他并未过度担心。那时他和特里波迪刚刚围捕了许多黑手党徒。特里波迪要离开西西里了，居利阿诺尽力保护自己的美国朋友。特里波迪开车去渡口时，护卫的有一架直升飞机和两辆汽车，警察还沿途设置了路障，在渡口，也早有一队警察等在那里。

1979年7月21日，特里波迪告别挚友居利阿诺飞往美国，当时他们曾拥抱互道珍重，热泪盈眶，共约以后再合作。他走后没几天，居利阿诺走出公寓，像往常一样到力士酒吧去作晨祷。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八点时街上没有多少人。他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便决定在这天早晨比通常早点起来去与他见面。据当时去酒吧的唯一目击者说；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我看到一个人正在颤抖，脸色苍白。我想他肯定病了。我起初想帮他一把，可当居利阿诺走向大门的时候，那人却随后紧跟上去。他拔出手枪，对准他的脖子打了三枪。居利阿诺倒下了，那人又在他背上补了四枪。居利阿诺竟没来得及拔出自己的手枪。”

凶杀在继续着。

基督教民主党的临时秘书米歇尔·雷伊纳 1979 年血溅长街。这样的政治谋杀清楚他说明了黑手党与当地基督教民主党人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们怀疑米歇尔·雷伊纳没有向黑手党作出必要的让步，他们只好找一个更听话的人来担任基督教民主党的秘书之职。

一位毕生致力于打击黑手党的富于战斗精神的法官西萨里·特拉诺瓦成了当年的第二位牺牲者。他早就一心一意地追踪李吉奥，并称其为“头号公敌”，甚至将他收审。像居利阿诺一样，他也意识到要战胜黑手党，只有从他们的钱入手。他告诉妻子：

“我若有权力调查，去银行查清那些三个月前还在推小车，现在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的家伙的财政状况，该多好啊！那就有许多文章可作了。”

正是特拉诺瓦对李吉奥毫不畏惧的立场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妻子西涅拉·特拉诺瓦回忆起有一次她丈夫去乌西亚监狱提审李吉奥。

“有人告诉他李吉奥病了，下不来床。他知道李吉奥（小王子的意思）这个科隆的小霸王不会心甘情愿地下来接受一位法官审讯的，非得法官上去提审不可。为了把事情再敲实，他问卫兵，‘哎，李吉奥在床上吗？他已卧床了吗？病了吗？’卫兵回答说，‘没有，实际上十分钟前他还在院子里呼

吸新鲜空气呢。’

“听到这里，他当然一定要把李吉奥带来。他说，‘怎样把他带下来，我不管，但他必须下来受审。’

“就这样，李吉奥被用担架抬了下来。法官开始审讯，问的全是例行公事的那一套。例如‘你叫什么名字？’李吉奥回答‘我不记得了’。‘你父亲是谁？’‘我不记得了。’‘你母亲是谁？’‘记不得了。’

“法官一眼不眨，对记录员说，‘对了，这个人不记得他的名字，不记得他父亲是谁，也不记得母亲是谁。’”

特拉诺瓦是在侮辱李吉奥，他似乎在暗指李吉奥承认自己是私生子。李吉奥大怒欲狂，差点把唾沫啐到特拉诺瓦脸上。他勉强压住了胸中怒火，但记下了这段仇，结果便是：特拉诺瓦法官在离公寓不到100码的地方被近距离一枪致命。

警方对特拉诺瓦暗杀案调查得毫不起劲。就像调查一起交通事故一样。虽然李吉奥被指控犯有凶杀罪，审讯中起诉证据却不充分，毫无办法。西西里常有这种事，证人一出庭，记忆就不可思议、一点也不符合生理规律地消退。这次也一样，枪案虽然发生在巴勒莫市中心，可谁也没见到什么，谁也没听到什么。保密禁规又一次保护了凶杀者。

唯一有力的证人是法官的遗孀，西涅拉·特拉诺瓦面对目空一切的李吉奥勇敢地提出了证据。李吉奥坐在被告席上，他穿一件开领毛衣，翘着小胡子，据说身体多病，尚未痊愈，完全是一副受到侵害的商人模样。

在一次毫无思想准备的记者采访中，他声称自己无罪，又说到有时候“挤柠檬”是如何如何的必要——这是暗指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折磨和凶杀。

西涅拉·特拉诺瓦的证词是徒劳的。个人的悲剧却变成了众人的笑剧，在意大利对黑手党的许多次审讯中，常出现这种结局。像许多被黑手党干掉的人一样，特拉诺瓦曾经威胁了一个受到有力的支持者保护了多年的人及其组织。这些支持者们伸出援助之手，要么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威胁，要么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合作便保证会获得金钱和权力。反过来，他们不遗余力地保证被告免于法律制裁，在某些案件中，彻头彻尾的贪污堕落和先天的迟钝，使得对黑手党的起诉与审讯毫无结果。

西涅拉·特拉诺瓦眼见丈夫的死没引起任何反应，更决心抨击那些在西西里黑社会和整个意大利都存在的利于黑手党生长的各种因素。“西西里人生来就屈从和恐惧。”她说，黑手党正是从西西里人这些心理特征中吸取生命血液的。对于政治家和一般人来说，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对事情听之任之，或者将作表面文章而实际上一无所为的手法进一步完善。这种政治花招旨在转移公众压力，同时保护个人利益和现状。首先，黑手党人可以利用普通西西里人和那些可能的证人的恐惧心理，使他们在出庭作证时突然失去记忆。

西涅拉·特拉诺瓦与黑手党彻底干上了。她鼓励别的妇女去抵制统治着西西里的那种心理状态。她从自己的悲剧和许多其他人的磨难出发，掀起一场有力的希望运动。今天，她从街头游行示威和西西里发展起来的反黑手党激情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

——“正是由于这些迹象，一切将发生变化。这种心理状态必须改变。今天的儿童明天将长大成人。假如能够成功地改变这种心理，改掉这唯唯诺诺的心理，改掉黑手党据以生存的那种恐惧心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够打败他们。”

西涅拉·特拉诺瓦无畏地与黑手党作斗争，她以自己的行动召唤所有人的正义激情。

宪兵队一位名叫伊曼纽尔·巴兹尔的上尉接替居利阿诺，继续调查黑手党的财政问题。他调查了黑手党与西西里上层银行家和财政大臣们的关系，其中有些人当时正从美国将数以百万计的海洛因收入“洗”出来。到20世纪80年代初，替黑手党转移资金已成了一种兴旺的行当。西西里的银行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多。

在只有7万人口的西西里西部城镇特拉帕尼，银行竟多于意大利金融都市米兰。1970至1980年期间，西西里各银行营业额竟增长了百分之四百。就连西西里农村最偏远地区最不起眼的小镇都有自己的银行，它们在巴勒莫几乎每一条大街的角落都在竞争着顾客。这是银行同业不光彩的贪心与炫耀，他们就像鲨鱼一样被吸引到一个满是流血交易收入的城市里来。

巴兹尔上尉虽然也得不到调查银行账目所需要的合法权力，但在黑手党委员会看来，他大顽强执著了。1980年5月1日，在他和妻子以及小女儿回家的路上，三名枪手拦街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也了结了他的调查活动。

没过几分钟，警察便截住三名黑手党凶手进行审问。当时其中两人驾着另一位汽车正要逃之夭夭，这一位是在离出事地点几百码处企图爬上一道高高的铁丝网时被抓获的。他对警察说自己正在“寻找柠檬”。这三人早就是谋杀另一位警官的嫌疑犯，虽然他们都没能解释出是怎样逃离犯罪现场的，但却提出了同一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他们说刚刚与几位年轻的有夫之妇进行了浪漫的私通。他们不能透露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都是“体面人”。三人中的一位属于米歇尔·格雷科的齐亚库里家族，另外两位是属于因泽里罗家族。

因泽里罗早就是调查对象，许多通缉令缉查他的团伙成员。因泽里罗对通缉令非常愤怒，几乎有些神经失常了。他没同委员会商议就下令干掉巴勒莫检察长盖塔诺·科斯塔。1980年8月6日，当这位64岁高龄的检察长准备避开城市的热浪去消暑度假时，一位年轻人在大街上走近他身边，从报纸下取出一支左轮手枪，向他连开了五枪。科斯塔饮弹身亡。

因泽里罗作出这一狂躁的反应，目的是要让格雷科家族及其委员会里的同伙知道，他的残暴无情并不逊于他们。

黑手党不断地组织凶杀和犯罪，得到了有效的官僚机构保护。人们都知道，新的组织结构是“跨省的”。

1979年，正当需要新杀手的时候，一个人加入了委员会，他是有名的残忍嗜杀的变态者，这在黑手党是前所未有的。他名叫居塞波·“皮诺”·格雷科，又名“铁鞋”。他乐于参加黑手党的凶杀活动，有一次竟疯狂地砍掉了被害者的臂膀。他常到紧挨巴勒莫市中心一间黑暗的地下室房间去，这是黑手党的私刑室，许多人被绞死在这里。尸体要么被零切碎割大卸八块，要么在酸液中被蚀化。米歇尔·格雷科是委员会的头儿，其门徒皮诺·格雷科虽然与他并非亲戚关系，也成了齐亚库家族的首领。

80年代初，完全获得控制权的科隆家族开始加快步伐向国家政权提出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黑手党改组成一个依靠恐怖策略的组织。对知名人士的凶杀在继续着，这都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常常得益于得知关于某谋杀对象的安全部署和行动路线的内部消息。

斯卡格莱昂、德·毛罗、马太、罗梭、居里阿诺、特拉诺瓦、巴兹尔上

尉、科斯塔检察长一一被杀。名人的尸体越堆越高，终于惊动了那位意大利一流的宪兵将军——达拉·基耶萨，将军披挂上阵。来到了巴勒莫，他的使命是：镇压黑手党。

可惜，当他踏上征程的时候，事实上却是在一步步一步步地靠近地狱和死神。

黑手党贩毒、杀人猖獗了整整十年之后，忽然有一天，巴勒莫来了一位气度不凡、威风凛凛的将军。西西里人再三打量之后，此人似曾相识。噢，对了，他……他是达拉·基耶萨！

真是冤家路窄，他来肯定没好事。西西里的黑手党有些惶惶不安了。可接着立即又安下心来：这老家伙虽然德高望重，可也不见得能把爷们儿怎么样！走着瞧，最后难看的还不知道是谁呢？

西西里人的眼力不错，这位就是全意大利家喻户晓的国家宪兵副司令达拉·基耶萨将军。1982年4月30日，他被意大利政府任命为巴勒莫省督，执行一项“特别使命”：侦破黑手党近年来制造的大量凶杀案件，查清他们以西西里为跳板，每年向美国和欧洲各地走私近百亿美元的毒品生产、交易网点。

基耶萨是黑手党的“老朋友”，他才刚刚二十出头就已经是黑手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出身于军人世家，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反法西斯游击队，战后服役于宪兵部队。当他还是巴勒莫负责宪兵总部的一位年轻上校时，就因公视察过西西里岛，因此他熟悉风土人情，并向意大利国会的反黑手党委员会提供过证据。现年62岁的达拉·基耶萨已是国家宪兵副司令，这是一个高级职位，但实际上只干着办公室工作。

基耶萨这次重返故地，心中感慨良多。他虽然从青年一直到须发皆白都在与黑手党斗争，几次获得一级勋章，以战无不胜闻名全国，但严峻的事实是，黑手党非但远未销声匿迹，反而愈加发展壮大。今天，他们再也不是乡野村夫，其势力越出西西里，伸向全国，并渗透到政府部门、政党、工会以及金融界中去了。在国会议员中，甚至政府的部长、副部长中都有他们的代言人。1962年成立的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由于黑手党势力的渗入而多次被迫解散，黑手党人成了亿万富翁后，它和政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些政界人士的帮凶和打手，相反，这些人倒要看黑手党的脸色行事方能保住其权位。今天黑手党已可以同国家政界和财界的最咄咄逼人的集团平起平坐，毫不逊色。更可怕的是，各家族已跨越国界成了“多国黑手党犯罪集团”。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生死搏斗。

对于达拉·基耶萨的任命，有一定的背景。美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敦促意大利政府对黑手党采取果敢行动。任命达拉·基耶萨就是果敢行动之一。

基督教民主党也支持对他的任命。该党领袖居里奥·安德里蒂坚决主张打击集团犯罪，并认为达拉·基耶萨将军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巴勒莫市前任最高官员是墨索里尼的使者莫里。莫里因为像黑手党一样残酷无情，被人称作“铁腕最高长官”、“魔鬼将军”。当意大利总理斯帕多里尼把这项工作交给达拉·基耶萨时，他表示只有得到特殊权力才肯接受。

他特别要求得到政界支持，在全意大利打击集团犯罪。他说“在巴勒莫的牧场上打击黑手党，意大利别的地方却无动于衷，那只能是浪费时间。”

这位将军知道，黑手党不再只是西西里一地的现象。章鱼的触角伸向大陆，并超出了大陆。它已经与那不勒斯的卡莫拉家族等其他秘密犯罪组织组

成了强有力的联盟，在米兰和罗马都有代理人。将军在致总理的一封信中清楚地挑明了自己的要求：

亲爱的教授：

我写信给您是想谈谈我们最近谈到的事。尽管我不愿占用您宝贵的时间，我觉得有责任使您注意下列问题。

我可能被任命为最高长官，这的确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不能心悦诚服地离开现在的职位。任命巴勒莫市高级长官这一职位不应也不必将打击黑手党作为‘暗含’的职权，因为这会使人觉得我们不知道黑手党是什么，或者‘黑手党’一词意味着什么。这样还会让大众更觉得，我们虽声称要制约和打击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种现象，但并不十分认真。

“集团犯罪”一词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还要证实西西里岛一些道德败坏的政治“家庭”送往某些报纸的“信息”已达到目的。

奉命打击这种恶劣现象的人不仅要得到新闻界的支持（尽管报界并不总是权威，也并不总是可信，而且时时变卦），还应当得到政府公开的和法律认可的支持。这并不是寻求特殊法律和要求特权。这要求是必要的和真诚的。之所以要“公开的，是因为这样一项任命得与其重要性一致起来。之所以要“立法”，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牵涉到某种利益，所有的许诺便会被忘到脑后。每一句诺言，像‘会解决的’，‘我们将对此采取措施’等等，都会失败，什么事都会悄然而上。

我因而要请您，以最合格和最可信的姿态干预此事。这不仅是我个人事业的重要部分，也是作为一名忠诚可靠的国家公务员一生的大事。这样才能保证我以心平气和的、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真正的热情，接受任命。”

通过繁冗的外交辞令，将军在询问总理是否真心严肃地对待打击黑手党一事。将军太清楚意大利人的政治手法了，即似欲为而实不为。他不想成为政府公关演习的又一名受害人。

他也了解黑手党在西西里和大陆对政界、商界的渗透，他向反黑手党委员会提供的证据中，这是内容之一。去巴勒莫前，他告诫内务部长维吉里奥·罗龙尼，假如真要打击黑手党就必须拿西西里岛最显赫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开刀。罗龙尼对达拉·基耶萨将军说的还是那句他以前说过的老话：“你是宪兵队的将军，而不是基督教民主党人的将军。”

达拉·基耶萨满以为支持就要到来，满怀信心动身去了西西里。实际上，总理斯帕多里尼早就对意大利安全委员会提过此事。安全委员会由内务部长、两大竞争的警察机构（宪兵和公安）首脑、军事憎报局和国内憎报局首脑组成。只有国内情报局首脑伊曼纽尔·德·弗兰西斯科支持基耶萨的要求，其他人都投了反对票。

1982年夏初，将军到了巴勒莫，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美丽的年轻妇女。这是他刚娶的第二任妻子，她未出嫁时名叫伊曼纽尔·德·赛特卡罗。

基耶萨上任前的40天里，黑手党在西西里就已杀害了37人，平均每25小时杀死一人。这够令人发指的吧！

可是，仿佛有意向这位新省督挑战，基耶萨上任后，这种谋杀风不仅没有刹住，反而愈演愈烈了，平均每18小时杀死一人，特别是在8月中旬，8天中就杀死了14人，而1982年头八个月仅巴勒莫地区就有105人被杀。

参加过战争的基耶萨将军不是没有见过流血和死亡，可这次他忍不住了：“巴勒莫不是屠宰场！不管谁是凶手，他都得向至高无上的法律请罪！”

经过调查，这些残杀主要是为了争夺毒品的生产权和控制权而发生的黑手党之间的火并。

一时很难找到西西里黑手党提炼海洛因的地下工厂，基耶萨决定先搜捕携毒贩运的小喽罗。

1982年7月21日，警察在巴勒莫机场逮捕了凯·阿贝特，从他的皮箱里和小腿上发现了绑附的九公斤半的纯海洛因。阿贝特手上的机票表明他刚刚完成了巴勒莫——曼谷——哥本哈根——巴勒莫的旅行。

同一天，英国警察在伦敦机场也抓获了一个姓阿贝特的人——米·阿贝特。他随身带有两公斤海洛因，护照显示是澳大利亚籍意大利人。他也是由曼谷经哥本哈根飞抵伦敦的，而且一直与凯·阿贝特同乘一机，只是在伦敦他们才分手。应意大利警方要求，米·阿贝特随后被引渡到巴勒莫。经证实，这是一对兄弟，米·阿贝特是弟弟。

哥哥凯·阿贝特是一个西西里贩毒惯犯，在审讯中不肯供出事情，而弟弟则感到为之卖命的黑手党头子已经抛弃了自己，对警方采取合作态度，招出了许多内情。

米向警方提供了他们在曼谷取“货”地点的电话号码和在巴勒莫与“老板”联系的一个酒吧间电话号码。他还支出了曼谷方面写给巴勒莫方面的一封密信，并帮助警察破译了其中密码、代号，当然，作为一个小喽罗，大部分内容米·阿贝特也说不清楚。

基耶萨闻讯后大喜，亲自提审了米·阿贝特，然后立即布置军警宪特包围了巴勒莫市中心的那间酒吧。可是一连三天都没有什么动静。第四天时，基耶萨发现情况不妙：军警宪特都不听他的调动了，指挥失灵。

警察说：“我们无法接受省督的做法，无端的围捕、设路障，这是战时的做法，和平时时期会扰乱社会秩序，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瞎指挥失去全城的人心。”当基耶萨听到警察局长门多利亚如此指责时，他敏感地觉察到：这话里有话，也许并不是通常的“同行是冤家”的本性和嫉妒。

在法院方面的情况也很不乐观。除了法官尚能提供有关黑手党的重要调查报告外，在司法机关中也没有倾向将军的气氛。

当将军在市政厅与高级官员们走个面对面时，他们总是讳莫如深地一笑。

许多人劝将军省省心，别管那些“闲事”，还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多是议论达拉·基耶萨的婚姻：“这样一个老头子娶一位如此漂亮年轻的女人，肯定不对头吧？”

该地区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马里奥·达吉斯托抱怨没同他商量就作出任命的决定。另一位基督教民主党高级人物，同时也是欧洲议会成员的萨沃·利马当众声称自己与这一任命“毫无牵连”。巴勒莫市长耐罗·马特卢西也发牢骚说，该市的诚实人多的是，不需要“一位将军”来给他们解决问题。

这一系列反应刚好证实了基耶萨的怀疑，即西西里早已烂了根。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思想的挑战，这思想代表了黑手党势力的精髓。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到意大利社会各个阶层，从街头堕落的警察到法院玩忽职守的起诉人，每个阶层都有人从维护现状而不主张变革中获得好处。

这堕落的保守主义就像一面盾牌，掩护了西西里最有权势的黑手党人。达拉·基耶萨要把这面盾牌搬开，却无人肯帮他一把。

基耶萨虽然意识到这里面凶多吉少，但他顾不得许多了。大敌当前，他

立即向罗马政府呈上一份报告，要求颁布巴勒莫省督有权协调指挥全国的安全力量打击黑手党这样的紧急法令。

但是报告递上去将近一个月，却迟迟没有回音。这时，意大利财政部却发给他一批与黑手党贩毒走私有关材料，涉及近三千二百人，包括企业家、商人，甚至侦探和法官，让他火速调查这些情况。

接到报告后，基耶萨把要求扩权的事暂时放到了一边，立即派亲信宪兵和警卫部门分头去侦查，并要求巴勒莫省内各市市长、镇长上报承包工程和企业等方面的情况。

“在有 70 万人口的巴勒莫市，虽然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达 12 万人，但是，真正的穷人几乎没有，人们都花钱如流水。这是什么道理呢？是黑手党通过收买，发展其成员、半正式成员和对从事其活动的人给予经费的办法，至少养活着 20 万人！”将军斩钉截铁地说。

这是 1982 年 9 月 2 日的事。

9 月 3 日 20 点 3 刻，巴勒莫显得闷热异常。一辆蓝色的小轿车疾驶在巴勒莫热闹繁忙的大街上：基耶萨的年轻妻子像每天一样，驾车前往公署去接将军回家。

此时，基耶萨在公署门口正与哨兵聊天说笑。哨兵是个幽默的那不勒斯小伙子，他风趣地问将军，什么时候解甲归田，好像普通人一样轻松自在地下班回家。将军笑着回答说：“你说得在理，我明天就男扮女妆不让任何人认出来。”这时，夫人的车子已到，将军向哨兵道声晚安，便偕同警卫佐鲁乘车离去。但哪里知道，在他们一行驶离公署的那一刻，一辆大缸量的铃木摩托车就尾随其后，紧追不舍；摩托车之后还跟着两辆小轿车，里面各藏三名枪手。与此同时，在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另有二十个人按三人一组，分头埋伏在几个街口，并相互用步话机保持联系。这是黑手党设下的一个有计划的暗杀网。他们这次非要置将军于死地不可，否则，他们将难逃被判的命运。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基耶萨与妻子娓娓细语，后座上的佐鲁持枪在手，警觉地望着车窗外路灯下的一切。

这时，轿车已驶过市剧场，刚刚开到市警察局的门前。局里的值班员正对着闭路荧屏聚精会神地观察街头的动静。突然，他发现了一辆西德大众牌和另一辆意大利菲亚特牌小轿车，从左右两边冲向基耶萨将军的蓝色轿车。这位值班员尚未来得及拿起话筒通知将军的汽车马上改变方向，大缸量的铃木摩托车已与蓝色轿车并肩，摩托后座上的人举起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对准伊曼纽尔·达拉·基耶萨扫射了一梭子，子弹射入她的脸和身体。将军扑向妻子，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她，可是太晚了。他的警卫连枪都没来得及举起，已被击中头部，一周后死在医院里。

大众车开到跟前，一个彪形大汉走下来对满身弹痕的将军及其妻子又补了一梭子，黑手党似乎有意先对伊曼纽尔·达拉·基耶萨面部开枪，然后再杀死她丈夫，以加剧此举的残酷性。

基耶萨将军头部中弹九发，缓缓倒在比自己提前片刻身亡的妻子身上，两人殷红的血染透了轿车的座椅。

警车立即飞奔现场，人们全都在那辆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汽车跟前怔住了：警卫佐鲁头部中弹，昏迷未醒；将军夫妻被打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不远处，花生米一样散落着百八十颗苏式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壳和一颗

没有炸开的子弹。

第二天一早，意大利各大报都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悲惨的消息。著名的《共和国报》用了这样的标题：“他们害怕将军——黑手党历史上最卑劣的暗杀。”全意大利群众纷纷集会、示威，强烈要求当局捉拿凶手。许许多多的人从四面八方云集巴勒莫，在基耶萨将军遇害的街头投下了一束束鲜花，表达他们的敬佩、感激、沉痛和哀思。有人还在鲜花上留下了这样的标语：“对诚实的巴勒莫人来说，希望已经从这里消失。”

这辛辣的墓志铭比那些把将军孤立无援地送到暗杀者手中的政府那些花言巧语虚饰之词坦荡得不知有多少倍。

其实，出事前，基耶萨将军早已预感到身遭不测的危险性了。多年的经验使他深知：黑手党攻击和杀害的对象是那些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打击黑手党而又孤立无援、单枪匹马的作战者。也就是说，当整个政界、司法界袖手旁观、漠不关心时，孤军奋斗者就成了黑手党的冤家对头，在劫难逃了。

将军生前在接受一家报纸的记者采访时曾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飘摇在大海上的小舟，当暴风雨来临时，我随时可能被淹没。我是孤独的。”

将军回忆起早年在西西里当宪兵上校时的一段往事。当时在西西里西部的黑手党盘踞的村镇里，一位名叫帕马·德·蒙特恰洛的官员与当地黑手党首领发生了矛盾，一天，蒙特恰洛打电话给达拉·基耶萨，报告说他已受到黑手党首领要杀死他的威胁。达拉·基耶萨在下午晚些时候驱车来到这座村镇。天还大亮，午休过后，人们正在街上游逛、闲聊，浏览橱窗，呼吸着新鲜空气。达拉·基耶萨与那位官员手挽手慢慢在镇上溜达，从那位黑手党首领的住房前走了好几趟。这暗示是清楚的：那位官员有朋友在这里，他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于是黑手党人打消了加害的念头。

达拉·基耶萨将军说他非常希望在西西里有人这样帮他一把：“我只需要有人能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走一走。”然而谁也不肯，一个为人民为同胞甘洒热血的英雄却遭到了同胞的冷落，这是怎样的悲剧！

身为一省之督，又不乏军警保卫，将军为什么产生那样悲观的预感呢？有许多迹象使他不安，主要有这样两件事：

一是得不到罗马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有力支持。他要求给予更大的权力，增加干练的侦缉人员和反恐怖装备，但始终没能如愿以偿，政府甚至至连空头支票也没给他开出来，更不用说兑现了。

另一件是，将军上任不久就发现，黑手党一直在跟踪他。他还发现省督公署的门房也被换成一个曾被判过刑的黑手党党徒了（厉害！）。由此，他感到在这场搏斗中势单力孤，命运难以预料。

尽管长期同恐怖分子作斗争的惊险生涯已使将军敏锐超人，曾躲过了四次看来难逃的暗杀，但是在这个被黑手党阴影笼罩的城市中，他毕竟孤掌难鸣，防不胜防。他在根除黑手党的条件尚不成熟之际被“甩”到这个“匪”岛上，黑手党认为杀死他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因为他还不能代表国家权威，仅仅是“代表个人而已”。

所以，黑手党就下了毒手。

10月16日，巴勒莫为卡洛·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意大利总统、总理、巴勒莫红衣大主教、罗马政府全部内阁部长都出席了葬礼。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十多万群众在巴勒莫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纪念基耶萨将军，坚决要求惩罚黑手党。

总统佩尔蒂尼含着热泪为基耶萨将军的半身铜像揭幕。他哽咽着说：“我们已经忍无可忍，黑手党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必须由所有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一致把它打垮。”

巴勒莫红衣大主教打破了宗教的沉默，大声疾呼：“杀害将军的毒蛇注定要下地狱，永远得不到神的宽恕！”

他们俩人的话，引来了一阵阵如雷的掌声。人们似乎总算恢复了一点信心。

可是，当意大利总理斯帕多里尼带着部长们出现时，人们立刻想起了将军生前的痛心自述：“我将全力以赴，随时准备当我触及并了解某些情况时被人干掉，随时准备以死尽我的职责。但我是孤独的，我是孤独的。”

顿时，人们愤怒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大骂总理和他的部下们：“你们是真正的黑手党”、“是你们害死了将军”、“刽子手”、“小丑”、“败类”。激怒的群众把矿泉水瓶向内政部长掷去，而一些硬币像雨点似地朝总理和他的部长们头上打去。

内政部长维吉里奥·罗龙尼满面羞愧地说：“现在应该把黑手党看作头号公敌了，而且是个比恐怖主义更强大更难斗的敌人，政府即将颁布一项目前为止最严厉的反黑手党法令。”

没有三个月，这届政府便垮了台，斯帕多里尼成了临时看守总理，一个光杆司令，再也没权颁布什么“反黑手党法令”，内政部长的许诺又变成了空话一句。

在“名人的尸体”那长长的名单中，达拉·基耶萨将军和妻子最为杰出。他的灵魂会归来让那些黑手党人和纵容杀死他的政客们提心吊胆。公众对凶杀事件如此愤怒，新的政府再也不能敷衍了事了。广泛调查银行帐户的权力终于通过（这权力是居利阿诺、特拉诺瓦和基耶萨将军以生命换来的），并任命意大利国内情报局负责人伊曼纽尔·德·弗兰西斯科接任达拉·基耶萨将军的职务。

同黑手党的斗争出现了转折点：格雷科、科隆家族的凶杀活动说明他们的势力已发展到了顶峰，现在只有走下坡路了。可惜，将军却已血染征袍，饮恨黄泉。

黑手党历史上最卑劣的暗杀。

正如达拉·基耶萨将军所意识到的，黑手党并非意大利一国的现象，各家族已跨越国界组成了“多国黑手党犯罪集团”。

当黑手党在意大利本土闹得乌烟瘴气、不亦乐乎的时候，那些雄心勃勃踏出国境走向世界并在异乡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黑手党徒也在建功立业，炫耀他们的辉煌。

黑手遮盖下的梵蒂冈在哭泣……

教皇的灾难

1978年9月28日夜间，教皇保罗一世无声无息地去见上帝了。

第二天清晨，当女佣照例给他送去咖啡时，教皇早已不知在什么时候咽了气。他的眼镜滑落一旁，手里拿着几张纸，脸上留着临死时痛苦的痕迹，床头小柜上有一个药瓶。最先看到这一切的只有两个人——那位女佣和随着她的惊呼跑来的教皇秘书。

第三个走进死者卧室的是梵蒂冈国务卿维洛特。这位先生独自在死者身边呆了一会儿，离开时带走了死去的教皇身边的药瓶、眼镜、手稿和软底便鞋——这些东西后来都不见了。维洛特命令教皇秘书拿来一册中世纪典籍《效法基督》，把它塞进死者僵硬的手指，便向全世界宣布，教皇在临睡前阅读教会典籍时，猝死于心肌梗塞。

可是，由于下属们口风不紧，维洛特的所作所为还是传了出去，天主教徒们和舆论界强烈要求解剖教皇遗体，弄清真相。但在新教皇选出之前，维洛特是梵蒂冈最高首脑，他断然拒绝了各方面的这一要求。教皇遗体经过三小时防腐处理后就被匆匆安葬了。

五个月后，维洛特步保罗一世后尘，也翘辫子了，把一切秘密带进了坟墓。五年后，英国作家戴维·亚洛普经过长达三年的周密调查，询问了无数梵蒂冈的知情人和教皇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出了结论：教皇保罗一世死于黑手党的谋杀，并据此写成了《以上帝的名义》一书。

保罗一世1978年8月16日当选为教皇，管理梵蒂冈仅三十三天就暴死于床。据可靠情报，就在保罗一世猝死的那天晚上，他召见了国务卿维洛特，给维洛特看了一份他准备撤换的人员名单，而且，其中就包括维洛特本人在内。

保罗一世准备改组梵蒂冈领导层的原因有二：其一，梵蒂冈银行主管人员有营私舞弊行为；其二，梵蒂冈内部有一百二十名共济会秘密会员。从1783年起，历代教皇曾多次颁发训谕，凡参加黑手党分支共济会的天主教徒，应一律革除教籍，但现在教皇获悉，国务卿维洛特、梵蒂冈银行行长马尔钦科斯、马尔钦科斯的副手辛多纳和卡尔维等人，全是共济会员，这使保罗一世震怒不已。教皇还查明，在红衣主教科迪参与下，这个集团从教会财产中窃取了数千万美元。因此，保罗一世气愤地对国务卿维洛特宣布，维洛特、马尔钦科斯和科迪必须自动退休。可是，这些人却先下手为强，当晚，保罗一世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但是保罗一世生前却不知道，维洛特等人都受共济会头目杰利的控制。

一年后，与谋杀保罗一世有关的上述五个人中，维洛特、科迪和卡尔维相继被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扼断了喉咙。随后杰利就退隐江湖了，后来有人见他在南美某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现在，辛多纳也因盗窃罪被美国政府判刑入狱，只有马尔钦科斯仍在梵蒂冈。

保罗·马尔钦科斯是美国芝加哥人，当年67岁。60年代初，由于美国红衣主教斯佩尔曼的推荐，他当上了教皇保罗六世的保镖。这块材料善于拍马奉承，很快获得了保罗六世的信任，当上了卫队长，接着又升任梵蒂冈银行行长。此君属于“中山狼”一类的人物，得志便猖狂，一旦这个教会国家的财政大权入其掌握之中，就公然声称：“向圣母玛丽亚祈祷不会给我们带来一分钱。”因而肆无忌惮地大搞投机交易。

保罗六世知人不明，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祸胎。如今，这颗毒瘤发作了。

传教士们痛恨尘世的罪恶，马尔钦科斯却与意大利黑手党串通一气收买赌场股票。保罗六世大声疾呼世界和平，马尔钦科斯却在投资军火工厂。1972年，马尔钦科斯通过卑劣的手段，非法将下属的一家威尼斯银行转卖给米兰黑手党头子卡尔维。他的行径引起威尼斯天主教界及红衣主教卢恰尼的强烈反对。这位卢恰尼红衣主教后来就是保罗一世。当时他赶到罗马，要马尔钦科斯取消与卡尔维的合同。马尔钦科斯不屑一顾地冷笑，回答道：“干您自己的事去吧，少来干涉我的行动。”把卢恰尼从客厅里轰了出来，卢恰尼一当选为教皇，就打算撤掉这个完全背弃了天主教教义的梵蒂冈银行行长，这成了他的直接死因。

保罗一世猝死的那天晚上，教皇宫廷卫队的士兵两次看到马尔钦科斯出现在教皇卧室附近。一次在半夜前后，一次在黎明时分。他在干什么？亚洛普在《以上帝的名义》一书中认为：“马尔钦科斯不仅具有杀死教皇的理由，而且具有这种现实可能性。因为他曾长期担任宫廷卫队长，独一无二地了解教皇的保安制度。”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使教皇猝死之谜大白于天下，罗马一位检察官阿姆勃罗佐利自告奋勇，毫无畏惧地着手调查马尔钦科斯与黑手党犯罪的联系，并动员意大利反间谍专家瓦里斯科中校和警官米利亚诺参加侦察。1979年7月11日夜，黑手党用四颗子弹结束了这位检察官的性命。一月之内，瓦里斯科中校、米利亚诺警官相继惨死街头。

但是，死神吓不住正义者。意大利米兰一群天主教徒对马尔钦科斯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气愤已极，他们给新当选的教皇保罗二世送去一封千人联名信，指控马尔钦科斯与黑手党狼狈为奸，图财害命，却逍遥法外。

终于，保罗二世上台后两年，下令对梵蒂冈银行管理处的全部活动进行最严格的审查。1981年3月，梵蒂冈新闻处发布宗教规令，重申禁止一切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违者开除教籍。马尔钦科斯为了保住自己在梵蒂冈内部的影响，决定再次采用除掉教皇的办法。于是，他重金起用了一个著名黑手党杀手阿里·阿贾，执行暗杀保罗二世的使命。

阿里·阿贾的行刺将保罗二世击成重伤，可并没有使他命归黄泉。这一举动使全世界深感震惊。紧接着就是对凶手漫长复杂的初审和复审，这一场长达数年的忙乱使梵蒂冈内外都忽视了对马尔钦科斯的注意。保罗二世虽然侥幸逃得性命，但马尔钦科斯的目的毕竟是达到了。

在漫长的审判中，马尔钦科斯难道不担心自己指使的凶手招供，使阴谋败露吗？天知道，是什么东西鬼使神差般地让阿贾胡说八道，却对马尔钦科斯只字不提。

1985年5月27日，意大利法院在罗马正式开庭，审判谋杀教皇保罗二世一案。为防止发生不测事件，法庭警卫森严，重兵把守。

想不到第一次开庭，教皇谋杀案的主要证人、凶手阿贾就大放厥词，狂吼乱叫：“我是耶稣基督，我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切都将毁灭！”“我不是凡人，我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人，我是人类灵魂的伟大鉴定人，比弗洛伊德和达尔文要高明一千倍、一万倍……”阿贾的举止不能不令人怀疑，他的精神是否已经错乱。

在审判的最初两周里，阿贾一再声明自己是耶稣基督，却拒绝陈述自己以前的指控：1981年行刺教皇乃是一个国际密谋。他说，进一步作证将会危及他的生命。但后来，他又突然揭发：杀害教皇的命令来自苏联驻索菲亚大

使馆，一个名叫“米林科夫”或“马林科夫”的一等秘书为此支付了300万西德马克。遗憾的是，在阿贾以前的证词里，这个“米林科夫”或“马林科夫”乃是一位保加利亚间谍，是他把阿贾介绍给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一位官员的。面对前后矛盾的证词，阿贾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的这种说法是编造的。

在随后的审判中，阿贾的揭发源源不断：1980年，苏联委托土耳其恐怖主义分子炸毁设在慕尼黑的由美国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1980年，三名保加利亚人派遣他去突尼斯，暗杀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和来访的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后来此计划因过于冒险而作罢；1981年1月，他又被保加利亚人要求用无线电遥控炸死来罗马访问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后来这一计划因被警方得知而取消……

驴唇不对马嘴。

阿贾的这些指控或违背事实、漏洞百出，或前后矛盾、难以置信，或根本无法查证。由于他出尔反尔，随意地增减证词和一再地承认自己是在胡编乱造，审判无法顺利进行，他的可靠性大成问题。甚至连主持审判的法官塞韦里诺·圣阿皮基也对阿贾的这种无赖行径感到厌倦：“我怎么能知道老的说法和新的说法哪一种谎话。”

法庭外面，马尔钦科斯得意地笑了，笑得奸猾好阴险。混乱之中，这块材料又一次平安过关，坐稳下交椅。在那些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个幕后策划者就像个没事人一样，以年近七十的高龄，竟偷偷带着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情妇，满世界兜风，上南美游山玩水去了。

经历了这么一场大大的虚惊。可敬的马尔钦科斯先生总该收敛一些了吧？可事实是：没有。这个戴着教职神圣帽子的老牌匪徒，继续导演着一幕幕丑恶的悲剧。

1982年6月18日清晨，薄雾濛濛，伦敦《每日快报》的一名职员在上班途中经过泰晤士河上的布拉克弗拉亚斯大桥。他偶尔向下一望，看到桥下钢架上赫然挂着一具衣着完整的尸体，脚尖摇曳在浑浊的河面上。警察经过检查，发现尸体衣袋里装了价值13000美元的各种外币。还装了12磅重的石块和砖头。经鉴定，他就是意大利最大的私人银行盎布洛西亚诺银行的董事长罗伯托·卡尔维。卡尔维一周前在意大利神秘失踪，现在却发现死在伦敦，不禁引起西方社会和金融界的震惊。英国警察当局和法医在尸体身上找不到斗殴、挣扎、枪击或服毒等迹象，因此判定其为自杀。可卡尔维的儿子和意大利许多朝野人士则肯定这是一桩谋杀案。

就在前一天，6月17日，跟随卡尔维多年的女秘书格拉齐拉·考洛彻从这家银行在米兰的总部大楼的四层上坠楼身亡，留下一纸绝命书说：“但愿卡尔维为他犯下的种种罪行受到加倍诅咒！”但人们怀疑这也是一起蓄意的谋杀，这就使整个事件增加了更重的神秘色彩。

盎布洛西亚诺银行是意大利最大的商业银行，在15个国家中有业务活动。这次发生的事件，牵涉到两起死亡案件，12亿多美元的借款倒账，二百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无法收回贷款。这威胁到整个国际银行制度的稳定，形成意大利战后最严重的金融风暴。

盎布洛西亚诺银行的问题由来已久，首先要从它死去的董事长卡尔维与黑手党徒马尔钦科斯的关系到。

1946年，卡尔维年方26岁，进盎布洛西亚诺银行的国外业务部当一名小职员。当时这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省级小银行，但已经同米兰的天主教

上层挂上了钩，所以银行虽小，地位颇稳。卡尔维在工作上勤勤恳恳，逐级高升。1971年，他被任命为总经理后，就力图把它从一家地区性小银行扩展为强大的国际金融机构。三年以后，卡尔维成为副董事长，1975年终于登上了董事长的宝座。从那时开始，他与梵蒂冈银行行长马尔钦科斯挂上了钩，后者答应借用教廷的名义大力支持卡尔维建立海外业务网，但卡尔维必须支付数以亿计的“好处费”给马尔钦科斯。从此，卡尔维仗着与天主教廷这个神通广大的“朋友”的密切关系，以此作背景大肆活动，扩大势力范围。他在海外成立了上百个“分支机构”，这些机构给卡尔维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例如在巴拿马，根据当地法律，企业仅以一万美元开张以后即可大量贷款，卡尔维在巴拿马一国就成立了这样的“皮包公司”达12家之多。卡尔维还在意大利的米兰收购了有73年悠久历史的里卓利出版公司45%的股票，从而对该公司出版的意大利最大的日报掌握了控制权。这引起了许多意大利朝野人士的关注。

由于卡尔维的活动日益引起怀疑，意大利中央银行从1978年起即对该行进行严厉的审查。但卡尔维仗着和梵蒂冈教廷的特殊关系，继续变本加厉地买空卖空。到1981年为止，他通过向欧洲货币市场等国际银行筹款，向巴拿马等地的“皮包公司”提供总数为12亿美元的巨额贷款。1982年，意大利里拉对美元的比价大跌，盎布洛西亚诺银行的12亿美元贷款无力偿还。同年5月31日，意大利当局命令该行报告它给拉美的贷款详情。几天之后，卡尔维在该行一次紧急董事会议上受到空前的责难，董事们纷纷质问当家的：账面上无从查找的六亿多美元巨款哪里去了？形势急转直下，卡尔维只好连夜赶往梵蒂冈，请求马尔钦科斯将从盎布洛西亚诺银行得到的数亿美元“好处费”“还借”一半给他，以便他在银行内部不至于受攻击太多而下台。但“好朋友”马尔钦科斯冷冰冰地拒绝了卡尔维，只给了他一番什么“朋友是朋友，金钱是金钱”的训诫。第二天，卡尔维突然失踪。6月17日，意大利银行指派专员进驻盎布洛西亚诺银行，其后就传出卡尔维及其女秘书的死讯。于是该行存户纷纷提款，债主索债，银行陷于瘫痪。8月6日，意大利财政部下令清理盎布洛西亚诺银行，同时批准成立一家新银行接管其全部业务。8月26日，米兰法庭正式宣布盎布洛西亚诺银行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

因和马尔钦科斯这样的黑手党徒关系密切，卡尔维生前终日担心自己的安全，每次出门旅行都要带十二名贴身保镖并包乘专机；后来发展到每次出行包两架飞机，一架空机飞向宣布的“目的地”，自己则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别处。他在1981年内个人的保安费支出达100万美元，其提心吊胆之状可想而知。

但结果仍未能免于死。

马尔钦科斯不愧是在“教皇”身边工作的人，他比上帝还神通广大。

盎布洛西亚诺银行丑闻及其与梵蒂冈银行行长的特殊关系被揭露以后，舆论大哗，一夜之间，马尔钦科斯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马尔钦科斯与卡尔维的勾结由来已久，马尔钦科斯一直是卡尔维金融王国的主要据点——盎布洛西亚诺—骚拿银行的董事。这样的消息闹得罗马满城风雨，神圣教廷那层金色的辉煌色彩陡然变得斑驳陆离。梵蒂冈教廷不得不指定一个国际三人小组来调查梵蒂冈国家银行在这一丑闻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新闻界挖苦这个国际三人小组为“三智者”——三个绝顶聪明却又拿不出任何结论的偶像。这很清楚地说明，人们对这次调查实在没有抱太大的信心。

不过，“三智者”的确还是有点工作成绩，弄清楚了一些情况：

一、“上帝的银行家”马尔钦科斯早在 1973 年就与世界各地黑手党的一些金融犯罪活动有所牵连。

二、美国司法部打击黑手党小组纽约办事处主任阿隆沃德现在是纽约市开业律师，他说在十年前的金融犯罪调查中，就有迹象表明马尔钦科斯是参与者之一，但在查证过程中原有的秘密档案材料却被一把“意外”之火烧了个干干净净。梵蒂冈的《主日观察家》周报第二天却兴高采烈地欢呼：“上帝之火把一派诽谤胡言化为可耻的灰烬。”这件事后来在美国出版的一件纪实著作中重新被揭露。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梵蒂冈的瓜葛——黑手党和天主教会之间十亿美元伪造股票交易的惊人内幕》，出版于 1982 年秋季，作者是理查德·哈默。

纽约曼哈顿区检察署在对市区的一家酒吧间进行电话窃听中了解到，有大批被窃的和伪造的股票及证券正被设法偷运出国，联邦调查局闻讯后立即进行侦察。阿隆沃德说，在侦察中，马尔钦科斯被怀疑是幕后策划者之一，正在继续取证时所有原始材料却化为一缕青烟上青天了。“意外事故”的解释令人啼笑皆非，难以置信。

三、从已有的意大利警方电话窃听记录中了解到，意大利黑手党季诺维塞家族的一名成员文森特·里卓要到慕尼黑去同两名德国工业家商谈索还数百万美元巨额债款问题，而里卓在这笔贷款交易中使用了美国洛杉矶可口可乐公司和克莱斯特汽车公司的失窃股票。后来意大利警方在调查中却意外地发现这笔非法股票来自梵蒂冈国家银行，作为行长的马尔钦科斯先生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个案件报到意大利政府时却不知什么缘由被压了下来。

“三智者”越调查，了解到的类似情况就越多；了解的情况越多，他们的心里就越发毛。终于，三位“智者”作出了明智的决定：停止调查，去西班牙海滨“休假”。这样缄口而去，会使心黑手辣的马尔钦科斯感到满意，而他们并没有就此推卸责任，岂不两全其美？

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息”之后，三位“智者”重返梵蒂冈时，已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忘”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战后意大利最大的银行丑闻这场重头戏又重新拉开帷幕。这一幕的主题是意大利金融当局同梵蒂冈教廷之间的短兵相接。前者力求迫使后者担一部分债务责任，偿付盎布洛西亚银行倒闭拖欠的部分债款；后者由“上帝的银行家”马尔钦科斯在幕后操纵，借口维护神圣教廷的尊严，拒绝认罪。可是，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梵蒂冈国家银行想洗刷自己深深卷入这一丑闻的瓜葛，已是难于上青天。各方舆论对于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梵蒂冈教廷和它守口如瓶的财务内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疑问。教皇保罗二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几乎喘不过气来。

终于，1982 年 11 月，罗马教皇和红衣主教团接受它指派的三人小组关于盎布洛西亚诺银行事件的一份调查报告，宣称梵蒂冈国家银行无意中受到了盎布洛西亚诺银行已死的董事长卡尔维的欺骗。同时，教皇保罗二世公开承认：梵蒂冈必须改革财务，更多地依靠信徒们的直接奉献，而不应依靠参与金融交易。教皇说：“今后梵蒂冈的财务目的不着眼于积累资财和增加收入。”

卡尔维的阴魂已下十八层地狱，对于任何关于他的指责都再也无法对证。可身中铅弹、死里逃生的教皇保罗二世还要代人受过，为他身边“犹太”

式的人物马尔钦科斯的罪责向全世界公开认错。倘若那位不明不白去见了上帝的保罗一世九泉有知，也会为天主教的这种宰相肚量而啼笑皆非吧？

风雨之中，马尔钦科斯平安过关，稳稳地坐在钓鱼台上微笑。那些受害者不知能否笑得出来？

人们不禁会问：难道仅仅是黑手党创造出了马尔钦科斯这种不倒翁吗？别的人是否也负有责任？有良心的人不妨扪心自问。黑手党是一场世纪性的瘟疫。

黑手遮盖天日。

这场挣不脱、猜不透的噩梦不知何时方能苏醒。

第七章铁血内幕——黑手党内讧与火并

所谓“内讧”，就是指集团内部由于争权夺利等原因而发生的冲突或战争。同伙决裂，自相杀伤或并吞就称作“火并”。如此看来，“内讧”和“火并”意思差不多。

在黑手党这样的“国中之国”内部，弱肉强食几乎是他们的天性，大发横财则是他们的本能，有权有势有能力的就多赚一点，而能力差的只好少赚点，或者干脆靠边站，看别人吃肉，自己捡点骨头、喝点剩汤。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对于凶横惯了的黑手党徒来说，在大把大把的横财面前，谁会承认自己是孬种，谁会不眼红？僧多粥少，只眼红是不行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刺刀见红。更何况他们所争的并不仅仅是财，还有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

醉卧美人膝，醒掌杀人剑——西西里的子孙固当如此，方不负此生。

好，为了钱，为了权，干吧，打吧，杀吧。

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内讧不断，火并频繁。杀出了黑手党的风格，杀出了一个活生生鲜亮亮崭新的黑手党。

黑手遮天，而火并的枪声还在响……

美国黑手党的内讧

说起美国黑手党的内讧，一句话：斗争激烈，从产生就未间断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黑手党“所有的老板的老板”是托托·达库伊拉，但他不久即被朱塞佩·马塞里亚杀死。

到了1930至1931年，朱塞佩·马塞里亚处于曼哈顿黑社会的最高地位。以“老板”而闻名的马塞里亚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他最亲近的同伙（也是竞争者！）是查尔斯·卢恰诺，维托·杰诺韦塞、萨尔瓦托·马扎兰诺、阿里·卡波内……头两个人是马塞里亚最忠实的朋友和助手，阿里·卡波内领导芝加哥的犯罪集团，人称“芝加哥之王”；萨尔瓦托·马扎兰诺在纽约充当了同样角色。马塞里亚突然和以萨尔瓦托·马扎兰诺为首的那个意大利人小集团发生了争执，他们来自西西里岛西部的戈尔福海堡。乔·马塞里亚又矮又胖，而且很自负。他相信他1902年带到这个新世界来的那个旧世界的思想体系会使他成为黑手党的头号人物，当时他从巴勒莫移居纽约。

在1910年至1915年，马塞里亚为黑手党当枪手。他在下流社会的名声在1922年8月激增，当时两个杀手试图在一次伏击中杀死他，而他躲过了枪林弹雨，随即在曼哈顿第二大街上他的公寓中出现，呼吸着第二次生命的甜蜜空气。

几秒钟以后，当马塞里亚开始相信他不再是一个暗杀目标以后，喧闹的枪声又爆响了。他被一阵0.48口径的交叉火力打中。

他又摆脱那把人彻底捣碎的猛攻的子弹，逃到一个男帽店，他推测那是个安全的地方。但他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一个未来会成为他的杀手的家伙对他紧追不舍。

那个匪徒跟着马塞里亚向店铺的后部赶去，仔细地瞄准了马塞里亚的头部。他迅速地扣动扳机射出了四枪，马塞里亚扑倒在地，又一次逃脱了敌人死命的猛烈进发的铅弹。瞬间之后，那个枪手把他的最后两颗子弹向畏缩的马塞里亚打去——却又一次打偏了目标。那个杀手的左轮没了子弹，他出于一些未知的原因而逃之夭夭。

为了进行另一天的战斗，马塞里亚活了下来。而且他的确战斗着，在弗兰基·耶尔被暗杀之后达到了权势的高峰。但萨尔瓦托·马扎兰诺那给人深刻印象的存在，使他无法得到他所寻求的对这个城市下流社会的完全的权力和控制，马扎兰诺率领着由来自戈尔福海堡的可怕的匪徒们组成的一个特别大的集团。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马扎兰诺听从马塞里亚的指挥，但“老板”马塞里亚对此人很不放心——马扎兰诺正在渴望脱身，组成他自己的黑手党组织。马塞里亚试图通过大大削减戈尔福海堡匪帮进行的非法营主的收入来加强对马扎兰诺的控制。

但是马扎兰诺根本没有给他机会——与他结盟的人们都是强硬、无情、勇于献身的黑手党党徒——这些人中许多人后来变成了下流社会最可怕的领袖；他们中就有卢切斯、加利亚诺和博南诺等人。

当然，马塞里亚也有自己的很棒的枪手，那些杀手本人的名字有一天也会家喻户晓：查尔斯·卢恰诺，乔·阿尔多斯和维托·杰诺韦塞等人。

马扎兰诺向马塞里亚回话说他不会付更多的供奉以后，“老板”对他的士兵们不宣而战，开始干掉了他们中的几个人。

戈尔福海堡人迅速地进行了报复。最早受害的人中有“紧握的手”彼得·莫

雷洛，他是马塞里亚的一流枪手之一。随着双方的杀戮继续下去，这场冲突成了著名的“戈尔福海堡人战争”。它只进行了一年——1930年至1931年——但从它夺去的下流社会的生命的数目讲，伤亡是灾难性的。

到了1931年7月，马兰扎诺完全脱离了马塞里亚的管制，在他所指挥的那个下流社会的组织中有500个战士。尽管马塞里亚仍然有更多的部队——大约有900名工作者——但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勇气，于是派人给马兰扎诺送去了橄榄枝，可是马兰扎诺断然拒绝他的和平请求。马兰扎诺知道，他正使马塞里亚受到伤害，而那不过是和“老板”打硬球的一个方法，在“老板”或者是屈服或者是下地狱之前。

马塞里亚的两个最亲信的首领，杰诺韦塞和卢恰诺决定，“老板”马塞里亚不能再做那个领袖了。他正在失去他的控制，而且他们害怕，在那些戈尔福海堡人接管正在迅速衰弱的马塞里亚匪帮之前，那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了保护自己的皮——也为了为自己夺取马塞里亚组织的领导权——杰诺韦塞和卢恰诺去见马兰扎诺，提议4月15日在科尼岛诺瓦别墅的塔马罗餐馆给“老板”马塞里亚举办一个告别午餐。那个餐馆由斯卡尔佩多拥有，他是马塞里亚的好友，但和下流社会的活动并无联系。

在这个场合，斯卡尔佩多超过了那个匪帮最喜爱的期望。他为这四名尊贵的用餐者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美酒佳肴令人闻香止步。

那些用餐的客人们在一个星期三的大约正午时到了。由于他的三个地位最高的助手请他吃午餐，马塞里亚有些不知所措。这三位助手是杰诺韦塞、卢恰诺和泰拉诺瓦。泰拉诺瓦当时是纽约著名的“洋蓍王”，泰拉诺瓦的权力日升是因为他完全控制着那神异植物的销售，如果他没有先在批发市场上的销售中得到他那一份额，便没有一张桌子上能出现洋蓍。

午餐进行得很顺利，在吃主菜的时候它甚至变得更液化了。当时，葡萄酒就仿佛不合时尚似地流着。马塞里亚无法相信他的手下会为他安排盛宴。他无法想象这三个人不过是在遵照那个高尚的社会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行事：用最好的食物填满那个人，但不要做得过分，你必须为那些子弹留有余地。

将近下午三点三十分，泰拉诺瓦和杰诺韦塞由于在布朗克斯有“事”要办而有礼貌地告退。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卢恰诺要斯卡尔佩多取一副牌来，这样 he 可以和“老板”马塞里亚赌两把。

赌了两盘后，卢恰诺从桌旁站起身来。

“朱塞佩，”他说。“我必须上厕所……请原谅我……”

“噢，当然，我的好朋友，‘幸运者’，”马塞里亚回答说。“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儿的……而且也许我会再给你一个机会在牌上击败我……下次你可能更幸运……”

卢恰诺动身上厕所之后，马塞里亚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这个餐厅中唯一的顾客。在接下来的那一瞬间，四个端着0.38口径枪的大汉大步闯进了餐馆，冲马塞里亚背后发出了一阵快速连续的射击，25颗子弹打入他的头部、脖子和背部。

马塞里亚倒在桌上，从他的伤口中流出的血把白桌布变成一个深红色的湖泊，血液荡漾着艳光。当警察到餐馆搜索证据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张方块“A”。它仍然紧握在朱塞佩·马塞里亚的手中——那是一个确实的标志，如果再玩下去的话 he 可以从卢恰诺手里赢过下一把牌。但是今天，对于“老

板”马塞里亚来说，好运变成了霉运，输家是他。而输的代价就是生命。

“戈尔福海堡人战争”结束，萨尔瓦托·马兰扎诺便当了“科札诺斯特拉”的领袖。他把马塞里亚梦寐以求的东西彻底实现了，即改组“科札诺斯特拉”，把它组织得特别严密，所以直至今天它仍然和从前一样，原封来动。这个组织虽然是一个全美犯罪组织，但是被按区域特点划分为各个“系”。这种明确的划分与其说是为了整顿组织，不如说是为犯罪市场划分势力范围，划分猎获范围。按原来打算，这一措施本应能有效地防止“科札诺斯特拉”的流血内讧，但是，改组后，它的头目们之间的撕咬仍在继续，丝毫不见减少。

朱塞佩·马塞里亚原先的助手和亲密伙计查尔斯·卢恰诺和维托·杰诺韦塞刚刚出卖了自己的老板，现在又以完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自己的新主子马兰扎诺。不过在这里要说一点公道话，不管杀死马塞里亚，还是杀死马兰扎诺，卢恰诺和杰诺韦塞都只是先下手为强而已，因为如果不是他们收拾自己的主子，就会被主子收拾掉。卢恰诺和杰诺韦塞并非什么善男信女，当然是恪守“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原则。

如果说马塞里亚是在饭馆里被杀的话，马兰扎诺则是死在自己的家中。卢恰诺私人保镖中的几个职业杀手装成警察局密探，手持伪造的拘票闯进了马兰扎诺的家中进行搜查，向他开了几枪，并且还割断了他的喉咙。同一天，在不断扩大的内部大屠杀中，又有40名“科札诺斯特拉”的成员丧生。人称“幸运者”的查尔斯·卢恰诺成了“科札诺斯特拉”的新首领。

这个匪徒组织的一位元老尼古拉·詹基莱的有趣的供述说明了它狂热的内部流血生活的情况。他在美国从事多年的犯罪职业，后来引退回到西西里岛，死时年近八旬。下面是尼古拉·詹基莱的供述：

“我的先生们，在黑手党的上层人物中，任何人没有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死去，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的20年来是这样的。所有的‘王’都死于雇佣杀手之手，残暴的托托·达库伊拉是被马塞里亚杀死的，马塞里亚夺得‘王’位，但后来又被别人杀死。”

的确，在“科札诺斯特拉”最后形成一个组织期间，流的血是够多的。在这个组织成立后的若干历史时期直到目前流血也还不少。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进一步“整顿”“科札诺斯特拉”的工作作风期间也有许多匪徒头目活到了自然死亡。

现在让我们回到尼古拉·詹基莱有趣的自白上来。这个引退回家的老匪徒临死前曾回忆道：

“他们进行残杀或是为了当上‘老板’，或是为了保住现有的位置，或是为了排除宫廷政变后院失火的可能，肃清可能出现的潜在的觊觎者，或是为了消灭他们所犯罪行的目击者，最后，仅仅是由于讨厌某人就起了杀机。当然，只有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才能这样为所欲为……黑手党人是没有平静生活的。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杀死，躺在家里的床上和坐在自己的弟兄们的宴席旁作客都不例外。他们对这一点已习以为常了。”

尼古拉·詹基莱还回忆道：

“不，先生们，黑手党不是今天才诞生的，也不会明天死去。因为它到处盘根错节，并且对任何人都不会宽恕。就举我们从前的上司阿里·卡波内为例吧，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尊重我们事业的规矩，从来不使‘兄弟们’为难，但是对变节行为也从不宽恕。有个弟兄做了警察的耳目，被我们

揭发后逃到了国外，阿里·卡波内发誓要找到他，结果怎么样？真的找到了。他在国际特别快车的包厢里见到了那个叛徒——当然，这不是偶然相遇——并且亲自把叛徒打死了。当时的报纸报道说：在包厢里找到一具割断喉咙的尸体，但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在我们的事业中，公正和毫不留情是必要的。”

卢恰诺夺取了“科札诺斯特拉”的大权之后，他手下建立了某种集体领导的虚伪机构——一个所有大“系”的老板都参加的所谓“委员会”，但是“幸运者”卢恰诺实际上是“所有老板的老板”。

尽管卢恰诺集大权于一身，但是在“科札诺斯特拉”的上层，争夺权力的斗争仍在继续。在斗争过程中，卢恰诺再次证明他的确是个幸运者：他没有被打死，内讧的结果使他于1946年流亡他乡，去享用他那掠夺来的巨额美元。

弗兰克·科索泰洛成了美国的犯罪之王。当然，另一个匪徒“老板”维托·杰诺韦塞起初曾阻止他这样做，但杰诺韦塞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保住自己的吃饭家伙，不久，他不得不赐洋过海，返回老家。维托·杰诺韦塞在家乡呆了几年并对争夺“老板的老板”这个宝座作了充分准备，自认已有足够的把握之后，又卷土重来，回到美国。1957年，他雇佣的杀手杀死了弗兰克·科索泰洛。杰诺韦塞终于掌管了这个罪犯辛迪加。

杰诺韦塞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开始从形式上做一些消释前嫌的尝试。他提议召开由“科札诺斯特拉”的头目们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10月14日代表大会召开了。会址并不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而是在纽约州的老匪徒约瑟夫·巴伯的农场里。大约有100名“科札诺斯特拉”的头目们参加了大会。会议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议内容也很不少，从各“系”之间的合作到贩卖麻醉品问题。但各方面争执不下，也没达成什么一致的协议。在罪犯的老板们开会的时候，一名当地的警察中士表现了起码的警惕。他注意到，一向平静的农场突然停放着空前大量的豪华“罗尔斯—罗伊斯”牌和“林肯”牌轿车。他叫来了一些警察，并在他们的协助下逮捕了大约一半匪徒集会的参加者，而其余一半利用警察人数少得可怜的机会逃跑了。但这次捕获还是够丰富的。“科札诺斯特拉”的上层分子几乎全部落网！对这样的收获美国司法部门做梦也没有想到……。但是，美国社会的法律（倒不如说是反常现象）在这里又产生了效力：在审判和判决之后，辩护人提出异议。结果撤消了判决，所有被捕者都恢复了自由。警察对他们每一个都了如指掌，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掠夺来的巨额美元做后盾，而美国司法部门对有钱的罪犯是无可奈何的。正如大多数场合一样，“老板”们这次获得了充分自由，因为在会上逮捕他们时，没有抓获什么具体罪证。他们都声明说，他们来到农场是为了看望患病的朋友——农场主约瑟夫·巴伯先生。

“全国代表大会”泡了黄汤，内部残杀有增无减。

奇怪的是，当黑手党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刑事案件的编年史编纂者们断定说，犯罪活动是有的，也有危害不浅的暴徒，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却是没影的事，也没有什么全美罪犯辛迪加！这种巧妙制造的舆论（什么人授意不得而知）长期以来得到非官方人士和官方人士的赞同。甚至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也长期固执己见，认为美国没有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须知，在美国似乎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胡佛更了解情况的人了。他领导联邦调查局将近半个世纪，中间经历了四任民主党政府和四届共和党政府，连续经历八任总统。正当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时候，“科札诺斯特拉”

却在不断发展，踏着别人的和自己人的鲜血与尸骨，满脸狰狞地爬向社会上层。

纸包不住火。尽管“科札诺斯特拉”的活动是极其秘密的，尽管当局对它放任姑息，全美罪犯辛迪加的存在最终不再是秘密了。

匪徒“老板”维托·杰诺韦塞的一名同伙，一个叫约瑟夫·瓦拉奇的人被投进了监狱，但不是因为他是“科札诺斯特拉”的成员，而是因为一般刑事犯罪。法官们根本没有把这种刑事犯罪和任何秘密辛迪加联系起来。如果不是情况的巧合，瓦拉奇期满就会获释并在“科札诺斯特拉”里仍然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但当时的情况是：他被怀疑当了联邦调查局的耳目。

这还了得，谁敢打破黑手党的“乌默它”规矩，就算是天王老子，有通天彻地之能，上天入地的本事，他的结局也只是一个：死！

按照罪犯组织固有的传统，瓦拉奇被告知，他已被揭露并且只有死路一条，甚至呆在监狱里也绝对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他知道，“科札诺斯特拉”是会排除一切障碍来进行报复的，而且它在监牢里更易于收拾自己的仇敌。因为无可幸免的牺牲品决不能逃离监狱躲藏起来，而任何一个犯人都乐于去执行这个罪犯组织的命令以换取“科札诺斯特拉”的感激、金钱和赏识，或者仅仅由于对它的恐惧，担心自己性命难保。

就这样，瓦拉奇每一天都在等待着别人谋杀。这个老匪徒很清楚自己组织的习惯，并深信某个犯人正企图执行它的判决。他吓得心惊胆战，并且草木皆兵。在一次放风时，突然认定，他的一个同伙马上要杀死他。可能真有其事，也可能是他神经过敏，瓦拉奇抓起一根扔在地上的铁管打死了那个同伙。自杀人罪，法院判处他死刑。但瓦拉奇并不想死，结果他由于进行了某种交易而得以保全性命。他向当局讲述了有关黑手党的情况，于是，死刑改成了无期。

瓦拉奇立即向狱吏说明了他的危险处境，被当局转移到一个军营里。他在那里开始关于“科札诺斯特拉”的自白。

由于内讧，瓦拉奇叛帮，“科札诺斯特拉”的真相大白于美国人面前。黑手党的存在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科札诺斯特拉”对叛徒的脑袋标价极高：谁能迫使瓦拉奇沉默，就给谁100万美元。但是，就连“科札诺斯特拉”自己也无法越过军营的围墙，况且瓦拉奇又是呆在得到加强警卫的水泥仓库里。

现在，联邦调查局再也不能说美国没有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了，不管愿意与否，它都得给“科札诺斯特拉”设立案卷。现在那里已收集了不少有趣的文件，其中联邦调查局的密探秘密录制的匪徒们谈话的录音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是关于他们内部的残杀的：

“你记得杰克逊被吊在挂肉铁钩上的情景吗？他重得把铁钩压弯了。他被吊了三昼夜，直至死去。”

“嘻，嘻！真饱眼福！他像只大象！基米用电线扎他一下时，才好看呢！”

“对，他当时旋转起来，为了让电流更强，我们就用水浇他。他当时尖声叫了起来。”

“这算得了什么！我的分尸机比这强多了。把甘比诺家族的一个小伙子放在机器上，套上链条就拉，直拉得他关节辟啪响。记得那小子吗？那时他一直流大汗，简直要把自己流干了。他当时一个劲地要水喝。我想，他可能就是渴死的。”

还有一段录音：

“避开这个地方吧！在这里死的人太多了。屋后有一只炉子，炉子里成天都在烧人。”

“对，奥利维尔，维利，小加罗里德，托米……就是在炉子里被烧死的。”

“我亲手用链条把维利拖进了炉子。”

“他活该，咱们分给他两千美元已够意思了，他竟敢不服，哼！”

够残忍的吧？其实，这种内讧在黑手党来说只能算是小规模，恐怕还上不了黑手党的历史，1972年，在美国又一次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匪徒内讧，当时当局刚刚声称“科札诺斯特拉”已被肃清，但已被联邦调查局“肃清”的罪犯势力重新用一梭梭冲锋枪子弹和手枪的响声宣布了自己的存在。

“科札诺斯特拉”纽约分系的头目之一约·科隆博首先被杀，紧跟着另一个纽约的匪徒老板，外号“疯子”的约·哈洛也去见上帝了，他是因谋杀科隆博遭到报复被杀的。顺便说一下，科隆博和哈洛在年轻时都是这帮匪徒的一个五人凶杀小组的成员，曾相约同荣华共患难。可笑的是，这两块料分别当“老板”的两个纽约“系”于1971年竟互相宣战。和以往一样，这个组织的其他“系”也很快卷进了这场流血厮杀。

阵阵枪声，使得匪徒“老板”日渐稀少。当硝烟散去之后，人们发现，在这场互相厮杀的闹剧后面是五个纽约“系”之一的老板卡洛·哈姆比诺充当凶险的导演。据说，挑起这场匪徒内讧的正是他。结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最主要的竞争者已被清除，卡洛·哈姆比诺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当上了“科札诺斯特拉”老板的老板。当时，他已经年逾古稀了，但这位先生老当益壮，人老心不老，高龄并未妨碍他在五光十色的美国生活舞台上又一次导演和演出戏剧：悲剧、喜剧、闹剧、惨剧和笑剧。

卡洛·哈姆比诺未能长期享用自己流血阴谋的巨大成果。

1976年秋他便死于纽约。他是在自己的床上突然去世的——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他的逝世以及他的葬礼成了美国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并引起情报机关的严重关注。“科札诺斯特拉”的全部精华都出席了在大教堂举行的这个枭雄的安魂祈祷式。这件事也把美国报界、电视和广播界的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吸引了过来。

在卡洛·哈姆比诺上西天不久，这个罪犯辛迪加的内部又重新展开了争夺权力和空缺宝座的斗争。不仅在纽约，而且在“科札诺斯特拉”各个“系”盘根错节的全国都展开了这种丧心病狂的斗争。枪声又响了起来，几十个匪徒又死于自己同伙之手。

掌管“科札诺斯特拉”纽约世袭领地的该组织的元老之一——卡明·加兰特开始逐渐挤上“老板的老板”的宝座。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百万富翁，负有至少杀害一百人的血债，但却伪装成一个可敬的资产者，一个小商人，住在纽约的中心——曼哈顿区。的确，当他进行伪装、符合他周围社会的情调时，他俨然是一位入乡随俗的奇特典范。你看，他仅仅是一个小小化学洗涤店的老板，虔诚的天主教徒，种植西红柿的专家和爱好者。当然，他还是一位热情满腔的爱国主义者。

1978年，卡明·加兰特因被控贩卖麻醉品而暂时被投进纽约的中心监牢。看守加兰特的不仅有警察，而且还有来自他的“系”的私人保镖，即匪帮。一点不错，看守人员每天都把武装到牙齿的匪徒放进监狱。他们就在卡明·加兰特的牢房门口站岗。一些匪徒站完岗离开后，另一些匪徒来值班。

“科札诺斯特拉”的“老板的老板”就是这样在警察和匪徒的双重看守下坐牢的。

当然，必须说，警察和匪徒的任务有所不同。按规定，看守人员的任务是防止加兰特逃跑，而他的私人保镖的任务则是保护他们的老板不被杀死。

原来，加兰特在夺权斗争中的主要竞争者安耶洛·德拉克罗切已经向自己手下的刽子手下了命令，要除掉这个老匪徒。这命令使加兰特大为惊慌，因为德拉克罗切也是“科札诺斯特拉”的最著名的头目之一。卡洛·哈姆比诺活着时，他是这个组织的第二号人物，由他占据“老板的老板”这个位置似乎比加兰特还合乎逻辑，况且德拉克罗切又是“科札诺斯特拉”的最高集体领导机构，即所谓“委员会”的成员。他和这个罪犯辛迪加的许多头目一样，也是从雇佣杀手，即贯彻执行“科札诺斯特拉”各系判决的刽子手的身份开始发迹的。所以他对谋杀这种事相当熟悉。关于他谋杀对手的命令使加兰特和他的亲信不能不感到担忧。于是尽管自己的老板已经在监牢里，他们也要对他进行保护。他们只是些小猢猻，必须得保往加兰特这棵大树才能保护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当然，这要取得当局的允许。

加兰特的谨小慎微并不是多余的，这里有他的原因。在远离纽约的另一座监牢里，有一个和加兰特同名的人也在服刑，他也是“科札诺斯特拉”的匪徒，叫卡明·彼尔西科。他的职业是执行这个组织的死刑判决。但他坐牢并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劫持飞机。就这样，他，更准确地说，他的秘密上司成功地让当局决定把彼尔西科转移到加兰特所在的那座监狱。其实彼尔西科完全可能是按照匪徒老板的命令故意来坐牢的，以便随后把加兰特杀死。正当彼尔西科已在来纽约的途中时，引起警察当局的怀疑，结果就不让这个匪徒刽子手转移到纽约来了。

由于在争夺“科札诺斯特拉”的首领宝座的斗争中采用了这些复杂的手段，结果卡明·加兰特获释出狱，并于1979年7月按照匪徒典型的方式在监外被杀死。当时他正带着私人保镖在一家饭馆里吃饭，突然有四个戴口罩的人冲进来，对着他就是几梭冲锋枪子弹，加兰特被打成一个马蜂窝，保镖们也无一幸免。像往常一样，凶手们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后石沉大海，无从查考。

从黑手党自本世纪初在美国扎下了根，到现在已近百年。百年来，内部残杀的枪声不断，刀光剑影笼罩着整个发展的历史。其间经历的战争无法累计，仅有据可查、规模较大的内讧就有几十次，例如：萨加曼舞厅伏击战，施陶赫舞厅激烈交火，弗曼街枪声，阿多尼斯俱乐部圣诞大屠杀，情人节大屠杀，戈尔福海堡人战争，加洛对普罗法西之战，大鼻子战争……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奇怪的是，血流得越多，黑手党越兴旺，这是不是一种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精益求精培植良种所孕育出的更具有适应能力更强大的生命力呢？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

美国黑手党表演着精彩刺激的内战的时候，意大利的同门师兄弟们在干什么呢？

天下乌鸦一般黑，意大利黑手党绝不是性格温和安分守己的主，他们当然不会让那帮在异地生根的同类专美于前占尽风流而无动于衷。他们粉墨登场，淋漓尽致地挥发着自己的凶残，在世人面前自编自导自演了两场泣鬼神的大火并。

意大利黑手党的第一次火并

1957年，西西里黑手党头目托马索·巴塞塔和萨尔瓦托·查希特杜·格雷科开始着手秘密策划在西西里建立委员会体系。这个计划很快取得了成功。

西西里黑手党不像美国那样只有一个委员会，格雷科和巴塞塔成立了一连串的省委员会，省委员会设有代表，这些代表统统是士兵而非首领，巴勒莫委员会为最高统治机构，它是国中之国，相当于拥有区域分支机构的中央政府机构。权力核心是在巴勒莫市，省委员会对之则唯命是从。有一个时期，该体制颇有成效，但在60年代初期，还不足以防止巴勒莫黑手党家族之间一系列敌对行动引发的血腥内战。

巧合的是，战争恰好在从美国归来的“幸运者”卢恰诺1962年1月22日晚死于那不勒斯机场之后不久爆发。那一天晚上，卢恰诺正在机场等候会晤一位好莱坞电影制片人，那制片人正筹划着拍摄一部有关他的影片。

卢恰诺的美国黑手党朋友们对他想利用电影使其令人生疑的生涯青史留名一事颇不以为然，并且警告他再拍这部片子便会产生悲修的后果。

悲惨么——的确如此——他在喝过一杯咖啡之后便一命归阴了。很可能是中毒身亡（在黑手党内，喝下了毒的咖啡称作“喝苦咖啡”）。国际刑警组织麻醉品署的特工人员们还在机场等候着他呢。尽管官方判定他死于心力衰竭，但谣言四起，说黑手党将他灭口是由于影片一事以及防止他一旦被捕后泄露内情。

这位曾在美国黑手党组织中坐头一把交椅、手握重权、后在夺权斗争中全身而退流亡他乡最后回到老家帮助和带领意大利黑手党走私贩毒发家致富的“幸运者”卢恰诺先生，永远不会再幸运了。

在西西里，黑手党战争犹如一座长期郁积一朝爆发的火山，周期性地循环往复。实际上战争每时每刻都存在、进行着——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永无休止的冲突应归咎于西西里族间的仇杀传统：死亡与耻辱必须雪耻。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西西里人将对敌人作出和平的假像，然后在对方最不防备的对刻干掉他。西西里岛有句家喻户晓的谚语：“复仇是一道最好搁凉了再吃的菜肴。”

同以往一样，60年代初期爆发的战争起因于金钱，尤其是起因于从毒品交易以及建筑投机生意中获取的暴利。这导致了老新黑手党，即老派黑手党与现代派黑手党之间冲突的日益加剧。前者大致为该团体确认的成员，农民出身，后者则涌现于巴勒莫贫民区，其力量则在于街头巷尾的狡诈及对人类生命的漠视。这些现代派黑手党党徒们从芝加哥美国犯罪学校得到启示，特征是穿戴时髦讲究，携带冲锋枪，钱夹子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钞票，他们看过贾格纳主演的不计其数的电影。处于对立面的老派黑手党则偏爱于有节制的态度。他们身着西西里农民的破衣烂衫，推崇部落的礼教习俗，采取暴力行为之前，往往采用传统的劝诱与含蓄恫吓的软硬兼施之法。

初次崭露头角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嗜血成性的黑手党党徒露西亚诺·李吉奥可谓新黑手党的典型。恰如“幸运者”卢恰诺为黑手党全力以赴给麻醉品生意铺石筑路一样，露西亚诺·李吉奥也为了新的暴力行为的不断升级铺平道路。因为他亲自督阵搞了一连串恶性谋杀事件，使得他的权力急剧上升并加以巩固。大部分谋杀旨在破坏克莱昂的工会运动。他所属的科莱昂家族首领是极受尊敬的社团成员米歇尔·纳瓦拉博士。此人堪称传统派的

“体面人”的楷模，他除担任该地区的卫生督查员外，还任种植者协会会长及天主教民主党地方分部主席；另外，他还是个货真价实的医生，有一次他给亲眼目睹李吉奥谋杀一位工会活动家的二十岁的羊倌注射了一针，使其死于非命，从而臭名远扬。

科莱昂是个虽小却很分散的村落，紧靠通往巴勒莫市的山路。这个村落的形成纯属偶然，它处于西西里岛风景最秀丽的乡村之中。圣·弗朗西斯雕像凝视着该镇广场，他的双手满怀希望地或者毋宁说绝望地举向茫茫苍穹。上了年纪的、带着平顶帽的男人们聚集在通往地方公园小路旁的长凳周围，两片嘴唇微微地一张一合，喋喋不休，热切地指手划脚，显示出与年龄很不相衬的活力。有一间名为“教父”的酒吧间，店老板出售的货物五花八门，甚至包括卖给一些上街冒险的孩子们的塑料枪。撕得支离破碎、退了颜色的谴责黑手党暴行的标语张贴在墙壁上。

“科莱昂”一词的意思是“狮子的心脏”，然而就其大部分而言，它却充满了鬼域般的荒凉孤寂的气氛——关得紧紧的百叶窗，空荡荡的胡同街巷，裂缝儿的楼堂房舍。身穿丧服的年迈寡妇们如同受惊的蜘蛛，仓皇地沿着狭窄的街道匆匆而去。唯一有点几阳间气息的标志是一个阳台接一个阳台晾晒着漂洗过的衣物，望不到边际。

就是这么一个小镇，1953——1958年五年间，竟发生了153起谋杀案。这个数字够惊人的吧？

这得归功于露西亚诺·李吉奥日益加深的恐怖统治。

李吉奥的出身经历与纳瓦拉博士大不相同：孤儿、近乎文盲，从未进过学校，尽管后来他确曾试图过受教育，那是在枪口威逼下，由一位学校教师授课，但那时他年纪老大不小的，实在学不了什么了。

他的生涯始自捍卫贵族封建领地的绿林大盗，最后发迹到负责一个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大产业，如今他在巴勒莫市尤夏顿监狱的铁窗内依然控制着它。新型的黑手党党徒的特点是不受先辈传统差异的左右而急欲求成，野心勃勃。李吉奥主张尽快投资于更为有利的新生意中去：运输、牲畜走私、赌博机器、绑架、建筑以及毒品交易。一旦首领不同意，首领便倒了大霉，李吉奥不得不除掉那位博士，“哼，纳瓦拉先生，你虽是我的义父，也不应挡我财路，更不该对我粗声大气。”当李吉奥预先瞅准在一项修筑水坝工程中能捞取大笔金钱时，最终的对抗揭开了序幕。脾气暴躁的纳瓦拉博士试图反对，由于他阻碍李吉奥从承包人那儿敲诈勒索大笔钱财，因而只剩下一种解决办法了。李吉奥派了15个人埋伏在路边，待纳瓦拉博士开车路过此地，乱枪齐发。纳瓦拉的尸体后来在汽车内被人发现，他身中210发子弹，被打得血肉横飞。

狗咬起主人来也真够狠的。

接着，李吉奥有计划地着手杀害纳瓦拉的支持者们。

正是这次谋杀开始破坏了“体面人”之间一直遵循的传统行为准则。李吉奥以为个人利益不惜杀死首领的方式来公开蔑视“荣誉社团”内部等级由选举而定、首领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常规。

当时的委员会头儿萨尔瓦托·格雷科，即人们熟知的查希特杜唤李吉奥前来就这次违规事件作出解释。李吉奥向他辩白说，他个人对此一无所知，还请求格雷科相信他的话。

打那几以后，李吉奥便有计划地、巧妙地追击所有那些曾支持过查希特

杜的铁杆们，所有的铁杆儿党羽不是被消灭掉，就是遭到过追击。

由于无人斗胆向他挑战，李吉奥逐渐成为科莱尽这个阴森可怖小镇的无可争辩的一镇之主和黑手党最可怕的凶手之一。在随之而来的若干年内，如此众多的人都屈从于他的淫威之下，他的心腹亲信及家族同伙们组成了著名的“科莱昂”派。

在李吉奥扩张权势的同时，其它股力量也在努力在黑手党内部培植形成其他派系。“幸运者”卢恰诺归天后，接管其大宗麻醉品生意的是塞扎·曼泽拉，一个在巴勒莫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老派黑手党首领。他是坐落在通往蓬塔莱西机场途中的一个海边小镇——辛尼西为基地的家族首领。由于该机场位于其势力范围内，故成为他们进行包括毒品在内的违禁品进出口走私的宝贵基地。他的副手就是伐为的头面黑手党人巴达拉门蒂。曼泽拉喜欢孩子，每逢他漫步在辛尼西狭窄的街道上时，会掏出满满两衣袋糖果分给孤儿以及流浪街头的顽童们。他捐出在海洛因交易中获取的一部分利润，设立了一所孤儿院。他的慷慨施舍使他当选为辛尼西天主教信徒会的会长。

1962年2月，曼泽拉家族安排好由其老供应商、臭名昭著的科西嘉走私犯即“金指”运送海洛因。他的人几乎遍及地中海每个港口，走私从香烟到海洛因的一切物品。常规作法，当将海洛因转运至西西里时，“金指”只不过乘一艘快艇靠近巴勒莫港口，将海洛因移交给黑手党许多小渔船中的一条。目前，这种移交方法已变得如此惹人注目，引起了当局的反感。这次装运他们决定作一点小小的变更，移交将在该岛南部进行，曼泽拉派去接货的是迪·皮萨，迪·皮萨是黑手党的重要人物，身兼巴勒莫委员会成员及诺斯家族首领之职。

迪·皮萨在阿格里真托城租了一条船与“金指”接头，然后把货交给曼泽拉。这批海洛因又通过横越大西洋的船员偷运出巴勒莫，走私至纽约。直到为这笔买卖提供资金的辛迪加收到货款后才发觉上了当。曼泽拉在纽约与合伙人见了面，合伙人告诉他发来的货份量不足，迪·皮萨被怀疑欺骗了合伙人，被传唤至委员会。他巧妙地设法使委员们相信他是无辜的。但此事却遭到委员会两名成员——拉·巴伯拉弟兄的激烈反对，此即拉·巴伯拉兄弟与迪·皮萨一伙恶战的开端。

战争方兴未艾，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提议：首领代表们应区别于家族首领——事实上，首领代表应是家族首领指定的资历较浅的家族成员。这一裁决加剧了那些不愿意目睹权势被资历年龄浅者所削弱的首领之间的紧张局势，其中一些人甚至放弃了家族首领地位而到委员会去争一席之地。曼泽拉已经同意由副手巴达拉门蒂接替其位置，而且，迪·皮萨也准备交权，但他却永远没有机会退下来了。1962年圣诞节那天，他将汽车停在巴勒莫大广场，钻出车子，正当他朝一间售烟亭走去时，三个男人悄悄走到他背后，操起一支枪口锯短了的猎枪和一支左轮手枪朝他开了火。警方询问时，广场上的旁观者居然无一人能回忆起来听到枪声。

是谁杀死迪·皮萨的？无论怎样，最大的嫌疑犯要属安格洛·拉·巴伯拉了。对委员会作出的迪·皮萨对海洛因交易亏空不负责任的裁决他一直心怀不满，此乃执行“合同”最充分的理由了。况且，他在年轻的家族首领中最凶暴、最果断。甚至还有人，他利用了波塔·纳奥瓦家族的人搞这场谋杀，他利用的是该家族首领的孙子。后者申明，他同谋杀毫无干系，其祖父也支持他这种说法。这些否认并不令人信服，整个波塔·纳奥瓦家族被委员

会开除。

不管安格洛·拉·巴伯拉是否有罪，反正现在黑手党都迁怒于他们兄弟俩。波培·纳奥瓦家族——以前拉·巴伯拉兄弟的伙伴们——如今发觉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被疑为同谋，卷入迪·皮萨轰动一时的事件之中。巴伯拉兄弟的好友巴塞塔甚为机警，又擅长搞外交，从这场恶战中逃脱了。虽然巴塞塔有萨尔瓦托·格雷科这样有权势的朋友，他仍被要求对他以前朋友搞暴力行动以此来证实自己的忠诚。

鉴于反对安格洛·拉·巴伯拉的联盟十分强大，安格洛·拉·巴伯拉乘飞机飞往米兰。他兄弟的命运却没有这么好，1963年1月7日，即迪皮萨被杀后的第十一天，他失踪了，从此再未露面。巴勒莫警察怀疑是萨尔瓦托·格雷科的堂兄英格纳尔安排的，藉此巴塞塔背叛了他从前的朋友，将他杀死并在其玻璃厂的熔炉内焚化，这也许是巴塞塔不得不向其联盟付出的代价。

委员会将矛头指向拉·巴伯拉兄弟时，巴塞塔家族那些由于同兄弟俩关系密切而遭排斥的成员们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一致同意，为免遭族间仇杀还是分散开好。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胜利者是实力相当笃厚的格雷科家族。该家族使得参故的新、老黑手党分子结成联盟，获得了大量军火，并得到了政治与财力的大量储备。

格雷科是西西里岛最有势力的黑手党家族，直到今日，大权仍燥在姓格雷科的人手中。英格纳尔和查希特杜控制着巴勒莫南部查库内和盖迪尼一带区域。

格雷科家族是拉·巴伯拉势力的主要威胁，由于安格洛的逃亡和他兄弟的死，格雷科家族似乎稳操胜算。不过，安格洛可能会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继而发生的事情确实让黑手党一下子四分五裂。1963年2月12日，一辆装有甘油炸药的被窃汽车在查库里爆炸，这辆车就停靠在英格纳尔住宅外面，但英格纳尔福大命大造化大，他毫毛未损。

4月1日上午，晴空万里，一辆费特牌轿车缓缓驶过巴勒莫一家鱼店。率窗玻璃被弹雨打得粉碎，拉·巴伯拉的一个主要副手被打死。据谣传，已返回西西里的安格洛·拉·巴伯拉受了伤。警方赶到时，在鱼店内缴获了一批武器。

4月26日，曼泽拉回家时，他的保镖惊异地看见一辆崭新的阿拉法特牌轿车停在院子大铁门之内。曼泽拉与司机走出汽车想看个究竟，刚刚打开车门便引爆了一枚大炸弹。曼泽拉只剩下一顶宽沿美式帽子及一只鞋，司机被炸得尸骨无存。黑手党发明了一种新的杀人方法，虽然多少有点儿响声并且花费昂贵，却既可置敌人于死地又能消尸灭迹。

距爆炸地点二十码处的一棵树上，警方发现了一个小包，是曼泽拉的，里面装着大量有关黑手党工作情况及目前战略的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委员会对刚刚成立的意大利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极为焦虑不安，以及一次宣布所有黑手党家族间休战的会议的情况。他们最怕的是对黑手党恶迹作进一步宣传，因为那可以增强意大利议会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的决心。他们还决定巩固同显赫人物的政治联系与往来。委员会特别握到，有关迪·皮萨及海洛因交易中下落不明的钱款的争论会将所有这些置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境地。

他们说对了。

正是曼泽拉——奇尼塞家族的首领，召集委员会开会判处了萨尔瓦托·拉·巴伯拉的死刑。现在，安格洛已经让他为此付出了代价。报仇雪恨之后，安格洛同其他人一样逃之夭夭——但他却未能逃脱。1963年5月24日凌晨一点二十分，他从米兰市的情妇吉奥文娜家里出来，偷偷上了自己的欧佩尔牌轿车。路上不远处，停着两辆小车，顶灯亮着。安格洛尚未来得及将车发动，只见那两辆车门同时打开，从中跳出两人，左轮手枪子弹倾注在这个黑手党分子身上，尽管身中六弹，他还是竭尽全力拔出手枪予以还击，起码射伤了一名袭击者。救护车赶到将他送往医院，在那里，他竟活了下来，并且逐渐恢复了健康。

火并于1963年6月底达到高潮。6月30日，巴勒莫警察总部接到一个电话，提醒他们注意被抛弃在查库里一条小巷中的一辆外观可疑的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该地区就在巴勒莫市郊外，由格雷科控制。几分钟后，第二个电话被记录在案，打电话的匿名者说，“别去触摸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警方才下需任何警告呢——就在一天之前，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在维拉巴塔爆炸。一位正去上班的男人丧生，另一人终生残废。巴勒莫总部派了一支警察巡逻队和一个工兵班前往检查这辆汽车。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发现安装在汽车后座内的引爆装置纯属粗制滥造，有一条导爆线，点着过，但又熄灭了。汽车一只后轮胎瘪了，这可以看作这辆车被遗弃的原因。警察小心翼翼地从前座移动装置，并打开汽车尾盖。

接着，真正的炸弹开了花，七名工兵和警察被炸死，后座装置不过是个圈套而已。

这辆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停在英格纳尔住宅对面，袭击嫌疑落在正在发迹的巴勒莫市黑手党分子托瑞塔身上，似乎还牵涉到巴塞塔。此事件就是尽人皆知的“查库里大屠杀”，震惊的意大利民众从而加速了对黑手党大规模的制裁行动。

身中八弹的安格洛·拉·巴伯拉从医院被送到监狱。一个假人——身着曼泽拉的质地最上乘的西服，头戴帽子，脚穿一只鞋——这是其主人的唯一遗物——被敛在一副豪华奢侈的棺材内埋葬了。波塔·纳奥瓦家族分崩离析，大部分成员流离国外。查希特杜去了巴西，那儿将是许多在逃黑手党人的栖息地。与此同时，警察在西西里岛剑拔弩张，黑手党几乎偃旗息鼓，停止了活动。“查库里大屠杀”引起了大逮捕，街面上黑手党走卒的踪影越来越乏见了。

据说，当时黑手党中有一人名叫米歇尔·卡瓦塔伊奥，他策划了攻击拉·巴伯拉兄弟的行动。卡瓦塔伊奥的生命已近完结，但终结前仍发生了很多流血事件。

巴塞塔在黑手党的一个密友邦塔特，是个年轻、英俊的西西里人，教名为“法尔康”，他二十来岁就成了圣马瑞拉迪格苏家族的首领，当然是以鲜血为代价夺来的。卡瓦塔伊奥对邦塔特怀恨在心，决定下令谋杀其副手伯纳多·迪阿那。这顶任务交给了屈塞波·西尔查，于是，迪阿那被射倒在地，一命呜呼。

邦塔特大发雷霆——这简直是对他权力的严重蔑视与冒犯。他要相机行事。

1969年，西尔查被流放到维纳托，邦塔特一发现他呆的地方便着手进行报复。他委派了一个四人小组，驾车到达该地区将西尔查监视起来，以便他

们制订出袭击的最佳方案。西尔查见到几辆轿车在周围游移——以前没见过这几辆车——反常，他疑心大起，居然违背黑手党戒规，打电话给警察。警方派来一辆巡逻车截住了这两辆外观可疑的轿车。在车内他们发现了四个人，配备着枪管锯短了的机关枪，半自动枪等武器。其中三人是于1969年又重操旧业的波塔·纳瓦奥家族成员，他们的出现表明了该家族与邦塔特家族之间的关系。对于该家族来说，邦塔特就如同兄长。重整旗鼓后的波塔·纳瓦奥家族的新头目皮波·卡罗也与邦塔特保持了密切关系。

但西尔查毕竟在劫难逃，他终于被人在监狱外边干掉。他的妻子也遭到弹雨狂袭而丧生。这次暗杀受命于邦塔特，听说邦塔特先生从未因采取这种谋杀方式而心安理得过，尤其是对谋杀了西尔查的妻子一事他始终深感内疚云云。

卡瓦塔伊奥也没得到善终。1969年12月10日，若干警察进入其公司公干，卡瓦塔伊奥突然认出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并非警察，而是与他作对的黑手党人，卡瓦塔伊奥掏出手枪打死了他。另一名“警察”开了火，接着便是一场激烈的枪战。卡瓦塔伊奥及另外三个被打死，冒牌警察带着他们死掉的同伴逃离现场。死者给扔进停在外面的一辆崭新的阿尔法特牌轿车尾箱，杀人者消失于巴勒莫市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之中，无影无踪，只留下几支杀人凶器——枪。

卡瓦塔伊奥终于为阴谋反对拉·巴伯拉兄弟而送了命。

安格洛·拉·巴伯拉最终却也在一次黑手党屠杀中死于监狱。那是1975年的事了，三个西西里人连捅了他八下，他不想死也不行了。

巴塞塔紧步查希特杜·格雷科的后尘逃往巴西。他走得恰逢其时，警方已对他发出了缉捕令，罪名是谋杀。这个使别人“鹬蚌相争”以取“渔人之利”、被认为参与过若干谋杀案的老狐狸又一次漏了网，逃之夭夭。

第一次火并徐徐谢幕，李吉奥掌了重权。他终止了实际上的紧急状态，又开始搞起了“买卖”。其实，他是在为第二次黑手党战争铺路。他着手指派自己的属下任职区域首领，从而导致了他自己、邦塔特和巴达拉门蒂三人之间的不和与反目。

1979年，李吉奥派人暗杀了著名的法官特拉诺瓦，这是他亲自制造的流血事件，并且是瞒着委员会硬作决定，撇开了那些可能会反对他的人。这种独断孤行的行为，引起大家强烈不满，并最终促发第二次黑手党火并。

意大利黑手党的第二次火并

权力斗争中的彼胜我负，名利场上尔虞我诈，风云变幻，使得黑手党内部敌友难分，昨天还是朋友，说不定明天就成了仇敌。同样，今天还誓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人，明天也可能会成为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密友。

70年代末，曾受过邦塔特扶持帮助的波塔·纳奥瓦家族头目皮波·卡罗开始渐渐与恩人疏远。他与邦塔特的对手雷伊纳和米歇尔·格雷科走得很近，卡罗完全被米歇尔·格雷科所控制。在巴勒莫委员会会议上他一言不发，只偶尔点点头就算发了言。他已不再附和邦塔特。

邦塔特大为恼火，为了自卫，他准备干掉正日益威胁到他利益的雷伊纳。邦塔特告诉自己的朋友巴塞塔，有一位中立的委员支持他，但是，那位委员只有在事后才会当众宣布他对邦塔特的支持，他允诺将在委员会里确认邦塔特“有权自己”采取行动。

巴塞塔担心邦塔特会听信这空头允诺而受骗上当。他告诫说实际上是无用的协议，邦塔特实际上是孤立无援的。巴塞塔问他准备怎么去杀雷伊纳，他说准备在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亲自动手。巴塞塔怀疑他是否有点神经错乱。

巴塞塔不能与神经错乱的朋友一起去冒险，这老狐狸决定和自己的家人重迁巴西。

临行前，老朋友邦塔特在价值五十万美元的别墅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宴。这所房子有电子门和由自家卫士控制的闭路电视摄像机。晚宴很盛大，上的是最好的西西里酒和地方风味佳肴。客人有因泽里罗，有邦塔特家族中最粗暴也最忠诚的成员康特诺。

1981年1月，巴塞塔持一份假护照，从巴勒莫登上汽车渡轮，然后登陆开车到巴黎，在那里他乘上飞机到了里约热内卢。他的第三任妻子和孩子们从罗马乘了另一架飞机。

聪明机警的巴塞塔又一次及时脱离了险境，到达里约热内卢三个月以后，他从报纸上看到邦塔特被杀的消息。那次真成了一次诀别的宴会，从此阴阳相隔，即成永别。

事情是这样的：

邦塔特被杀前，他的助手皮埃特罗·拉·依阿康诺去看望过自己的老板。邦塔特告诉拉·依阿康诺，他计划当晚到乡间别墅过夜。这天是他的生日。拉·依阿康诺带走这一情报，通知了等在外面车里的米歇尔·格雷科家族的尼塞波·卢切斯。卢切斯又用步话机把消息通知了在更远处路上等待的人。

几分钟后，邦塔特从家中出来，到他的乡间别墅去。保镖格里高里奥开着另一辆汽车为他开路。行至西西里摄政大街十字路口，刚好遇上红灯。格里高里奥加速驰过，却没注意自己的老板被红灯挡住了。邦塔特成了一个很容易击中的目标。

既然羔羊已经待宰，杀手们自然不会客气，他们趁机开火。邦塔特虽然也有武器，但他根本没等摸枪就完了蛋。他的汽车和身体被卡拉什尼科夫机关枪打得千疮百孔。他受了致命三伤，但仍然往前开了几码远，撞到一堵墙上。格里高里奥一路赶到邦塔特的乡间别墅，才发现老板没跟上来（这个粗心大意的失职保镖，不知他当时在想什么）。他忙折回来，开了六公里赶到谋杀现场。他看一眼血迹斑斑的尸体，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只有在警察到来之前赶紧离开这凶地。

邦塔特20岁时就成了西西里最有权势的黑手党首领之一。他死的这天正

好是 43 岁生日，这位“猎鹰”式的人物死在了比他还要凶狠的人手中。更糟糕的是，他是被自己的本家出卖的。拉·依阿康诺的背叛行为和迈克尔·格雷科家族人员的参与，都清楚地说明，这是委员会的旨意。

参加邦塔特葬礼的人寥寥无几。仅有的两位按惯例穿黑纱出席的妇女是迈克尔·格雷科和邦塔特的教父斯帕多拉的妻子。另外一位参加葬礼的人是康特诺。康特诺虽然未受过正统的良好教育，但他是一位朋友尊重、敌人害怕的聪明睿智的黑手党人。他被称为“勇者”，这是对那些专事凶杀的黑手党人的婉称。他的品质，尤其是那鲜明而绝对的忠诚，早就为邦塔特大加赞赏，说他是圣玛丽亚迪格苏家族要员之一。为表彰他的功绩，邦塔特给他以直接与自己打交道的特权，而不必通过另一位首领。康特诺非常清楚，邦塔特在委员会里正被逐渐孤立。他知道，李吉奥谋杀国家官员的决定并没有同邦塔特和因泽里罗商量就擅自作主了。康特诺还与老板的好友巴塞塔这位令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黑手党人建立了亲密的友情。

参加邦塔特葬礼的寥寥人数更证实了康特诺的怀疑，即他的老板被人出卖了。康特诺觉得圣玛丽亚迪格苏家族的副首领米毛·特莱西还是可信的。迈克尔·格雷科曾告诉特莱西不必害怕，应该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接着干。后来，特莱西在西西里摄政大街，就是邦塔特遭伏击的那条街上一家货栈秘密会见因泽里罗。特莱西再次见到迈克尔·格雷科时，那位心狠手辣有“教皇”之称的黑手党首领问他到货栈去干什么。特莱西意识到自己受到科隆家人的监视，便向格雷科承认与因泽里罗见了面。格雷科警告他不要再去找因泽里罗，还告诉他，拉·依阿康诺已经成了圣玛丽亚迪格苏家族的摄政人。

这时，因泽里罗仍然以为自己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他还欠着雷伊纳买海洛因的钱。然而邦塔特遇害以后，他谨慎了起来，自己买了一辆阿尔法特牌 2000 型防弹车。

从 1980 年起，黑手党最喜欢用的暗示武器是卡拉什尼科夫，一种俄国人设计的枪，又名 AK47，射率为每分钟一百发，近距离射击可把人切为两半。

邦塔特遇害刚过几天，警察就不得不处理又一起枪杀案。这次神秘的攻击是以巴勒莫市中心的一家珠宝店为目标。谁干的，为什么？令人费解。康蒂诺店里的陈列橱窗弹痕累累，可似乎啥也没丢失。原来，袭击的目的根本不是抢劫，骑摩托车的人只是想用珠宝陈列窗的防弹玻璃来试验一下他的卡拉什尼科夫枪威力如何。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

1981 年 5 月 11 日，因泽里罗驾驶着新买的防弹车去约见情妇。情妇被安顿在他的公司承建的位于布隆内什街的一座公寓内。他刚走进房子，他的司机居·蒙达托便向马路对面的一伙人发出了信号，因泽里罗与情妇小会幽欢之后，从公寓里出来，还没来得及钻进汽车，便在一阵冲锋枪扫射中被打死，片刻之前还在温柔乡中享受浓情蜜意，谁知马上就被枪林弹雨打成马蜂窝，过早地入了英雄家。凶杀用的武器同杀死邦塔特的毫无二致，也是卡拉什尼科夫。人们搜查了因泽里罗的尸体，从他口袋中找到一支装满子弹的 357 型马格纳枪。

事实证明，因为与雷伊纳进行海洛因交易而产生安全感大错特错。对科莱昂家族来说，损失几十万美元而消灭最强的敌人是值得的。在这一事件中，他们甚至没用射穿防弹玻璃就要了因泽里罗的命。那次试验很有必要，只是那家珠宝店倒了大霉。

像对付邦塔特一样，科莱昂家族以争取家族内成员变节的手法干掉了因

泽里罗。现在他们已经消灭了两位反对派首领，并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安插了自己的应声虫。然后他们开始劝那些忠于邦塔特和因泽里罗的人放弃复仇之念。劝降的第一个对象便是米毛·特莱西。他曾不听格雷科的“忠告”，准备到因泽里罗遇害的地点去与他见面，只是因为迟到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他秘密地见到康特诺，和他谈起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康特诺说，特莱西已经是“死人”一个，不能再轻举妄动，否则事情会更加糟糕。

在巴西，巴塞塔知道他可能也上了科莱昂家族的谋杀名单，处境相当危险，因为他和自己的朋友、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萨拉莫纳都知道邦塔特要杀雷伊纳的计划。萨拉莫纳与格雷科会晤后来到了巴西，他告诉巴塞塔，刺杀雷伊纳的计划已经暴露，虽然不清楚格雷科是否知道巴塞塔和他了解此事。尽管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亲自参与这场凶杀，仅了解内情就可能使他们遭到杀害。他们听说科隆家族正准备枪杀那些效忠因泽里罗和邦塔特派的人，更加忧心忡忡，忐忑不安。

米毛·特莱西和康特诺接到拉·依阿康诺的邀请，去参加一次“和平”会议。康特诺感到可疑，并立即觉察这是一个圈套。他决定不去参加这场鸿门宴，并劝特莱西也不要去。可惜特莱西没听他的，结果是一去不回。这是一次大血洗的序曲，许多被认作是因泽里罗和邦塔特的支持者，或当作科莱昂家族敌人的人都死于非命。指挥这次大血洗的人就是杀人狂皮诺·格雷科。

因泽里罗的儿子居塞波首当其冲。尽管居塞波只有十七岁，也被皮诺·格雷科看作危险人物。他听这少年吹嘘过，“我要亲手杀死雷伊纳这条狗！”对这样公开的吹嘘，皮诺无法容忍也不能放过，他亲自监管了对居塞波·因泽里罗的凶杀，在行凶前先折磨他，最可怖的是，皮诺砍下了那少年的手膏，嘲笑道：“用这只手，你再甭想杀死雷伊纳了。”

这族间血仇从巴勒莫一直蔓延到纽约。有人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死去的因泽里罗的兄弟皮埃特罗，他嘴里塞着美元，生殖器已被割掉。这些黑手党的标记暗示着他可能与别的黑手党人的妻子鬼混过（这是死罪，比中国的“朋友妻，不可戏”的处世原则还要严厉得多），而且在讨价还价中过于贪婪。

接下来，皮诺·格雷科开始搜寻康特诺。康特诺藏了起来，既躲避警察又躲避科莱昂家族的人。但皮诺的情报员给他报信，说康特诺将去看望他的父母。他立即动手布置埋伏。

1981年6月25日晚上7点30分，康特诺从乔亚库里父母的公寓里出来，开动了岳母的非亚特127型汽车。车上还有执意要和他同车的堂兄法格列塔。妻子和儿子在他前面乘另一辆汽车走了。他们驾车离开乔亚库里，接近通往加法的立交桥。行车间，康特诺看到一个名叫安吉洛的熟人也开着一辆非亚特127型汽车。康特诺招手让他先行。安吉洛挥手致意，超过他们以后就减了速，康特诺十分不解。他行驶到立交桥的最高点上，和路边公寓楼最高一层都齐平了。在右前方，康特诺注意到另外一张熟悉的面孔躲在桥边一幢楼房最高层的窗户后面，这个人名叫文森佐·布法。

康特诺吃了一惊。几秒钟后当他看到一辆大马力摩托车向自己冲来时，吃惊变成了恐惧。骑手是杀害邦塔特的凶手之一——居塞波·卢切斯。另外一位坐在后座上，正是以冷血嗜杀著名的皮诺·格雷科！

摩托车在康特诺的汽车前慢下来，皮诺举起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瞄准，开火，一梭子子弹射向康特诺。康特诺飞扑过去保护法格列塔，

他们竟神奇地躲过了冰雹般的子弹。法格列塔被打中脸颊，康特诺毫发未损。

摩托车沿着公路疾驶而去。皮诺要重填弹匣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一会儿，康特诺从汽车后视镜里看到摩托车又高速折回来。他反应极快，停下车，把法格列塔推到车外。自己蹲伏在汽车前灯下面，手握装有五颗子弹的左轮枪。皮诺用卡拉什尼科夫又扫射过来，康特诺仔细瞄准这个刚才险些要了他性命的凶手。他自信自己打中了皮诺的胸部，因为他的自动枪子弹飞了，人向后倒去。跟在摩托车后面的是一辆高尔夫车，装着射击队的后备人员。康特诺寡不敌众，顶不住了，决定一撤了事。他拉着堂兄从枪林弹雨中窜了出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康特诺的堂兄告诉他，说在海滩上遇见了皮诺·格雷科，他只穿着游泳裤，身体上没有任何弹痕——原来这冷血动物虽然对别人的生命轻贱有若蚂蚁，对自己的性命却很有些敝帚自珍，不舍得浪费——那一天袭击康特诺时，他穿了性能极佳的避弹衣。康特诺逃了出来，只是被玻璃碎片割伤了点皮。另外一颗子弹削掉一撮头发令他出了一身冷汗，真是悬而又悬的死里逃生。他当即逃往罗马，本想找皮波·卡罗，但想起主子邦塔特遇害前曾怀疑卡罗的友情，而且凶杀以前，卡罗去邦塔特家中的次数明显减少，便打消了找他的念头。

康特诺决定深居简出，尽可能不让人知道自己的下落。到罗马后不久，他便听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妻子的叔叔被人杀害，一同遇难的还有一位和他在一起的不幸的砌砖工。康特诺大为震惊，这位砌砖工并不是邦塔特派的成员，而是一位同他的黑手党活动毫无牵连的远房亲戚。康特诺意识到这无意义的凶杀目的只有一个，即把他从藏身之地引出来，群起而攻之。后来他的朋友和亲戚又接二连三地惨遭杀害，康特诺仍然隐忍不出，直到被警方逮捕。

逮捕或许救了康特诺一条命，他成为黑手党大战中少数幸存者之一。

可是当他写下忏悔录，开始供述的时候，却发现家人已全遭杀害。

当时，黑手党中“泥鳅”式的人物巴塞塔正龟缩在妻子克里斯蒂娜在里约热内卢买下的公寓里。

1981年秋天，巴塞塔收到意大利传来的一些不祥的消息。他第一任妻子迈齐奥拉的哥哥卡瓦洛在都灵被杀害了。巴塞塔最害怕的似乎已变成了现实，自己卷入了黑手党的权力之争。这消息几乎使他绝望，便给皮波·卡罗挂了电话，而对方却说关于这次凶杀，他知道的也很有限。他想进一步安慰巴塞塔，说这仅仅是都灵一地的事，与巴勒莫事件没关系。卡罗邀请巴塞塔回巴勒莫，巴塞塔说没有路费，他又主动提出为他支付机票，说他会把钱交给当时正在巴勒莫的萨拉莫纳。

不清楚卡罗是否给过萨拉莫纳钱，反正萨拉莫纳返回巴西与巴塞塔大吵了一架，他指责巴塞塔把他们在巴西交往的事告诉卡罗，结果使他面临生命危险。巴塞塔说萨拉莫纳是胡言乱语（看来，这对朋友的交情似乎并不怎么真诚）。争吵使这对朋友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萨拉莫纳的经历使巴塞塔提高了警惕——不能轻信卡罗。

邀请巴塞塔回巴勒莫可能是一个圈套。虽然巴塞塔有足够的势力在西西里拉起一小股效忠者，但是在邦塔特和因泽里罗被害以后，他已暴露于危险之中。如果说萨拉莫纳担心生命危险是因为自己曾接近巴塞塔，这只能说明巴塞塔其人已被看作对科莱昂家族的主要威胁。

巴塞塔不想回西西里，可是边远地区也不平静。一位老朋友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往日西西里的生活使巴塞塔开始重温旧梦。这位朋友便是：巴达拉门蒂。

这次来访并非完全出人意料，萨拉莫纳早就告诉巴塞塔，说巴达拉门蒂可能会来找他。这样做显然对两人都极其危险。巴达拉门蒂早已被赶出了委员会，并且奇尼塞家族首领的职务也遭解除，他成了科莱昂家族的公开敌人。有一条关于他性命的公开契约，即任何见到他的人都有义务让他从这个世上永远消失。对这义务和警告，巴塞塔竟然非常罕见地不予理睬。巴达拉门蒂是朋友，他也好奇地了解一些急干知道的情况。他建议巴达拉门蒂住到贝莱姆摄政旅馆，那里离他的居所近，很方便。巴塞塔开着车出去迎接他。

巴达拉门蒂仍然是一位气度不凡的人物。他给巴塞塔带来简单的消息：“我来这儿是要劝你回西西里。只有你才有足够的影响力指挥一场反攻，拉起反抗科莱昂家族的起义。”

但巴塞塔无动于衷，在他看来，巴勒莫的局势已无法挽回，他又何必去趟这浑水，自找没趣？他反过来劝巴达拉门蒂，说从事伐木业日子过得也不错。他要巴达拉门蒂相信，如果巴达拉门蒂留在此地，也会一样生活得平平安安。巴达拉门蒂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可能说服巴塞塔，也就没再勉强。

他们把话题转向最近在巴勒莫发生的事。巴达拉门蒂指责了萨拉莫纳，说他在邦塔特和因泽里罗被杀后不仅没有保证朋友安全，反而把事情弄砸了。他还说，萨拉莫纳只是假装帮助他们，而实际上出卖了他们，“好好的一番事业，毁在一个小人手里。”巴达拉门蒂又说，邦塔特遇害后他找过因泽里罗，提出自己要为反攻科莱昂家族出力，可是因泽里罗拒绝了他。这是事实，因泽里罗那时正抱着侥幸心理，以为科莱昂家族不会对他下毒手呢，哪知自己很快就丧了命。

巴达拉门蒂因为李吉奥策划排斥他，仍然怀恨在心。和巴塞塔谈话时，他提到好几件被李吉奥激怒和羞辱的事。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有一次李吉奥在巴达拉门蒂领地内组织赎金支付。委员会早就规定，不能再在西西里从事绑架。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因为当地人对绑架十分反感，再干下去会破坏黑手党的形象（？）。这样还会招来警察太多的注意。可是李吉奥在意大利别的地方，特别是北部地区进行绑架，并安排在接近奇尼塞的巴达拉门蒂地界内交接赎金。这使大批警察集中到这一地区。李吉奥不仅破坏了委员会不许绑架的规定，而且还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就是未经许可而在其他首领的地域内从事活动。对于这种蓄意的侵犯，巴达拉门蒂怒火万丈。

此类事还有许多。每次在委员会碰面，李吉奥总要奚落巴达拉门蒂，以显示自己受的教育多；而且在巴达拉门蒂发言时，取笑他的语法错误。

巴达拉门蒂证实，科莱昂家族的“清洗”活动还远未停止。遇害的有他的堂兄安东尼奥·巴达拉门蒂，巴达拉门蒂被赶下台后，是他接任了奇尼塞家族的首领职务。而邦塔特和因泽里罗的另一位朋友，西西里东部卡塔尼亚家族的首领费利图也被不共戴天的仇敌桑塔帕拉残害。桑塔帕拉是科莱昂家族的坚定的同盟。

是的，1982年6月16日，宪兵队一个武装押解组用汽车把被捕的费利图从恩纳监狱转移到特拉帕尼一所监狱去，他们可不是科莱昂家族职业杀手的对手。费利图及其押解人在精心策划的埋伏中全军覆没，成了卡拉什尼科夫枪下的最新牺牲品。

巴达拉门蒂的话一点也没错，科莱昂家族的“清洗”活动还远未结束。巴塞塔虽不想牵入，却也躲避不了。

1982年9月11日，巴塞塔要了巴勒莫的长途电话，找儿子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因为拥有皮波·卡洛给的绑架赎金而服刑，刚刚刑满出狱。他和哥哥贝内德托刚在巴勒莫开了一家馅饼店，与姐夫杰诺瓦共同经营。

巴勒莫这边接电话的是安东尼奥的妻子约兰达。她哭着说已经三天没看见安东尼奥了。一直同他在一起的哥哥贝内德托也失踪。人人都知道在西西里岛“失踪”意味着什么，都把这叫做“白色死亡”，极少能找到失踪者的尸体。这对亲友们是残酷的折磨，他们时常害怕受害人死去，又强烈地希望受害人有朝一日能够归来。

巴塞塔让约兰达去找警察，看看他的儿子们是否被抓了起来。第三天他再打电话时，约兰达说警方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再也没见到贝内德托和安东尼奥。

1982年11月，下一个凶杀目标轮到巴达拉门蒂家族，受害人是巴达拉门蒂的侄子，凶手打穿了他的脑袋。

1982年腥风血雨的圣诞节假日里，巴达拉门蒂开始反击，圣诞节这天打响了对科莱昂家族的反攻，目标：谋杀精神变态者、杀人狂皮诺·格雷科。巴达拉门蒂和罗曼诺打了一次埋伏，但皮诺逃跑了，并以极快的速度给以反击。24小时后，一些顾客走进巴勒莫的“纽约馅饼店”，该店仍由巴塞塔的女婿杰诺瓦经营。这些顾客没买馅饼，却开枪打死了杰诺瓦和他的两名雇员，三名被害人都是巴塞塔的亲戚。

三天后，12月29日，巴塞塔的弟弟和侄子——一个从未沾过黑手党边的可爱的小伙子——同时在自己的玻璃厂遇害。

1983年2月，凶杀过后，巴达拉门蒂重返巴西，还希望说服巴塞塔参与行动。他说，不愿斗争显然对巴塞塔不利，科莱昂家族以残酷手段继续夺走无辜的生命，但他不该告诉巴塞塔，他在杰诺瓦遇害前一天曾想干掉皮诺·格雷科。巴塞塔立刻知道是巴达拉门蒂设下了那次埋伏。他大发雷霆，巴达拉门蒂欲使他参与行动，已使他处境危险。

巴达拉门蒂可能是故意把巴塞塔扯进这场火并，好迫使他回巴勒莫与科莱昂家族斗争。巴塞塔儿子的失踪可能也是他亲自布的局。在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的国中之国里，什么事都会发生。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来支持这种推测，但不管怎么说，巴达拉门蒂已把巴塞塔拉进了黑手党内战的中心，而且使巴塞塔危难重重。

不到四个月，巴塞塔便有七位最亲近的亲戚遇害，他被压垮了，惶惶不安。

他也试图阻止这种残忍，强撑着从巴西赶回巴勒莫，想劝说对手结束战争，但很快意识到这一切无济于事。因为“谈判”过程中，巴塞塔的亲戚还在一个个倒下去，一个个成为冤魂怨鬼，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从此不存在了。巴塞塔魂飞魄散，只好光棍一人逃窜回巴西，从此一股冲心急火窝在胸中，他只想死。

1983年10月25日，巴塞塔在巴西被捕。

黑手党火并的牵连无辜已使他寒心，使他生出一股毁灭的愿望，于是他和警察合作了。

黑手党大头目招供，这是百年未有的奇迹。这奇迹给予黑手党一次绝对重大的打击。这将在下一章中有所涉及。

黑手党的内讧会不会使其灭亡呢？

从黑手党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种竞争是推动这个犯罪组织发展的某种共同规律。难怪美国《时代》周刊指出：“黑手党把凶杀看作是做生意的一种手段。”报界还就匪徒内讧问题发表了一次很有趣也很有价值的意见：

“如果认为，黑手党人由于互相残杀终究会把自己杀光，从而使美国社会摆脱这种最丑恶的现象，那么任何这种猜想都是绝对错误的。实际上，大规模的斗争是危机大发展的征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惊人的规模在恶性发展。黑手党正在波及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新领域，它正在向美国的新地区蔓延，它正在采用新的、更加现代化的方法。”

黑手党的内讧和斗争似乎就是他们得以发展的自然选择，被淘汰的是弱者，保留下来的是优良品种，会发育得更好，生长得更快，根系更深，枝叶更茂，茎干更粗壮。

何以消灭黑手党？全世界的正义力量必须联合。

事实上，自从有黑手党的罪恶产生，正义就从未停止过与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可惜，正义似乎很少占上风。

博尔斯、居利阿诺、特拉诺瓦、达拉·基耶萨将军……这些为正义而战的人一一躺倒在血泊中。

第八章正义之剑——世界反黑手党行动

时至今日，黑手党像世上最凶猛的瘟疫一般，遍布欧美国家的各个领域。在美国，黑手党操纵工会，勾结警察，打家劫舍，杀人如麻，仅靠贩卖军火、走私毒品、职业杀人积累起来的钱财，堆积起来比一百多层的帝国大厦还高。它的活动猖獗，然而，直至今日，这只崛起于地中海西西里岛的黑手猛兽仍像幽灵一般。没有人能确切掌握和了解它的组织和活动规律。黑手党的那只黑手伸向了各个角落。而黑手党的首领们也不像以前的土匪那样流浪江湖，占山为王。他们有显赫的身份，白天是社会的促进者，为公众谋福造利，而晚上却阴谋定计，贩毒、暗杀，直至杀人越货、洗劫商店、炸毁飞机、击沉轮船、奸污妇女，给社会留下阴森恐怖的黑手印记。

在黑手党的历史中，它曾是“和平”和“公允”的使者，深得它的发源地——西西里岛的众多赞誉。意大利本世纪黑手党最著名的领袖唐·维齐尼的葬礼比任何一位意大利亲王都要隆重，他的铭文以这样饱含深情的言词结尾：“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讲信用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可见最初他们在民间人们心中的地位。

自从黑手党由游兵散卒结成严密的组织以后，他们便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他们成为地中海上的国中之国，政府、教皇在这里分文不值。1921年法西斯上台后，也是整个法西斯潮水在意大利半岛上汹涌时，西西里却没有半点波浪。1924年5月，法西斯头子、意大利的大独裁者墨索里尼来到了西西里岛，却被巴勒莫市的黑手党人市长皮尔纳·德伊格雷奇·库恰戏弄一番落荒而逃，主要原因是黑手党人认为墨索里尼也是昙花一现，是个过客罢了。

但那次黑手党人却估计错了，他们碰上了比他们更凶残的混世魔王，墨索里尼回到罗马，立即发誓要除掉所有的黑手党。后来证明，黑手党并非天兵天将，也是凡夫俗子。一年之间，名扬四海的黑手党土崩瓦解，他们遭到了灭顶之灾，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法西斯政权垮台。

而在当今的和平世界之中，各国警察对于黑手党想尽办法。从刑事犯罪到隐藏极深的黑手党要人，都成为他们追寻的目标。世界反黑手党行动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1985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飞到纽约，为纽约警察局一举逮捕“五大家族”的“老板”和四名高级助手而欣喜若狂。他在连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除掉了这批最高级的有组织犯罪分子。美国势力最大的黑手党犯罪集团也被置于铁窗之后。”那天，面对数百只照相机的闪闪灯光，韦伯斯特激动得满脸通红，两只山鹰一样的眼睛闪闪发光。

但是，美国舆论界对联邦调查局宣布的这一“空前胜利”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因为黑手党头目的“捉”与“放”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对于这次审判，人们只不过是比往常稍稍多瞟了几眼。

从第一批西西里移民在美国行凶作恶开始，黑手党已在这片土地上猖獗百年，形成了24个“家族”分布在美国各地，其中纽约的“五大家族”势力最大。在全美黑手党共有七百多个分支，“五大家族”就占了一半以上，其中甘贝诺家族兵强马壮，实力最强。

这些西西里人的后裔，本世纪初就在纽约打天下。从一开始，他们就毫不顾及什么同乡故里的“情谊”，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总是把机关枪和手榴弹做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方式。近百年以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血染纽约，倒

也常常杀得人仰马翻，两败俱伤。为了避免警方从中渔翁得利，“五大家族”的教父终于在1931年坐在一起，组成了黑手党委员会。“五大家族”各派首领参加，成为纽约黑手党的最高权力组织。

几十年以来，纽约黑手党在这个委员会的操纵下如虎添翼，敲诈、勒索、杀人、放火、放高利贷、走私贩毒、开赌场、设妓院，无所不为，直至发展成为不可一世的“黑手党帝国”，美国人提到纽约，都知道那是一个两分天下，白天是联邦政府任命的人当市长，而晚上则是黑手党“五大家族”轮流作庄“主持市政”。

1983年，美国司法部第三号人物朱利安尼调任纽约南区检察官，他雄心勃勃地从华盛顿来到纽约，发誓要使这批黑手党恶棍全部锒铛入狱。美国司法制度的原则是，宁可放过坏人，不可冤枉好人。所以对司法手段和程序要求极严，不得轻易对公民进行跟踪、窃听、讯问，搜查，否则就被视为知法犯法。可是朱利安尼后台硬得很，他来自华盛顿，美国司法部长史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都是他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所以，朱利安尼一上来就把一切现代化的“非法手段”都对黑手党用上了：收买、打入、跟踪、窃听、录音录像，无所不包。

其实，“五大家族”在纽约的犯罪很有些明目张胆的气势。几十年来，他们使警方屡屡败北的经验激励他们从事任何冒险。所以朱利安尼的调查很快收到了显著成效。六个月后，纽约“五大家族”的首领被控参加监督全国性黑手党地下活动的“委员会”而同时被捕，同时对他们组织的4190多起犯罪活动提出了指控，并以此为线索，对黑手党全国24个家族中的16个进行了不同罪行的控告。

“对一个无法无天的无形帝国的斗争从未取得过今天这样的胜利。”消息传到华盛顿，年过古稀的里根总统兴高采烈，以他那赛过年轻人的洪亮声音断言：“我们终于使这帮为非作歹之徒无法逃脱了，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美好局面……我们决意要粉碎他们的组织，耗尽他们的利润，并让他们的成员尝尝铁窗滋味。”

美国政府实在想这是一次永久的胜利，至少也能杀一儆百，所以，开庭审判前，韦伯斯特部长亲自飞往纽约。但是，出乎意料，这场“世纪审判”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却是无人敢当陪审员。

在美国，审判一般都采取陪审员制度，从市民中选出12名陪审员，审议审判中原告、被告双方的意见，作出最终判决。担任陪审员是市民的义务，一般从有名望的人中推选出若干名候选者，经法官认定后，成为陪审员。

纽约曼哈顿区的联邦地方法院的大楼里，法官在逐个和候补陪审员谈话。

“你对黑手党知道什么？”

“只是从报纸、电视、电影或书上知道一星半点儿。”平常无人不知的黑手党在候选人这儿却变成了“稀世珍宝”似的。

法官知道他们心怀恐惧，但还是问下去：

“你愿意作本案的陪审员吗？”

“不！”

“为什么，担任陪审员是公民的义务，您知道！”

“太可怕了！不管怎么说，我可不想和黑手党纠缠在一起！”回答斩钉截铁。

没办法，这个审判破例不公布陪审员的姓名，理由是“为了避免威胁、收买或给陪审员带来其他危险”。黑手党被告及其律师立即提出抗议，认为此事是为了事先对陪审员施加有利于公诉人的影响，即“被告是可怕的恶魔”一类印象，争执再三，法院决定把陪审员的姓名用号码代替。然而，这些措施并没能消除有的陪审员候选人的恐惧心理。其中一位直截了当地说：如果非要我担任陪审员，我明天就搬家去别的州。”折腾了足足两个月，才把符合条件的12名纽约市民凑齐。

1986年11月19日的纽约，已是初冬天气。这天阴云浓重，寒风中夹杂着雨和雪，使人感到寒冷。市容也有几分萧条。但在靠近唐人街那座联邦地方法院大厦的审判室里，却挤满了旁听者和成群的记者。在紧张的气氛之中，他们屏息等待对黑手党“世纪性大审”的结果。

中午12点10分，法警打开审判室深褐色的厚重大门，旁听席上微微一阵交头接耳的骚动，由七女五男组成的陪审团成员鱼贯而入。

为首的陪审团主席是位中年女黑人。她身着深蓝色的裙子，浅红上装，领着全体同僚在木制的陪审席上坐定，庄重地注视着检察官席和被告席：三名年轻的检察官显得有些紧张，倒是九名被告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饱经世故的脸上找不出一丝感情的流露。在过去的十周的审判中，他们一直就是这种表情。

这次审判的重要证人是西西里黑手党大人物巴塞塔。黑手党内部火并杀死了他的所有亲人，悲愤无奈之际他向意大利当局投降，不顾黑手党的规矩，将所知的黑手党内幕全部吐露无遗。1985年年底，他作为“五大家族”案的重要证人，被引渡到美国。由于他的供述，黑手党的秘密贩毒途径遭受到严重打击，意大利当局因此而逮捕了360多名黑手党罪犯。现在，美国当局指控他们有贩毒重罪。这样，“五大家族”的罪行增加到15项。如果法庭全部认定，每人至少要判百年以上徒刑。

满头白发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欧文，看着陪审团主席问道：“陪审团是否已经达成裁决？”

在前一周礼拜五，陪审团开始进行商议之前，欧文法官曾对他们解释；只证明某一个人是属于黑手党成员的“单纯事实”不足以将其定罪；要将一名被告定罪，必须证明他在黑手党“委员会”中的存在，同时要证明被告“通过黑手党委员会”从事过两件以上的诈骗案件。

身材纤瘦的中年女黑人站起身来，回答道：“我们已达成裁决！”她的编号是126号，其他陪审团员也以号码来代表。审判过程中，一直使用号码而不用姓名。

12点17分，这位陪审团主席说了第二句话：“有罪！”

接下来，她花了28分钟的时间，来宣告陪审团的全部裁决。检察官在包括22款罪名的起诉书中，指控这些“教父”们用欺诈、谋杀、放高利贷、抽取劳工佣金，以及在纽约市建筑业之中和混凝土业之中进行勒索等方式，主持黑手党“委员会”的业务。陪审团对这些指控全部认定有罪。

当法庭书记从第一名被告“安东尼·萨勒诺”的名字念起时，那位黑人女陪审员声音朗朗地裁决“有罪”。她前后共说了151次“有罪”。

所有裁决宣告完毕之后，欧文法官向全体陪审团员点头致敬，并说：“在这个案子之中，你们才是真正的司法部长。”然后，这十二位不知名的陪审团员静静地离开审讯室，由数十名联邦执法人员陪同，穿过法院地下道，登上

保护严密的旅行车，驶往事先选好的秘密地点，各自解散回家，完成了他们作为法治社会一分子应尽的职责。

审讯室内，三名联邦检察官麦可·柴图夫，约翰·萨瓦瑞斯和吉尔·齐多斯紧紧握手，互相祝贺这一伟大胜利。被告的律师们则声称将对这次判决提出上诉。其中一名律师向欧文法官求情，感恩节和圣诞节接踵而至，他的当事人希望能获准保释，和家人团聚。柴图夫检察官立即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都是重刑事犯，如获保释，有弃保潜逃的危险，并对他人造成威胁。这些人在街头一分钟，就将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

“我完全同意柴图夫检察官的判断。此案将于明年1月6日宣判，宣判之前，全部被告不得保释。”欧文法官斩钉截铁地裁定。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被告席上亮相的各大家族的“教父”吧。安东尼·萨勒诺——吉诺维斯“家族”头目。

安东尼·柯拉洛——洛其斯“家族”老板。

卡明·波希科——科伦坡“家族”老板。

萨瓦多·山多罗——洛其斯“家族”第二号头目。

罗夫·史科波——科伦坡“家族”重要成员。

金纳罗·兰吉拉——科伦坡“家族”第二号头目。

克利斯多夫·富纳力——洛其斯家族的军师。

安东尼·殷德力卡多——波纳诺“家族”重要成员。约翰·盖蒂——甘贝诺“家族”头号人物。

罪名：以威胁、暴力和谋杀手段，管理黑手党“委员会”事务。

刑期：多数被告面临的最高刑期将超过一百年。

面对这样的局势，联邦法官欧文无限感慨，三位年轻的检察官喜形于色：法律对于黑手党终于起作用了。

57年以前，纽约甘贝诺、吉诺维斯、洛其斯、波纳诺和科伦坡五大黑手党“家族”的教父们，在纽约市东鲁克林区的一家饭店组成委员会。从那以后，虽然个别成员时有落网，但从整体上它从未受到任何方面的挑战。想不到，今天这个庞然大物的重要成员，竟被纽约一名黑人家庭妇女代表陪审团宣布为“有罪”。这一石破天惊之举第一次使“委员会”感到恐慌和震动，从来认为官方不敢对黑手党“动真格的”的老百姓也揉一揉半信半疑的眼睛，开始刮目相看了。

美国司法界也对这次审判给予极大的关注：此番“世纪性大审”乃是美国司法当局援用1970年“联邦反欺诈及贿赂组织法案”对黑手党头子组成的“委员会”开的第一刀，效果如何自然非常引人注目。

能够取得这样大的突破，头功归有“司法硬汉”之称的鲁道夫·朱利安尼。这位从前坐在美国司法部第三把交椅上的人物来到纽约后，就开始搜集“委员会”犯罪的铁证。

朱利安尼精心挑选一批训练有素的检察官，展开查证工作。他们首先从纽约的混凝土业下手。这个行业在纽约的建筑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向受到五大家族“委员会”的照顾。如纽约哪家酒店的建筑投资超过200万美元，其中必有黑手党染指，巧取豪夺名为“顾问费”实为“保护费”的大笔金钱。朱利安尼搜集到萨勒诺、柯拉洛、波希科、山多罗、兰吉拉、史科波、富纳力等七人，以“委员会”的名义开设俱乐部，操纵混凝土业建筑合同，而从每一合同中抽取2%佣金的证据，成为起诉的基本依据。柯拉洛和山多罗还

被控在斯坦顿岛经营高利贷，进行大规模的勒索剥夺。而“委员会”利用暴力胁迫牟取暴力的证据，也查获多起。总共罪名达 22 款之多。

真正被控告执行“委员会”下达的谋杀令的，倒只有波纳诺“家族”的安东尼·殷德力卡多。陪审团发现他参与 1979 年波纳诺家族头目卡明·嘉兰德的遇刺事件。

那是一次“家族”内部的篡权阴谋，担任副首领多年的殷德力卡多图谋登上“家族”的最高宝座，伺机很久。他终于策划了一次谋杀。1979 年 10 月，卡明·嘉兰德和两名亲信在布鲁克林一家餐馆吃饭时被击杀于座。事后，联邦调查人员发现，谋杀者作案时用的车子属于殷德力卡多所有。另外的证据是一盘录像带，显示被告在凶杀案发生一个小时后，在黑手党另一总部与“家族”内其他首脑和甘比诺家族的老板密谋，殷德力卡多在会上当场自命为波纳诺“家族”的第一首领。

事实上，录像带和录音带是朱利安尼用来对付黑手党犯罪的有力武器。执法人员经过内线渗透，在被告的车中和他们出入的俱乐部中，装置了电子监视系统，录下了他们的许多密谈内容。检察官在审讯里出示 150 多盘秘密录音带，加上数百张照片及图表说明，可谓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这些材料证明由五大家族组成的委员会的委员们用胁迫、暴力和谋杀的手段来监控全美各地的黑手党“业务”，并且根据需要去制造并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在一节录音中，萨勒诺杀气腾腾地说：“告诉那些该死的东西，我们是来自纽约的委员会，让他清楚，他现在是与谁打交道！”另一盘录音带中，柯拉洛在训斥一批毒贩子：“再也不能逃脱了，你们必须被干掉！”在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出庭作证时都装聋作哑，但这些录音、录像带是最有力的“证词”。柯拉洛与山多罗被指控进行高利贷的罪项，经陪审团裁定有罪，主要的依据也是他们被秘密录下来的谈话内容。

唯一没出现在录音带或录像带中的被告是科伦坡“家族”的波希科。但是检察官们指出，波希科因谋杀罪已被捕多年，他是从牢房中通过亲信来统治其“家族”的。

检察官在寻找有利于控方的证人方面，也大大地露了一手——找到了 85 位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其中包括波希科的外甥克莱多夫。这是前所未有的。

一名建筑商作证指出，黑手党“委员会”总是操纵建筑行业工会，挑唆工人罢工或无理取闹，而且总是赶在完成工期的最后关头。为了维持与工人的和睦及信守合同，建筑商必须没完没了地交钱给黑手党恳求他们“开恩”，让建筑工会绿灯放行。另一位证人出据的谈话记录表明：纽约市凡是总价在 200 万美元以上的建筑工程，黑手党都要分一杯羹；同时，工程投标常常被做手脚，以保证黑手党经营的公司中标。另一位来自克利弗兰的前黑手党头目安吉拉·罗纳多则陈述了他在 20 年代所从事的报复性凶杀行动以及他在 40 年前秘密加入纽约黑手党的情况。

九名被告中，最受人瞩目的自然是五大“家族”的大老板。除了甘贝诺“家族”的头目约翰·盖帝的罪行还没有最后裁定外，其余八名被告均被判有罪，75 岁的吉诺维斯“家族”头目萨勒诺，面临 306 年刑期。洛基斯“家族”头目，绰号“东尼鸭子”的柯拉洛，因放高利贷被定罪，多加 20 年徒刑，面前的刑期足足有 326 年。科伦坡“家族”头目、绰号“狗小子”的波希科也面临 306 年徒刑，在 11 月 17 日的审判中，又因欺诈、勒索和贿赂等罪，被加刑 39 年。

将八名黑手党被告面临的刑期加在一起，总共达 2222 年。事实上，应该不止此数，本案的被告本来还包括波讷诺“家族”的头子菲利普斯·拉斯特利，甘贝诺“家族”前头子保罗·卡斯特拉诺和副头目安利罗·迪拉科斯。结果拉斯特利在此前两周病死，卡斯特拉诺和迪拉科斯两人则在 1985 年 12 月 16 日在曼哈顿一家牛排馆前被枪杀，均不能列案。

1986 年 12 月 19 日八名黑手党被告被定罪之后，为此贸尽心血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发表了声明：“此项判决一举瓦解了黑手党统治委员会，今后打击黑手党犯罪的行动将继续下去。”

美国联邦调查官员威廉·杜南也对报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次世界性大审的结果，对黑手党确有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是造成五大家族的权力真空，使执法人员的渗透活动更容易奏效。”

1987 年 1 月 6 日，“世纪性大审”终于有了最后结果，八名黑手党被告以 2222 年破纪录的漫长刑期被打入铁窗。顿时，纽约在欢呼，华盛顿在欢呼，全美国都在欢呼。

欢呼过后，人们的目光自然而然转到了“五大家族”之首，甘贝诺家族的头号人物约翰·盖蒂身上。

46 岁的盖蒂本是甘贝诺家族的小头目，但此人生性狡诈，心黑手毒，是黑帮之中有名的亡命之徒。他不甘久居人下，拼命向“家族”的权力顶峰爬。但当他当上甘贝诺“家族”管家后，形势也就不再乐观了：在黑手党家族内，超群绝伦的能力并不就是升迁的首要条件，血缘决定“小爬虫”能否最后登上“家族”的宝座。盖蒂虽也是意大利后裔，但与甘贝诺家族重要成员却无任何血缘关系。难道当一辈子唯命是从的管家吗？盖蒂可不是那样的窝囊废！在征服了家族内大多数喽罗之后，盖蒂决定枪口见红了。

1985 年 12 月的一个寒夜，甘贝诺家族的总头子卡斯特拉诺在一家餐厅酒足饭饱后，与保镖欣然走到停放在门外的超豪华“林肯——大陆”牌防弹轿车前。还没扯开车门，一梭子机关枪子弹就把这位“大老板”穿得满身窟窿。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这次谋杀与盖蒂有关，但他却一步就登上了帮主宝座。从此，就有这样一种说法：“纽约市白天的市长是郭德华，但晚间是盖蒂。”

盖蒂表面上是笑面虎，背地里却被同伙称为“冷面动物”，又被咒骂为“恶棍之中的恶棍”。他的罪行，桩桩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次，他 12 岁的小儿子骑自行车被邻居的汽车擦一下，受了一点皮肉之伤。可三个月后，那位邻居却失踪了。一天，纽约警察在落潮后的河滩上发现一辆汽车，走近一看里面用满满的混凝土“塑”了一个人，经辨认，死者正是盖蒂的邻居。

盖蒂这次在朱利安尼组织的行动中落网后，立即花钱聘请了庞大的律师辩护团，首席律师的报酬在 50 万美元以上；他不愿在牢房中度过下半辈子生涯。这群律师也果然身手不凡，在长达三个月的审讯中滔滔不绝，舌翻莲花，最后居然使得录音带中的记录成了孤证，几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证人与前面的证词自相矛盾。将近两万页的证词转眼间成了废纸。于是当另外八名黑手党被告被判千年徒刑时，这位身着华贵西装、手上戴满钻戒的“大鱼”却开怀大笑起来，他被宣布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使朱利安尼极其生气。

不论如何，这次审判使美国黑手党损失严重，也鼓舞了人们反对黑手党的斗志。

黑手党自从它开始以组织活动开始它的罪恶勾当时，也像其它帮会那样

有铁的纪律和行为规则。因而在世界反黑手党运动之中，绝大部分警方抓获的只是那些执行他们主子命令的刑事犯罪分子，而他们早就抱有以死相碰的信念。他们明白，完成这次任务后，或许自己也会被干掉杀人灭口，但已加入这个组织，即使自己逃到海角天涯也难逃出他们的黑手。

现在我们看看他们早期的规章制度。

(1) 必须不惜流血地相互帮助，共同报复敢于冒犯者。

(2) 必须想方设法营救落入司法部门手中的战友。

(3) 每个成员都有权参与分配，依头领慎重考虑分配共同进行的敲诈、抢劫、偷盗及其它活动所得的财物。

(4) 必须保守机密，违者处以死刑，由有关黑手党司法机构判决。

这些只是黑手党人早期时规定的本组织内人员活动的基本原则。不论哪派黑手党，最后一条——保守本组织秘密则是他们的最严格的条件。如果哪个黑手党徒敢向警方投降而供出他的同伙，那就意味着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他的后半生，因为没有比这里更加安全的地方了。

至于守口如瓶则是整个西西里人的法则。人们都赞扬沉默不语者，蔑视饶舌多嘴者。

对于黑手党人来说，走私不是什么新业务活动，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定居美国的和留在西西里的黑手党人保持着联系，也进行了香烟走私活动。就连极端专制的法西斯势力都未能有效地禁止这项地下活动。

战后，许多黑手党人重返故里，不仅扩大了走私的数量，而且增加了走私的品种，除了烟草，又加上了毒品。最先经营这项新生意的发起人之一就是卢恰诺。还是 30 年代时，他就最先将淫业和海洛因消费结合并举。由于他能向美国军队提供毒品，美国警察居然也将他释放出狱并允许他迁回意大利。卢恰诺衣锦还乡，在黑手党界开始传播“我们的事业”的美国新模式。人们观念“更新”，纷纷实行起黑手党的“现代化”来。

一个叫米凯莱的人说：“听卢恰诺讲，老牌马菲亚只是搞搞水源控制、蔬菜水果市场控制、绑票勒索之类任务，没有能力进行复杂棘手的贩毒之类活动。要完成这类任务，需要思想灵活、行动果敢、能力过人，战后新起来的年轻人是在非法活动和政治斗争的混乱环境中成长的，只会动手枪和炸药，尤其缺乏组织纪律，无法形成团结一体的家族，也实在不配受尊重。”

卢恰诺回国之后没有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落脚，而是在那不勒斯附近安家，成了卡莫拉与马菲亚之间的联系人，使黑手党人的事业向着国际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当今，卡莫拉对于非法商品的国内外运输和推销零售是极有用处的，这是使黑手党发生根本转变的一步；虽然过去采取的暴力恐怖手段不合法，但他们的地位表面上是合法的。他们的生意也是基本合法的。随着毒品的打进流通领域，他们的活动就完全违法了。毒品的进口销售是禁止的，医疗之外的使用也是禁止的。这就是说，插手毒品贩运就必须从始至终进行地下活动，因而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因为与他们作对的不仅有警察和其他国家机构，而且还有那些想多占独吞的合伙人——承运人、中间人等等。

走私活动是在 1973 年左右才进入昌盛阶段的。当时的黑手党人将原来独立经营的大走私贩拉入帮伙，使这些人也成为“受尊敬的人”。

巴塞塔说：“那时最大的走私贩是巴勒莫的斯帕达洛，拉·马蒂纳，还有那不勒斯的扎扎。后来斯帕达入了卡洛帮，马蒂纳入了邦塔特帮，扎扎则跟了博诺。”这些人的加入使黑手党的走私活动迅速发展。

“邦塔特嘲笑扎扎每次卸货时都要弄几箱烟自己用，却不懂得先孝敬巴勒莫的头头。”

那不勒斯刑警队从 1977 年 2 月就开始注意扎扎等人的活动，记载了一系列事件：

1) 1977 年 2 月 28 日，在那不勒斯费尔迪南多餐厅召开了会议，出席人有：斯帕达洛，费拉拉，扎扎，马扎雷拉，米拉诺，埃内亚，马蒂纳，博诺和加斯帕莱。到会者除加斯帕莱外都被当场逮捕。

2) 1977 年 9 月 9 日，在那不勒斯一家马戏场里发现墨西哥的菲利普、布鲁斯卡和扎扎接头。

3) 1977 年 10 月 27 日，在那不勒斯一处住宅里有卡塞塔、斯卡沃内和萨沃卡等人值得怀疑。

4) 那不勒斯凶杀侦缉队上校普索对保释监外“温泉治疗”的菲丹扎蒂、加埃塔进行监视。该犯先找到著名的卡莫拉分子戴·高迪奥，又在扎扎家落脚。但警察去搜查时，家中只有扎扎的亲属。

5) 1978 年 6 月 13 日，刑警队对扎扎、巴尔巴罗萨、米拉诺和埃内亚实施电话监听。

刑警队还发现那不勒斯市多次凶杀和鸣枪事件均出自上述两地烟草走私“联盟”之手。结论是：本地区的烟草走私和毒品贩运活动直接与格雷科、巴达拉门蒂和邦塔特等黑手党帮派有关。

70 年代末，黑手党人对烟草走私已经不感兴趣，将注意力转向更能获取暴利的贩毒生意。据 70 年代末意大利和美国警方的观察，欧洲毒品运输的 60% 和世界走私的 1/3 是由西西里和住美国的西西里家族控制的。诸如以色列、古巴、伊朗、爱尔兰等地的走私贩们均被西西里人排挤掉了。

1977 年接过迪·马焦的权力的萨尔瓦托莱·因泽里洛年仅 35 岁。他作为走私活动的总头目使用了现代化管理手段：用电传进行通讯，用支票进行支付（要知道原来的马菲奥索都是提着装满钞票的箱子四处奔走），以数十家合法企业掩护贩毒等非法活动。除了贩毒，他们还进行多种经营：购买上百顷土地，盖饭店开旅馆，在美国亚特兰大设游艺场和赌场，还通过他们的忠实朋友托马索·巴塞塔在南美大肆进行土地和建筑投机。

巴塞塔自己对警方坦白说：“我从 1980 年 6 月回到巴勒莫时就发现‘我们的事业’的所有成员都参与了贩毒，或多或少在经济上占了便宜。邦塔特说贩毒的结果使大家都发了财，但也可能会毁掉我们的事业。他说是 1978 年左右开始不再从事烟草走私活动的，因为一方面是风险越来越大了，另一方面是为此引起内部纠纷会耽误我们的大事。马蒂纳在走私烟草时就接触了海洛因原料生产基地，他认为可以贩毒，而且说服了‘我们的事业’里最有权威的几个头目。

“在一定时期内专门由斯帕达洛·马蒂纳和萨沃卡承办原料购进。他们各行其是，彼此保密。其他人只是为购买海洛因投资，并参加加工提炼。这时候谁也顾不上去分什么家庭帮派了，愿意怎么搭档就怎么搭档。我是唯一没有插手此事的‘受尊敬的人’，因为我总认为它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一大危险，再加上我的监外生活也只能使我袖手旁观。邦塔特也说他自己没有沾边，但我怀疑这话是否属实。每个‘受尊敬的人’都应该讲实话，但这只针对属于‘我们的事业’的事情，而生意是个人自愿结合的，与‘事业’无关。当然，在合伙人之间仍必须坚持讲实话的原则。卡洛撤了斯帕达洛的副

首领之职，就是因为他在走私时不能正确对待其他‘受尊敬的人’，甚至包括卡洛本人。相反，如果欺骗不属于‘事业’的人，绝不会有任何‘受尊敬的人’找麻烦。还有一种人没参与贩毒，不是他们不想干，而是因为他们还被‘挂起来’无法与任何其他‘受尊敬的人’接触。但这种表面上的不参与是否属实呢？如果他在暗中插手，只能说明钱已经腐蚀了一切。‘挂起来’的人绝不允许参加活动，这是‘事业’的规矩！

“由于贩毒，不少非‘事业’分子也参与活动，造成了人员上的混乱。总之，我回到巴勒莫的最深感受是‘事业’中一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一面是家庭之间和‘受尊敬的人’之间关系严重混乱。这使我马上意识到我们的事业最初的原则已经荡然无存，到了日暮途穷之际。我也无需再忠于这个我儿时就相信的组织了。

“谈到毒品贩运，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安东尼奥·罗托洛。他负责筹办购买供岛上加工的吗啡。至于将西西里加工生产的海洛因向美国出口，当地最大的买主之一是皮波·博诺，但他不负责从西西里到美国的运输。过去博诺是在欧洲向我认识的孔特雷拉和卡鲁珂纳交货的。后来他变成美国的第一个西西里海洛因的收货人。

“巴勒莫所有家族都卷入贩毒生意，家族首领们决定自己的成员如何参与。一般总是靠首领近的人被认为有用，因而分得的利润也高些。而那些年纪大或能力差些的人则很少介入，或干脆被排斥在外。

“每个参加投资的人可以自己选择一种方法：要么从海洛因加工提炼处直接提货自己设法出售，要么筹货运往美国或别处出售后再收取本与息。第二种方法可以提高收益，但风险很大，往往在运输途中货物就被海关没收了。”

1981年11月10日，在巴黎奥利机场，一个叫弗朗切斯克·加斯帕里尼的人因携带4公斤半纯海洛因而被捕。他来自曼谷，飞往自己居住的罗马。在他身上，法国警察搜出了一个化名帕·皮埃尔·路易吉的伪身份证，一个化名齐切罗尼·艾内斯托的假护照，上面的签证表明他9月15日到30日曾去过曼谷。

加犯在法国警方面前信口胡诌不讲实话，直到意大利警察找到他的女友米莱拉才弄清真相。加犯在巴勒莫曾因一起诈骗案被捕，因查无实据后被释放。在狱中，他结识了黑手党分子，出狱后仍与那些人保持联系。他认识的人中就有巴塞塔，他还找了一位塑料外科专家为加某做了一副假面具。还有一个叫奥泰罗，他收买了几个警察，使加犯不在意大利期间能由他去定期代签临时保释者必需的签名。

在加犯的工作地点——罗马汽车俱乐部的记录和照片中查明，他与被通缉的巴勒莫黑手党分子加斯帕莱·穆托洛有来往。在加犯的笔记本中，还找到一张发自泰国的明信片，署名为“金”。

经进一步调查得知，加犯在泰拉莫市半自由居住时，穆托洛为他在豪华的“米凯朗杰罗大饭店”租了一间房，同一旅馆中还住着专程从巴勒莫赶来的穆托洛的侄子戴·卡尔洛和卡塔尼亚人利奥塔·萨尔瓦托莱。加犯在巴黎被捕时身上还带有这家旅馆的电话号码。他在这家旅馆的房间里曾多次打国际长途电话，接话的有澳大利亚、巴西、委内瑞拉和加拿大人。

1982年2月2日，穆托洛得到监视他的警察批准，准备会巴勒莫。不料当天却在卡塔尼亚被警察逮捕，当时与他同乘一车的有多梅尼克·孔多雷利，

库希马诺·乔万尼和佩多内·米凯朗杰罗。这几人都是受鲁方监视的人。穆托洛声称与这些人是偶然相遇，并不认识孔多雷利。但警方在孔多雷利家找到了穆托洛的侄子卡尔洛，对此他无言以对。

在搜查孔多雷利的台球厅时，反毒品警犬表现得焦躁不安，但未能查获什么。

在搜查穆托洛的巴勒莫市内住宅时，警察找到了一张 1982 年 2 月 27 日由中国寄出的明信片，通知“金将近日抵曼谷”；加斯帕里尼母亲的来信中，请穆托洛帮助解决仍扣押在法国的儿子的财政困难；还有许多卡特尼亚市正被迫捕的黑手党人的来信，这些信中表现出对他的深情厚谊和无比尊重。

从 1980 年 4 月 28 日，警方开始监听穆托洛使用的电话。监听中，发现他与卡特尼亚那些人通话频繁，关系密切。他与孔多雷利讲话时不仅表现出极深的交情，而且还动用了贩运毒品的暗语。孔多雷利为穆托洛的弟弟乔万尼在卡特尼亚找一处住所，让他躲起来避嫌。警方还从电话之中得知孔多雷利的两个朋友将到巴勒莫市见穆托洛，穆要给他们什么东西。果然穆托洛极为谨慎地在一个加油站接待了两个人并陪他们回家去。在这两个人返回卡特尼亚途中，警方有意识检查车辆，发现他们都是“圣保拉”家族成员。

也从那时起，警方开始对孔多雷利、萨尔瓦托莱和朱塞佩等人进行电话监听，并且获得大量证据。他们均属“圣保拉”组织。在萨尔瓦托莱家窝藏着该组织的“支柱”卡尔莱托，他是黑社会内部寻杀的对象，连孔多雷利本人也怕被对方杀掉。

在监听中，警方还发现有一个操着东方口音的外国人与他联系贩运问题，穆托洛的侄子卡尔洛去罗马与那个外国人接洽。卡尔洛到罗马后就去加斯帕里尼前妻安娜家见那个外国人。

在掌握了一系列证据之后，警方逮捕了穆托洛、卡尔洛、安娜、孔多雷利及卡特尼亚等黑社会分子，并将加斯帕里尼引渡回意大利。所有被捕者，除了加犯，一致咬定是无辜者，但又无法对警方拿出的证据作出解释，穆托洛则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神经失常。

1982 年 10 月 21 日，警察在罗马机场逮捕了阿贝南特·米凯莱，从他皮箱里和小腿上发现绑附有纯海洛因共重 9.5 公斤。阿贝南特手上的机票表明他是刚刚完成罗马——曼谷——哥本哈根——罗马的旅行。他身上还有已经挂失了的一个护照。据查，他还在 1982 年 4 月 10 日至 19 日和 7 月 24 日至 31 日两次去泰国，这次是 10 月 13 日动身去泰国，随行的还有一个穆托洛家的常客杰里诺。

由于黑手党的组织严密，它的许多详情很难掌握。更由于它的内部的许多规章制度，而很少有黑手党分子与警方合作。但是警方仍是努力调查，打消被捕黑手党分子的顾虑而让他们说出详情。

1982 年 9 月 3 日晚 21 时左右，巴勒莫市警察局行动中心得到了卡里尼路有人开枪射击的消息，警方立即出动飞奔现场。人们目瞪口呆，目睹了这样一个场面：在卡里尼路与利卡索里路的交叉口处不远，一辆车牌号为 ROMA J97252 的 A112 型小轿车停在人行道上，车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车上有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的人——这就是巴勒莫市的省督卡尔洛·阿贝尔托·达拉·基耶萨将军和他年轻的妻子玛努拉·塞提·卡拉洛。在现场，人们找到了 23 颗卡拉什尼科夫机关枪子弹壳和一颗尚未炸开的子弹。

达拉·基耶萨将军之死激怒了意大利全国人民，举国上下要求严惩凶手

的呼声甚高。公安司法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了空前未有的大调查、大搜捕，终于在 1986 年 2 月 10 日开庭审判 475 名黑手党罪犯，判决书长达 8607 页，分为 22 卷。这次审判是投向黑手党的一颗重型炸弹。

这次“反击战”的成功因素之一是一些黑手党分子反戈一击。靠他们提供的线索，警方得以顺藤摸瓜，不断扩大战果。

第一个主动和国家合作的是莱奥纳多·维塔莱。他于 1972 年 8 月中旬因怀疑是抢劫犯同谋而被捕，9 月 30 日因证据不足而获释。1973 年 3 月 30 日，他主动找巴勒莫巡逻队自首，交待了自己所知道和做过的事情。

维塔莱是在 1960 年 10 月因按照叔叔的指令杀掉了马尼诺·温琴佐而被吸收加入阿塔莱洛家族的，为了担任巴勒莫西西里路建筑工地的警卫，他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偷盗并焚烧小汽车三辆，以此威逼当地灌溉水联合公司的首脑每月付他 4 万里拉“保护费”；与皮波·卡洛、安德莱阿和斯科利马合作，给马尔凯塞和瓦伦扎写威胁信；按照洛托罗·安东尼诺转达的莫蒂希的指示，在安娜诊所里投放了一颗炸弹；按照卡洛指示烧了焦尔达诺公司工地上堆放的木材；参与勒索布鲁斯卡司活动，使该公司在洛托罗和菲乌拉剪断和浆机电线后答应付给他们 300 万里拉；在安·塞米拉公司土地上破坏一台吊车并剪断电路上的一段电线；参与勒索普乔·库希马诺公司，该公司向卡洛每月付 10 万里拉；参与威逼西西里路上的制鞋厂，硬把因泽里洛的妻弟塞去当门卫；参与敲诈格拉夏塔饭店老板，使卡洛从中获利 200 万里拉。

维塔莱说，家族内一个叫波洛尼亚·朱塞佩的曾想向乔万巴蒂斯塔打听消息，后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还指控乔为奸细并动手打了乔。由于他这种做法违反了“我们的事业”的“荣誉法典”，他在 1969 年 3 月 12 日被维塔莱处决了。

维塔莱还交待了新门家族中的弗朗切斯克在卡洛表兄家族实力人物弗朗克·斯科利马的姐姐的商店里进行偷盗，为了报复新门家族这一行径，卡洛下令杀掉了迪·马尔科·彼得罗，因为他是该家族中最心狠手辣的人物。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洛托罗，因为他是斯科利马和迪·马尔科两家冲突的局外人，不易被猜疑。

维塔莱还谈到 1971 年 10 月 17 日巴勒莫市特拉伊纳·温琴佐被杀事件。那是弗朗克·斯科利马与另外三个人干的。起初他们只想绑架这位有名的建筑业人士，以此敲诈他家一下，不料特拉伊纳居然能在受伤后逃跑。斯科利马在追击时连放数枪打死了他。

维塔莱还谈了家族之间的纠纷等事，他的话在 10 年后得到了证实。而他指出的“受尊敬的人”无一差错，但是，他的揭发被低估轻视了，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疯子胡说。他 1984 年 6 月获释，12 月 2 日在星期日弥撒回家途中被人开枪打死。

第二个主动交待的是朱塞佩·迪·克利斯蒂纳，他是列希家族的代表，是斯特凡诺·邦塔特的好友，属于“我们的事业”中的一流人物。在 1962 至 1963 年“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时期，各家族之间互不理睬，“事业”瘫痪了若干年后，他参与了重建组织，并首先让手下的屠夫卡鲁索·达米亚诺在 1969 年 12 月除掉了“造成黑手党战争的两面派、叛徒——米凯莱·卡瓦塔耀。

70 年代后期，卡莱奥尼家族与他这一派结下冤仇，开始先消灭他们几个主要助手，再铲除邦塔特本人。克利斯蒂纳感到了威胁，主动通过列希车站

的宪兵迪·萨尔沃与连长阿尔菲奥·佩蒂纳托取得联系，并约定在1978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克利斯蒂纳兄弟安东尼奥的乡间农舍里会晤。会见时只有连长和他本人在室内，萨尔沃和安东尼奥均在房外。尽管克利斯蒂纳极力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慌心情，但仍给连长留下了“如惊弓之鸟”的印象。他讲了许多情况。

(1)正在教养院中监禁的卢恰诺·利焦将在近期越狱。准备工作已就绪，只待时机一到就要实施计划了。

(2)切萨莱·泰拉诺瓦议员将使利焦派在当地黑手党内占据优势地位。因为利焦指使里纳和普罗文扎诺绑架并暗杀了少校鲁索，造成一些喽罗被指控受审。

(3)1977年9月在巴勒莫召开的第22次会议上，克利斯蒂纳和另一位“医生”曾谴责利焦派暗杀军官阿尔马这一行动计划欠妥。当年11月21日早晨，在利焦手下执行暗杀时，因某种巧合造成阿尔马本人未被击中。

(4)卢恰诺·利焦是那不勒斯到卡塞尔塔之间的大农庄主。他的庄园从事水果生产加工，但也有一个大毒品库。庄园挂名的是个女人，其实由努沃莱塔兄弟经营。

(5)利焦有一支14人的雇佣分队。他们全副武装，分别在罗马、那不勒斯和其他城市从事铲除敌对力量的活动。

(6)利焦在西西里最主要的基础力量是贝尔纳多、布鲁斯卡。只要谁对布鲁斯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就能酿成正面冲突。

(7)克利斯蒂纳在对方也安插有亲信。

(8)利焦让人杀了律师斯卡廖内，因为他对利焦的对立面巴达拉门蒂兄弟有利。

(9)里纳·萨尔瓦托莱和贝尔纳多、普罗文扎诺是利焦派中最危险的人物，是以凶狠著称的野兽。他们至少参与了40起凶杀案，警察局副局长普利奇就是他们杀害的。

(10)科莱奥是利焦一伙人绑架的，目的是检验一下内部温和派的力量。执行绑架时有两个罗马人。

(11)利焦早已成为百万富翁，他手上的一个戒指就值八九千万里拉。每次在卡拉布里亚发生抢劫绑架案后他都能分得一大笔钱。

克利斯蒂纳本人于1978年5月30日被杀，他的死验证了他生前揭示的一系列情况。

1984年7月，从巴西引渡回国的托马索·巴塞塔向警方交待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从事黑手党活动数十载，也曾经显赫一时，快到花甲之年却落得势孤力单，走投无路。黑手党内的对立派已经杀掉了他的许多同伙，他自己性命危在旦夕，这使他不得不选择唯一一条生路，向国家投诚。

我们从巴塞塔那里得知黑手党后期的组织机构。

继巴塞塔之后，又一个与警方合作的“受尊敬的人”是萨尔瓦托莱·孔特尔诺。在他爱戴的主子邦塔特被杀之后，他本人在几个月内屡遭暗算，他身边的亲戚朋友数人身亡，他决心去罗马杀掉米塞佩·卡洛，报仇雪恨，拼一死活。就在罗马，他被捕了(1982年3月)。他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仿效他敬重钦佩的巴塞塔。他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事业”作恶多端，内战不休，已到日暮途穷之地，他再遵守秘密禁规，只能是在沉默中被敌对势力消灭。

孔特尔诺的许多交待与巴塞塔所言相吻合。由于他一直作为邦塔特的贴身保镖，比长年在国外的巴塞塔更加熟悉近年来“事业”内的情况。他说巴塞塔讲的组织结构已经是名存实亡，各家族之间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争霸格斗已经到了混乱不堪无法控制的程度。

第五个与警方合作的是马尔萨拉·温琴佐。他是维卡里家族首领马尔萨拉·马利亚诺的儿子，其父死于黑手党内战。他意识到当年杀富济贫的马菲亚早已变成盗贼加杀人犯的匪帮，决定与国家司法部门合作。

他谈到了季吉诺·皮祖特。皮祖特是邦塔特的好朋友，是维卡里家族所在区的“区长”，他在巴勒莫买下了邦塔特副手泰莱希公司建筑的一套房子。1981年9月29日，当他在圣乔万尼一杰米尼（阿格里莫托与巴勒莫交界处的一个小镇）的一个酒吧间跟两位同乡打扑克时被人乱枪打死，连那两位牌友也未能幸免。他死后，当地市政府发了讣告，并花钱为他办理了丧事。同年4月初，马尔萨拉参加了父亲乡下一处房子里召开的会议，他们在栅栏门外恭迎了里纳和杰拉齐。到会的还有皮祖特，以及其他一些家族代表。那次会是该区“委员会”会议，参加者除了他外均为家族首领。皮祖特被杀，使邦塔特派少了一名主要合伙人，而科莱奥内派则更显得势力强大了。

黑手党内战在80年代初愈演愈烈，巴勒莫市70年代每年死于凶杀者为40至50人，1979年57人，1980年54人，1981年则翻了一番，达到101人，1982年则达到151人。

总之，事情都在变化中，再也没有旧日那样一位众望所归的头目，黑手党从事的资本经营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相互竞争。

另一方面，反对黑手党的杰出的人物和勇敢战士的流血牺牲，极大地唤起了各界人士的义愤。达拉·基耶萨将军之死非但没能使黑手党吓退国家机构，反而促使政府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大反攻。政府和参众两院所作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共同要求委派一名高级特派员统管一切反对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斗争。一条反对黑手党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措施正在制订。

在将军遇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未受怀疑的“劳动骑士”和企业家们受到了调查，十几家西西里金融机构的账户被冻结，警察从“投诚”的人口中得到更多的线索。

就连教会方面对此也十分关注。早在省督遇难之前，巴勒莫的主教帕帕拉尔多就曾向警察局提供帮助，之后又强烈谴责意大利政府机构表现得软弱无能；那不勒斯的阿切拉主教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许多教士禁止为黑手党人和卡莫拉分子举行隆重葬礼，说他们是违反“基督”的社会成员。教会与50年代那种充当黑手党“邮差”和70年代扮演黑手党神父的过去彻底决裂。这一果断态度使得政界多数人认为再继续与黑手党为伍者非但危机四伏，而将不得善终。

黑手党人未被吓倒。他们通过卡拉什尼科夫机枪在吼叫，通过“梯恩梯”烈性炸药在反扑，力图保住他们国际范围内的利益和权势。

以上我们从黑手党的深层中看出了他们的活动的规律，而事实上，这些斗争都在社会上层内部进行，人们很难看到他们相斗的真相。因为这些黑手党人都有合法的生意和受人重视的身份。他们行迹秘密，连官方情报部门也一时难以找到他们的栖身之地。

但是人们看到的却是最直观的刑事犯罪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活生生的

材料，使他们直接感受到黑手党的凶恶。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黑手党的毒菌在世界各地蔓延，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正在密切注视它的动向，同时由于黑手党和国际恐怖组织联手，而使他们的实力大增。

1986年春天，意大利巴勒莫巡回法院对475名黑手党头目和骨干分子进行了大审判，沉重地打击了黑手党，舆论将这次审判称为“世纪大审判”。人们对割除黑手党这个毒瘤燃起希望。然而，黑手党未蛰伏多久又猖獗起来。在1992年5月至7月的两个月时间里，黑手党在其老巢——西西里巴勒莫市连续作案，先后杀害了被誉为反黑手党“旗帜”的著名法官乔万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以及数十名无辜者。黑手党的杀人行径迫使意大利政府及有关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严厉行动。1992年8月上旬，意大利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的《反黑手党法案》；成立了“反黑手党调查局”；授予反黑手党人员和宪兵、警察在侦破调查方面更大的权力，其中包括电话窃听和银行账户调查等等。此外，意大利内政部、国防部和宪兵司令部联合向西西里增派7000名军人，调换军事安全情报局和国内安全情报局局长以及巴勒莫市警察局长、省督和法院院长，将二百多名影响很大的黑手党头目和骨干分子从巴勒莫市区监狱转移到撒丁岛的“安全地带”等等。

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虽然使黑手党的杀人越货行为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完全停止。据有关方面统计，从7月到10月的4个月时间里，意大利南方的普利亚、巴西利卡塔、坎帕尼亚和西西里四个大区共有114人惨遭黑手党杀害。人们不禁要问，黑手党何以如此猖獗？又缘何屡禁不绝？这里，既有黑手党内部的、更有外部的因素。

从内部来说，黑手党的权力结构异常严密，纪律森严，使得它得以顽强生存。据意大利司法当局和宪、警部门的分析，黑手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内部势力最强的派系首脑们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下设“议会”，“议会”的下级为“家庭”。每个“家庭”内部均有一个主要头目，称“大当家”，骨干成员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在“家庭”内部，还有“二当家”、“副主管”和“小队长”等，黑手党内部有被称作“七戒”的帮规：一、守口如瓶；二、组织高于个人；三、不得违抗上司命令；四、不得叛变自首；五、对家人保密；六、不得擅自搞绑架活动；七、兄弟之间严禁斗殴。

意大利前内政部长文琴佐·斯科蒂在向议会呈送的一份文件中称，到1991年3月份，意大利境内的黑手党已发展到近500个派系组织。它们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四个大区，其中仅西西里一地就有186个，占总数的2/5左右；在卡拉希里亚有142个；在坎帕尼亚和普里亚分别为106个和30个，其余的则落脚于中部和北部地区。这些派系之中，黑手党大小头目和重要骨干分子有近1.7万名，为其效力者不下十万人，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地下黑社会势力。斯科蒂的报告还称，国家对上述四个大区已经失去控制。他要求对这些大区迅速采取紧急措施，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前总统科西加则公开指出，那里（上述四个地区）正在进行战争，黑手党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在向正义发难和挑战，“有人说，他们在相互残杀，不，他们在扼杀国家，扼杀世界。”

从外部因素看，法网疏漏，使黑手党有隙可乘。根据意大利现行法律条文，除特殊情况外，对罪犯一般都得进行一审、二审和全国最高法院审核后方能定罪。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只要有一环要求重新增罪或减罪，已作的审讯就必须全盘推倒，从头再审。经过二审之后，即使罪犯认罪，但只要全国

最高法院的最后审核裁定还未正式下达，罪犯在被监禁八年后便可出狱，或软禁在家，或改为管制，直至最后判决。

按照这一规定，意大利现有的两万多名黑手党头目、骨干分子和帮凶都可出狱在家。由此看来，许多黑手党分子之所以一再作案犯科，同意大利现行法律的漏洞不无关系。因此，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强烈要求修改现行法律，严惩黑手党犯罪团伙及其成员，很多人甚至提出了“意大利应当恢复死刑”的要求。然而，上述要求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当权者们足够的重视。直到法尔科内和博尔塞利诺法官先后遇害后，有关方面才开始对现行法律进行有限修改。

黑手党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均拥有各式各样的后台，形成了一张保护网。在这些后台中，不乏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司法机关和海关工作人员、律师、豪商巨贾、宪兵警察头目等等。黑手党同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独特的默契。凭借着这种联系和默契，黑手党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有人说：“在今日意大利，难得有一件事不同黑手党有瓜葛。”此言虽有些夸张，但它的确反应了当今黑手党已深深地渗透至意大利全国各个角落、各个领域。在黑手党的各种渗透中，尤以向各级权力机构的渗透为最。因为黑手党深明“朝中有人好办事”这一处世哲学。

1991年5月，意大利最高反黑手党专员多梅尼科·西卡在内政部举行的一次报告会上透露，在意大利全国12.4万名地方行政官员中，有1.86万人即约15%的人应受到审判和法律制裁，因为他们都与黑手党有染。据意大利全国反黑手党委员会公布的一项调查，1990年，意大利全国共有21个市镇的政权机关因黑手党渗透严重而被勒令解散。卡拉布里亚大区的陶里亚诺是一个小城镇，在全镇18名天民党市镇议员组成的政权机关中，就有五人同该镇原黑手党的头目米诺·焦维纳佐有密切关系。

正值盛年（48岁）的西西里法官多梅尼科·西尼奥里诺不久前在其卧室开枪自杀一案便是黑手党在司法界渗透的缩影。西尼奥里诺原是巴勒莫市的著名法官，1986年初对黑手党头目进行“世纪大审判”时，他曾是法官之一。1988年1月，他同其它三名法官共同签署了三百多份逮捕令，沉重地打击了黑手党。因此他一直被善良的人们视为反黑手党的斗士。然而，1992年11月间，西西里黑手党一号头目里纳原来的司机加斯帕雷·穆托洛交代道，西尼奥里诺法官同黑手党关系密切。在1981年的一次对黑手党的大搜捕之中，他曾收受贿赂，向几名被捕的黑手党分子提供方便，开了绿灯，他用这些脏款买了一所住宅，后来风声走漏，西尼奥里诺受到了审查。不知是受到良知的谴责或是什么原因，西尼奥里诺最终选择了自绝的道路。1992年12月3日，他开枪自尽了。

黑手党与政坛人的勾结是因为互有需要。官员们需要黑手党的大笔金钱和在选举中的支持；黑手党分子则需要从官员那里得到各种不法经济活动上的方便，而且还需要暗中得到保护。在押的黑手党头目之一奥纳尔多·梅西纳直言不讳地说，黑手党分子拉拢政界、司法界和经济界人士以便自由地从事各种经济交易，同时为他们开脱罪行（包括撤销判决和减刑）和制定有利于黑手党的法律等。共同的利害关系将他们紧紧地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法的网络”。这个网络成了黑手党的“保护伞”，同时也是黑手党繁殖的“肥沃土壤”，巴勒莫黑手党的一名教父在他的一份自述中这样说道：“我说不清有多少政客直接受雇于黑手党的确切数字，但绝不是个小数目……”他还

说，在一般情况下，黑手党备有两手：一手用金钱收买，另一手杀人要挟，但通常以金钱收买为主。用金钱收买这一着失灵后，他们才大开杀戒。

值得指出的是，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黑手党眼下正在进行重大改组，将更注意提拔年轻人，起用“新面孔”。这不仅可保证黑手党后继有人，而且将使黑手党更具有隐蔽性和挑战性。据黑手党人交代，目前黑手党不仅牢牢地控制了意大利南方四个大区，而且已将触角伸到了中部和西部。黑手党的最终目标是要使包括西西里在内的南方独立于意大利。与此同时，黑手党已建立了国际领导机构，从1991年11月起，黑手党的西西里跨省领导委员会也已成为领导全球范围内黑手党组织的最高代表机关。

黑手党的暴力作法导致世界各国反恐怖活动的大力工作。

受到国际暴力冲击的各国政府日益把对付恐怖主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不少国家新上台的政党和领导人都把解决国际恐怖主义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恐怖活动成为各国政府志在必除的心腹之患。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一支支令恐怖分子闻风丧胆的特种部队建立起来了，一项项打击黑手党恐怖活动的法令和政策措施开始执行了，这些都有效地遏制了恐怖主义无限上升的势头。

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开始谋求国际性的合作，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制定了一系列的双边和多边协议，颁布了不少反恐怖活动的国际公约。各国情报部门和反黑手党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一张围剿黑手党的巨大罗网正在世界范围铺开。

一、各国政府对付黑手党及其它恐怖活动的主要手段

(一) 组建强有力的反黑手党恐怖部队

当暴力事件发生时，对策只有两条：一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二是用武力制服黑手党徒。前者往往以政府委屈求全、作出让步而告终，这正中黑手党徒的下怀，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导致新的一连串恐怖活动的再发生。第二种方法虽有极大的冒险性，有时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它毕竟是杜绝暴力活动的有效方法。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会令黑手党恐怖分子产生泰山压顶般的心理障碍，因此，在他们挺而走险之前，不得不考虑一下后果。同时，政府的坚决不让步，实际上堵住了黑手党徒讨价还价的可能性。据美国兰德公司的调查报告，在对暴力活动采取果断措施的国家里，恐怖活动正在减少。

“以暴制暴”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这样，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具有极强战斗力、杀伤力的反恐怖队伍，就成为各国政府对付黑手党及其暴力活动的主要手段。现在，恐怖活动越来越频繁，恐怖手段越来越高超，这就对反恐怖队伍的素质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此，很多国家政府相继建立了专门用来对付恐怖活动的特种部队。

下面，我们介绍一些国家反黑手党及其恐怖部队的情况。

1. 联邦德国

前西德社会动荡，军国主义复苏，法西斯阴影又重新笼上了人们的心头，这里也被黑手党入侵，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1972年九月在慕尼黑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绑架事件。那是在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巴勒斯坦“黑九月”突击队的成员在黑手党徒的帮助下扣押了以色列的运动员。

两天后，警察营救人质失败，共有11名运动员遇难。

消息传来，国人纷纷指责警方无能，联邦德国政府在世界公众面前也为此感到汗颜。

二十天后，联邦德国内政部发表公告，宣布组编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简称GSG9）。同时各州也组建了“机动和特种大队”（简称MEKS和SEKS）。边防警察第九大队专门对付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集团，而地方大队则用来监视、缉捕单个恐怖分子。在恐怖分子杀气腾腾的攻势下，联邦德国的反恐怖部队就这样诞生了。

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在由大队长统一指挥的司令部下面，设有一个顾问组、六个中队和一个直升飞机联队。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中队的任务是指挥运输和特种作战，第四中队负责训练，通讯侦察中队负责通讯和情报，技术中队由爆炸、潜水、文献资料等专家组成。此外，还有后勤保障单位。

第九大队的实力体现者是三个特种作战中队，每个中队由30名队员组成。中队内部又通常以五个人配置成一个小队，即特种作战小分队。小分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独立地制定行动计划。这样，众多的小分队构成了一张难以摧毁的屏障，即使有一支小分队全军覆没，也不会对其他分队产生影响。在紧急情况下，特种作战分队可以随时组成一支统一的联队，共同行动。

边防警察第九大队队联邦政府获得了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财政拨款。第九大队拥有专门为他们定做的载重汽车、摩托车、轿车等装甲特种车，

以及各种型号的直升飞机。作战部队配备有现代化的通讯器材和武器，其中仅一架能在夜间使用的高精度观察镜，造价就达 2 万马克。

为了造就一批精干的反恐怖战士，第九大队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招募和训练体系。蜚声国内外的第九大队队长乌尔里希·魏格纳说：“会杀人和能射击的莽汉我们是不予理睬的，我们需要的是谨慎而守纪律的人。”申请参加第九大队的资格是很严的，它要求申请者必须是至少在边防部队或正规警察队伍中服役一年以上的、年龄在 25—27 岁之间、身高在六英尺以上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申请者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资格考试，包括细致的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全面的运动考核以及个别谈话等。

和以色列等国的反恐怖部队不同，联邦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的成员没有高额的危险补助金和保险金。但是，能够成为这支部队的成员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在第九大队中，能够受到极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获取丰富的实战知识。这样，即使成员日后被第九大队淘汰了，仍能在其他警察部门找到一个非常优越的工作，对他本人将来的升迁也是大有好处的。因而，申请加入第九大队的竞争十分激烈。

有幸被录取到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的佼佼者，必须先接受三—六个月的基本训练。第一阶段的课程包括法律知识、徒手格斗、武器装备的操作、无线电技术、跟踪和监视，攀登悬崖和建筑物、汽车驾驶技术和各种破门方法。第二阶段的训练科目则根据需求和学员的特点开设，有的学习搭乘直升飞机追捕罪犯，有的学习保护重要人物，有的学习反劫机技术。整个训练的难度和强度是令人咋舌的，以至于训练班的淘汰率高达 90%，但最后留下来的，个个都是技术娴熟、艺高胆大的勇士。

精良的武器装备，严格的组织纪律、杰出的指挥艺术和高超的实战能力，使第九大队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十多年以来，这支部队以其赫赫战功誉满世界，也以无畏的战斗精神令恐怖分子不寒而栗。今天，第九大队已成为世界上最精锐的反恐怖特种部队，是对付暴力分子的一张“王牌”。

2. 美国

美国拥有一支反黑手党恐怖特种部队，下分陆海空共四支部队。“特混 160 部队”驻扎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配备有高速直升飞机。另一支空中反恐怖部队是驻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洛林空军基地的“空中特种部队”，它拥有的反恐怖特种部队被称为“海豹突击队”（SEALS），队员都是潜水员，基地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

在美国的反恐怖部队中，最著名、最精锐的是陆军反恐怖特种部队，名为“三角洲”（DELTA）。“三角洲”特种部队的代号是“蓝光”，成立于 1978 年 2 月，主要是以联邦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和以色列的反恐怖部队为蓝本建立的。“三角洲”部队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直接指挥。它的经费预算是没有限制的。

“三角洲”部队的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监狱。政府不惜投入巨资把这所监狱改建成一个现代化训练基地。“三角洲”部队的成员是从美国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中精选而来的，所有的人的军衔都不低于中士，因而，它又称为“美国武装部队的精英”。这支部队目前拥有 300 名成员，其中仅 100 名为作战队员，其余担任后勤、情报等配合性任务。这些队员都是经过近乎残酷的训练，从众多候选人中筛选出的，往往具有超人的

毅力和勇气。这些队员除了进行一般的军事技能和体能训练外，还必须学习多项专门技能。他们必须熟练地掌握东、西方和第三世界生产的八十多种新、旧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还要学会操作各种“土造”武器。他们要学会对桥梁、建筑物和水中目标进行定向爆破，并掌握医学、照相、指纹检查、潜水、滑雪、跳伞、通讯等方面的技能。可以说，每个队员几乎都是“万能博士”。

目前，在一些动荡地区，如黎巴嫩和中美洲地区，驻那里的美国外交官一般都有“三角洲”部队成员的暗中保护。这支部队参加过1982年在意大利营救多齐尔将军的行动；负责过1983年罗马教皇访问拉美时的保卫工作；在1984年，“三角洲”赴伦敦协助进行利比亚驻英使馆暴力事件的处理工作；同年12月，在科威特班机被劫持期间，它曾飞往阿曼演练救援行动。

“三角洲”部队拥有世界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有一种多功能传感器，可以在三公里外利用其“听、视、嗅”觉识别别人和其它目标。一个比雪茄还小的电子感应仪器，能在半英里外录制在密封机舱或无窗房间里的谈话。一种地波仪能在视线以外的距离测出坦克、车辆以及轮船的声响，判明是什么物体在运动。在灌木丛林地带，红外传感器可根据目标的辐射热，确定目标的轮廓。至于各具用途的进攻武器，更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三角洲”部队可谓兵强马壮，一向被新闻界吹得神乎其神。可惜，和其它国家的反恐怖特种部队相比，“三角洲”并没有多少显赫的成绩。1980年4月，“三角洲”部队执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恐怖活动，是营救被伊朗学生扣押在美国驻伊朗使馆的五十多人质。但由于气候和机器故障的原因，突击队尚未到达目的地，便发生了直升飞机相撞事故，只得中止了行动，丢盔弃甲，无功而返。好在1985年6月24日，“三角洲”部队在贝鲁特国际机场成功地突袭了一架被劫持的美国客机，救出40名人质，总算挽回了一点面子。

美国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特种小队，它人员精干，行动诡秘，专门对付核恐怖事件。该小队全称“核紧急搜索小队”，简称“奈斯特”（NEST），成立于1974年。当时曾发生一起讹诈事件：一个不法分子威胁当局交出20万美元，否则就要引爆安在波士顿的一枚核炸弹。事后查明，这次核威胁只是一个骗局。但这也提醒了美国政府，必须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以便对核恐怖事件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于是“奈斯特”应运而生了。这支小队由精通各种技能的科学家组成，配备着排除核威胁的特种设备。迄今，“奈斯特”已联合联邦调查局处理了许多核威胁案子，其中大多数案件属虚张声势。不过，在恐怖活动日趋升级的今天，确实有一些恐怖分子正打着利用核武器的主意。为此，美国政府对“奈斯特”的活动给予很大重视。1986年拨给的活动经费达870万美元。

3. 法国

1973年9月发生的沙特阿拉伯驻法国使馆被暴力分子占领事件，促使法国政府建立起一支精干的反恐怖力量，即国家宪兵干涉组（GIGN）。这支部队在行政上隶属法国国防部，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它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直升飞机和中型喷气机，实力雄厚。

国家宪兵干涉组人数很少，只有五十多人，但效率很高。他们共分成四个小组，每小组12人。全体人员及家属一律驻守在巴黎近郊的宪兵营房里，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小组值班，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有敌情，这支队伍便

可以迅速投入战斗。这支反恐怖部队人数虽然少，但其成员个个骁勇善战，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每个人既是空降兵、“飞毛腿”、登山运动员、神枪手，同时也是出色的高速驾驶员、拳击格斗手和水中“蛟龙”。法国国家宪兵干涉组创建以来，共执行任务 250 多次，营救人质 400 多名，可谓功勋卓著。在一些国际性的营救行动中，这支部队大显身手，赢得过国际同行的赞誉。

法国反恐怖部队在作战中表现出足智多谋，谨慎老练。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决不轻易动火力，以免伤及人质的生命。他们善于迷惑对手，等时机，一旦条件成熟，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对方，果断地结束战斗。1976 年 2 月，他们在吉布提营救人质的行动便是一起成功的战例。当时，有 30 名法国小学生被索马里暴力分子扣押在一辆大轿车里作为人质。GIGN 的一个小组迅速赶到现场。但是，由于暴力分子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一开枪必然伤及孩子。怎么办呢？小组指挥员想出了一个妙计，他们借口给孩子们送食品，在食物中拌入了安眠药，恐怖分子并没有疑心。几个小时后，孩子们昏然入睡，一个个都瘫倒在轿车里，这样，孩子们已脱离了火力范围。这时，反恐怖战士一起开火，子弹如雨点般向恐怖分子泻去，当场便有四名毙命，另外三个刚一露头，反恐怖战士的子弹便如长了眼睛一般，准确地将他们击毙。这场战斗打得干净利落，仅有一名儿童在这次交火中丧生。

1988 年 4 月 22 日，在南太平洋的法属喀里多尼亚岛上，发生了一起世界罕见的劫持大批宪兵事件，岛上的卡纳克武装黑手党徒把 27 名宪兵扣押在山洞中作为人质。国家宪兵干涉组组长勒高齐斯立即率领二十多名队员，赶到喀岛。为了拖延时间，寻找战机，勒高齐斯亲自出马。他化装成一名镖师，陪同别人深入虎穴，和恐怖分子谈判，从而摸清了洞内的情况。5 月 24 日夜 22 时，反恐怖突击队出其不意地打响了营救人质的战斗，他们使用自动轻机枪、火焰喷射器、眩光手榴弹、巨响手榴弹以及催泪瓦斯弹，迅速制服了对手。战斗之中，共打死和俘虏了 24 名恐怖分子，而人质和突击队员安然无恙。这次营救人质行动，在反恐怖主义行动历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4. 英国

英国的反恐怖部队是“特别空勤团”（简称 SAS）。它是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英国“陆军特别空勤团”演变而来的。1941 年 7 月，英国为了破坏敌军在非洲与地中海各岛上待命的飞机和其它目标，在埃及组建了一支特别空降部队——“陆军特别空勤团”。它由 6 名军官和 60 名士兵组成，不断骚扰敌人的后方。他们以伞降形式对敌人的飞机场、港口、仓库发起突袭，炸毁敌人的飞机和军用物资，然后在地面游击队的掩护下撤退。这支部队行动诡秘，破坏力强，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以后，在盟军解放西西里岛、雅典、意大利和法国的战斗中，这支部队都出现在主力部队的前头，成为一把令敌人胆寒的尖刀。1945 年，它还突然空降到马来西亚，在丛林中与日军作战。

1972 年以后，这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被正式改编为反恐怖特种部队，以对付日益猖獗的“爱尔兰共和军”和黑手党。目前，这支部队拥有大约 900 名队员，基地设在伦敦西边的赫里福德。

“特别空勤团”的成员都是从空降兵的伞兵中选拔的。他们入团后要进行为期三年的训练，内容包括：爬山、潜水、爆破、开锁、无线电通讯等。每个人都要精通一门特技，成为专家，每人还至少要掌握一门外语，能识别

和利用地图，能单独作战。

英国《星期日快报》1988年3月首次披露了特别空勤团的机密行动条例，它一共包括五项条款：“第一，每一行动要有书面命令，并且必须得到设在利斯伯恩的陆军总部的批准。第二，特种部队对付的目标必须是已经受到长期监视，并被确认是准军事组织的成员。第三，执行任务的单位长官必须确信‘目标’拥有武器和爆炸品，并且已经杀人或对他人的生命构成极大威胁。第四，符合上述条件，可以不经警告就开枪。第五，事后必须立即呈送一份详尽的报告。”

“特别空勤团”有辉煌的反暴力战绩。1977年5月，该团协助荷兰当局解救了一辆被劫持了的列车。同年10月，当联邦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奇袭一架被劫持到索马里的客机时，该团曾派两名专家协同作战。1980年4月30日，来自伊朗的五名恐怖分子占领了伊朗驻英国使馆，在40秒内闪电般击毙了四名恐怖分子，活捉一人，而突击队员无一人伤亡。

为了对付恐怖分子可能进行的核威胁，英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支反核恐怖秘密部队。英国《星期日邮报》于1989年1月8日披露了这支部队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全国第一流的核科学家组成，他们必须接受警察神枪手和炸弹处理专家的严格训练。这些科学家还被带到绝密的训练基地接受实战的放射性物质的演习活动，以使他们能够处置各种不测事件。

5. 其它国家

现在，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组建了专门的反恐怖力量。尽管这些部队与美、英、联邦德国等国的反恐怖部队相比略逊一筹，但也都具备很强的战斗力，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恐怖分子的克星。

荷兰拥有两支反暴力力量。一支是“海军陆战队”中的反恐怖支队，另一支是皇家的特种部队“骑警队”。其中，“骑警队”在组织结构和训练计划、任务方面都与联邦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相似，只是规模要小得多。1977年夏，在阿森铁路上，一列火车被恐怖分子劫持。这两支反恐怖部从协同作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出奇制胜，成功地救出了人质。

意大利警方在前总理莫罗于1978年遇害后，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红色旅”的反恐怖部队“宪兵突击队”。由于这支部队在战斗中每人戴着头套，只在眼睛部位留个黑洞，所以它也被老百姓称为“皮头套突击队”。该组织人员精干，全部成员仅50名，它的成员、指挥官的姓名、电话、地址都是严格保密的。

希腊建立反恐怖特种部队较晚。1988年7月11日，希腊“波罗斯”号游艇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外国游客死伤九十多人，三名恐怖分子事后乘快艇溜之大吉。在血的教训面前，希腊政府决定立即组建一支反恐怖特种部队。这支部队由200人组成，主要任务是负责保护游船、护送长途船只和负责港口安全。

此外，波兰的“特种突击队”、奥地利的“科布拉”、埃及的“突击队”、瑞士的“老虎部队”等也都是名扬世界、屡建功勋的反恐怖特种部队。

（二）改进反恐怖技术和装备

现代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武装了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掌握的新式武器不仅杀伤力大，而且便于携带，隐蔽性又好。他们运输、安装、藏匿武器的技术也不断翻新。为了适应这一新情况，各国政府不惜代价，加强了反恐怖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和生产。近年来，各国不断推出新发明的反恐怖

器材。归纳起来，这些器材大致可分为三类：安全检查型、防护型和进攻型。

1. 安全检查型。

安装在重要出入口的传统安全检查系统只能查出金属制的武器，对非金属武器则无能为力。现代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携带塑胶制的炸药或手枪，大模大样地蒙混过关。针对这些塑胶制火器和炸弹，新型的尖端检测系统不断被研制成功并投放市场。

美国科学与工程公司于 1986 年设计成功的 Z 型 X 光扫描系统，不同于以往的 X 光扫描器，它对低原子量物质非常敏感，可以显示出塑料武器和塑胶炸药等低原子量物体的形象。到 1988 年为止，欧洲已有十多个机场购买并安装了这种价值 7 万美元的新式探测仪，美国海关也计划添置这一设备。

1988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家天体物理研究公司研制出一种新的 X 线扫描装置。它通过颜色密码可以辨别旅行袋中的各种物品。其原理是采用放射高能和低能 X 线的双剂量系统，高能射线束用于探测含碳物体，低能射线用来探测金属和玻璃制品。扫描系统的计算机按物品的化学组成进行分类，又给每种物品指定一种颜色，再将颜色信号显示到荧光屏上。据测定，塑料爆炸物在 X 线扫描器上呈现橙色；金属和玻璃制品呈亮蓝色；手枪之类的武器由于壳体较厚，X 线不能将其穿透，在扫描上呈现的是绿色。目前，世界上几家大机场已安装了这种新式安全检查装置。

在英国剑桥郡有一家“空运安全公司”，他们出售一种专门检查可塑炸药的仪器，生意相当兴隆。这种仪器可以测出以三甲基三硝基胺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可塑炸药散发出的极微量水汽。这是一种可以放在手提箱内的袖珍装置和手握金属探测器同样容易地对旅客搜身。

另外，美国马萨诸塞州热电医学公司还发明了一种新型电子探测器，它可以在行李中“嗅出”炸药里存在的氮。

诸如此类的安全检查系统不断问世，如能在世界各地的安全检查站普遍应用的话，将能有效地在恐怖分子面前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1988 年，美国弗吉尼亚特别销售公司宣布，他们已发明了一套反恐怖仪器，使用电视和电脑系统对恐怖分子进行核对和监视。这套仪器是在飞机上、机场内其他地方安装电视摄像机，并与储存已知恐怖分子照片的电脑相连接。如果电视摄像机拍摄到恐怖分子的面孔，在几分钟内，电脑就发出警报。目前，这家公司的电脑已储存了 1.5 万张人头照片。由于照片都已转化成数据资料，因此，这套仪器能识别经过化妆的面孔，如戴胡子、假发的恐怖分子难逃过它的慧眼。它还能发现机上乘客的反常行为，如戴面具、掏武器等。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许多航空公司都对这一系统表示有兴趣。

2. 防护型

这类装备和设施主要用于阻止恐怖分子的袭击，或在遭受袭击时，尽量地减少自己一方的伤亡。美国国务院于 1984 年 11 月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四年来投资 44 亿美元改善大使馆的防护设施，收到了一定效果。

恐怖分子惯用的汽车炸弹袭击，使美国政府甚感头痛。现在，白宫已拆掉门口用来阻挡公众视线的铁栏杆，换上齐腰高的混凝土障碍物，以防备有炸弹的汽车冲入。国会山设置了许多种植天竺葵的水泥盆，目的也是为阻挡车辆。同时，一辆辆装满沙土的自卸卡车和“撞击汽车”也昼夜停在那里，发动机从不熄火，以随时拦截来犯的汽车炸弹。

美国一家公司研制出一种受欢迎的反自杀汽车挡板。这是一块厚一英寸的钢板，平时平铺在大门口，一旦启动，一台电动液压泵控制的绞链可在一秒钟内使钢板竖起来并向前倾斜，其抗冲撞强度能挡住最大吨位的卡车全速冲撞。为保险起见，也可安装两层。现在，美国国务院和其它重要政府机构都安装了这种装置。

法国总统府也有防汽车炸弹闯入的设施。在总统府的主门廊下，竖立着一个高1米、直径20厘米的圆柱体。驶入的汽车经检查可放行时，警卫才按电钮将圆柱体降入地下，让汽车通过。

世界上暗杀活动的日益猖獗，使生产防弹衣的工厂获得了滚滚财源。1973年，世界上仅有一家生产防弹衣的工厂，到1988年已增加到几十家。防弹衣的质量也不断提高，在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上大显身手。约旦国王侯赛因曾多次遭到暗算，多亏了他的防弹衣，才使他幸免饮弹身亡。意大利的防弹衣工厂专门为罗马教皇制作了一件白色长袍，正是这件长袍使教皇多次死里逃生。像美国总统里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也整天穿着防弹衣，不少恐怖分子也穿上了这种服装。

制作防弹衣的材料是一种叫“凯芙拉”的特种纤维织物，它重量轻而质地坚固。防弹衣包括衬衣、雨衣、礼服、风衣、背心等，有的用十多层，甚至二十多层“凯芙拉”缝制而成，但重量不超过1.5公斤。这种防弹衣韧性好，承受和分散子弹、弹片的强度比钢板高六倍，可抵御轻机枪和近距离扫射，手枪、猎枪子弹更不在话下。

美国联邦调查局采用一种特制的防护罩来对付恐怖分子的袭击。这种外形犹如圆形信筒的护罩套在人身上，长度可达髌关节之下。使用者从眼睛部位的透明窗看到外面的情况。右手可以从防护罩中伸出，进行瞄准及射击。为了防备恐怖分子半路袭击，当今的各国政界要人、大公司老板、外交使节大都配备了高级防弹轿车。如美国总统乘坐的黑色林肯牌轿车，防弹性能良好，在破坏性试验中，特工人员对这种车连击百枪，弹头四处横飞，座车除喷漆有脱落外未有伤洞。法国总统乘坐的是一种带装甲的汽车，它可经受住枪弹和小型火箭弹的袭击。1987年12月、当戈尔巴乔夫到美国与里根会晤时，特地把自己的苏制“吉尔”牌装甲防弹轿车从莫斯科空运到华盛顿。近两年，有一种超级防弹车已投入使用。它枪弹打不透，炸药炸不毁，地雷炸不垮。这种车的防弹玻璃是美国宇宙航空工业界研制出来的，有5厘米厚，分三层结构：最外一层是耐磨擦而光滑的膜，可以使打斜的子弹滑走；中间一层是强化聚碳酸酯，其硬度比铅更硬；最内一层为缓冲层。轿车门板更加坚固，它是美国直升飞机防弹夹板材料进一步强化而成的，不仅硬到反坦克火箭炮都打不穿，而且有适当的柔韧性，可以防震裂。这种车的车盖、车底、驾驶座与客座之间的隔板都用防弹夹板制成，其轮胎、马达和油箱亦受特殊保护。轿车的前后两侧装有催泪瓦斯发射口，防备有人靠近车身。车内还有自动灭火装置，无论哪一部位着火，都会有灭火剂喷出，将它及时扑灭。这种车具备缓冲系统，不怕撞击，而且当碾上地雷或挨了炸弹时，只能整辆车弹起，不会被炸散。在恐怖分子当前的攻击能力下，乘坐这种车可谓比较保险了。

3. 进攻型

在反恐怖斗争中，各国军警难免会和暴力分子兵戎相见。进攻型装备就是反恐怖人员提供的特殊武器和辅助性工具。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恐怖特种部队都配备了一种闪爆弹，又称“晕眩弹”。这种由联邦德国设计的防暴利器，在爆炸的瞬间会产生极刺眼的闪光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恐怖分子在短时间内（约10秒钟左右）暂时丧失视觉与听觉能力，瘫倒在地，反恐怖突击队员便可以利用这宝贵的几秒钟，冲向失聪失明的暴力分子，把他制服。这种闪爆弹曾在袭击劫机分子的行动中显示神功。

反恐怖突击队使用的枪支种类繁多，各具优势。

如果想在1000米之外轻易干掉恐怖分子头目的话，可以用7.62毫米佛瑟狙击枪。这种英国皇家兵工厂特别设计制造的步枪再装上特制的狙击瞄准望远镜，其威力更高一筹。

为对付火力较大的恐怖分子，可使用AR—15突击步枪。这种枪口径只有5.56毫米，子弹初速高达每秒1000米，发射速度为每分钟950发，在400米有效射程内杀伤力极强。

当和恐怖分子在屋内短兵相接时，突击队最顺手的武器是M—37霰弹枪。这种枪口径大，射程仅几十米，但霰弹从枪口射出后，效果好似一门小型火炮，在近距离内极有杀伤力和压制力，可对恐怖分子造成极大的威慑，迫使其缴械弃甲。

法国总统卫队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短筒防暴枪与冲锋枪，子弹是半穿甲的，能杀伤被瞄准的人，但不会穿透，因而避免了击中其它人或弹回。

另外，反恐怖突击队员的枪上，一般还配有红外线瞄准仪，有了这种瞄准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可以清楚地瞄准射击目标。

在这里介绍国外反暴力情况的时候，顺便提一下中国对世界反恐怖活动技术的一个贡献。

1986年，中国轻型武器研究所设计了一种微型反劫机专用手枪，并已投入批量生产。这种枪是我国各种制式手枪中最小的，重量不到一般手枪的三分之一，而且具有防水、耐高温和低温等性能。在高空飞行的飞机机身遭到子弹击穿后易被冲裂，严重时可导致机毁人亡。而反劫机专用手枪使用的子弹只有铅笔上的橡皮头那样大，是特制的，不会击穿飞机表面蒙皮，只在机身上留下浅浅的小坑。子弹也不会穿透机舱的玻璃。这种微型反劫机专用手枪，是机上保安人员制服劫机恐怖分子的理想装备。

（三）加强对重点目标的保护

国际恐怖分子为了扩大影响，震动社会，总是把政府首脑等重要人物、大使馆和法院等重要部门、机场和车站等重要公共场所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因此，只有加强对这些重点对象的保护，才能挫败恐怖分子的阴谋，减少损失。

目前，各国都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在美国，除了白宫的850名警卫队员外，总统还有40名贴身保镖。这些有“肉体盾牌”之称的保镖个个身高马大，具有百步穿杨之功，此外，还有精通现代通讯、车技和擒拿格斗术。总统外出时，至少有五名保镖相随：两人在前开路，两人负责断后，一名紧随总统身边。他们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把周围所有的人都看作潜在的威胁，在集会和社交场合，他们常化装成总统模样或和总统穿一样的衣服，以迷惑刺客的视线。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一个丛林地带，有一所“理查德高级保镖训练学校”。这是美国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训练中心，专门为大企业家、政

治家和社会名流提供训练有素的专业贴身保镖。美国前总统里根、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贴身保镖都毕业于该校。1981年，里根总统在希尔顿饭店门前遇刺时，就是里根的贴身保镖在众多保安警卫人员中第一个拔出手枪，在别人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第一个冲向总统，置身于刺客和总统之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刺客的子弹，保住了总统的性命。他因此被美国国会授予“忠勇卫士”的勋章，并被提拔为卫队长，“理查德高级保镖训练学校”因此也声名大震。西欧、中东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慕名向该校索要毕业生。

美国总统的所有食物都要严格化验。如果是一篮桔子，每只都要切片化验后，才能让总统及其家属食用。有些子女常对总统父亲发牢骚：“贵为第一家庭却吃不到整个桔子，实在可怜。”前总统尼克松喜欢吃河蟹，但经过保安人员的三道关卡切片化验，活蟹早失去了鲜味。为此尼克松曾气愤地摔过叉子！

每天送到白宫的大量物品，都先由保镖用荧光镜透视，若有疑点，就到安全室用X调光透视作诊断性检查。一旦疑点不清，就一律送到郊区引爆炸毁。

在暴力手段日益升级的今天，为防止美国总统被内奸安置的放射性武器杀伤，保安人员还定期用有“概率计数器”对白宫进行检测。总统办公室隔壁建立了报警系统，如果发现任何原子尘，就会立即报警。

法国总统密特朗有75人的贴身卫队，全部成员都是合格的跳伞员、急救员，受过格斗、驾驶、攀登和游泳训练，大多数人有辨别爆炸物的知识。卫队有两名电子学专家和几名潜水员。

无论法国总统走到哪里，卫士都会跟到哪里，连总统个人散步也不例外。总统卫队提出了一种保卫工作的“层次理论”，即保卫人员围绕总统组成三层圈子。第一层圈子的人直接与总统接触，第二层圈子位于距总统20米左右，第三层圈子则位于此界线以外，要求不得有两个保安人员同时做一件工作。例如，不让两人目光监视同一区域。一旦发生事情，训练有素的卫士们每人只留意于事前指定给他的任务，恐怖分子无法指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在密特朗总统外出活动时，总有一个拎着手提公文箱的卫兵跟在身边，所提公文箱是用特殊材料制造，能挡住射来的子弹。由于密特朗拒绝穿防弹衣，安全人员才想出了这个替代办法。

法国总统每次外出，卫队总要先行，对所去的地方进行三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是在总统到达前几小时，排雷员与电子专家进行细致搜索，并关闭场地。当密特朗出于礼仪需要，须站在圣丽舍宫的台阶上时，任何人都不得在对面大街的人行道上停留，附近建筑物顶上有荷枪实弹的警察拿着望远镜警戒。

每当重要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国访问或举行国际会议，往往引起举世瞩目，这也恰恰是恐怖事件多发之时。因此，在这一期间，有关国家的保安人员更加紧张，如临大敌。前几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奥地利时，警卫人员多达3000人，其中有200人是从美国带去的特工人员。1988年6月，当西方七国首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会议时，盛传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和日本的“赤军”暴力分子计划发起袭击，加拿大警方戒备森严，严加防范，共出动了3000名军警，动用了直升飞机和骑兵，还在会场和七国首脑下榻的饭店周围的高层建筑物上设置了流动哨。地面上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以应付突发事件。

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赴华盛顿与里根会晤时，带去了135名紧随左右的克格勃特工人员。美方安全机构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的车队所要经过的17公里长的公路上，所有人口都暂时封闭，其他车辆改道运行。此外，美方安全人员和警犬事先仔细检查了所经公路两侧射击范围内所有的下水道、邮筒、楼房和道路交叉口，下水道的出口一律封闭。在华盛顿市区内，车队经过的路上都设有路障，并不准停车，如有停车，一律用拖车拖走。街上行人也受到了抽查。在会晤期间，美联邦航空署禁止飞机飞临车队上空，华盛顿市区的部队地区上空被列为飞行禁区。美国还在戈尔巴乔夫下榻的苏联使馆附近布置了大批安全人员。

在人们心目中，使馆应是林木葱笼、鸟语花香的地方，但国际恐怖主义的肆虐已使热点地区的使馆变成一座阴森森的军事堡垒。美、法、意、联邦德国等国驻贝鲁特的使馆，都是戒备森严，其中防卫最严密的要数美国使馆了。

美国使馆曾两次遭到汽车炸弹袭击。为此，美国外交官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加强保安措施。在距离美国使馆500米远处，一道路障将马路拦腰截断，任何车辆行人未经黎巴嫩警方检查，不得通行。再往里200米，一堵高约2米的沙袋赫然横亘路中，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对来往汽车实施安全检查。离美使馆还有100米时，有一条由几吨重的水泥方块组成的S形通道。车经过这种通道时，必须挂二档缓缓行驶，否则就会被撞。在使馆门口停着两辆M—60型坦克，炮口指向S形通道。为了防御火箭推进弹的袭击，使馆的整个七层大楼都被一张特制的大网罩住。当有人进入美使馆大门时，还要走过一个类似机场安全门的通道。楼中电梯的门要用特制钥匙才能打开，而其他楼梯都被封死了。许多西方记者将驻黎巴嫩的美国使馆称为世界上防卫最严密的使馆，是恰如其分的。

为防止暗杀和绑架，西方高级外交官在贝鲁特的住宅也有武装保护。其中，守卫美国大使的兵力达一个连，配备的重型武器包括五辆坦克和六门高射炮。

近来一连串的劫机、空中爆炸和袭击机场事件，迫使各国加强机场保卫。特别是1985年12月恐怖分子袭击罗马机场和维也纳机场的惨案发生后，各大机场除使用各种新型电子设备加强检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特别保护措施。

在西欧，英国已打破惯例，除了调遣坦克、军队进驻机场外，又给守卫机场的警察配备了手提机枪。历来注意保持良好形象的英国警察，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佩枪执勤。奥地利当局反应是加强了驻守维也纳施怀泽机场的特别反恐部队。法兰克福、慕尼黑、巴黎和马德里的国际机场，都加派武装警察在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柜台区巡逻。

在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的中东，埃及开罗机场现在与军营无异，只有持有机票的乘客才可以进入机场大厦，武装保安人员24小时守卫在机场大厦。为防万一，保安当局还在航空公司的行李过磅区架起了防暴障碍。乘客登机前，必须接受两次护照检查，所有行李都要经过缜密的搜查，乘客登机前要搜身，到了舱门还要搜查一次。

东京机场的保安措施与开罗机场不相上下，在距机场一公里的公路上，有机场特警的关卡，乘客必须下车接受检查。到达机场后要先经过保安检查，所有提包和行李必须打开，检查后贴上保安封条，如果封条断裂，行李就要

重新检查，否则不准登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提包和行李放行后，有人擅自揭开封条把武器或爆炸物放进去。

在以色列，机场的保安措施包括巨细无遗地逐件检查行李，乘客登机前要接受详细的盘问。在以色列的大多数班机上，都有配备“乌兹”型轻机枪的空中警卫乔装乘客。

在美国，自 1985 年 6 月环球航空公司客机被劫持以来，所有的主要机场都加强了保安措施。

有人预言，禁止旅客亲友进入机场送行这样苛刻的限制，不久可能成为被普遍采取的措施。

奥运会，可算是当代世界上最隆重的盛会。奥运会期间，全球注目，各国的游客蜂涌而来，这就给恐怖分子混水摸鱼、制造爆炸性新闻提供了良机。特别是慕尼黑运动会发生枪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暴行后，运动员、记者和工作人员的绝对安全，成了衡量奥运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4 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成立了安全特别行动组，组建了一支防暴待遣队。这支头戴防毒面具、荷枪实弹的敢死队，时刻守卫在各主要运动场和公共场所。一旦有突发事件出现，这支部队就会如同神兵天降，迅速出现在现场。

1988 年 9 月，第 24 届奥运会在汉城举行。当局为保障安全，早在奥运会开幕前半年多，就设计了一整套严密的防范措施。由组委会和机场协同安全要员、电器技术专家、消防人员组成了一个协同作战综合服务性组织，以确保奥运会期间的机场安全及出入境的官员、运动员和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有关部门建立了一支特种反恐怖部队，专门负责奥运会期间的治安保卫工作。此外，还出动了大批警察、士兵和有关专家。奥运会期间共出动了 10 万名保安人员，他们被分编成 16 个大队，分驻体育场和各奥运村及有关设施。这些保安人员配备了新式的反恐怖武器，如：能打穿水泥墙的气枪、带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日本进口的瓦斯步枪和只要听到声音就会使人失去知觉的噪音步枪等。此外，还在汉城等城市设警察电子指挥体系和电视监视网，在机场和码头配备了爆炸物探测器等。

在运动员村的周围设置了严密的警戒线，架设了铁丝网，由军人严密把守入口，在铁丝网周围还设立了流动巡逻哨。同时，运动员村入口还设置了爆炸物品探测器，电子感应装置等尖端设备，以防患于未然。各国运动员和体育官员外出时都受到了武装保安人员的严密保护。

在马拉松赛、自行车和帆船等项目中，保安当局更是费尽了心机。他们设计了从陆上、水下到空中的立体式保护网，还设立了应急救援组织，一旦发生紧急事件，立即派精锐力量赶赴现场，以防止事态扩大，尽量把事态控制在小范围之内。

在这次奥运会开幕前，有情报说，有暴力组织打算在奥运会期间进行骚扰。也许是严密的防范措施起到了作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在风平浪静中结束了。

（四）开展情报工作和宣传工作。

对付恐怖分子，除了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和一批性能精良的武器装备，还需要做好情报的搜集和积累工作，需要进行广泛的、有效宣传工作。这是保证反恐怖斗争能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

中国有句老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掌握第一手可靠的、全面的

情报资料，是有效地打击恐怖分子的先决条件。联邦德国反恐怖的成功经验中，有一条就是“对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嫌疑分子的动态掌握了极为准确的情报”。美国人曾因为在中东和西欧没有获得准确、及时的情报吃过大苦头。美国反恐怖主义专家在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时，提出了“替恐怖主义分子或组织画像”的建议。他们列出了一系列搜集情报的要求，其中包括恐怖分子的姓名、性别、年龄、种族、个人历史、使用的武器、训练情况、集团的组织情况、行动的类型、破坏目标的性质及人质的国籍、身份、年龄、职业，以至于恐怖分子提出要求的性质、具体内容，企图达到的目的等。然而，这方面的情报工作有一定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斗争的进展，恐怖主义的成员、行动的目标、使用的手段都会有变化，因此专家们指出，这种情报搜集工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应当是长期的、持续的工作。

在情报工作方面，美国可以说是走到了各国前面。在美国十大情报部门中，有六个直接参与搜集黑手党及其它恐怖主义分子的情报，即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公司、国防情报局和武装部队的情报部门。现在，美国已积累了大量国际黑手党及其它恐怖主义分子的资料和照片。中央情报局储存着 2000 多万份世界各国的各种护照和入境证件等资料。这些资料同机场、海关等地的电视摄像机和电脑系统配合起来，就能迅速确定被检查人员的身份和所持证件的真伪，甚至能当场辨出恐怖分子。这种掌握准确情报的措施在防范劫机事件中特别有效。美国联邦航空署在旅客购买机票及通过安全门登机时运用这方面材料，及时阻挡了企图劫机的嫌疑分子登机，其成功率达到 87%。

为了及时掌握恐怖组织的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不择手段、不惜血本的。他们绞尽脑汁地竭力往恐怖小组内打入特务或告密员。这些人往往先被派去充当帮助恐怖活动的外围人员，再逐步打入核心；或冒充那些恐怖分子容易招募的较为激进的学生和失业的青年。《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一书中曾透露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个左倾学生来到美国大使馆打听有关签证的事，中央情报局乘机向他提出，只要愿意合作，完成任务后保证从银行得到一笔钱，于是，这个学生奉命参加了恐怖主义组织的外围，并逐渐接近了这个组织的核心，不断传递有关这个恐怖组织的情报。

美国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约瑟夫·皮斯托恩在取得黑手党徒的信任后，逐步打入黑手党内部。六年之中，他的家庭和姓名严格保密，至审判之前未向外界披露过。在秘密潜入黑手党的那些岁月里，他每天都在说谎。他确信，他的谎言是为了一个具有崇高道义的目的：帮助美国政府摧毁黑手党。然而，他又害怕，当他有一天终于站在证人席上，当那些黑手党徒被送上法庭时，他的生活也将失去意义，将生活在无言的秘密之中。从 1980 年 7 月开始，他终于在黑手党里取得了大量的证据。法庭开始审理这批黑手党案件中的头一桩时，他已 43 岁。他失去了六个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春秋，其间儿女已长大。

1983 年，开庭审理。

五名黑手党被告已经到庭，设有五排座位的记者席已经爆满，审判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三百多位旁听者只好站着。这是令黑手党分子难以置信的。尽管黑手党分子不相信这一切会发生。但另两名被告已在审判前供认了他们的罪行。

黑手党各家族已盟誓立约，对皮斯托恩进行捕杀。为此，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对他实行了 24 小时保护。

1984年2月美国国务院起草了四项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决议。其中第三项是关于对提供美国国内或国外恐怖活动情报的人的奖励办法。草案规定，凡是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有关恐怖分子活动线索者根据情报本身的价值得到的奖金须由总统或众议院批准。为了保护提供情报的人，美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证人保密”组织，保护他们及其家属的安全，并严格为他们保密。

意大利保卫部门的情报系统善于利用黑手党分子本身来获取情报。他们通过心理战迫使被捕的黑手党提供情报。有时，仅凭黑手党分子的一句供词，就能轻而易举地端掉一个黑手党分子的基层组织。为了分化、瓦解和利用被捕的黑手党分子，让他们为警方提供有利的情报，1982年5月，意大利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授权意大利法庭对那些“供认不讳”或向当局提供消息的黑手党徒可以减刑。1983年初，就有四百多名提供过情报的“黑手党”分子被从轻发落了。这一招真灵，本来逍遥法外的黑手党分子为此终日惶惶不安。

开展适当的宣传活动，在反恐怖斗争中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美国，有一些学者使用行为科学的方法对恐怖主义者进行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适当地利用宣传武器开展心理战，同样可以达到制止，减少恐怖事件发生的目的。

在西方国家，大多数的新闻传播媒介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不少电视台、电台和报纸为了抢新闻都竞相把恐怖活动作为爆炸性新闻公之于众。一些新闻机构为了招徕读者，添油加醋地把恐怖活动的细枝末节描摹尽致。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忧虑。美国一些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指出：宣传报道要注意分寸，避免产生副作用。他们认为，不适当地渲染、描绘恐怖事件，常常会带来所谓“暴力传染病”的后果。例如，报道恐怖主义分子行动得逞、逃跑成功的消息往往会激起其他恐怖分子争相效尤；过多地渲染击毙或处决一名恐怖分子有时也会促使其它恐怖分子进行变本加厉的活动，因为有些恐怖分子的心理状态是志在必死，只求一鸣惊人；详尽地叙述恐怖分子提出的目的、口号，实际正中他们的下怀。

总之，过分宣传正是恐怖分子求之不得的。因此，在恐怖事件发生后，报道什么、如何报道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新闻界的重视。

在西方各国，对外交人员和普通公民进行反恐怖主义教育和宣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外交部门给各驻外使馆散发《恐怖主义手册》，有关专家还专门对大使进行反恐怖训练。社会各界对去海外旅游、学习和工作的公民进行有关反恐怖教育。1986年，美国好莱坞制片人推出《旅行恐怖》的录像带，由反恐怖专家专门指导人们在受到恐怖分子袭击时如何避难逃生的方法。录像带出版后，大受人们欢迎，制片商也因此大发其财。在录像带中，专家讲解了一些对付恐怖袭击的方法。它们包括：第一，当恐怖分子站在你面前时，不要望着他。第二，在恐怖分子面前，千万不要与他人耳语，这会招来杀身之祸。第三，不要拒绝恐怖分子提供的食物、资料和香烟，否则会被认为对他们不敬。第四，在飞机场入口，要尽快通过安全门，勿留恋于公众来往的候机室。第五，在飞机上选择的座位最好靠窗，因为坐在通道两旁存在着更容易受到粗暴对待的可能性。这些宣传和教育，对于减少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失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国际反恐怖合作

1972年5月30日，一支暗杀小组潜入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国际机场，不加选择地向旅客群开枪，打死打伤106人。当时《时代》杂志曾报道过这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暗杀活动。美国国务院反恐怖协调官员曾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全世界1983年在93个国家发生了746起国际暴力事件，作案看来自71个不同民族的117个暴力组织。

面对恐怖主义这个可憎的“政治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蔓延，交叉传染，像以前那样“各扫自家门前雪”的做法已经过时。采取把暴力主义推出去的明哲保身的办法到头来只会引火烧身。各国政府已认识到加强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一些专家指出，今后的暴力事件已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所能对付的，也不能指望某个国家、某个部门单独行动，反对国际暴力组织是一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报、法律、舆论、心理各方面综合的斗争，必须动员世界各国力量，联合社会各界，实现“以国际化对付国际化”才能奏效。

现在，世界各国正加强合作，一条反暴力的国际联合阵线正在形成。

（一）欧美国家间双边和多边合作

欧美各国是恐怖分子跨国活动最频繁的地区。然而，多年以来，欧美各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反恐怖合作关系。一些国家从自身的外交政策和利益出发，对恐怖分子采取退让、宽容的态度，委屈求全，推卸责任。这种姑息养奸的做法虽然暂时保全了自身，但却给恐怖分子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愈加猖狂，导致恐怖活动新的泛滥。惨痛的教训告诉人们，恐怖主义没有国界。

1979年10月，西欧共同体的司法部长们首次聚在一起，讨论加强国际合作以控制恐怖活动的发展。他们联合发出呼吁：“对出钱、出武器帮助恐怖分子，给予恐怖分子训练和宣传方便，并且准许他们避难的国家进行外交和经济上的制裁。同年12月，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对于进行动机、绑架、使用炸弹以及自动武器装备袭击外交人员等活动嫌疑的人，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必须进行引渡或起诉。

1984年1月，美国邀请英、日、法、意、加拿大和联邦德国的有关官员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反恐怖主义的秘密会议，决定联合组建一个“国际反恐怖活动网”。

1985年1月，在国际暴力的狂潮中，法国国防部的奥特朗将军被暗杀。在这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西欧各国大大加快了建立反恐怖联合阵线的步伐。2月，来自西欧各国的八十多名反恐怖专家云集布鲁塞尔，进行紧急磋商，研究联合防范措施。同时，意大利利用当时担任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主席之便，不遗余力地推行反恐怖联合行动。意大利政府内务部长到比利时、西班牙、卢森堡、荷兰和南斯拉夫进行穿梭访问，专门协商反恐怖问题，2月5日，法国总理法比尤斯专程飞往联邦德国同科尔总理商讨反恐怖合作，宣布将建立法德反恐怖主义联合阵线，并希望其它国家也加入这个阵线。同一天，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宣布，两国将开始定期交换关于恐怖主义的情报。这短短几天的一系列活动，把西欧大规模反恐怖合作推向了一个高潮。

1986年，欧洲共同体外长曾四度开会讨论联合对付恐怖主义的事项，给反恐怖合作增加了不少具体项目。10月份，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决定在共同体国家间建立反恐怖主义情报热线，同时还开列了200个恐怖分子的名单。

12月9日，共同体外长会议再次明确了“恐怖威胁来源国”以及恐怖组织和个人清单，商定反恐怖活动不受各国移民和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为快速传递恐怖分子的照片和有关识别资料，西欧计划建立快速无线电报警和信息传真系统，设立联合情报和侦缉行动网，其效能大大超过国际刑警组织。西欧各国还共同商定，在必要时联合揭露参与或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共同合作说服或迫使已知的恐怖主义“发起国”或“支持国”放弃恐怖活动；互相提供证据，审慎使用武力，以便对恐怖袭击活动作出快速反应，真正用武力威慑和进行“预防性攻击”。

1987年5月28日，西方九国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引人注目的部长级会议，讨论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美、日、英、法、意、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的内政或司法部长及高级警官参加了会议。他们就恐怖主义的威胁广泛交换了意见，决定加强合作，在行动、情报和技术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主动行动。据报道，这种会议将在九国轮流举行，并打算设立联络秘书处，加强两条情报网，分别交流欧洲和中东的恐怖主义发展动向。九国司法部长准备就法律问题制订补充措施。舆论界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西欧的反恐怖主义合作已扩大到整个西方阵营。法国《解放报》认为，西方诞生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反恐怖主义俱乐部”。

1986年6月9日上午，在威尼斯召开的第十三届七国首脑会议发表了《关于恐怖主义的声明》，重申在波恩、威尼斯、渥太华、伦敦和东京举行的历届首脑会议就此发表的声明的精神，再次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七国首脑郑重强调，与会国将遵守不向恐怖分子或支持者作任何让步的原则。1988年6月20日，西方七国首脑在多伦多发表的政治声明再次强烈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并呼吁各国为反恐怖主义进行合作。声明在重申了上届首脑会议确定的原则立场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空中安全，即同破坏和劫持飞机行为作斗争的问题。

欧美国家的反恐怖合作已取得了可观成果。

首先，在反恐怖技术方面，欧美各国互相协助，合作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观察和监视器材方面，它们联合研制或互相提供了能透过墙壁和窗帘的侦听、透视仪和红外线、激光仪及其他电子侦察设备。在特种装备和设备方面，它们不断推出先进的机场安全检查设备、电子跟踪设备，以及突击队员使用的轻质防弹护具、攀登用具和打开缺口的突破技术，还有高效的急救医疗技术及装备。各国还在研制对付恐怖分子的失能剂和命中度高而且消声效果好的高效杀伤武器方面加强合作。1987年5月，法国内政部长帕卡透露，警方在茫茫的枫丹白露森林搜出了恐怖分子埋藏的炸药，原因之一是使用了美国提供的尖端设备——质度和密度地下电子探测仪。

其次，欧美国家在直接反恐怖行动上，并肩作战，互通情报，建立了双边或多边协同关系。1987年3月，根据联邦德国提供的情报，法国成功地侦破、逮捕了几名重要的恐怖分子。同年5月，由于西班牙和法国的合作，意大利警方破获了一个“黑手党”小组。

1988年3月23日，西方近二十个国家在罗马签署了一项条约，要求签约国起诉或者引渡那些在公海上施暴的恐怖分子。条约要求把对船只和坐船人的施加暴力的行为视为犯罪，必须给予严惩。据美国一位专家评价，这项条约“填补了国际反恐怖活动中的一个空白”。

（二）国际反恐怖条约

1987年12月7日，联合国大会以153票赞成，2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明确把任何人在任何地点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谴责为犯罪。决议要求所有的国家采取有效而果断的措施来加快并最终彻底消除国际恐怖主义。这届联合国大会还要求秘书长征求会员国的意见，决定是否召开一个由联合国发起的国际会议，以便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

60年代，为了对付劫机事件，在日本东京签订了《东京公约》。60年代末出现了劫机狂潮，使《东京公约》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70年代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专门讨论了劫机事件，最后签订了《海牙公约》。

以上我们看到了世界反黑手党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和艰难的历程。从整体上摧毁黑手党就需运用其弱点并且需警方勇敢而大胆、仔细而又谨慎地寻找证据，因为当代的黑手党徒许多都拥有合法生意和社会地位。对于黑手党活动的外部显现即是恐怖活动，造成了全世界反恐怖运动，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黑手党这个九足兽能否最终被消灭，世界人民正充满着希望。

